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农奴戟英雄血——清湖谓华暴动纪实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引子

一九二七年元月二十六日，在风雪交加中，冯玉祥一行打马进入西安西门。

与一九二一年第一次督陕不同，那时他是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北京政府的封疆大吏身份出现在三秦大地上；而此时，同一个冯玉祥，却以国民军联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阔别了五年之久的西安。他将三秦大地为基地，与那个他曾靠之起家的北洋军阀营垒作一死战。

尽管天寒地冻，冯玉祥进城时心中还是窜跳着一簇熊熊的炽火。

满目疮痍的古城对冯玉祥将军的欢迎是空前的。经历了刘镇华镇嵩军八月围城之苦的西安老百姓扶老携幼，从西安城的各个角落跑了出来，黑鸦鸦的人群挤塞在冯玉祥经过的街道上。

风萧萧，雪茫茫。

童谣穿破风雪，使隆冬变得暖和起来：

不盼爹，不盼娘，单盼来个冯玉祥……

冯玉祥闻声驻马，向路边正在唱歌的一群孩童看去，那些七八岁十来岁的娃娃个个都骨瘦如柴，精细的脖子上挑着的脑袋青里透黄，带着菜色。冯玉祥鼻子微酸，他正要翻身下马，一个衣衫褴褛的老汉跌跌撞撞走了过来，双手紧紧抓住他的马镫。卫兵赶过来驱赶，被冯玉祥制止了：“不要动他，看老人家有什么吩咐。”

老人摸着冯玉祥的靴子，干枯的眼窝里蓄着一滴浊泪，死死地盯着冯玉祥的脸，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冯大帅……我想跟你说，盼你哩……”

冯玉祥赶紧翻身下马，用手扶住老人，动情他说：“老人家，玉祥来迟了。”

老人紧紧抓着冯玉祥的胳膊，挤出一丝惨然的笑，用越来越微弱的声音说：“……冯大帅……秦人苦啊……”

冯玉祥鼻子又一酸，正要开口说些什么，只见老人松开了抓着他的手，身子向后一仰，倒在了雪地上。

老人倒下去的时候，轻飘飘得像个纸人。

冯玉祥俯下身子，半扶起已经没有一点气息的老人，忍住悲痛，打量一下周围，问：“有认识他的吗？”

路边挤出一个约摸三四十岁的汉子，说：“我认识，他是四府街的韩玉成，人称韩老四，娃们都叫他四爷爷。”

“是干什么的？”冯玉祥问。

“卖水的，早先在甜水井担了水，卖给南院门的铺子上。”汉子说。

“他家里的人呢？”冯玉祥问。

汉子摇摇头：“他家没人了。”汉子也是一脸病容，他轻叹一口气，抬起眼睛，看着冯玉祥说：“以前四爷爷有一个小孙女，刘镇华围西安时，就饿死了，算来离现在已经有三个多月了。”

冯玉祥沉吟一阵，又问汉子：“你们街坊四邻里，饿死的人多吗？”

“家家都有。”

冯玉祥心头一紧：“你家，有没有？”

汉子低下了头：“嵩匪围西安时，家里三口人，现在就我一个了。”

冯玉祥一脸沉重，轻轻放下早已气绝的老人，从地上站了起来，回头看了看于右任——一个多月前国民联军孙良诚部解西安之围后，于右任即被冯玉祥任命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他早冯玉祥二十天进入西安。

于右任抚髯颌首，声音低沉：“百姓所言不假，刘镇华头年四月十八日兵临西安城下，至九月，城中粮食告紧，不少居民断炊，油渣豆渣苦槐涩榆也都吃光了，开始死人，人冬以后，因冻饿而死的居民和兵士，每天都在几百人，最多的一天里死了一千六百多，最少的几天，一天也在百人以上，到孙良诚吉鸿昌部进城时，全城几乎已经找不出没有死过的人家了。”

冯玉祥问：“死难于此次守城的军民总人数可有统计？”

于右任说：“统计过，不准，少则三万，多则五万，西安解围至今已近两月，由于百姓元气大亏，每日还不断有人死去。眼下，来不及掩埋的死人城中随处可见。”

白雪无声地落着，渐渐掩盖了地上老人的尸体。

冯玉祥站在风雪中，久久没有说话。忽然，他从腰间掏出小手枪，向随行的国民军联军官兵大声说道：“同志们看到了没有，西安人民为国民革命舍身毁家，保住了西安城，使我们今日有了立足之地，我今天当着三秦父老的面立誓，冯玉祥日后如不维护民众利益，如不为国民革命尽心倾力，不论军还是民，不论官还是兵，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用这把手枪打死我。”言罢，跨镫上马，走进了风雪。

冯玉祥，我的娘，你比“二虎”真是强；

冯玉祥，我的爹，你比“二虎”好得多……

身后，又响起了歌谣。

听到歌子里“二虎”两字，冯玉祥微怔一下，转过头，对并辔而行的于右任说：“那歌子你听到了吗？此颂玉祥不敢接受，‘二虎’守城，于国民革命功不可没，应该把两位将军找出来。”

冯玉祥是个明白人。他不会像老百姓那样感情用事。

“二虎”指守城陕军总司令李虎臣、副总司令杨虎城。刚刚结束的西安保卫战与他们的名字紧紧相连。

冯玉祥对于李虎臣并不陌生。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正酣之际，属于直系的冯玉祥联合胡景翼、孙岳等将领从前线倒戈回师，发动了震撼中外的“北京政变”，推翻了曹锟政府，驱逐溥仪出宫，正式树立起国民军的旗帜。此时的李虎臣正供职于胡景翼将军麾下，任胡师一团团长。“北京政变”时李虎臣兵驻丰台、通州一线，拱卫京都以南防线，并协助冯玉祥部攻打天津杨村之直军，为政变成功立下了汗马之劳。“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改编为几个军，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兼国民一军军长，国民二军、三军军长分别由胡景翼、孙岳担任。胡部李虎臣随之升任国民二军第十旅旅长，孙中山先生还授之以少将军衔。一九二五年秋，李虎臣被冯玉祥任命为陕西军务督办。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的李虎臣对国共合作以及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采取同情支持态度，因此遭致反动分子忌恨。一九二六年暮春，曾经一度主陕的河南军阀刘镇华率镇嵩军八个师，号称十万之众，由潼关入陕，企图重新统治陕西人民。在刘的勾结下，陕西地方军阀吴心田也从陕南向西安进逼；甘肃军阀孔繁锦由陇县袭击凤翔；被国民军收编的柯梦庚、麻振武（麻

老九)、侯保杰也叛附刘镇华。一时间,关中道上黑烟滚滚,刘镇华乘虚而入,兵临西安城下。在血雨腥风中,李虎臣开始以主将的身份指挥长达八月之久的西安保卫战。

对于陕中名将杨虎城,冯玉祥仅限于耳闻,并不像对李虎臣那样熟悉。杨虎城一九一七年参加了以于右任为总司令的陕西靖国军(陕西靖国军是中国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护法之役的军事组织),任第三路军一支队司令。一九二一年,直系军阀势力进入陕西,大部靖国军易帜改编(其中不少受冯玉祥改编),唯独杨虎城仍坚持靖国军旗帜,孤军奋战于渭北源上。后来为了保存实力,接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改编,成为陕北步兵团。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杨虎城在陕西首先响应,并拥井岳秀为陕北国民军总司令,井岳秀即请杨虎城为前敌总指挥。一九二五年夏,国民军第三军孙岳部进入陕西,此时杨虎城与井岳秀已有芥蒂,便接受了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职。孙岳率第三军出关后,杨部留陕,驻防三原、耀县一带,加紧军事训练。

此时,杨虎城已成为驻陕国民军中兵力最多战斗力最强的一支。

刘镇华在向西安推进时,李虎臣恐独立难支,一面部署向西撤退准备,一面向三原的杨虎城紧急求援。他在电话上对杨虎城说:“你来我就守,你不来我就走。”杨虎城认为西安为西北国民革命的根据地,若被刘镇华占领,不仅不利于国民革命,也会给陕西父老带来极大灾难,因此告知李虎臣决不能放弃。他除留下一部防守三原、泾阳外,急令各部驰赴西安守城。

这就是史书上称之为的“‘二虎’守长安”。

西安守军总共万余人,在十倍之敌重围中坚守了整整八个月。

李虎臣、杨虎城谁也没有料到城内后来发生的可怕粮荒。

陕西先年粮食丰收,麦价很贱,西安各粮行商号为图暴利,争相囤积,“二虎”守城之初,并元短粮之虞。杨虎城估计,靠城中存粮,足可坚持半年。但后来由于战争时间拖长,加之西安近郊好几万居民进城避难,增加了粮食消耗,到九月粮食已日见缺乏,九月以后更加严重,不少居民断炊,城中开始死人。此时,军纪也已颓败,屡屡发生军人与民争食现象,士兵官佐人宅抢粮,往往颗粒不留,居民因面对“二虎”生出许多怨忿。

八个月西安保卫战,军民死于冻馁者达五万人,占城中居民的四成。

西安解围后,面对遍地饿殍,杨虎城口不言功,给五万死难军民留下一幅“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的挽联后,将所部撤至渭北三原一带,自己托病径赴富平隐居。李虎臣在此后也率部离开了西安。

用人之际,冯玉祥需要这样从血泊火海中锻造的良将。

冯玉祥来到西安的第一件事就是再次函请杨虎城出山(冯玉祥第一次函请杨虎城是在头年十二月由五原至西安途中)。杨虎城为冯玉祥的诚意所感动,以请纓北伐打头阵为唯一条件,接受了冯玉祥的任命。

杨虎城再次进入西安,已经是国民军联军第十路总司令了。李虎臣则被冯玉祥任命为第八路总司令。

冯玉祥踌躇满志。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印着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告陕甘民众书”的传单飞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

陕西、甘肃的父老兄弟姊妹们:

现在我们中国革命的事业已经快要达到成功了。自从湖北、江西、浙江、福建各省

被国民革命军先后克复后，国民政府已从广州迁到武昌，即是革命势力已由南方进展到中国中部和北方，马上就要统一中国了。果然最近人民和革命的武力共同奋斗的结果，江苏、安徽、河南等省又快要完全克复了。吴佩孚、孙传芳几个大军阀的势力已经完全消灭，只剩下奉鲁军阀张作霖、张宗昌等，也是一天天的逼近死亡。侵略我国的英、日、德、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在我国的特权更是根本动摇，眼见得要从中国境年滚开去。我们国民军，是用革命来救国救民的军队，早日完成革命，解除你们老百姓的痛苦，是我们国民军的责任。现在大军三十万陆续开到河南去与国民革命军会师，进攻北京，根本毁灭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巢穴……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现在正是向中国最野蛮的最残暴的奉鲁军阀，即英日帝国主义共同豢养的走狗张作霖、张宗昌等猛烈进攻的时期。革命的人民和革命的军队，切实联合起来，革命成功的日子便是你我大家得到解放的日子……

这篇热情洋溢的文告落款日期是四月十七日。

那是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第五天。

看来，南方发生的一切还没有打乱冯玉祥前行的脚步。

一九二七年在注视着这位高大魁梧的安徽人：他脚下的三秦大地将会发出什么声音……

农奴戟 英雄血

第一章 风云惊变

蒋介石誓师北伐，冯玉祥相见恨晚

西安解围之后，南北各方政治势力都将目光盯在了日渐丰满的冯玉祥身上，常有匆匆的身影频繁地出入于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

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设在第一次督陕时的督军署。

西安人将冯玉祥的督军署叫作新督府，以示与旧督署的区别。一九二一年冯玉祥做了陕西督军后，怕染上官僚习气，不愿住在北院门的老督署（即现西安市政府所在地），便派后来成为抗日名将的张自忠（时为冯玉祥卫队营长）率一营官兵，用一名盗卖督署委任的罪犯的五千元罚款，在城东北的一片空地上建成了二百间房子。冯玉祥就在这片并不美观的兵营里安顿下了向全陕发号施令的督军署。

这块地方早先建有明朝历代皇帝的行宫，故有皇城之称。清时称为满城，以四分之三居满人，四分之一居蒙古人，成为奴役汉人的统帅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逃到西安避难，就住在这里。民元改制，关中民众群起造反，皇城自然成为锋芒所指，城中满人被赶杀得鸡犬不留，宫殿亭榭也被烧成一片焦土。冯玉祥在这里建起督军署后，西安老百姓依旧习惯地称之为皇城。

不过此时，西安皇城已经换上了一个极易让人产生遥远联想的名字——“红城”。

皇城改为红城，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兼省政府主席于右任先生的杰作，很受冯玉祥赏识。

一个“红”字，无异于一个简约鲜明的政治宣言。

当然，毋庸置疑，那是莫斯科“红场”给这位东方美髯公的灵感，那时，他和冯玉祥将军都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在莫斯科时，红场是他们常去散步的地方。

冯玉祥开始在红城接见来自各方面的代表。

国民政府中央先派来了郭春涛和邓飞黄，之后又派来了简又文，他们都是从事政治工作的；在冯玉祥挥师出关前，刘骥、熊斌也作为中央代表来到了西安；唐生智派来了一个曾与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长刘伯坚同过学的留俄生，此人思维敏捷，极善言辞，冯玉祥请他给队伍讲演，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对下面提出的问题，有问必答，很得冯玉祥赏识，事后冯玉祥得知，他是个共产党员；与陕西一河之隔的山西军阀阎锡山派来的代表叫甫桂馨，冯玉祥为日后联阎讨奉计，对此人特别重视，优加款待，希望他回去在阎锡山面前做点工作，谁知甫桂馨回到山西后，却在阎锡山面前大讲西安如何已被冯玉祥“赤化”，连督署衙门也改成了“红城”等等，冯玉祥对此人一直耿耿于怀。

在西安按见的各方代表中，冯玉祥最具有好感的是蒋介石的密使彭程万。

十几年过去之后，冯玉祥已被蒋介石挤压得焦头烂额，但他对蒋当年派往西安的代表彭程万的感情却一直和美如初。他在《我的生活》一书中这样写道：“彭先生为日本士官学生，为人深沉，不苟言笑，以后在江西也曾见过面……”

冯玉祥第一次会见彭程万，破例没有在红城自己的总司令官邸，而是选

择了西安城东北角一个僻静的处所。从会见地址的精心选择上不难看出冯玉祥对这次会见的重视。

虽然时至眼下，冯玉祥和蒋介石还没有见过面，但他对这位所向披靡的北伐军总司令不仅怀有仰慕之情，而且还抱着更大的期望。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在广州东校场，当蒋介石在十万军民的欢呼声中第一次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名义誓师北伐的时候，已经下野两个多月的冯玉祥正在莫斯科考察。他是在蒋介石宣布誓师北伐的第三天得知这个消息的。那天，他被安排参观了一个莫斯科的敬老院和一个军人俱乐部，很晚才回到莫斯科郊外查理村自己的住处。他进屋刚坐下倒了一杯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共旅莫支部书记刘伯坚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冯玉祥拿着一份印有蒋介石誓词的电稿，一口气看了下去：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自己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的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冯玉祥的心被蒋介石热辣辣的词语点燃了。

远在莫斯科的冯玉祥当时并不清楚蒋介石麾下有多少兵马。但仅就蒋敢于向拥有七十五万之众的三支大军阀（头目分别是直系吴佩孚、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奉系张作霖）公开宣战这一点上来看，就足以使人钦佩的了。

在张作霖、吴佩孚联手夹击下被迫下野的冯玉祥，在誓师北伐的蒋介石身上找到了与自己的共同点——他们面对着同一个敌人，那就是北洋军阀。

当彭程万衔蒋介石之命秘密来到西安之前，蒋介石的总司令部早已移驻到了江西南昌，北伐军正在蒋的指挥下，兵分三路向前推进。一路出湖南沿京汉路北上，另两路直趋长江下游，二月，进占杭州，继而占领安庆、芜湖等地。待彭程万到达西安时，国民革命军已乘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之机，未废一枪一弹，于三月二十二日进入上海，二十四日，攻占南京，二十六日，蒋介石乘船抵沪。至此，北伐军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里，就消灭了三大军阀中吴佩孚、孙传芳两大军阀的主力，把革命浪潮由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两岸，大半个中国已在国民革命军的控制之下。

显然，北伐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窃据北京的张作霖。

张作霖是冯玉祥的宿敌。

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后，赶走直系，又来了奉系，冯玉祥眼看着到手的北京政权又被北洋军阀窃取，胸中一直填着一股吐不出的恶气。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从莫斯科回国的冯玉祥五原誓师，宣布“倒戈”，参加北伐。西安解围后，冯玉祥稍事整顿后，又发表了措辞激烈的讨奉檄文。此时，张作霖已处于南北两支革命军的腹背包围之中。

在这个紧要关头，蒋介石派代表来看冯玉祥，可谓恰逢其时。

冯玉祥和彭程万第一次见面，就谈得很投机。谈到兴致时，冯玉祥斥退

了左右，只留一名贴身马弁端茶倒水。

在与彭程万的竟日交谈中，蒋介石渐渐在冯玉祥的心中鲜明起来。

彭程万不紧不慢的说话声有一种很自然的感染力：“……孙中山先生之后，纵观中国政治舞台风云人物，若论人格之伟大、魄力之奇伟、才干之精明，可以说，蒋总司令是独一无二的了。”

冯玉祥诚恳地点着头：“北伐以来，蒋中正先生已经表现出了他的不凡了。”

彭程万话锋一转：“五原誓师以来，冯焕章（冯玉祥字）先生也足以表现出你的不凡了……”

“不敢不敢……”冯玉祥笑着谦让。

“不，彭某不敢妄评，这是蒋总司令的原话。”彭程万说得一脸严肃。

冯玉祥笑笑，没有继续客气。

他相信这是蒋介石的评价。

类似的话他已经听过。头年十二月，蒋介石在武汉接见他的代表时，就说过：“国民军纪律的严明和战斗力的坚强，我们久所熟闻，冯总司令的治军、用兵，尤所钦佩。北伐大业得到冯总司令的参加，进行必定更加迅速。将来北方之事，仰赖冯总司令处极多，希望你们转达我意，请他多多指教。”蒋介石知道冯玉祥装备破旧，财政短缺，还特意关照冯的代表说，请转告冯总司令，国民联军需要什么，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请随时与邓演达主任接洽办理。

英雄识英雄。从那时起，蒋介石在冯玉祥心中，已经成了一个相见恨晚的英雄……

那天，冯玉祥和彭程万在西安城东北角那个僻静的角落里谈到很晚。掌灯时分，冯玉祥兴致很高地邀彭程万去吃了老孙家的羊肉泡馍，然后，又陪着彭看了易俗社的看家戏《柜中缘》。

这天，冯玉祥感到一种自解西安之围后少有的轻松。

刘伯坚婚礼上牵出的思绪

三月，桃花如期开了，满目疮痍的古都也渐渐显出了生气。

在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院子里，凡树桃花开得分外红艳。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走近一株桃树，把鼻子凑上花枝嗅了一阵，然后撩起长袍，朝礼堂走去。

阵阵欢笑声、嬉闹声正从礼堂敞开的窗子里飞了出来。于右任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意。

礼堂里，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的婚礼正在进行中。

在中山军事学校为共产党人刘伯坚举行婚礼，是于右任的精心安排。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属国民军联军驻陕司令部所辖，它是于右任先生一手倡办的。西安解围，于右任虽被冯玉祥任为驻陕总司令，但手中无兵无将，为了谋求日后发展，培养人才，在共产党人魏野畴、史可轩（当时都在于右任驻陕司令部政治部任职）的帮助下，创办了这所军事学校。军校组建过程中，以国民党左派著称的于右任接纳了许多共产党员，并委以要职，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政治处长邓希贤（即邓小平），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唐澍、许权中、高克林等先后都在该校担任过领导职务，刘志丹、高岗等担任教官，学生中党团员也很多。中山军事学校除了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教育，政治教育公开讲马列主义，实际上这是一所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红色学校。

在这里为一个共产党人举行婚礼，是最恰当不过的选择。

于右任走到礼堂门口，看了一眼用红纸贴在墙上的标语：

联合革命党，打倒帝国主义！

阶级利益的结合，是阶级奋斗……

于右任抚须微笑。显然，他对这个国共合作色彩很浓的革命婚礼十分满意。走进礼堂，一身戎装的刘伯坚和新娘子立即热情地迎了过来。

新娘十七八岁，圆脸短发，此时穿一件白绸短褂，黑绸长裙，胸前别一朵红纸花，显得质朴，干练，文静。

她叫王叔振，西安女子师范的学生，她来国民军讲演过几回，口才很好，受到刘伯坚器重。而富有传奇色彩的共产党人刘伯坚在这个西安女师学生心目中，早已成了一个英雄。虽然认识时间不长，他们相爱却已水到渠成。

贵宾陆续到齐。冯玉祥、邓宝珊、杨虎城、吉鸿昌、续范亭、葛霁云、魏野畴、史可轩、邓小平……在国民联军中国共两党著名人士几乎全到齐了。

驻陕总司令于右任主婚，冯玉祥即席讲话，婚礼简朴、隆重。

其情融融，其景融融。刘伯坚的婚礼是一个十分美好的征兆：在国民军联军中，共产党和国民党水乳交融，苦难深重的三秦大地将迎来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风暴。

刘伯坚有些激动。

国民军走到今天，冯玉祥走到今天，倾注了共产党人多少心血。

是年四十五岁的冯玉祥字焕章，安徽巢县人，生于河北青县，系淮军子弟。幼年家贫，十一岁丧母，即随在淮军任下级军官的父亲住在军营，十四岁正式成为淮军兵勇。一九二二年，二十岁的冯玉祥改投袁世凯新军“武卫

右军”，辛亥革命前一年，任第二十镇四十八协八十标三营管带。辛亥武昌起义爆发，第二十镇从天津移驻滦州。一九一一年十二月，青年军官发动滦州起义，推举冯玉祥为参谋长。起义失败，冯玉祥被押解回乡，后被陆建章保释，一九一三年，被陆建章任为京卫军第一团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冯玉祥为人耿介，处事果决，加之自幼养成的刻苦、坚韧、勇猛，在征南讨北的戎马生涯中，显露出卓越的统军之才，因而在走马灯式地更换头目的北洋政府中，不论谁坐镇北京，都不会忽略这位仪表奇伟的军人，他先后被任为旅长、师长，陕西、河南督军等职。冯玉祥年轻时信奉过基督教，赞成平等、博爱之教义，自当团长起，就将基督教引入军中，常请牧师向官兵宣讲教义，作为练兵的辅助手段，因而有了“基督将军”之名。二十年代以前的冯玉祥尽管参加了一九一五年的反袁护法战争，一九一七年又率军平定了张勋复辟，反映了他反对专制、维护共和的进步倾向，但究其实质，仍未跳出北洋军阀营垒，是其中一名勇武的战将。

一九二一年九月，孙中山派徐谦持亲笔信联络冯玉祥，之后，二人未断书信往来。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玉祥的爱国为民思想与日俱增，革命倾向愈加浓厚。一九二四年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又起，北洋政府总统曹锟以吴佩孚为讨逆总指挥，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奉军作战。十月，冯部抵滦平停止前进，秘密酝酿反戈倒直，在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的策应下，未发一枪一弹，迅速占领北京城，解除总统府卫队，顺利地完成了北京政变。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联合召开会议，将所部联合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建立了短暂的以冯系为中心的临时混合内阁。十一月五日，派警卫总司令鹿钟麟将废帝溥仪及清室逐出紫禁城，至此，清朝小朝廷寿终正寝。同时，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政。这是冯玉祥从北洋军阀营垒迈向革命的起点。

由于冯玉祥国民军兵力有限，北京政变的成果很快就落在段祺瑞和张作霖手里。冯玉祥却被任命为西北边防督办，离开北京到张家口赴任，取消国民军番号，改为暂编西北边防军，但国民军的习惯叫法却延续了下来。

失意中的冯玉祥在离开北京前，认识了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结识李大钊，使他的政治生涯又处在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上。李大钊为了帮助冯玉祥最后冲出北洋军阀营垒，倾注了大量心血。冯玉祥移驻张家口不久，李大钊就派宣侠父等一批共产党员来到国民军中，以国民党员身份做统战工作，促使冯玉祥更加倾向革命。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爆发，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民众反帝示威大会，与全国反帝斗争遥相呼应，一时间，国民军辖区内民众运动如火如荼。与此同时，李大钊又秘密沟通了冯玉祥与苏联的联系。七月，冯玉祥派代表团赴苏联考察，随后又选送三十名青年赴苏留学，苏联也秘密派出军事顾问帮冯玉祥训练部队。

冯玉祥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积蓄着力量，准备最后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另起炉灶。

冯玉祥的反帝爱国和浓重的革命倾向，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在北洋军阀眼中，他已成了名副其实的“赤化将军”。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吴佩孚和张作霖这两个昔日的宿敌又携起手来，会同阎锡山等地方军阀，以“扑灭北方赤化”为由，夹击国民军。冯玉祥为缓和局势，保存国民军实力，被迫于一九二六年元旦宣布下野，西北边防督办一职由张之江代理，在共产党北方区委的安排下，于三月带着妻子李德全经库伦（今乌兰巴托）赴苏联考

察，并寻求军事援助。

此行对冯玉祥的一生来说，至关重要。

行至恰克图，冯玉祥与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及徐谦等国民党人相遇。鲍罗廷是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会议之后，由国民政府代表徐谦陪同，正在返回广东途中。冯玉祥与鲍罗廷、徐谦深入研讨了中国的前途问题。历史资料中，记载着冯、鲍二人这样的对话：

冯玉祥对鲍罗廷说：我来贵国考察，目的是为了救中国。

鲍罗廷问：有没有救国的方案？

冯玉祥：没有。

鲍罗廷：你得有个救中国的方案才成。

冯玉祥：确实没有。

鲍罗廷：你们中国有个孙中山先生，你知道吗？

冯玉祥：知道，对中山先生，我一向仰慕。北京政变后，我曾电邀孙先生赴京主政，不幸孙先生抱病北上，到北京不久就病逝了。

鲍罗廷：但是孙先生的主义还在，他有个建国方略，在中国可行。去年七月在广州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执行的就是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

冯玉祥：我愿意实行这个主义。

鲍罗廷：你现在还是一个北洋军人，不是国民党员，怎样实行？

冯玉祥沉吟一下：我愿意入党。

徐谦作为介绍人，冯玉祥加入了国民党。就这样，在外蒙古草原上，一个北洋军人完成了向革命军人的转化。

一九二六年五月九日，冯玉祥将军一行到达了莫斯科。苏联政府、各界及中国留学生在火车站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式。世界上第一个红色国都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我的回忆》一书中这样记述了那天的情景：

在车站上欢迎的人员很多，步兵，骑兵，都人强马壮，武器鲜明。苏联政府人员个个显得精明强干，富于朝气，其中最多而且最使我注意的，是东方大学和中山大学的中國男女学生。他们约四五百人，整整齐齐排列在那儿，都有一种英俊有为的样子。他们手里拿着小旗，狂热地高呼着“中国国民党万岁”的口号，使我极是感动……

冯玉祥不会知道，中国留学生欢迎队伍的组织者，就是日后成为他的密友的共产党员刘伯坚。

刘伯坚，四川平昌人，出生于一八九五年，在四川成都求学时，就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成为四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在吴玉章先生的倡导下，于一九二二年六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巴黎，他先后见到了李立三、赵世炎、蔡和森、李维汉、陈毅、李富春、邓小平等，日后他们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内最重要的人物。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正式成立。在海外的刘伯坚随即加入了少年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八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比利时中共支部书记，一九二三年秋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十一月转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担任了中共旅莫支部书记。

刘伯坚很快进入了冯玉祥将军的生活。

遵照国内党中央和共产国际争取冯玉祥的指示，刘伯坚经常出入于冯玉祥下榻的莫斯科郊外的查理村。在宽敞的会客室里，刘伯坚向这位北洋军阀

营垒里的旧军人展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列宁，斯大林，十月革命，马列主义原理，三民主义精神，国共合作……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们走出那座幽静的别墅，刘伯坚带着冯玉祥来到工厂、集体农庄、军营、敬老院、福利院，在刘伯坚的安排下，苏联军政领导人斯大林、加里宁、伏罗希洛夫、列宁夫人都接见了冯玉祥。

冯玉祥在红色国都里，深埋胸中的火苗被点燃了。他感慨道：“从和这些人会谈以及我自己对革命理论与实践的潜心研究和考察的结果，深切地领悟到要想革命成功，非有鲜明的主义与参加行动中心的党组织不可。”

冯玉祥决心为国民革命而战。六月，他派代表回国，同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联系。七月一日，广州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冯玉祥闻讯大喜，通过代表与广州国民政府商定，国民军接受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北方协助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国民政府则承诺对国民军按照国民革命军的标准，一律待遇。

冯玉祥正在踌躇满志准备为国民革命效力之时，七月下旬，却从国内传来了国民军兵败南口的消息。

冯玉祥不敢相信。

他下野时，国民军仍有雄兵三十万。赴苏前，他命部下在南口一线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部署了二三百里能攻能守的防线，如今不出两三个月，竟全线崩溃，这对于冯玉祥来说，无异于晴天一个霹雷。

冯玉祥正在心急火燎之时，于右任先生却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于右任是受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委托，专程由国内赶赴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的。

在紧要关头，共产党又一次关心着这位昔日的基督将军。

冯玉祥在查理村住处，秘密接见了于右任。于右任详细告知了国民军遭重创的情况：冯玉祥下野出走苏联，并没有缓解北洋军阀对国民军的压力。奉系、直系、直鲁联军以及晋军组成了“讨赤”联盟军，以五十多万精锐兵力围攻撤出北京后的国民军。国民军将士虽艰苦作战，但终因兵力悬殊，给养困难，军械空虚，加之战线太长（绵延近两千里），分散作战，只能穷于应付，坚持三月之久，全军伤亡过半，弹尽粮绝，不得不下总退却令，全线向西突围，眼下正在向内蒙与甘肃交界一带集结。

冯玉祥刚刚热起来的心一下子又凉了。

听罢于右任介绍，冯玉祥半天没有说话，他在地上踱了几个圈子，站住问于右任：“国民军已到如此地步，我回去又有何良方？”

于右任微微一笑：“临行前，李大钊先生让我送你十六个字。”

冯玉祥眼睛亮了一下：“哪十六个字？快说。”

于右任：“‘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

冯玉祥沉吟片刻，咬咬牙，说了声：“回！”

他们开始作回国的准备。

当刘伯坚再一次来到查理村的时候，冯玉祥诚恳地向他发出了一同回国的邀请：“毅伯（刘伯坚字），眼下国民军受重创，我早已归心如箭。然重振国民军军威，无毅伯这样大才，恐难完成。玉祥恳请大驾，与我这粗人一同回国，不知意下如何。”

刘伯坚笑道：“难得冯总司令器重，敢不从命。再说，一直在国外学习，现在也该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了，只是身在组织，要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能行动。”

冯玉祥大喜：“知我者，毅伯也。共产国际由我去恳请。”

对于冯玉祥回国重振国民军，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十分重视，不仅同意刘伯坚随冯玉祥一同回国，还专门为冯玉祥派了一名顾问乌斯曼诺夫。乌斯曼诺夫曾任加伦将军的参谋长（一九二四年八月，应孙中山先生请求，苏联政府委派加伦来华担任广州革命政府首席军事顾问），精通军事、政治、地理，善辞令，冯玉祥深有好感。

一九二六年八月十七日，冯玉祥、刘伯坚一行秘密搭乘一辆货车，启程回国了……

军乐奏响了。

刘伯坚拉着王叔振的手，走到冯玉祥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这一鞠躬，不仅仅是为了感谢，还表达了一种祈望：愿我们携着手，走下去。

赴豫西刘志丹收编刘镇华

四月九日，晴空无云。

二十四岁的刘志丹带领一排骑兵，打马驰出潼关，向豫西山区奔去。

刘志丹此行是奉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之命，怀揣冯玉祥的亲笔信，去收编被国民联军赶出潼关后，窜到豫西山区的刘镇华。

镇嵩军头子刘镇华率部逃离陕西时，还号称十万兵马，但兵败如山倒，一路上，溃兵逃的逃散的散，分散小部被沿途农民武装消灭不少。逃到河南时，仅剩万把人。刘镇华不得已向他的主子吴佩孚求援，要求拨些队伍给他。吴佩孚南要防国民革命军继续北上，东北要防张作霖南下抢夺地盘，西面还要防日渐壮大的冯玉祥，四面受敌，已是自身难保，哪有人马给他。刘镇华无奈，只好率残兵败将逃进豫西山区，祸害当地人民，暂时蜗居，以求再起。

二月间，刘镇华曾派人向冯玉祥表示，愿意归顺，冯即委任其为国民军联军驻豫军总司令。但脚踩两只船的刘镇华迟迟不肯到任。

四月五日，由广州迁到武汉的国民政府正式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正在厉兵秣马，准备早日沿陇海路进行北伐，而盘据在豫西山区的刘镇华始终是冯玉祥的心头之患。为了稳定后方，决定再次收编刘镇华残部。

刘镇华在河南、陕西经营多年，老奸巨猾，朋党爪牙中，不乏顽劣亡命之徒。顺利收编，并非轻而易举之事。冯玉祥与刘伯坚再三合计，决定派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教官刘志丹充此大任。

五原誓师前后，冯玉祥为了改造旧军队，一方面接受了苏联大批的军火物资援助，一方面向中共北方局负责人李大钊以及广州国民政府提出了选派干部的请求。这样，一大批共产党员分别从莫斯科、黄埔军校和中共北方局陆续来到了国民军。他们中除了随冯玉祥一道回国的刘伯坚外，还有宣侠父、魏野畴、陈延年、方仲如、邓希贤、刘志丹、王一飞等。

刘志丹是从黄埔军校派来的。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用的是这个名字（据说这个名字一直用到一九二八年），志丹是他的字（原为“子丹”，报考榆林中学时，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意，自己改为志丹）。他一九一三年出生于陕西保安一个家道殷实的人家。他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教私塾的爷爷刘士杰，在一心想让他学生意发大财的父亲刘培基眼中，他是个没有出息的后生，父亲不止一次地骂过他“叛逆子”。不过，在刘志丹心中，“叛逆子”并不是个不好的字眼儿，陕北就出过一个大“叛逆子”李自成。爷爷在讲李自成的时候，说他是杀富济贫的英雄，差点夺了天下。陕北地瘠民穷，灾荒不断，加上军阀官僚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和统治，家乡饿殍遍野，民不聊生，这些景象在幼年的刘志丹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对同学们说：“我长大了要当李自成，为穷人打天下”。为了实现那个拳拳的抱负，一九二二年，已经十九岁的刘志丹，背着一个粗布包袱，步行六七百里，来到榆林，考入了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

在榆林中学，刘志丹遇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革命导师魏野畴。

魏野畴，陕西兴平人，一九一七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并与在京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等一同创办了宣传新思想的进步刊物《秦声》。一九二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

后经李大钊、刘天章介绍，加入共产党。此时，魏野畴早已名播三秦大地。一九二一年他于北师大毕业时，具有开明进步思想的榆林中学校长杜斌丞先生便将他请来任教。

魏野畴在课堂上讲授《共产党宣言》、《社会进化史》、《社会科学概论》，介绍李大钊、陈独秀，推荐《向导》、《新青年》……世界在刘志丹的眼前变得广阔无比。在魏野畴的指导下，榆林中学学生会成立了，刘志丹被选为第一任会长。

一年后，魏野畴离开了榆林中学——他终于引起了陕北迂腐势力的反感，那些封建乡绅们联名要求校长杜斌丞解聘魏野畴。为了不给杜斌丞增加麻烦，魏野畴离开了榆林。

这时，杜斌丞又请来了大名鼎鼎的共产党人李子洲。

李子洲是陕北绥德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他和魏野畴都是陕籍学生中“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是西北地区在京学生的带头人。李大钊刚一组织共产主义小组，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即被转为中共党员，是党在西北的最早党员。他来到榆林中学，继续宣传马列主义……

刘志丹终于明白了世界上为什么有穷人富人之分，明白了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一个青年革命者正在成熟。

一九二四年冬，李子洲、王懋廷在陕北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刘志丹成为榆林中学第一批团员。

一九二五年秋天，广东处于革命高潮，党组织决定选派刘志丹、霍世杰、杨国栋等进步学生入黄埔军校学习，刘志丹生平第一次远走高飞，离开了大西北。

陕北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刘志丹赶到广州，已到年底。翌年初，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步兵科。置身中国革命的中心，刘志丹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繁重的政治和军事学习中。在这里，他认识了党的著名活动家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与留校工作的黄埔一期学员陈赓、唐澍结下了永生难忘的友谊。

一九二六年七月九日，大病未愈的刘志丹抱病参加了广州东校场的国民革命军北代替师大会。会后，带领两个连队随东路军东征，一路摧枯拉朽，连连奏捷。东路军打到江西吉安，刘志丹忽然接到命令，要他立即赶回广州。赶到广州后，才知新的战斗任务在等着他，原来是在苏联考察三个月的冯玉祥已经回国，向广州政府要干部，现冯部国民军正集结在内蒙、陕、甘边界一带，考虑到刘志丹是陕北人，熟悉那一带情况，决定他立即去冯玉祥部工作。

刘志丹不顾征程劳累，带着十几名黄埔军校毕业生，风雨兼程，紧急北上。赶到绥远的五原时，正是九月十七日，冯玉祥在这天誓师出兵援陕，进行北伐。刘志丹征尘未洗，又马不停蹄地随总部一路南下，驰援西安。在三原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他欣喜地见到了阔别三年的魏野畴老师，魏野畴一身戎装，眼下是驻陕总部政治部主任。

时值隆冬，刘镇华奉吴佩孚之命，以十万嵩匪，准备对弹尽粮绝的西安守军发动最后的进攻。这时，冯玉祥已经固原到了陕西三原，准备与刘镇华交战，解西安之围。然而在此紧急之际，国民联军第四路军马鸿逵却蛰居宁夏，迟迟不肯发兵。冯玉祥几次电催驰援，马鸿逵都按兵不动。

西安城内连连告急，军情十分紧迫。

此时，刘志丹担当了一次涉及整个陕西战局的大任：国民联军总部调刘

志丹速赴宁夏，督促马鸿逵立即发兵西安。临行前，冯玉祥亲自为刘志丹饯行，并任命刘志丹为他的少将特使，以国民军联军总部名义，整顿马鸿逵第四路军。

宁夏军阀马鸿逵队伍的底子是他伯父马福祿、父亲马福祥创立的“安宁军”。光绪二十一年，西宁府循化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撒拉、回、东乡、保安各族起义，斗争波及到河湟、海固一带。清廷在派大军镇压的同时，飞檄甘肃各地，准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次防卫”。从维护自己庄园利益出发，马鸿逵伯父马福祿、父马福祥招募乡勇二百名，名为“安宁军”，在镇压回民起义中，马氏兄弟率安宁军惨杀起义军两千人，因之清廷授马福祿为记名总兵，“安宁军”也正式编入董福祥甘军，这样，在清帝国卵翼下，一支回族封建军阀武装开始孕育。一八八九年春，马氏兄弟随甘军北上京畿，驻防蓟州，以对付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一九〇一年六月，八国联军由天津向北京进攻，义和团和甘军奋力抗击。在正阳门激战中，马福祿中弹身亡。北京陷落后，慈禧偕光绪皇帝西逃，马福祥随扈保驾。次年秋，又护驾回京。一九〇六年，升任西宁镇总兵，成为西北地区的实力派人物。辛亥革命后，马福祥在北洋军阀间巧于周旋，先被任为宁夏镇总兵，后又升任绥远都统，由此逐渐坐大，成为以回民为主的宁夏的最高统治者。其子马鸿逵少时好武，五岁起就随父在军营生活，年轻时曾当过袁世凯大总统府的侍从武官，不久，马福祥部被改编为“宁夏新军”，马鸿逵被委以司令。至此，马鸿逵羽毛渐丰。第二次直奉战争中，曹锟又委任马鸿逵为讨逆军独立骑兵前敌副总指挥兼绥远援军司令。冯玉祥五原誓师，马鸿逵倒戈，投了冯玉祥，所部被编为国民军联军第四路军，答应出兵南下，解西安之危。

当冯玉祥率国民联军抵西安前线时，狡猾的马鸿逵却背信弃义，不仅一拖再拖，按兵不动，还派人与吴佩孚暗中勾结，采取了两面讨好两面应付的对策。

刘志丹就是在这个时候驰赴马部的。

马鸿逵听说冯玉祥要派人来，放出口风：谁来杀谁！

途中，刘志丹恰好碰上了马鸿逵派去给吴佩孚送信的一个连长。刘志丹看了马鸿逵写给吴佩孚的密信，笑一笑，对那个连长说：“烦你先蜚回去给马司令报个信，就说冯总司令派的人来了。”

连长唯唯诺诺，不知如何是好。

刘志丹沉下脸来：“快去！你再告诉马司令，像他这样背信弃义的人，是不会有好结果的。眼下，吴佩孚已经日落西山，国民革命成功在即，让他不要不识时务。”

连长嗫嚅道：“敢问长官尊姓大名？”

刘志丹用不高的声音说：“国民军联军少将特使刘景桂。”

连长露出惊色：“哦，久闻大名，久闻大名……”

连长说罢，赶忙朝来路窜去。

马鸿逵早闻刘志丹大名，闻报后不敢怠慢，赶紧率领亲信前去迎接。将刘志丹迎到司令部，盛宴招待，竭力讨好，对那封给吴佩孚的信百般解释。刘志丹对那封信并未多加评论，只是分析当前国内形势，宣传北伐意义，介绍西安前线战况。刘志丹谈吐文雅，学识渊博，行伍出身的马鸿逵对这个黄埔四期生更加不敢小看，当即答应一切唯冯大帅马首是瞻，加紧整训后立即出兵援陕。并在席间恳请刘志丹对其第四路军进行训导，以便随冯大帅出师

参战。

恰在此时，国民军联军总部给马鸿逵部来电，任命刘志丹为第四路军党代表兼政治处长。刘志丹开始名正言顺地改造这支回民旧军队。

马鸿逵的部队长期以来，受的是封建家长制的管理，封闭、落后、愚昧，但作战勇敢。冯玉祥经由宁夏入甘时，沿途迎送的竟然是穿着废清官服的地方官吏和兵勇，检阅马鸿逵的军队时，冯玉祥按照在国民军的习惯，问部队：“你们是为谁当兵的？”部队答：“为马大帅当兵！”冯玉祥又问：“你们是谁的军队？”部队答：“是马大帅的军队！”冯玉祥啼笑皆非。

在短时间内改造这样一支素质低劣的队伍，使之脱胎换骨，刘志丹肩上的担子不轻。

刘志丹在征得马鸿逵同意后，在营以上军事单位都设立了政治机构，配备专职政治干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反对打骂士兵，废除对逃兵割耳朵、打军棍、揭背花等酷刑。还深入到回族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宣讲革命道理，士兵大都是穷苦人出身，刘志丹的话很容易就灌输到脑子里去了，很快，他的周围就团结起了一批初具革命思想的士兵和军官，为改造这支旧军队奠定了基础。

在极短的时间里，经刘志丹整训的马鸿逵第四路军，战斗力大大提高，在西安解围中攻城南，立了大功，受到了冯玉祥的嘉奖。西安解围后，这支倾注着共产党人心血的军队又在出兵北伐、会师中原的战斗中建立了新的功勋。

自那时起，在冯玉祥眼中，刘志丹成了一位能担大任的青年。

刘志丹收编刘镇华，在日后出版的一些传记作品中有过绘声绘色的描写。大致是：刘镇华先是不屑于理会；继而盛宴款待；再下来是以杀头威胁；接着又以重金收买，最后只得接受整编，将队伍从山里拉出来。

可以想到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初上威虎山的情景。

这不是杜撰。

刘镇华最终成为国民革命第二集团军东路军司令。

中国南北出现了三支北伐军

一九二七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西安皇城广场，风和日丽。

在一片欢呼声中，国民军联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登上了用木头临时搭成的检阅台。与他并肩而立的是于右任和刘伯坚。此时，他们都一脸庄严。

很显然，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望着黑鸦鸦的人群，刘伯坚的思绪飞到了秋风衰草中的五原。

一九二六年九月十六日，离开莫斯科一月之久的冯玉祥、刘伯坚、乌斯曼诺夫一行被国民军将领宋哲元、鹿钟麟迎到了五原——从南口溃散的国民军各部都聚集在五原一带。此时传来消息，国民革命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在先后攻占汀泗桥、贺胜桥后，李宗仁率第四、七军于九月初已抵武昌城下。冯玉祥十分振奋，第二天（九月十七日），即率部在荒凉冷落的五原县举行北伐誓师大会。那天，也像今日一样，冯玉祥、于右任、刘伯坚并肩站在一个土台子上。面对那些破衣烂衫、面带血污的国民军将士，冯玉祥庄严宣誓：

……兹此中山主义驱我归来，因全军将士之公推，于九月十七日在五原宣布就国民军联军总指挥之职，并率全军将士郑重宣誓于国人之前日：我国民军之目的，以国民党之主义，唤起民众，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求中国之自由独立，并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特宣誓生死与共，不达目的不止。

声犹在耳。自那天起，国民军改名为国民军联军（仍习惯称之为国民军），刘伯坚被总司令冯玉祥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亦称部长，有说刘伯坚初为副，主任为石敬亭，不久，石改任参谋长，刘任主任——笔者注）。

五原誓师当天，冯玉祥宣布国民军全体官兵集体加入国民党。至此，国民军从形式上完成了由旧军队向革命军队的过渡。

冯玉祥也站在了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上。

今天，又是一次非同寻常的誓师大会。

军乐过后，冯玉祥将军向狂热欢呼的队伍和民众招了招手，沸水一般的广场立即安静了下来。

就像五原誓师担任的角色一样，他是今天这个集会的主角。五原誓师，他被拥立为国民军联军总司令；今天，他将正式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虽然早在四月五日，武汉政府就已经发表了这一任命，但冯玉祥还是特意选择了“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举行就职宣誓仪式。

刚刚成为国民党员不久的冯玉祥十分看重自己将要担任的角色，他需要这种承认。至此，他有了一种近似神圣的归属感。尽管统领的还是旧时兵马，干的同样还是国民革命，但五万之众的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总有点自拥自重的味道，从现在开始，由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以国民革命军这面旗帜干国民革命，他感到更加名正言顺了。

眼下，他渴望早日投入北伐，与他的宿敌张作霖决一雌雄。

像以往的重大集会和检阅一样，冯玉祥在正式讲话之前，先是一段与全军士兵程式般的问答：

冯玉祥：“同志们辛苦了！”

众答：“为革命服务，不辛苦。”

冯：“你们是什么人的队伍？”

众：“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冯：“你们的父母兄弟亲戚朋友是什么人？”

众：“是老百姓！”冯：“你们回去了是什么人？”

众：“是老百姓！”

问答完毕，广场上像大潮退去，只留下了一片寂静。冯玉祥满意地笑了笑，扫视了一下列队整齐的国民军官兵，在一片寂静中庄严地举起了右手，用洪亮的声音宣誓道：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一”劳动节，于西安红城，整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压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党，拥护党的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与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更促进世界革命之成功，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誓词刚罢，广场上又掀起一股欢呼的沸浪。

当日下午，冯玉祥下令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的国民军兵分六路，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作战，策应北伐，与正在向中原推进的武汉北伐军会师陇海线。

六路军分别为：

一、中央军，由总司令冯玉祥亲自指挥，集于华阴、潼关、灵宝一带，经洛阳向郑州前进。

二、东路军总司令刘镇华（平陕后降军）。拟定所部由孟津渡河，向河北段的京汉路方向活动。

三、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集中卢氏、洛南间，经洛宁向洛阳前进。

四、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集中龙驹寨、荆紫关一带，担任保护陕鄂交通。并寻机经南阳向郑州前进。

五、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由陕北破口渡河，经太原出娘子关。

六、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集中指定地点待命。

冯玉祥渴望着早日与由南北上的国民革命军在中原拥抱。

也就在这一天，发动“四一·二”政变不久、刚刚拼凑起南京“国民政府”的蒋介石也发布了继续北伐令，组织军队沿津浦路北上。“四一二”的血腥没有窒息这位新军阀的神经，北伐使他成为英雄，北伐使他羽毛丰满，他从北伐中得到了想要的一切。眼下，国民革命大功垂成，他不能丢掉北伐这面旗子。

不过，促使蒋介石北伐，还有一个更迫切的原因，他不愿看到已经拥有号称三十万之众的冯玉祥与汪精卫拥抱于陇海路

上。

冯、汪联姻，将是自己的灾难。蒋介石十分清醒。

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第二次北伐比冯玉祥、蒋介石整整早了十天。

“四一二”政变，宁汉之间出现对峙状态。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指导下，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四月十

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后，以左派领袖的面貌出现，以顺应反蒋革命潮流。

四月十五日，汪精卫在武汉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次日，汪精卫发出“铣电”，指责“蒋介石等行动，只是反革命。所谓反共，只是一种借口”。

此时，国内出现了三个鼎足而立的政权：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京政权，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以汪精卫为主席的武汉政府。尽管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接连不断地发表讨蒋通电，除了严厉谴责，并未对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采取有效的回击措施。大多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看清了蒋介石的反动实质，坚决主张立即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但在此时，武汉政府内部潜伏的危机也渐渐暴露了出来，当时中共党内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逐渐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让汪精卫等人掌握了党政军事大权，加之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对出击方向主张不一，更使武汉政府内在先击蒋还是先北伐问题上莫衷一是。经过激烈争论，武汉政府否定了多数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东征伐蒋的主张，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击垮盘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冯玉祥会师，然后再回过头来打蒋介石。

十九日，以唐生智为总司令的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机场誓师，二十一日沿京广路北进，向中原进发。

至此，在中国南北，有三支大军在进行北伐，他们的统帅分别是：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宁汉对立，冯玉祥游离其外。

然而对于一心北伐的冯玉祥将军来说，宁汉势不两立的局面，在他心头投下了一片浓重的阴影。

对于南京和武汉，谁是正统，他并不关心。然而对于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斥之为反革命的蒋介石，他却表露出同情之心。

此时的蒋介石在冯玉祥心目中，还是个英雄。就在“四一二”政变前夕的四月十日，他还在给武汉政府的徐谦的电报中，称颂蒋介石是“革命的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蒋介石指挥北伐的光环，展示在冯玉祥眼前的依然是辉煌。

其他，冯玉祥看不见。对于蒋介石从江西一路剿杀共产党到上海，冯玉祥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他只认为那是蒋介石对“过激”的工农运动采取的“过火”作法。

他希望宁汉消除歧见，携起手来。

除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冯玉祥当然还有自己的打算：冯军所集结之黄河流域一线，正处于奉军攻击要冲，只有尽快打垮以奉军为首的北洋军阀，才能稳固自己，谋求更大发展。宁汉对立，势必影响北伐。眼下当务之急，仍是北伐。

为此，他焦急万分。

冯玉祥向刘伯坚发出了一个不样的信号

当冯玉祥宣誓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的当天下午，冯玉祥与共产党人刘伯坚（改编后，刘伯坚任政治部部长）发生了两人交往以来的第一次不愉快。

事情是由一条贴在东大街的标语引起的。

当天，陕西省总工会也在西安东大街国民党省党部宣告成立。到会者有邮务、电务、电话、鞋业等三十多个团体的千余人。苏联共产党代表哀格斯出席会议，发表了演说。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宣传教育、统一工会组织、接受全国总工会领导、接受国民党对工人政纲等九项决议，以及致全国总工会和赤色职工国际、拥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开除蒋介石之决议等电文，会议选举张含辉等十三人为执行委员。

置身于大革命浪潮中的冯玉祥对省总工会的成立，本来采取了姑妄由之的态度，但他马上感到了群众的过分。那天，工人和市民在街上贴了许多标语。在花花绿绿的“拥护国民革命”、“唤起民众，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工友们积极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标语中，出现了一条十分醒目的标语：“打倒蒋介石！”一个旅长把标语用照相机拍下来，送给了冯玉祥。

晚上，冯玉祥派副官将刘伯坚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毅伯，街上那条标语你看到了吗？”冯玉祥用少有的语气问刘伯坚，脸色阴沉。

刘伯坚不知冯玉祥指的是什么。

不等刘伯坚回答，冯玉祥说：“工人们要打倒蒋总司令。”刘伯坚恍然大悟，沉吟一阵，说：“‘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已经公开叛变了国民革命，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将他开除了党籍，工人们贴出一条反对他的标语，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妥……”

“不对，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一直打到南京、武汉，一路所向披靡，有此大功者，是可以随便打倒的吗？”冯玉祥激动地站了起来。

“功归功，过归过。”刘伯坚尽量平和地说，但语气中依然带着锋芒，“何况，蒋介石北伐，究竟是为了国民革命，还是为了个人野心，还是个问号。”

冯玉祥压着火，低声说：“毅伯，你过分了。”

刘伯坚淡淡一笑：“不，我刚才说的也许过于含蓄。在上海，蒋介石对手无寸铁的工人大开杀戒，在政变后的三天时间里，就有三百多人被杀，五百多人被捕，五千多人失踪，继而又在人民的血泊中，于四月十八日成立了非法的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实行白色恐怖，他的反革命面貌其实早已暴露无遗了。”

冯玉祥蹙目：“毅伯，你是共产党员，我现在也成了国民党员，于此北伐之际，抛弃党派偏见，共同对敌，才是最重要的。”刘伯坚正要开口辩解，被他做了个手势制止住，继续说，“何况，有时候，民众运动也是很过分的。”

刘伯坚说：“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全国的一半已经从帝国主义及其同盟者军阀的直接压迫下解放出来，人民群众的斗争日益扩大，又直接推动了国民革命，这应该看作是一件好事情。三月十六日闭幕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对全国人民宣言》，公开号召‘要实现本党的农工利益，使民众

运动充分的、普遍的发展。’ ”

冯玉祥张了张嘴，没有找到合适的话说，只好由刘伯坚继续说下去。

刘伯坚显然在倾吐“四一二”以来压在心头的愤懑：“富于革命传统的上海工人阶级为了策应北伐，在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矛头直指直鲁联军。一昼夜的浴血奋战，于三月二十二日解放了大上海，为国民革命立了大功。四月初，蒋介石还向上海工人阶级表示：‘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果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六日，蒋介石还派人给工人纠察队送去一面绣着‘共同奋斗’的锦旗，可是没出几天，经他蓄意策划的一场针对共产党人和工人群众的大屠杀就开始了，如此出尔反尔，这不是叛变是什么？”

冯玉祥摆了一下手，说：“不，你太偏激了。也许蒋先生对工人采用的方法有不当之处，但你说的叛变，恐怕用辞过苛了。上海离西安太远，详情我们都不得而知，若说蒋先生在上海的举动是叛变，并要将他打倒，焕章不敢苟同。”

“但是……”

刘伯坚刚要说话，副官推门进来向冯玉祥报告说有人求见。

“谁？”冯玉祥问。

“秦女士。”

“又是她。”冯玉祥的眉头皱了起来。

刘伯坚心里也不由一怔。

秦女士名叫秦德君，四川人，“五四”运动时，刘伯坚和她都是成都学生运动的领导人。眼下是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小学校长。西安解围后，成立国民党西安市党部，她任妇女部长，经常带着一些女学生来红城国民军总部向官兵进行讲演。刘伯坚的新婚妻子王叔振，就是经她介绍认识的。

秦德君在这个不愉快的晚上来造访冯大帅，很不是时候。

冯玉祥犹豫了一阵，对副官闷闷他说：“请她进来吧。”

秦德君进屋后，大概也感到了空气的沉重，微微向刘伯坚点了一下头，就在冯玉祥的桌前站下了。

“秦女士，有事吗？”冯玉祥问，不失礼貌地指着沙发，招呼她坐下。

秦德君落座后，说：“国民军要出师北伐，女师的学生希望再搞一次联欢和演讲，不知能不能安排个时间。”

冯玉祥几乎没有考虑就说：“出师在即，要准备的事情太多，我看就免了吧。”

秦德君没有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与刘伯坚交换了一下目光，说：“如果没有时间联欢，我们可以在官兵们吃饭的时候进行演讲。”

冯玉祥挥了一下手，显出了不耐烦：“我看还是算了，你们的讲演我也听过几次，说来说去，总是那一套，男女平等，妇女自由，说到国民革命过来过去也总是那么几句，没有多少新意。”

秦德君碰了钉子，满脸通红。

冯玉祥继续说道：“有些学生在台上演讲，不是骂丈夫就是骂父母，这就是革命？你们贴的标语，还有‘打倒贤妻良母’这一条，王铁老在街上看见了，回来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我也不懂。王铁老你们可以骂他是个老腐败，你们也可以骂我是个粗人是个丘八，但于右任先生呢？他可是个老国民党员，不见得不如你们革命。我又就‘打倒贤妻良母’请教他，他也摇头

说不懂

秦德君红着脸分辩：“你不能只抓住这一条就……”

她的话被冯玉祥打断了：“不只是这一条。”说着，他在地上走了几步，又说：“学生们革命精神可嘉，这没有什么可说的，但还幼稚。革命路途还长，你们现在重要的还是充实自己，要虚心地学习，不徒表面，不随波逐流，不要空谈革命……”

冯玉祥不断说着，也似在倾泻久压心中的一股激流。

刘伯坚心事沉重地拿起桌上的帽子，向冯玉祥和秦德君说了声“你们谈，我先走了”，走出了屋门。

屋外，星月不知被什么时候涌上的一片浓云遮掩了，夜幕显得更加沉重。远处，有人扯着嗓子在吼秦腔，曲调悲凉高亢。刘伯坚驻足，侧耳听了一会儿，戏文是《苏武牧羊》：“汉苏武在北海身体困坏，牧抵羊饮塞风草枕星盖……”被那戏文感染，刘伯坚的心头忽然热了一下。

刘伯坚迈着缓慢的脚步，走过一排排兵营，朝自己的住处走去。还剩下两排房子就要到宿舍的时候，妻子王叔振迎了上来。

“你咋去了这么长时间？”王叔振拉着他的手说。

“冯总司令约我说话。”刘伯坚说。

“说些啥？我能知道吗？”王叔振仰起头望着丈夫问。

刘伯坚看着还没有完全脱去稚气的王叔振，苦笑了一下，说：“革命问题。”

王叔振也笑了，暗夜中，她没有看出丈夫笑意中的无奈和苦涩。这时她忽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丈夫说：“秦德君刚才还到家里找你呢，我说你在总司令那里，她说她直接去找总司令，你看见她了吗？”

“见到了。”刘伯坚点了点头，同时挪动了脚步，向往处的反方向走去。边走边说，“现在，他们大概还在谈着。”“秦校长说了，明后天，我们还要来红城讲演。”王叔振兴奋地说。

刘伯坚使劲捏捏妻子的手，没有说话。

这时候，王叔振才发现他们不知不觉间已经快走到“革命亭”了。

“怎么走到这里来了？”王叔振问。

“走，过去看看。”刘伯坚指着在夜色中显得挺拔的亭子说。关于“革命亭”的来历，笔者谨援引解放后立于革命公园大门内的一段文字介绍如兹：

在刘镇华围城期间，西安城内病、饿、战死军民达五万之众。解围后，在冯玉祥的倡议下，组成“陕西省革命大祭筹备委员会”，选择此地，由西安各界负土掩埋五万死难军民，修起两个冢，名为“负土冢”。在两冢之间建亭一座，高达十五米，占地 169 平方米，命名为“革命亭”，以作纪念。并将周围一百五十余亩地辟建公园，命名为“革命公园”。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那个沉闷的晚上，刘伯坚偕着妻子王叔振缓步走上了“革命亭”。刘伯坚看看亭子两侧的两座大冢，沉默了一会儿，问妻子：“你还记得这两座大冢建成后，举行大祭典礼的日子吗？”

“咋不记得，冯总司令植那棵柏树时，扶树苗的就是我。”王叔振说，“那天是三月十二日，是孙中山先生的逝世纪念日。”“西安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坚持守城八个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个希望，燃着一团烈火。”

刘伯坚在黑暗中说。

“现在，这团烈火越烧越旺了，学生全面发动起来了，工人发动起来了，成立了陕西省总工会，乡下，农民运动一天比一天红火，农民协会遍地都是，今天，国民联军又举行了北伐誓师大会，陕西的革命形势越来越好。”王叔振说，显得很兴奋。单纯质朴的王叔振并没有发现丈夫今天的情绪有什么反常。

“是啊，希望这种形势继续下去。”刘伯坚说，紧紧抓住了妻子的手。望着黑黝黝的“负土冢”，他的耳边忽然响起了于右任先生写的一首散曲：

名城高挂残晖，燕子犹寻故垒；兵民负土坟前泪，争祭当年饿鬼。

刘伯坚深深吸进一口空气。

他似乎闻到了夹杂在那清凉中的淡淡血腥。

夜风吹拂着亭前的松柏，发出簌簌的响声，空气中又悄悄地弥漫起一股令人担忧的不安。

五月五日，马克思诞辰日。

西安农、工、商、学、兵各界在莲花池广场举行“五一”、“五五”纪念大会。大会盛况空前，主席台中央悬挂着马克思、列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参加大会的有六万人。冯玉祥、刘伯坚、刘含初、赵葆华、史可轩、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在西安的知名人士大部分参加了大会。首先由共产党员、西安中山学院（是国民军人陕后在西安成立的另一所由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色彩很浓的学校，设军事训练、组党、农民运动三个班，每期三至四个月，学员四百人，共产党人刘含初任院长）院长刘含初致词。他面对六万尚没有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芸芸众生，向他们介绍了一个令他们激动的日子、让他们惊异的伟人：

“‘五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示威，要求八小时工作、增加工资、工人受教育的日子，所以每年全世界无产阶级在这一大联合起来检阅自己的力量，向资产阶级进攻……五月五日是马克思的誕生日，我们所以纪念他，是因为他唤起了无产阶级向资本家进攻，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救星……”

国民党省党部常务委员赵葆华（共产党员）向大会报告了蒋介石屠杀民众的情况，刘伯坚、乌斯曼诺夫等也都在会上作了讲演。到会群众不断高呼“工农组织起来打倒新军阀蒋介石”等口号。大会通过了“组织一个农、工、商、学、兵联合处”、“通电全国、全世界，宣布蒋介石罪状”等九项决议案。同日，富平、绥德、固市、旬邑、岐山、乾县等县也举行了盛大的纪念大会。

此时，波及陕西全境的工农群众运动达到了高潮，与轰轰烈烈的南方形成了呼应，在相对于南方来说岑寂的北中国，掀起了一股狂涛。

喜欢在大场合讲话的冯玉祥总司令在五月五日的纪念大会上破例没有讲话。

沉默，是他在那一天的选择。

基督将军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秦川道上，烟尘滚滚。

一九二七年五月六日，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总部由西安赴潼关督战。

坐在一辆苏式吉普里的冯玉祥双目微合，脸上露出淡淡的倦意。

虽然已经出师北伐，但一切都不尽如人意。

五原誓师以来，经宁夏，入甘肃，进西安，所到之处，吏治腐败，军队混乱，匪患如蜂，目之所及，一片凋敝，满目疮痍。每到一地，虽严加整肃，但前脚一走，后面却一切照旧。封建、愚昧、落后，是他给西北下的结论。冯玉祥经常想起在苏联的三个月，在那里的所见所闻，都井然有序，相比之下，自己统辖的简直是一个烂摊子。

眼下，最让他头疼的是三件事。

一是担心军心不齐。冯玉祥心中清楚，麾下虽号称三十万，但除了宋哲元、韩复榘、石友三等几支嫡系外，其余多数是分兵割据的地方大小实力派，现在虽都在国民军旗下，但对他能听命几分，心中没底。宁夏主席马福祥与自己交情不薄，其子马鸿逵部在解西安围中表现非凡，似无大虑。甘肃情况就复杂了，眼下已任命原甘肃督军刘郁芬为第二集团军驻甘司令，刘郁芬忠实可靠，但其主力孙良诚部已出陕西，甘肃眼下空虚，而被国民军联军击溃收编的大小甘肃地方军阀，原多数听命于吴佩孚，伺机蠢蠢欲动；青海“二马”马麟、马麒兄弟觊觎甘肃已久，会不会乘虚而入？冯玉祥由五原驰陕途中，专门致函马麟兄弟，煞费苦心，以期稳住他视为大后方的甘肃局势。陕西“二虎”虽已出山，但到底能随他走多远？陕北井岳秀驻榆林，拥兵自保，坐观成败；陕南吴新田一直依附吴佩孚，军纪败坏，会不会乘北伐之际再行倒戈；陕西境内其他各支如田玉洁、党玉昆之流，只管鱼肉百姓，吃喝玩乐，国民革命与他们似不相干；河南刘镇华受降后，虽答应投入北伐，但行动上迟迟缓缓……冯玉祥最担心的是那些不知底细的队伍与吴佩孚暗中勾结，使他腹背受敌。好在眼下武汉，南京都在北伐，吴佩孚已显出死相，恐怕不会有人不识时务。

想到这儿，冯玉祥睁开眼睛，轻轻吐出了一口气。

让冯玉祥头疼的第二件事就是财政困难。刘镇华围城八个月，关中大地早被搜刮得干干净净；西安城内，守军与百姓争食，富些的人家以豆渣充饥，一般穷人则啃光了树皮，元气伤尽。国

民军由五原入陕，所需物资补充极端困难，士兵中一百个人中有九十九个穿的是破衣破鞋，从官佐到士兵，人人面带菜色。再怎么困难，出潼关作战，也必得发给官兵一点路费，这是不能含糊的。冯玉祥戎马生涯几十年，从士兵一级一级干到总司令，因饷哗变的事例听说过不少。从西安到河南，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中间一条山路，沿途人烟稀少，即使强行征派，也无处去搜刮。在准备出征的那些日子里，冯玉祥的财政部长薛子良一筹莫展，急得好几次要喝大烟自杀，幸亏于右任经常规劝，才勉强撑着。最后薛子良想出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借了四百元大洋，过黄河到运城买了些纸张，用石印机印了一百万元的流通券，票面写明国民军联军字样，出关前，三万、四万地分发给出关部队，

以充开拔费用。并向地方声明革命成功之后，一定全部兑回，但还是遭到了老百姓的抵制。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维持部队士气，很大程度上

依赖刘伯坚他们的政治工作。

第三件让冯玉祥感到不愉快的事就是那些越闹越厉害的工人和农民。一切都很明白，这些民众运动是受到共产党支持的，联军总部中的刘伯坚、驻陕司令部里的魏野畴、史可轩等，都经常出现在民众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连老成持重的于右任也经常说些慷慨激昂的话。最让冯玉祥不能容忍的是遍及陕西各地的农民协会，在他眼里，那些无法无天的农民不仅抗粮抗款，还随意杀人。现援引冯玉祥《我的回忆》一些章节，来窥探一下当时冯大帅对待工农运动的心境：

.....有一天，一位国民二军的何旅长从部队驻防的周至和户县一带来，很愤慨地报告一件事，说他们部队分驻在西安附近数县，农民对于纳税，纳租都严加拒绝，每逢征发给养，必受当地农民协会的反对。农协在党部的主持下，非常凶横不法，有几个乡镇长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被他们用铡刀腰斩，说着他就拿出省农民协会发给各县农协的一封信来，上面说，本党有生杀予夺之权，你们看着地方败类，该杀的只管捕杀云云。上面盖有省农协的图章，一点不假。我看他们这个闹法，将来不知要出什么事，当即把原信送给于右任先生看。于先生即把省农协的负责人找来，问此信是不是他们发的。那位先生是个二十多岁的青年，把信端详了半天，才慢慢嗫嚅着说：“图章是真的，命令可不是我们发的。”据他说，农协的关防放在房内桌上，不知什么人伪造指令，偷盖了关防。农协会的关防怎么无人经管，任便人家去盗用？闹出事来，哪个负责？这话就叫人惊讶.....第二天省党部开会，各方面的人都出席，讨论到这件离奇公案，有几位党部青年，非常激昂慷慨地发言道：“有他们军阀杀人的，难道就没有我们杀人的？”.....我当时忍不住狠狠驳了他们一顿。我说这里有驻陕司令，有省政府，若有你们管这类事，还要他们做什么？正因为军阀草菅人命，我们才起来革命。革命必须有纪律，有组织，革命不是以暴易暴.....以后开会时候，常常免不了为这类事彼此冲撞。青年朋友总嚷着工农革命，说这个不是，说那个不对，骂张三反动，骂李四封建.....总之，这些青年是热情有余，勇气很大，只能如列宁所著的一本书所指说的“幼稚病太深，实在不能相当大事.....”

从文中不难看出，冯玉祥在出潼关前对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已经感到了厌倦。

不排除农民运动中的某些“过火”行为，遗憾的是冯玉祥面对发动起来的广大农民，他未能超越自己的阶级偏见。

冯玉祥将军带着他的偏见，只说了他认为该谴责的一面，而对于那个“何旅长”残杀农运干部的罪行却只字未提，有必要将当时的实际情况实录如下：

上面引用冯文中所说的驻户县的那个“何旅长”，即国民二军的旅长何经纬。一九二六年，何经纬向不到十五万人的户县派粮一万四千石，派款十九万元，并勾结土豪劣绅下乡强行征收，甚至逼死无辜农民。户县农民协会成立后，逮捕恶迹最甚的劣绅，发动群众进行斗争，何经纬为此耿耿于怀。一九二七年户县春旱，农民断炊，而何经纬却将私囤粮食一千石高价出售，引起农民抗议。为防民变，四月底，户县驻军包围了农会。五月十一日，何经纬派兵偷袭户县东索村，该村农民自卫军战士三十多人闻讯后，集中在村中关帝庙准备自卫还击，何部士兵首先开枪打死农民自卫军一人，然后向庙内投掷炸弹，打死自卫团长董新良，自卫战士董有庆等九人，重伤九人，轻伤十三人。同日，何部还在户县秦镇活埋了农运干部郑承文。何经纬镇压农民运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激起了各界的极大愤慨，中共陕甘区委及时发出通告，宣传事件真相，陕西青年社发表声讨何经纬的宣言，陕西《国民日报》

连续发表文章，揭露何经纬的反动罪行。十五日，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民党省党部在西安召开有一千五百人参加的追悼户县死难农民大会，并向全国发了通电。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冯玉祥被迫给何经纬“革职留任”处分，令其率部出潼关，“将功折罪”。冯玉祥的姑息，使户县国民军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数日后，何部又派人枪杀了中共户县特支委员、户县农民协会负责人高德隆……

冯玉祥心事重重进入了潼关。

进城时天色已经擦黑，他刚在文庙安顿下来，就有噩耗传来：革命先驱李大钊等二十人于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

这个消息如同一颗闷雷，炸响在冯玉祥的心头，他惊呆了。

李大钊以著名学者身份走入冯玉祥的生活，而后成为冯玉祥的人生知己，影响着他的政治旅途。早在一九二五年五月，李大钊就帮冯玉祥在国民军中建立了政治俱乐部，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派遣了共产党员宣侠父等人到西北军中做政治工作；冯玉祥下野后，又安排他到苏联考察；南口兵败，委派于右任赴苏催其回国，并为其制订了正确的战略计划……

两行浊泪无声地从这位经历过无数次战斗的统帅脸上流了下来。

夜深了，冯玉祥依旧坐在灯下，如痴如呆。

冯玉祥慢慢铺开一张白纸，拿起毛笔，舔墨，愤笔疾书：

何故被绞杀兮为革命！

何处被捕兮于苏联大使馆所在之北京！

何物残忍置诸同志于死地兮帝国主义之刽子手张作霖！

何人之主谋凶杀兮是帝国主义倡首为日与英！

我方率大军东来兮师次潼关！

凶耗惊传兮黄河流水为之呜咽！

三军齐下泪兮万众号啕！

为大多数被压迫民族而痛哭兮非为同志等之寿夭！死我同志兮增我消灭敌人之决心！

心！

革命潮流终不能被绞杀兮将更为之激荡而高歌与奔腾！

人孰不死兮死有异同！

二十位同志之死兮为全世界工农！

革命者之肉体虽死兮其精神永远留于彼压迫者心中！

后死者之责任兮起来向贼猛攻！

继续死者之志愿而奋斗兮达到革命成功！

在潼关文庙的另一间房子里，总部政治部长刘伯坚也含泪挥毫，写下激奋的《北伐歌》：

大军东出潼关去，

不怕死，不偷生，

打倒张作霖，

消灭奉鲁军，

会师中原入北京。

五月九日，冯玉祥悼念李大钊的诗勒石成碑，立于潼关县城，同日，举行了庄严肃穆的追悼大会。冯玉祥还于是日电令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所属各部全体将士佩带黑纱志哀，召开追悼会纪念。之后，签发由刘伯坚起草的“中国国民党西北临时政治委员会为张作霖绞杀李大钊等二十个同志告本党西北全体党员”信。

李大钊对冯玉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自此之前，冯部的许多策略是李大钊帮助策划的。可以设想，如果李大钊不死，冯玉祥日后在陇海路上与汪精卫、蒋介石两次会谈的结局有可能改写。

遗憾的是，历史无法假设。

被巨大悲哀笼罩着的冯玉祥又无可奈何地走到了他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现在，他必须对发生的一切由自己作出判断。

冯玉祥促成宁汉合流

分属于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统率的三支北伐军都在顺利向中原推进。

武汉政府北伐军在总指挥唐生智的率领下，沿京汉路北进，五月中旬在驻马店地区集中后，向河南奉军发起总攻击，连克许昌、新郑等地，奉军大败，败退黄河以北。

与此同时，冯玉祥率第二集团军出潼关，与奉军激战于河南西线。五月二十二日，冯玉祥率中路军在新安败敌张治公部；二十三日，方振武部与奉军四万余众激战于磁间，二十五日，孙良诚率部增援，奉军败走南山，洛阳被第二集团军占领；二十六日，攻占孟津；三十日，占领孝义，同日，第二集团军骑兵团进占郑州。

六月一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与武汉政府北伐军会师郑州。

武汉北伐军乘胜沿陇海路东进，于六月四日占领开封。南北两支北伐军连克郑、汴，控制了中原，取得了北伐以来的又一重大胜利。

六月二日，沿津浦路北上的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北伐军，在渡过长江后占领了军事重镇徐州。

至此，三支北伐军的主力部队都集中到了陇海线上。

冯玉祥控制了陇海、京广两路交通要冲，所处战略地位甚为重要，成为宁汉双方极力拉拢的对象。

宁汉依然对立。

但此时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在敌对势力的封锁破坏及大规模战争消耗下，内部危机也日益表面化。随着工农运动的猛烈发展，国民党中右派的反共叫嚣越来越厉害，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反动，利用所控制的党政机关，发出对工农运动的一系列禁令，公开保护地主豪绅的利益，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

在对待群众运动中，暴露出了资产阶级革命上层分子的一致性。蒋介石从广州到武汉，对给予北伐积极支援的工农民众运动说过不少好话，但当工农分子充分发动起来以后，他又十分惧怕，进而举起了屠刀；一向爱以“小老百姓”自称的冯玉祥也曾讲过“至于如何唤起民众，如何扶助民众团体，如何集中革命力量，如何巩固革命基础，均须与所部官兵，百计努力，一致进行”一类的话，曾使国民军辖区内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然而此时，特别是工农运动与国民军征粮派款发生矛盾的时候，他便产生了不满。在暗中限制反蒋活动，限制农民运动的发展，纵容部属残杀农运干部，东出潼关以后，即与武汉的右派分子徐谦、顾孟雄等来往频繁。当他在中共和人民的支持下，迅速打下洛阳、郑州、开封等地以后，反动意图和背叛革命的嘴脸就更加明显了。尽管他没有像蒋介石那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采取镇压手段，但对蒋介石的“四一二”血腥镇压，非但没有任何谴责，竟在“四一二”前夜，给在武汉的徐谦的电报中称蒋介石是“革命中坚分子，党国前途，同深利赖”。

此时，汪精卫在这一问题上也表现出了同样的态度。

他们的眼睛自然都会盯到站在工农运动指挥塔上的共产党。也许，这正是他们日后短暂政治联合的基础。

当武汉北伐军顺利向前推进的时候，蒋介石利用武汉政府内部的困难，加紧分化活动，策动反动军官叛乱。五月十七日，当革命军出师河南时，武汉政府所辖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五月二十一日，驻长沙的

许克祥部发动“马日事变”，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此时，武汉政府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军事压力，东面有蒋介石的威胁；南面的两广响应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也在加紧“清党”反共，与武汉政府持对立态度；北面有张作霖；如今又从西北来了冯玉祥。

汪精卫决心拉住冯玉祥，为自己在与蒋介石的较量中增加一颗砝码。在两军会师郑州后，他不失时机地给冯玉祥发电，建议与其立即在郑州举行会谈。

汪精卫不会想到，在新军旧军中闯荡了几十年的冯玉祥，为了减轻自己的军事压力，此时最关心的就是继续北伐，打败张作霖，进驻北京。为了这个目的，他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算盘：尽力促成宁汉合作。

六月八日上午，汪精卫偕武汉徐谦、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武汉政府要员先期到达郑州。

冯玉祥下午由开封来到郑州。

冯玉祥给参加欢迎的郑州各界民众的第一印象十分美好。

那时，小雨如丝，郑州火车站人山人海。一列火车徐徐进站，火车停稳后，从车上走下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他一身粗布棉袄，腰扎一条宽皮带，背着一把油布雨伞，俨然一个关东大汉。

顿时，“欢迎冯总司令”的口号响成一片。

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在郑州火车站附近的陇海花园，武汉方面与冯玉祥国民军举行会议。汪精卫意在拉冯玉祥在“分共”和“反蒋”两个问题上与冯玉祥取得共识。

会上，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武汉政府大员一面谴责蒋介石专横独裁，一面又大肆攻击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说共产党借国共合作搞阶级斗争，破坏了国民革命。随汪精卫而来的何键说到湖南农民运动时，更是声色俱厉，绘声绘色地描述出一场“痞子运动”。会后，汪精卫、徐谦、何键等又轮番向冯玉祥游说，发泄对共产党的不满。冯玉祥联想到平时部下反映的农民抗租、抗捐，不经地方官长准许，擅自捕人杀人等方面的问题，勾起了心中藏匿已久的不满。两天的会议，冯玉祥在“分共”问题上，与汪精卫取得了一致看法。

在“讨蒋”问题上，冯玉祥与武汉方面存在分歧。他明确表示不同意“讨蒋”，强调宁汉在北伐大目标上是一致的，规劝汉方“息争”，与南京联合进行北伐。

汪精卫集团为了拉冯“讨蒋”和“分共”，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了冯许多好处：党务方面，设立开封政治分会，指导豫、陕、甘三省党务，由冯玉祥任分会主席；政权方面，成立豫、陕、甘政府委员会，分由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担任主席；军事方面，在豫各军统由冯玉祥节制指挥，陇海路以北、京汉路以东之敌，由冯玉祥负责肃清，进入河南的武汉北伐军全部撤回整顿，巩固长江一线防务，冯的第二集团军扩编为七个方面军。至此，豫、陕、甘三省党政军全都处于冯玉祥控制之下，武汉国民政府北伐军以伤亡一万四千多人取得的会师中原的成果，被冯玉祥所独占。

这是政治利益驱动下的一笔明显交易。

交易还在进行。

蒋介石密切注意着冯、汪举行的郑州会议。郑州会议的结果，使精明的蒋介石看到了汪精卫的意图：“以豫交冯，而以全力巩固两湖，其后南下或

东下攻宁，皆意中事也”。而一旦汪、冯联合东征，将会给刚成立不久的南京政权以致命打击。

眼下，要想继续与武汉分庭抗礼，冯玉祥这边不敢掉以轻心。

蒋介石准备做另一笔交易。

郑州会议刚结束，蒋介石就电邀冯玉祥会晤。

这正中冯玉祥下怀。同样精明的冯玉祥知道在激烈对垒的双方中，裁判居于最有利的位置。

冯玉祥在接到蒋介石的会晤邀请后，立即回电表示同意。

汪精卫、蒋介石都需要冯玉祥，冯玉祥也同样需要他们，除了早日完成北伐这个目标，冯玉祥更看重他自己的利益。眼下，他已从武汉政府那里得到了权力。但是，他还缺一东西：钱。

国民军五原誓师以来，财政问题一直搞得冯玉祥焦头烂额，眼下虽已取得战场胜利，但所辖地区，是中国最贫瘠的地区，粮饷供应十分困难。而南京政权管辖着中国最富裕的省份，冯玉祥在经济上对蒋介石寄托着希望。何况，蒋介石的特使彭程万已转达过蒋在这方面的承诺。

为了促成宁汉合作，冯玉祥积极地担当起了调停人的角色。

六月十四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转达了汉方北伐军总指挥唐生智的态度：“决不与蒋公为难；如与蒋公为难，我辈将自革其命，又何以对革命二字……”六月十六日，冯玉祥由郑州回到开封，即致电蒋介石：

弟于早七时安抵开封，专候我兄晤谈种切，未知大驾现到何处，请即飞电指示，以便早日趋候，而倾渴望，临电神驰，敬候德音。

蒋介石大喜，于十七日致电南京，请吴稚晖、李石曾、钮永建、李烈钧、蔡元培、黄郛、胡汉民、张静江等速上徐州。蒋、冯往来书电频繁，商定在徐州会晤，冯玉祥告知十九日由开封抵徐州。

蒋介石早已从彭程万等人那里探知了冯玉祥的秉性和思想倾向，在迎接冯玉祥时表现的比汪精卫更为谦恭。十九日一清早，蒋介石就率李宗仁等远迎于二十里外的砀山车站。

月台上，手持鲜花的妙龄少女，排列整齐的仪仗队，明光锃亮的军乐队……戎装笔挺的蒋介石站在这精心安排的欢迎队伍里最显眼的位置。

冯玉祥乘坐的火车进站了，刹时间，军乐齐鸣，欢呼声如阵阵潮水。蒋介石引颈翘望着每一节从眼前缓缓驶过的车厢，想早点目睹一下当年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冯大帅的风采，但冯玉祥的影子一直没有出现。忽然，欢迎的人群呼喊向着车尾拥去。蒋介石终于看见在这列火车最后一节“闷罐子”铁皮车上，冯玉祥正探出身子向群众挥手。

蒋介石赶忙迎了过去。

冯玉祥刚走下火车，蒋介石就走过去，用西方式的礼节，与这位穿一身粗布棉袄的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紧紧拥抱在了一起。据当时在场目睹了这一场景的人说，在那一刻，两个人都流出了眼泪。

这次蒋、冯在砀山火车站的拥抱，将使西北的共产党人蒙受巨大的灾难。

当天，冯玉祥和蒋介石同坐一辆汽车来到徐州。

冯玉祥被安排下榻于徐州最有名的花园饭店。

二十日（有说十九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同吴稚晖、李烈钧、

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人抵徐州。

当日，冯玉祥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诸员在花园饭店举行会议。为了拉拢冯玉祥与自己一起“清共”，蒋介石迎合冯玉祥加紧北伐以减轻自己军事负担的心理，满口承诺“继续北伐”。同时，针对其军饷拮据的困境，蒋介石不惜以巨额金钱作为笼络手段，答应从七月份起按月向冯部提供二百五十万军饷，并当场馈赠五十万硬币给冯犒军。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经过两天会谈，冯玉祥和蒋介石达成了“宁汉合作，继续北伐，清党反共”的协议。蒋、冯在联合发表的会议公报上冠冕堂皇地宣称，为了“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决心“凡百诱惑，在所不顾；凡百艰难，在所不避；凡百牺牲，在所不惮”。

徐州会议后，冯玉祥单独发表了《敬告全国同胞及国民军同志书》：

窃玉祥此次转战七千里，率领革命健儿，只知誓死救国，对于本党实为后进，本不敢有所主张。及出潼关，始悉党务纠纷，已成分裂局面……对于共产党同志更愿极口苦劝：如其所取革命方法，不能与国民党三民主义之革命完全一致者，请暂时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

冯玉祥还根据与蒋介石达成的协议，于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即电促汪精卫、谭延闿“速决大计”。电文是蒋方吴稚晖代拟的，经冯玉祥再三斟酌修改后，由冯签名发出，提出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就应“通力合作”，并劝汪精卫早日送武汉政府的俄国顾问鲍罗廷回国，抑制共产党的群众运动。至此，冯玉祥公开追随蒋介石反共。

汪精卫联冯反蒋的企图完全落空。

在蒋介石及帝国主义多方面的压力下，七月十四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在武汉政府急骤右转的时刻，冯玉祥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冯玉祥和蒋介石来说，这却无异于是又一笔成功的交易。

徐州会议，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最后破裂。

当蒋、冯徐州会议的消息传到西安之后，国民军和地方上的共产党人已经预料到等待着他们的将是什么了。

冯玉祥“清共”前的陕西共产党组织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陕西共产党组织的由来与发展：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愤怒的学生一把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又痛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开篇大作中，就有旅京求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张耀斗等人。在当日被反动军警逮捕的三十二人中，就有杨明轩、郝梦九，以后，刘天章、刘含初等人也相继被捕。

他们中的大多数日后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陕西的最早播火者。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此后，旅居北京的刘天章和旅居上海的雷晋签成为陕西籍的最早一批共产党员。

一九二一年十月，北京大学的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杨钟健、赵国宾、刘含初、呼延震东等联合北京高等师范等学校陕籍学生，正式成立《共进》杂志社，以“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为宗旨，刊登了大量笔锋犀利的文章，揭露封建军阀对陕西实行的黑暗统治，号召陕西人民“罢税、罢工、罢市、罢学”，得到陕西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之后，又于翌年十月，成立了旅京陕西青年的政治性团体共进社，《共进》杂志从此成为它的机关刊物。该刊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逐步有了明确的方向和坚强的战斗力。《共进》第十七期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多次刊登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和《新青年》等进步报刊的广告目录和党的领导人的文章，使它在前进道路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共进》成为团结旅京进步学生的一面旗帜，共进社成员最多时发展到六百人以上。

一九二二年七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陕籍团员王尚德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受武汉地区中共组织和团组织的派遣，回到故乡渭南，与好友张浩如创办渭南赤水职业学校，通过教育活动，宣传革命理论；并以职校为基础，创办平民夜校，向劳动人民进行革命宣传。一九二三年，王尚德在武汉党组织的指示下，在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建立了第一个团支部。

从一九二三年前，魏野畴、李子洲等一大批在外地的陕籍共产党员先后回到陕西，发展党团在陕西的组织（杨明轩则早在一九二二年就回到了西安）。这些返乡后的热血青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他们职业革命家的最初脚印留在了学校，时而西安、时而绥德、时而榆林……封建势力的压制和排挤使他们不得不总处在频繁地移动中，随着他们北上南下，党团组织也在暗中发展着。他们的收获是丰盛的，魏野畴在榆林中学的学生中，除了刘志丹，还有王子宜、曹力如、阎揆要……

一九二四年冬，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北方出现了有利于革命的形势，一九二五年秋，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豫陕区党委，以王若飞为书记，黄平万为副书记，肖楚女、马玉夫、刘天章等为委员，李求实负责团的工作，统一领导河南、陕西两省的党、团工作。关中和陕北的党团组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初，成立中共西安地委；由黄平万任书记，魏野畴等参与领导工作，接受豫陕区委领导；三月，中共北方区委派耿炳光为陕北特派员，于五六月间，成立了绥德地委，受中共北方区委领导。

一九二六年冬，西安解围后，陕西革命形势发展很快，为了适应新形势，在西安组织了以黄平万、魏野畴、李子洲、雷晋笙、吴化之、张性初等人为首的党团联席会议，统一领导西安、渭南两个地委和临潼、三原、富平、泾阳、旬邑、兴平、岐山、乾县、延安等地特别支部的工作。年底，国民军联军酝酿成立驻陕总部，中共西安地委派魏野畴、史可轩等人帮助于右任开展筹建工作，十二月十二日，驻陕总部正式成立，正在前往西安途中的冯玉祥电令于右任、邓宝珊分别就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总司令、副总司令。与此同时，魏野畴、李子洲等人又先后领导举办了一个党员骨干训练班和一个政治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为党组织培养了近百名干部，此时全陕党员人数已发展到三百八十多人，为大革命的高涨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改革旧政制，各部、厅、局的重要组成人员，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苏共党员赛夫林担任驻陕总部顾问，中共党员魏野畴担任驻陕总部政治部副部长，史可轩任保卫部部长（后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杨明轩任教育厅长，杨晓初任财政委员会副主任，葛齐云任民政厅副厅长，王尚德任出版局局长。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陕西军政界陆续担任了重要职务。

陕西共产党人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大。

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举行，在出席会议的七十多人中，多数是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大会先后由于右任、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王授金任主席，共产党员赵葆华任大会秘书长，苏联顾问赛夫林、乌斯曼诺夫担任大会顾问。刘伯坚以国民军联军特别党部主席的身份参加大会，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选举出的十三名正式执委中，共产党员占了多数，刘含初、赵葆华、李子洲、魏野畴、张性初、张含辉、王授金等均在其中，王尚德、呼延震东等三人为候补执委。

一月二十八日，中央根据中共北方区党委的建议，决定成立陕甘区党委，任命耿炳光为书记，负责领导陕西、甘肃两省党的工作。三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在西安中山学院，中共陕甘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会议制定出《目前工作计划》，提出“工作集中”的原则，即将党的力量和工作尽量集中到渭河两岸地区，并提出“党到群众中去”的口号，会议选举出陕甘区党委，耿炳光为书记，魏野畴负责宣传，李子洲负责组织，亢维烙为农委书记，陈家珍为军委书记。五六月间，区委进行人事变动，因陈家珍消极怠工，停止其军委书记职务，由魏野畴负责军事，另增补刘天章、杜衡二人为候补委员。短短几个月时间，陕西党的建设有了很大的发展，到五月份，陕西党的地方委员会（简称地委）从陕甘区委成立时的三个发展到七个，特别支部由九个发展到四十一个，党员人数由一九二六年十二月的三百八十八人增加到二千一百七十七人，增长了四点六倍。在军队中，除中共中央和北方区委曾向原国民军第一军派出一百八十多名党员在部队中从事政治工作外，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所属的军队中，如陕北的石谦旅、关中的甄寿珊、杨虎城部，均建立了党的组织，特别是史可轩领导的国民军联军驻陕总政治部保卫队一千多人中，有共产党员近百人，中山军事学校教职员和学员中，也有不少党员。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陕西的农民运动出现了全盛时期。至六月，全省有农民协会组织的县五十个，有区农协一百七十九个，村农协三千八百二十八

个，会员四十一万，农民自卫武装人数在十万以上。
恰在此时，冯玉祥却向帮助过他的共产党人翻了脸。
陕西的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西安古城

其实，早在出师潼关前夕，在军阀混战中摔打出来的冯玉祥就对日益发展的共产党力量有了戒心。

西安解围后，莫斯科派往陕西的中共党员共十五人，原来决定都搞军事工作，但冯玉祥只把先期到达的邓小平等三人分配到军队，后来陆续到来的潘自力等十二人全部分到地方去做无关紧要的工作。

在潼关督战时，冯玉祥曾要求在部队中的中共党员全部转到地方去工作，他公开说“好狗咬人不露齿”，意思是中共党员不可靠，要求离开他的部队。他曾提议在军中担任一定职务的都去当县长，这一要求被以刘伯坚为首的中共党员所抵制。

蒋、冯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反共不再遮遮掩掩，把国民军联军中的苏联顾问和著名中共党员“礼送出境”，首先在河南拉开了大规模“清党”的序幕。

与此同时，冯玉祥秘密下令，第二集团军各部的政治处长和在军中做政治工作的中共党员全部集中到开封受训。

最先向西安党组织发出警报的是中共党员、陕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张含辉。

徐州会议之后不久，去武汉参加全国农民协会代表大会的张含辉、张振海、李仰旭等人，返回时在郑州会见冯玉祥，冯玉祥明显流露出反对农民运动的情绪，当时河南“清党”已经开始，这对陕西的革命形势无疑是个不祥的信号。张含辉等立即电告省农协做好应变准备，并星夜返回西安，向陕甘区党委汇报了冯玉祥的变化，以引起区党委的重视。

刘伯坚也是最早引起警觉的人。他在冯玉祥身边工作，尽管冯玉祥参加徐州会议背着，但他很快就得知了徐州会议的详情，会议之后冯玉祥的急剧右转已经明白无误。几乎在张含辉等向陕西党组织紧急报告的同时，刘伯坚也在郑州委托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返程的陕西代表工芾南、刘炎、李守仁等，立即回陕向党组织汇报，要求陕西党组织做好冯玉祥叛变后的应急准备工作。

在西安的邓小平是最早得到共产党员要被集中的消息的。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样提到了邓小平离开西安的经过：

父亲其时在中山军事学校任政治部主任，“四一二”以后触目惊心的国内形势早已历历在目，由于他直接和刘伯坚保持联系，因此消息比较灵通，在得到所有共产党员要被集中的消息后，他与刘伯坚、史可轩以及李林商量，大家一致认为邓应去武汉找中央，而不到开封去“受训”。因此，六月底，父亲离开了西安，经郑州，很快到达武汉。

当时住在潼关的共产国际派驻国民军联军的军事顾问乌斯曼诺夫同样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也向中共陕甘区党委提出紧急建议，要求区党委立即撤出西安，避免损失。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的一个下午，是个少有的闷热天气。没出太阳，也没有风，有乌鸦闪电般地掠过纹丝不动的洋槐树，预示着一场将要到来的风暴。

“同州西瓜！红沙瓤，赛冰糖……”

在东大街离中山学院不远的一棵洋槐树下，一个卖西瓜的汉子光着上半

截身子，摇着一把大葵扇，守着一车西瓜，有气无力地喊着。

一个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左右看看，走到卖瓜的车子跟前，停住了，对卖瓜的汉子说：“掌柜的，挑个瓜。”

卖瓜的汉子精神一振，看了一眼这个穿着白色长袍的先生，笑着说声“好”，就勾起指头在西瓜上“嘭嘭嘭”地敲起来。

买西瓜的“教书先生”就是魏野畴。

魏野畴付了钱，抱着一个大西瓜，走进了路北的中山学院。

在他刚进学院大门的时候，碰见了对面走来的李子洲，他们互相点点头，一同走了进去。

还有一些行装各异的人在它们之前之后陆陆续续走了进去。

今天，陕甘区党委紧急扩大会议在中山学院举行。

会场设在学院的一所不引人注意的教室里。魏野畴、李子洲进屋的时候人还没有到齐，屋子里已经弥漫上了一股沉重的气息。为了缓解气氛，魏野畴让人切开了带来的西瓜。

西瓜不错，又红又沙。

这些为当前局势焦灼的共产党人默默地吃着西瓜，没有平时那些轻松的说笑。空气沉闷依旧。

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共产党在西安的所有重要领导干部几乎都到了会：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张金印（即日后成为托派的张慕陶，当时是陕西共青团的负责人）、刘含初、杜衡、赵葆华、张含辉……

会议开得很短——显然，这是一个在紧急情况下仓促召开的会议。会议听取了区党委书记耿炳光关于形势的报告。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具体情况，决定由区党委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党的组织尽快地由半公开活动转入秘密状态，各单位身份已经暴露的同志要秘密离开西安，深入到基层开展革命工作。鉴于区党委机关办公地点已经暴露，会议决定将区党委机关由北大街故衣店转移到红埠街九号，重要人员白天隐蔽，晚上活动。各地请示工作均由耿炳光、杜衡两人负责接待。这是陕甘区党委自一月成立以来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冯玉祥决定“清党”，按捺已久的陕西反动势力立即嚣张起来。

七月四日，共产党人于五月一日在东大街创办的“二八”书报社被迫停止营业，失去了西安市内唯一公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阵地。

七月五、六日，驻扎在三原的田玉洁部包围并强令解散了武字区农民协会，逮捕农协负责人乔国栋，击伤积极分子肖德印，同时拘捕了县农协主席庞斋诚等人（乔、庞等人后被路过三原的许权中旅长营救出狱）。

七月六日，奉冯玉祥之命，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参谋长兼西安留守司令石敬亭派人逮捕了陕西《国民日报》社社长、陕西最早的共产党员刘天章和报社编辑、共产党员白超然，押送河南。

同日，驻陕总部副总司令邓宝珊在宴请各机关代表的会上宣布：“冯玉祥来电，要求进行清党。”（在此前后，邓宝珊将军始终与陕西共产党组织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七月八日，根据冯玉祥的指令，石敬亭令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按照冯玉祥“清党”反共的三条办法立即开始“清党”。在此前后几天，冯玉祥连电石敬亭在西安缉拿共产党要员耿炳光、魏野畴、李子洲，在西安实行白色恐怖。

七月十日，石敬亭在红城举行国民党员宣誓活动，通令在西安的所有国

民党员必须参加，否则开除出党。企图借机清除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同时，冯玉祥电令改组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占多数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强迫省农协停止活动，查封了陕西青年社……

短短半个月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了整个西安城。

恰在此时，出席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陕西代表黄平万带着中央指示，回到了西安。

黄平万带回了中央的一条重要指示：撤消中共陕甘区委，成立陕西省委。

七月十一日，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召开了陕西省委成立会议。由于白色恐怖严重，无法召集代表大会，仅由在西安的五个重要负责同志与会研究省委组成人选及其他工作，他们是耿炳光、魏野畴、黄平万、李子洲和团省委书记张金印。会议确定省委由正式委员十三人和候补委员五人组成，正式委员是：耿炳光、李子洲、崔孟博、魏野畴、亢维烙、张金印、李子健、杜衡、蒲克敏、何挺杰、张国藩、张性初、陈嘉惠，候补委员暂缺。耿炳光任省委书记，李子洲负责组织，崔孟博负责宣传，魏野畴负责军事，亢维烙负责农运，张金印为团委书记；省委常委三人：耿炳光、李子洲、崔孟博（后因崔在广东时曾被开除过党籍，决定由李子健代替）。

五人会议从下午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五时。

在陕西省委给中央的第一份书面报告中，陈述了冯玉祥近日在陕西“清党”的多次电令：

冯近数日电令：（1）几军政机关的 C.P.（共产党代号）须声明并退出工作。作为顾问，愿继续做国民革命者，须宣誓退出 C.P. 否则查明枪决。（2）作反“三民主义”宣传者枪决。（3）开秘密会议者枪决。（4）捕拿省党部执委解郑。（5）捕拿国民日报社两编辑刘天章、白超然解郑。（6）限三日驱除西安 C.P. 全数出境。（7）捕兰教育厅长（省政府委员）杨明轩同志与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同志解郑。冯又恐操之过急过激，惹起事变，所以又令（8）史可轩政治保卫队（于右任的势力）开至潼关，听候命令。（9）于所设的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校长，学生五百人）交冯部张某师长带至郑州。（10）后又来电令史可轩自带，恐上有变。以上（1）（2）（3）各条曾分令二军将领执行。

在报告的最后部分，省委陈述了根据当前形势和诸多因素，准备对冯玉祥采取的策略：

对冯在未得中央政策前，我们决定不能作反冯宣传与反冯运动，因为冯与第三国际尚未完全断绝关系，他过去与我们无大恶感，目前还不可破面；而且我们的羽毛尚未丰满，反冯也非时机；但不宣传一军好（冯玉祥兼任一军军长），对冯右倾也不袒护。

形势危急，政策不明，刚刚成立的陕西省委年轻的决策者们经历着迷惘、焦灼和痛苦。

共产党员被冯玉祥“礼送出境”

“礼送出境”——冯玉祥在反共歧路上表现出了有限的宽容。

乌斯曼诺夫的住所。

灯下，刘伯坚和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相对而坐。

明天，乌斯曼诺夫将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刘伯坚今晚特意来送送他。

尽管以前在工作中两人经常发生争论，但在此时，一种依依惜别之情还是弥漫在这间不大的客厅里。

他们互相祝福之后，就陷入了沉默。似乎一切都在不言之中。

乌斯曼诺夫喝了一口水，终于开了口：“伯坚同志，在这种时候，我还是希望我们能够认真地检讨一下，也许我们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刘伯坚露出一丝微笑：“乌斯曼诺夫同志，你是指什么？”

乌斯曼诺夫：“比如说，进西安以后，工农运动的步子是不是太快了一点，使冯玉祥无法接受……”

还是老话题，刘伯坚蹙眉，挥了一下手，说：“不，顾问同志

“你听我说，”乌斯曼诺夫打断了刘伯坚，继续说，“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革命就其实质来说，是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阶级斗争，然而，在我们进入西安以后，工农斗争的火药味是不是太浓重了一点。”

刘伯坚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以顾问先生的看法，好像造成目前这样的局面，责任在于工农运动？”

乌斯曼诺夫摇摇头，含糊地说：“刘伯坚同志，我可没有这样说，也许，你误会了我的意思，我只是想说……”他翻着眼珠，似乎想找出合适的字眼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他的意思其实已经表述得很明确，刘伯坚并没有误会他。在潼关督战时，乌斯曼诺夫就曾在国民二军何经纬旅镇压户县农民协会问题上流露过农民运动过火的看法，当时刘伯坚就与他有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今天，又是老调重弹。

刘伯坚无可奈何地笑了笑：“顾问同志，南方的蒋介石、汪精卫，北方的冯玉祥，如今唱着同一个‘清党’反共的调子拥抱在一起，这大概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吧？”

乌斯曼诺夫一怔，瞪着眼睛，嘴张了张，没有说话。

刘伯坚顿了一下，继续说：“蒋介石带着国民革命军在南方北伐，冯玉祥带着国民军联军在北方北伐，一路奏捷，哪里没有老百姓的支持。初到西安，面对一片凋敝，冯将军也曾大声疾呼支持工农运动，如今，眼看国民革命成功在即，曾经鼎力帮助过他们的共产党人和工农大众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这恐怕还是要从阶级关系上找根据吧。”说到这里，刘伯坚停顿了一下，又用低沉的声音说：“也许，我们的错误恰恰在于，对当前出现的局面没有足够的预见，我们太相信冯将军了。”

乌斯曼诺夫：“可是，刘伯坚同志，共产国际和苏联也一直在支持冯将军，直到眼下，冯还从苏联那里得到大量军火。”

刘伯坚哀哀地笑了一下：“以前，我们只看到了这些，这大概正是我们解除警惕的根据。以前有人总说我们这个幼稚病那个幼稚病，其实，这恰恰是我们的幼稚。”说着，他又抱歉地一笑，“你看，我又说多了。”显然，此时，在分手之际，他不愿继续这个不愉快的话题。

乌斯曼诺夫耸耸肩膀，没有说话，目光落在了堆在地下的行李上。

很晚了，刘伯坚站起来向他告别。两双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乌斯曼诺夫的眼睛里忽然涌上了一种发亮的东西：“啊，我们离开莫斯科整整一年了。”

刘伯坚点了点头：“是的，如果不是眼前发生的一切，我们还会一直在一起待下去。”

乌斯曼诺夫：“会的，我想会的——如果没发生眼前的一切。不过，我会记住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刘伯坚：“我也会。祝你一路顺利！”

乌斯曼诺夫：“我也祝福你！”

两个不同肤色的共产党员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乌斯曼诺夫不会知道，几天之后，刘伯坚也将被“礼送出境”。

开封。

冯玉祥的会客室，简单、朴素，而一圈考究的真皮沙发却与那些简陋的家具形成了不协调的对照。

一顶大吊扇“呜呜”地转着，依然吹不散屋里的闷热。

宽敞的会客室里只有两个人：站着的冯玉祥和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的刘伯坚。显然，他们在进行一次关系重大的谈话。

此时，谈话已经到了尾声。

冯玉祥踱到吊扇下，看了一眼刘伯坚，说：“毅伯，我们该说的都说过了。我冯玉祥并不反对共产党员本人，而是认为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眼下第一位的大事就是北伐，等到国民革命成功了，工人农民的日子自然就好了。”

刘伯坚摇摇头，微微一笑：“可是现在并没有出现这样的征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在流血。”

冯玉祥一怔，踱了两步，又说：“我知道，你是在指蒋先生。但是我能理解他，当他一心一意北伐的时候，他必须稳住他的后院，不能让它着火。当然，在具体做法上也许有些欠妥。”

刘伯坚看着冯玉祥，坚定地说：“不，这是背叛，地道的背叛。”

冯玉祥挥着手说：“算了算了，不说这个了，从潼关出来，我们就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来争论去，谁也不让谁。”他在靠近刘伯坚的地方拣了一把椅子坐下来，继续说，“尽管对贵党我也不满，但我不想学蒋介石先生的做法。我曾经要求过在国民军中的共产党员宣布脱离共产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我认为这并不过分。可是很遗憾，在开封集中训练以来，收效不大，我的意见执行不下去，没有人理会，都很顽固。”

刘伯坚淡淡一笑：“信仰是个顽固的东西。”

冯玉祥：“训导不成，只好将贵党党员‘礼送出境’了。”

刘伯坚：“谢谢冯将军。”说着，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冯总司令，我告辞了。”

冯玉祥指指椅子，对刘伯坚说：“不忙，先坐下，我还有话。”等刘伯坚重新坐下后，冯玉祥对他说，“你留下吧。”

刘伯坚笑笑：“我于冯总司令还有用处吗？”

冯玉祥面带赭色：“五原誓师以来，毅伯先生帮我治军，功劳最大，日后，还要仰仗先生的。”

刘伯坚：“可是如今，我们还能像在五原时那样，你我同站在一个土台子上对国民军发号施令吗？请总司令也仔细想一想。”

冯玉祥：“能，怎么不能！”

刘伯坚：“你在大张旗鼓的‘清党’，可谁都知道我刘伯坚是个共产党员……”

冯玉祥：“你可以脱离共产党，以你的才干，以你我的交情，在这边不愁没有发展。”

刘伯坚摇了摇头：“谢谢冯总司令的好意，刚才咱们还说过，信仰是个顽固的东西，怎么好随意改变呢？共产党员这个名字我是背到底了。”

冯玉祥满面通红：“常言说三军可夺帅，大丈夫不可夺志，那就不敢勉强了。不知临别之际，毅伯还有什么可说的话没有？”

刘伯坚诚恳地说：“我希望总司令不要忘记南口兵败以来我们的合作，不要忘记五原誓师时冯将军的铮铮誓词，不要忘记将军的挚友、几个月以前被反动军阀绞死的李大钊先生。我期待着我们的再次合作。”

冯玉祥呆立着，没有说话。

几天后，刘伯坚和关押在开封管锋街三道胡同第二中学的二百多名共产党员被装上了一列闷罐子车，开往武胜关。

从此，西北的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刘伯坚的名字消失了。

刘伯坚没有等到再次与冯玉祥将军合作的那天。

刘伯坚被冯玉祥“礼送”出境后，偕夫人王叔振先到了武汉，又转道前往上海。不久，受中央委派，去苏联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成为刘伯承的同窗。一九三一年，与刘伯承一同回国，被派往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宁都起义后成立红五军团，刘伯坚任军团政治部主任，领导建立了这支起义部队各级的政治工作。一九二四年九月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奉命留在原地坚持游击战争。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率部突围途中不幸被捕。在狱中大义凛然，坚贞不屈。

三月二十日，就义前的刘伯坚在大余粤军第一监狱给妻子王叔振留下了最后的话：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风笙大嫂及五六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革命事业。

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要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余

三月二十一日，冷风料峭，浓云低垂，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刘伯坚手戴镣铐，身裹铁链，走过破败的大余县城。看着路边为他送行的老百姓，他微笑

着向他们致意，朗声吟出了在狱中写就的绝命诗《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
螭珊复螭珊。
市人争瞩目，
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
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
工农齐解放。

枪声响了，刘伯坚和他的四个难友倒在了血泊中……冯玉祥将军不会料到，一九二七年七月与刘伯坚的那次谈话，竟会成为他们的永诀。

他同样不会料到，他将为一九二七年夏天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反叛付出代价。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历史悲剧中，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冯玉祥离开了共产党，走上了一条由阴谋家为他铺设的崎岖人生之路。

与共产党分道扬镳之后，冯、蒋关系更加亲密。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冯玉祥和蒋介石接受老将马福祥的建议，在郑州换谱结盟，冯年长五岁为兄，蒋为弟。

蒋介石写的帖子是：

安危共济，甘苦共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

冯玉祥写的帖子是：

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

然而谱帖上的墨迹未干，这对盟兄盟弟便反目为仇，兵戎相见。一九二九年，蒋介石在蒋桂战争取胜之后，血刃未洗，便把剑锋对准了他的这位北方盟兄，爆发了蒋、冯、阎大战，制造了中原大流血。以后，蒋、冯又多次在血火中角逐，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和教训，终于使冯玉祥将军幡然醒悟。抗日战争爆发，冯玉祥将军积极投身于抗日的革命洪流，虽再无缘掌兵，却毕生致力于民主事业，与共产党再次携手合作，反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一九四八年，他应共产党邀请，由海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在途中因轮船失火而遇难。

第二章 清涧起义

史可轩、刘含初之死

西安。

“清党”正在国民军联军驻陕总部和地方上大规模展开。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日，第二集团军参谋长兼留守司令石敬亭强制国民党党员宣誓，表示无“跨党”行为。规定统一誓词：“余向系国民党党员，完成国民革命，绝无叛党跨党行为，余再郑重宣誓，生死与共。此誓。宣誓人某某某。”

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分别以西安警备司令部、陕西省政府代主席石敬亭、驻陕总部总司令于右任、副司令邓宝珊名义，发布了“清党”反共的三条办法，计有：（一）不准跨党；（二）共产党跨党领袖一律解除职务，开除党籍，遇必要时得加以严重监视；（三）在国民革命时期，不准以共产党名义活动，亦不准假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工作。违者按反革命条例治罪。

七月十七日，以国民党右派石敬亭为首的陕西省政府正式成立，以于右任为总司令、邓宝珊为副司令的驻陕总部之使命宣告结束。值此，以西安市为中心的陕西大革命处于低潮。

陕西的共产党人面临着空前的困难。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陕西国民日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一条简短的消息：

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政治学校定期东行

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政治学校奉冯总司令之命，移豫训练。闻该两校奉今后，准备于本月十四日开拔云。

文中的政治学校即以史可轩为部长的第二集团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

在国民党左派于右任、邓宝珊领导下的驻陕总部，统揽陕西党政军大权，具有军政府的性质。在他们主政期间，吸收了大量的共产党员到总部和地方工作，就连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都是共产党办起来的。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则是共产党员最集中的地方。冯玉祥“清党”，决不会忽略这两支左派色彩浓厚的力量。为了抑制在驻陕总部中于（右任）系及共产党的势力，冯玉祥于七月十三日电令：西安中山军事学校与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并为一个旅，由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兼政治保卫部部长史可轩率领开赴河南“训练”。

事实上，冯玉祥电令“东行”的两部，并没有像报纸上说的准备“开拔”。

冯玉祥的意图不言自明。

陕西省委决定不执行冯玉祥的命令。

当时，主持驻陕总部的只有副总司令邓宝珊将军一人（总司令于右任早已看出冯玉祥异己之心，于六月间去了武汉，没有再回来）。接到冯玉祥的电令后，他通过共产党员葛齐云向中共陕西省委表示不愿反共，并提出要史可轩部随他从南路出陕入豫，靠拢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当时，武汉方面情况尚不明朗，省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表面上接受冯玉祥调遣，两支部队先离开西安，但不出潼关。史可轩遵照省委决定，带领政治保卫部与中山军事学

校学生共千余人于七月中旬开拔（有人说是十九日），先步行到西安以北草滩镇，然后沿渭河开往临潼交口一带，准备看形势发展再伺机而动。

不久，省委即接到武汉亦于七月中旬开始“清党”反共的消息。为了保存党精心培育出来的这支革命武装，省委当即决定史可轩率部北上，靠拢驻扎在陕北清涧、宜川一带受党影响较多的石谦旅，争取独立发展。为此，省委专派崔孟博急赴临潼交口镇向史可轩部党组织传达省委的决定。

为了接应史可轩部北上，省委同时还派魏野畴、唐澍、白乐亭急往清涧，向石谦部党组织传达省委决定。

那是一个朝霞如血的早晨，史可轩带着他的一千多人的队伍，顺着一条小路，向北进发了。

开始，他们的行动几乎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他们行进得很顺利，没有遇到任何阻截就进入了富平县境。

而恰在此时，这支部队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史可轩和许权中在部队下一步的去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原有四名主要领导：校长史可轩、副校长李林、政治部主任（也称政治处长）邓小平、总队长许权中，都是共产党员。冯玉祥“清党”反共后，邓小平、李林先后离开西安，此时的主要负责人除了史可轩外，就只有许权中了（基层干部和学员中尚有不少共产党员）。

渭北一带，驻有许多原国民二军的部队，史可轩、许权中都曾受李大钊派遣，在国民二军中工作过一个时期，因此这些部队的军官中有不少与史可轩、许权中或是“乡党”或是“老关系”。由于有这些旧日“朋友”，史可轩感到在渭北落脚比在相对生疏的陕北可能会更有利些，因此派人到国民二军上层人士中进行联系，打算暂时放弃北上清涧、宜川的计划，而另找落脚点。许权中则坚决反对史可轩的这一主张，要求立即北上。史可轩未采纳许权中的意见。

一天下午，许权中借故去查看行军路线，与史可轩不辞而别，回到了他的家乡临潼交口镇山东庄。

由于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左”倾色彩浓重，原国民二军驻渭北各部均不敢收留，史可轩带着部队向陕北转移。

这时，冯玉祥已经发现了史可轩的企图。七月二十七日，冯玉祥、宋哲元和驻渭北留守司令朱子敏密令驻富平美原镇的师长田生春（外号田葫芦），密切注意史可轩部的军事行动。

一张大网在渭北原上拉开了。

史可轩全然不知。

七月二十九日，史可轩率部北进到达美原镇。此时，经过十来天行军的部队已经疲惫不堪，为了筹措粮草和借道北上，他决定亲自去找田生春商谈。当时，由张蔚生带领的卫队已经被田生春扣压，史可轩去找田生春无异于自投罗网，许多人劝他不要贸然前往，但他却淡淡一笑：

“都是靖国军里出来的，看他田生春能把我这个乡党咋样！”

说罢，带了十几个人，径往田生春部。

不久，就传来史可轩被田生春扣押的消息。

当时驻扎在城外的部队各营长紧急开会，讨论营救史可轩的军事行动。一营长张雨生主张坚决攻城，乘乱救出史可轩，但参谋长韩威西优柔寡断，贻误了战机。

还没等到采取营救措施，就传来了史可轩被害的消息。

关于史可轩之死，有几种说法：

一说史可轩到了田生春部驻地以后，根本没有见到田生春。田生春得知史可轩要来找他的消息后，避了出去，却告诉部下，待史可轩一到，不用报告，立即将他杀了。因此，史可轩刚一进兵营，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就由一个连长指挥着把他抓起来枪

毙了。

一说史可轩见到田生春后，说明了来意，田生春即拿出冯玉祥和宋哲元严密监视史可轩部的命令让史看，同时摆出两条办法让史可轩挑选：一是让史可轩把队伍留给田生春，史可轩悄悄逃走；二是劝史可轩赶紧率部过黄河向冯总司令请罪。决不借路。史可轩大骂田生春无情无义，不讲交情。田生春说，既然这样，也就怪不得兄弟了。于是就命令部下把史可轩杀了。

一说史可轩刚见到田生春时，田生春态度还好，说可以商量，还为史可轩办了一桌酒席接风。刚吃完饭，田生春就接到了渭北留守司令朱子敏转来的冯玉祥关于严密注意史可轩部行动的命令，同时得知国民党驻渭北各部队纷纷向富平一带集结。田生春害了怕，食了前言，当下派人将史可轩杀了。

还有一些大同小异的说法。

历史过去已近七十年，其中细节已难考证。但史可轩牺牲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九日的田生春手下却是事实。陕西省委之后给中央的政治报告中这样谈到了史可轩之死：

可轩同志……不认识敌人，不想打着向北走，希望和平，希望田生春为自己筹备支应，田已将张蔚生的卫队扣了，可轩还亲往交涉，结果于七月二十九日被田杀害了！

史可轩被害后，史部不敢在美原镇久留，几个基层干部一商量，赶紧将部队撤回到栎阳镇附近一带。部队由于失去了首脑，一时间士气低落，情绪混乱。必须马上找个领头的人，这时，大家又想起了跑回家乡的许权中。于是由共产党员、原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组织科长高克林赶到临潼交口镇，把许权中从家里请回了部队。

许权中回到部队后，担任了总指挥，仍决定拒不接受冯玉祥的调遣命令。眼下，部队往哪里去仍是最急切的问题。陕北军阀井岳秀也已开始“清党”，沿途各军对这支戴着红帽子的部队也严加防范，原定北上陕北清涧、宜川一带已无可能。周围有冯玉祥、岳维峻、冯子明、甄寿珊等大小军阀部队，将这支共产党员领导的“赤色”部队团团围住，都想吃掉这块“肥肉”。为了利用军阀矛盾，保存实力，许权中决定暂时接受陕西地方军阀冯子明的改编。冯子明与被田生春杀害的史可轩曾同时在原国民二军中当旅长，素有交情，为了扩充实力，将许权中部收编，番号是暂编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驻扎在临潼关山镇。

至此，正式结束了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的历史。

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这支革命的武装部队在陕西省委的领导下，利用各派军阀的矛盾，巧妙地周旋在几股反动势力之间，保存了实力，活动于蓝田、洛南一带，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

一九二八年五月，许权中旅参加了著名的渭华暴动，这是后话。

奉命到陕北石谦部传达省委决定、准备策应史可轩部北上的魏野畴、唐澍、白乐亭到达陕北不久，就得知了史可轩被害、许权中接受改编的消息。

唐澍、白乐亭接省委命令，留在清涧石谦旅李象九营（李象九系中共党员）从事党的秘密活动，进行兵运工作。

他们将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清涧起义。

同他们一起来到陕北的魏野畴却在一个风高浪急的早晨，东渡黄河，去了河南。

就在冯玉祥下令中山军事学校东移的同时，西安另一所革命摇篮——西安中山学院也被勒令解散。

中山学院成立于三月十日，并于同日正式开学。名义上是国民党办的，实际上完全由共产党组织领导。校长刘含初、副校长兼教务长李子洲、教育长徐梦周、总队长任敬斋、总务科长呼延震东皆陕西著名的共产党人。学员来源，除从社会上招收少量

外，大部分是陕甘两省各地党组织保送的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其中以绥德第四师范、榆林中学和关中三原地区送来的学生为

最多（这些学校和地区，受大革命影响较多）。学院宗旨明确：以培养“指导农民运动，办理党务及军队中政治工作人才”、“妇女运动模范人才”为目的。先后设立了军事政治班、组党班、农民运动班、妇女班、行政人员养成班等，讲授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帝国主义侵华史、土地问题及农民运动等课程。任课教员中的共产党员有钱清泉、刘继曾、严信民、王子休（李子洲调陕甘区委工作后接任该校教务长）、潘自力（兼）、冯芾周、杨慰祖、冯文江、金鸿图、杜寿松、吴化之（兼）、杨明轩（兼）、亢维格（兼）、魏野畴（兼）、李子洲（兼）、吕有乾（兼）等。此外，刘伯坚、邓希贤以及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赛夫林（系驻陕总部顾问）也到校讲课或作报告。共培训学员一千多人，为陕甘两省输送了大批人才，他们中的不少人以后成为革命骨干。因此中山学院被人们誉为“西安革命学府”。

冯玉祥“清党”，自然不会放过中山学院。

七月二日，中山学院举行游艺大会，到会来宾约四千多人，石敬亭到会讲演，要求学生要“确定意志，不要中途变节，对政策要审慎，不要草莽从事”。

在西安警备司令部公布“清党”反共“三条办法”后，学院中的共产党员被迫先后离开学校。校长刘含初在白色恐怖下，无法在西安立足，回到了老家陕西中部县（即现在的黄陵县）。陕北军阀井岳秀闻知后，立即派人到中部县，将刘含初秘密杀害了。

刘含初牺牲在八月十九日，比史可轩晚二十天。

在石敬亭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前后几天，不仅加紧了“清党”步伐，还从多方面消除“赤色影响”。《陕西国民日报》曾有过如下报道：

七月十八日：标语文句须经规定方可张贴，以前各种标语均应一律洗去，快邮代电。万急。县知事钧鉴：顷据薛委员笃弼世电开：“中央对于以往工作之错误迭有训令，嗣及决议：以后一切运动之标语文句、纸张颜色皆须由此项规定方准张贴。俟印齐后即行付案。奉总座（指冯玉祥）论：以前各种标语，无论其合适与否，均应一律洗去，不得留有。”等语前来，合亟转达，即希查照办理是要。石敬亭，钤印。

七月二十二日：大钊图书馆更名。本月二十日，教育厅已颁发明令，将大钊图书馆更名为平民图书馆矣。七月二十五日：公共体育场擦去联俄字样。公共体育场于今年修理之时，革命标语中有“联俄”、“联共”字样，现在该字样已擦去矣。

汪精卫继冯玉祥在南方“清党”以后，将以鲍罗廷为首的苏联顾问团驱逐出境。鲍罗廷一行取道蒙古返俄，通过陕境时，八月十日的《陕西国民日报》是这样报道的：

鲍罗廷返俄过陕

苏俄鲍罗廷近因南方积极清党无所容足，特乘车返俄，昨经过西安，下榻中山公园。社会咸惊愕其蛊毒复播于北方。其鲍氏返国，已沿受政府监视矣，毫无宣传作用也。

在清除“赤色影响”时，原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驻地、经于右任起名的“红城”，对于石敬亭来说，是一个特别刺耳的字眼，于是他把它改成了沿用至今的“新城”。

西安解围后，陕西轰轰烈烈的革命局面因冯玉祥始，又因冯玉祥而终。陕西，一个时代结束了。

魏野畴死不瞑目

陕西无产阶级革命的播火者魏野畴一九二七年的八月离开了陕北。

他是七月下旬来到陕北的。

七月中旬，为了策应史可轩部靠拢陕北石谦旅，魏野畴奉陕西省委之命，与唐澍、白乐亭北上。他没有想到，几乎就在他到达陕北的同时，井岳秀便得知了他的行踪。

陕西。“清党”后，陕西省委处于地下状态，建立了秘密工作原则，为了减少下级与省委的直接关系，决定了特派员制度。全省共分为六路，每路设特派员一人，直接对省委负责。由于魏野畴曾在陕北榆林中学教过书，情况比较熟悉，因此兼任了陕北路的特派员（魏野畴时任陕西省委军委书记）。魏野畴进入陕北十分隐密，身穿白衣，头戴草帽，带着极简单的行李，骑一头小毛驴。他先来到延安，召开了地委会议，然后又来到共产党员较多的清涧石谦旅李象九营（营长李象九是党员），召开了李象九等人参加的党内会议，经魏野畴介绍，唐澍、白乐亭到李象九营工作。最后，又只身前往绥德，准备开展工作。但由于树大招风，很快就被陕北军阀井岳秀知道了，于是逮捕魏野畴的一纸密令下到了驻陕北国民党军队各部和地方各县。魏野畴不能在陕北立足，只好东渡黄河到山西，再转道河南去找杨虎城。

杨虎城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军军长，归东路总指挥鹿钟麟节制。出师北伐入豫后，现正驻豫东马牧集一带整训，准备参加豫东战役。对于魏野畴的到来，侠肝义胆的杨虎城表示十分欢迎。他们是一九二三年在榆林认识的。当时一个在榆林中学教书，一个正赋闲榆林（一九二二年，坚持靖国军旗帜的杨虎城被直系陕西督军阎相文和刘镇华镇嵩军所迫北撤，所部接受他的蒲城同乡井岳秀的改编，杨则闲住榆林），名人识名人，两人你造访我，我造访你，谈时局，谈历史，谈见闻，于是，魏野畴就成了杨虎城将军的第一个共产党员朋友。

魏野畴此时来到杨虎城部时，杨虎城正为部队军纪散乱而焦的（西安八月守城，元气未补即出征北伐——笔者注），化名魏金的魏野畴即被杨任命为政治部主任。魏野畴着手挑选了一部分党员和革命青年，开始在军、师、团、营、连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很快就在全军健全了工作制度，振奋了士气，在与奉军作战中取得了胜利。杨虎城对魏野畴更是言听计从，他不止一次地对魏野畴说：“在我的部队中，决不清党，如果共产党要离开我，我个人也断然离开军旅不干了！”杨虎城不但不“清党”，还请魏野畴把各军中清出来的共产党员吸收到杨部来工作。

共产党的组织在杨部中很快地建立起来，秘密成立了第十军中共军委，魏野畴任书记。

在豫东战役中，鹿钟麟为保存实力，避敌不战，将所部由前线撤至兰封，而用电话命令杨虎城死守归德。杨虎城率部孤军奋战，与数倍之敌连日激战，兵力疲惫，援军无望，城中粮草断绝。而此时，杨虎城的宿敌、已归顺冯玉祥的降将刘镇华又占领了车站一带，情况不明，随时都可能倒戈相向。西安守城八月的惨景又出现在杨虎城眼前。值此艰危之际，杨虎城采纳魏野畴建议，毅然下令全军脱离战场。十月，魏野畴随杨虎城部进至皖北太和县，暂时驻防该地整训。

此后不久，另一位共产党员南汉宸也来到了大和。南汉宸是杨虎城通过

第一师参谋长寇子严（共产党员）约来帮助治军的。十二月初，杨虎城在太和成立军事政治干部学校，以南汉宸为校长（有说南为副校长）。

由于第十军的到来，一向冷冷清清的太和县城顿时热闹起来了，各种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地纷纷亮出了自己的旗号：工会、农民协会、妇女联合会、革命青年研究会、少年先锋队……领导这场革命风潮的是秘密建立起来的以魏野畴、南汉宸等人为首的皖北特委。

共产党在第十军的活动，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注意。当时，无论南北，整个国民党军队都在“清党”，唯独杨虎城第十军还在搞国共合作。风声所播，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一九二八年一月，南京政府派韩震声携款三万元，以劳军为名，到杨虎城部来侦察情况。韩震声与南汉宸系山西同乡，且在冯玉祥五原誓师后，随着以鹿钟麟为首的赴苏参观团同去苏联参观，自然知道南的政治面貌。魏野畴、蒋听松（时任军部秘书长，亦为中共党员）等人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是人人皆知的。恰在此时，韩震声截获了寇子严写给特委书记南汉宸请示工作的一封信。韩震声人证物证俱在，持信径找杨虎城，逼迫杨虎城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共产党员，被杨虎城严辞拒绝。韩此时称即回京复命，暗示如不逮捕南汉宸、魏野畴等人，第十军将元前途。杨将军恐遭不测，将南汉宸暂时送出太和。

杨虎城既不愿接受冯玉祥节制，蒋介石又迟迟不予收编，韩震声到来之后，更增加了第十军的危机。长此下去，粮饷无着，必会引发兵变。杨虎城处此困境，如坐针毡，不得已决心亲往南京去见蒋介石。一九二八年二月，与韩震声同赴南京，不料与北上徐州部署北伐的蒋介石失之交臂。而此时，杨虎城却忽然接到蒋介石的一纸命令，着第十军归方振武指挥（方振武原属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建制，此时改归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笔者注），参加北伐战斗序列。杨虎城由此意志更加消沉，遂以外事托冯钦哉，内务托孙蔚如，嘱其二人共同代理军长职务，他却从陕军卫定一处借到三千元旅费，偕妻子谢葆贞、秘书米暂沉由上海搭轮东渡日本，暂消烦恼。

杨虎城赴宁之前，曾嘱告魏野畴，必要时可以离开，以防不测。杨走后，太和形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几次下令“清党”，孙蔚如不得已通知魏野畴等共产党员立即离开太和。

魏野畴离开第十军后，并没有远走。他不忍看到刚刚发展起来的皖北革命形势就此完结。二月九日，魏野畴连夜在大和县城主持召开了有七十多名党员干部参加的特委扩大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会议根据党的“八七”会议武装反抗国民党、实行土地革命的精神，通过了“皖北土地革命大暴动”，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决议案。

二月底，新任皖北特委书记魏野畴向党中央写了《关于皖北政治经济及党之组织经过现在策略》的报告，分析了军阀之间的矛盾，指出皖北党组织已迅速发展，农村中革命已经具备条件，兵运工作已有基础，特委“一致同意即刻发动土地革命，必能扩大至全皖北，破坏十军及十九军，引导五百万农民走上革命道路。”

四月初，魏野畴接到党中央给皖北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指示，现在的策略是“发展群众斗争，领导群众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为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魏野畴在阜阳县城主持召开了该县各区委负责人及四十七军军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了起义部队和群众发动情况的汇报。四月七日晚，魏野畴经过一番装扮，来到阜阳城外的西湖亭主持召开了地方党委和

军队党委联席会议，对起义作了最后的部署。根据阜阳驻军不多，城防空虚，军教导团及留守司令部特务连的兵力绝大多数为我党所掌握的实际情况，提出“以阜阳驻军作为起义的骨干，城内工人店员响应，城外农民赤卫队攻打各地伪税局，再一齐攻城，待起义胜利后，建立豫皖平原根据地”的计划。会议决定成立皖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魏野畴任总指挥，胡景陶任副总指挥。

四月八日，夜黑如漆，豪雨如注。午夜十二点，魏野畴命令发出起义信号。由于风大雨猛，浇上煤油的棉被未被点燃就被敌人发觉。因起义人员没有看到起义信号，遭致敌人阻击，起义部队陷入混乱。

魏野畴立即组织撤退。

天将破晓，起义部队才在魏野畴的率领下脱离危境。谁知这时，几名叛徒却勾结国民党军队缴了流动哨的械，随后敌团长谈万国率大军压了上来，起义部队还未来得及还击，起义领导人魏野畴、胡景陶、蔡澄波、胡怀西就被逮捕了。

魏野畴被捕以后，谈万国多次劝降，均被魏野畴骂回。

最后，匪首谈万国派刘永太等三人将魏野畴杀害在老集东边的凹地里。

据说，这位陕西兴平人在被害时一直骂不绝口，死后双眼不闭。

由书生成为了共产党人的魏野畴牺牲时，刚刚三十岁。

阜阳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安徽地区发动的首次规模较大的工农兵武装起义。它的悲壮的光荣是与魏野畴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对于魏野畴，毛泽东曾给予过高度的评价。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同杨虎城旧部孔从洲谈话时，指出：魏野畴是老同志，有学问，他还有著作，我看过，写得有水平。又说：魏野畴同志是西北地区共产主义新思潮启蒙运动中最先进、最英勇的战士和旗手，陕西青年的伟大导师。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暴动史上，应该留下陕西兴平人魏野畴的粗壮一笔。

李子洲南下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

让叙述再回到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陕西。

就在魏野畴、唐澍、白乐亭等人北上清涧、宜川的同时，一个商人模样的人坐着一辆黄包车进了西安火车站，然后上了一辆向东开的火车。

他就是陕西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李子洲。他的任务是去找党中央，向党中央请示汇报陕西的工作。

当时，陕西方面最急于知道的是中央对于冯玉祥的态度。此时已变成国民党新军阀的冯玉祥一方面同共产国际保持着关系，从苏联获得军火，一方面却又在“清党”反共。处于幼年期的

中共陕西省委在对待冯玉祥的问题上手足无措。

就在李子洲寻找党中央的这段时间里，爆发了一件对中国现代史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八月一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由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二万多人，在南昌举行的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李子洲八月初来到武汉时，已经公开叛变革命的汪精卫政府正在组织对“八一”南昌起义部队进行追击，同时，也加强了对武汉的政治控制。李子洲目光所及，全是逮捕共产党人的布告，武汉三镇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李子洲几经周折，终于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八月六日，李子洲首先书面向中央汇报了陕西的政治形势和省委的工作特别是组织工作方面的问题。

八月十二日，张太雷在一个十分隐密的地方接见了这位陕西党的负责人。

直到此时，李子洲才得知中央刚刚开过“八七”会议。“八七”会议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

张太雷参加了“八七”会议，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李子洲和张太雷最早相识于北京。一九二二年，二十二岁的张太雷在北京加入共产主义小组，年长他六岁的陕西籍北大学生李子洲在京创办了进步刊物《秦钟》。在一些革命青年的集会上他们见过面。至今时隔七年，两人一南一北，都成了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

形势紧迫，无暇寒暄。

李子洲首先向张太雷报告了陕西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对冯玉祥“既不反冯，也不说冯好”的原则。

张太雷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代表中央对陕西省委的报告提出了意见。在对待冯玉祥的问题上，中央指出：

陕西的政策与河南有同样的错误，不打冯事实上就是帮助冯的反动，此政策是错误的。这些错误不能完全怪地方，中央也要负责任。冯在河南将不能立足，将抓陕西来作为其根据地。我们要计划根本推翻冯的统治，现在他的统治并不会稳定，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过去我们有一错误，即仅是利用此打彼。这种上层的工作完全是军阀政客的把戏。我们党的一切都应建筑在群众的基础上，在民众的基础上来形成反冯势力，在民众中我们要提出代表民众真正利益的口号。如抗捐、抗税、不用流通券（冯玉祥军政府发的），

在兵士中鼓动要求发现洋，在商人中提出不交苛捐，如此我们可以拿到民众，在军事上利用二、三军（指原国民军联军第二、第三军）反冯可以，但二、三军得势仍是不好，甚而更坏，所以我们要拿自己的力量与他们合作反冯，并且在民众一点（原文“点”应是“致”字笔误——笔者注）利益的条件下来与他们合作……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央指出：要“取消反对新政策的分子，在渭河农民多的地方应加入至少二农民同志到领导机关；我们的力量不必一定要扩大到全省，务必要集中到几个重要的区域；改变党员的质量和成分，即要增加农民的数量；消极的分子要洗刷出去，吸收在争斗中勇敢的分子入党，或加入领导机关……”最后，张太雷还对当前需要注意的几个具体问题指示如下：

城市手工业工人也要作改良待遇等工作；

农运集中重要几县即可开始暴动，反对土豪劣绅，抗租、抗捐、抗税；

国民党工作要作，但不要只注意上级机关，更要留意的抓住群众，并要包办国民党，并抓住下级党部的群众，使他们也加入农民暴动的争斗；

要注意红枪会和土匪的工作，尤其要作破坏军队的工作（农民加入军队），我们不要怕拿政权，要勇敢的去拿，失败可以上山；

可以利用二、三军反冯，但要注意这不是我们主要的政策，主要的是要造成我们自己的力量……

九月上旬，李子洲带着“八七”会议文件和党中央对陕西工作的指示回到了西安。

经过比较充分的准备，九月二十六日，在西安市红埠街九号，召开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各路特派员、各县委及青年团的代表等十五人，他们是：耿炳光、李子洲、李子健、肖铭、潘自力、杜衡、张性初、张含辉、陈嘉惠、曹趾仁、徐梦周、张国藩、庞诚哉、蒲克敏、张金印。

省委书记耿炳光和组织部长李子洲向会议分别作了政治报告和党务报告。

会议讨论了《国际决议案》和《八七决议案》，通过了《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

在会上，省委书记耿炳光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认为自己受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较深，错误严重，提出辞去省委书记职务，并推举了新的书记人选。李子洲、张金印等人认为陕西党组织与耿炳光等人虽犯有错误，但也有国际、中央等多方面的原因，责任不全在耿的身上，提议耿炳光继续担任省委书记，这个提议为会议所接受。最后，对省委进行了改组，委员有耿炳光（省委书记）、李子洲（组织）、李子健（宣传）、张金印（团省委书记）、刘继曾（秘书长）、亢维格（农运）；候补委员为潘自力、张含辉。

由于得到了中央指示，会议开得很热烈，一直进行到二十七日深夜才结束。

这次会议史学家通常称之为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

它在陕西党组织的历史上，是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在革命的紧急关头，纠正了陕西党组织内的投降主义错误，澄清了党内的混乱思想，坚定了信心，从而为正确贯彻“八七”会议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使陕西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可以说，“九·二六”会议是为陕西即将爆发

的一系列武装暴动发出的起跑令。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深夜，走出红埠街九号的共产党人个个脸上都写着悲壮。

那晚的月亮很好。

石旅长得到了井岳秀的密杀令

宜川——陕北靠近山西的一个小县。

夜已经很深了，在已经熟睡了兵营里，有一所高大的青砖房子还亮着昏暗的灯光，宽敞的窗棂不断闪过一个有点趑趄的身影。

这是石谦的住处。

石谦此时的职务是陕北“土皇帝”井岳秀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步兵第六旅旅长。

此时，他正在屋子里踱来踱去，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将他的身影不断地在墙上拉长和缩短，宛如一只被囚禁的怪兽。他终于在桌前停下来，目光又一次落在桌上他看过无数遍的信纸上：

斋兄见字如面：

顷接上峰旨意，为适应国民革命新发展之需要，亟待开展清党工作。据悉，你部以谢子长、李象九等为首共党分子，进行赤化，甚为激烈，实为我军所不取。望兄以党国为重，设法消除此心腹之患，则国家幸矣！我军幸矣！切切此意，望速察之。

井岳秀手字

看着这封信，几个人的影子拉皮影似地在石谦眼前交替出现起来：井岳秀、李象九、谢子长，一个是他的上司，两个是他的下级，论交情，跟他都不错，对于如何处置这一道命令，他难以决断。

对于石谦来说，井岳秀曾有恩于他。

石谦出生于渭北源上的白水，自幼失去爹妈，小小年纪就给人拦羊、打活。忍饥挨饿冷眼恶语是童年留给他的唯一记忆。成年后，血气方刚的石谦再也不堪凌辱，一把火烧了财主的房子，上山当了土匪。从此以梢林为家，干起了打家劫舍的营生。

以血复仇虽然有一时痛快，但却常常担惊受怕，他好几次都撞在官家捕拿他的告示下。这时候，坐镇榆林的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收编了他。石谦起于草莽，办事利索，打仗勇敢，为人侠义，在井岳秀与大大小小的军阀势力拼打周旋中，屡立战功，很快成为井岳秀的爱将。眼下，成为坐镇一方的旅长，他不会忘记“井大人”的好处。

对于井岳秀要他除去的李象九、谢子长，他怀着的是另一种感情——他们是他的骨干，他石谦能干到今天，上靠老井，下靠他们。没有他们帮他治军，他这个大字识不了几升的草头王也成不了今日气候……

石谦看着桌上的信正在出神，几下轻轻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不等他应声，门就被推开了，一个高挑身材的军官出现在门口。石谦愁眉顿舒，立即迎了上去：

“象九！”

“姐夫！”来人赶上前来，拉住了石谦的手。

来人正是井岳秀要抓的共产党员、第二营营长李象九。由于他的姨表姐是石谦已亡故的前妻，在私下场合里，他经常以“姐夫”相称。

李象九，与石谦同乡，都是陕西白水人。一九一九年中断了同州师范（同州即现在陕西大荔县）的学业，赴陕北投军，在井岳秀陕北镇守使署骑兵第一营一连当头目士兵（即班长），当时的连长即是石谦。因在军中不得志，

李象九借故回家，开了小差。一九二一年，在白水同乡、石谦烟馆经办人的资助下，去当时中国北方的革命中心北京寻求真理。

到北京后，他结识了陕西旅京学生李子洲、魏野畴、刘天章、刘含初、耿炳光、呼延震东等人，对他思想影响很大，其中尤以李子洲、魏野畴为最甚。由于李象九手中拮据，李子洲便邀他与自己共住榆林会馆（解放后李象九写的“象九自传”言在京时与李子洲同住陕西会馆，据考，当时北京尚未有陕西会馆，只有延安、榆林、关中三个会馆，李子洲绥德人，归榆林府所辖，故推测应为榆林会馆——笔者注），在这里，李子洲向他介绍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一个新的世界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九二二年，他参加了由李子洲、魏野畴发起的陕西学生革命团体共进社，暑假后，李子洲勉励李回陕北工作。于是，他和刚从北平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魏野畴同行到了榆林。

在榆林，魏野畴被聘为榆林中学教员，李象九却乘杨虎城（杨当时正投靠靠在榆林镇守使井岳秀手下）到延安阅兵的机会，从瓦窑堡拉出几十人的武装到黄龙山孙家口的大南山一带占山为王。三个月后，韩城驻军麻老九派人发出通告，要李象九迅速离开黄龙山，不然将派兵围剿，李象九不得已于一九二四年复返陕北石谦部。同年，他在绥德加入共青团，随即转入共产党，党籍属绥德特别支部管理，特支负责人是云南人王懋廷。

此时的李象九既有学识，交游又广，很得已成为团长的石谦赏识。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李象九先担任安定县警察局长，后任石谦团第三连连长。

李象九担任连长后，党在陕北的兵运活动便有了基础。陕甘区委先后派从绥德师范、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回来的陕籍学生到李象九连工作，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和先进青年，如史唯然、张玉城、郝怀仁、雷恩钧、阎红彦、白锡林、南凤池、呼延震西等。在他们的影响下，全连学习空气很浓。没过一年，连里的士兵，人人会讲演，会写信，能吃苦，还能自己做鞋穿。当时，李象九连调防频繁，经常移驻在清涧、瓦窑堡和宜川集义镇等地。二十年代，在历来兵匪横行兵匪一家的陕北高原，出现这样一支部队，无异于闪亮了一颗星辰。“学兵连”的声名不胫而走，不仅全陕西知道，甚至连南方的党组织也知道了，社会及党组织投寄书报杂志时，只要写上“学兵连收”，准收无误。

李象九连出了名气，石谦脸上也很光彩，由于还沾点姻亲的关系，对李象九更加信任。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党组织在石谦旅逐渐得到了发展，党员也慢慢多了起来。一九二六年，石谦旅先后来了两个穿长衫的“先生”，一个是李瑞阳，一个是阎揆要。李瑞阳是绥德第四师范的教员，是有影响的共产党员，李象九通过绥德地委把他请到部队来做政治工作。李瑞阳来了以后，见石谦旅已有党的组织基础，便与李象九、谢子长（石谦旅第十二连连长）等着手成立了军事特别支部，直接接受李大钊同志为首的北方区委和豫陕区委军事工作委员会领导。由北方区委提供学习材料，特支也直接向北京汇报工作。此种关系一直延续到中共北方区委在苏联使馆遭破坏方才中止。在此期间，特支经常请党的负责人李子洲、杨明轩等到驻地部队作报告，积极发展组织，进行革命宣传活动。阎揆要由黄埔军校毕业回到陕北石谦旅，秘密加入共产党，在石部举办干部训练班，抽调班、排长进行军事政治训练，部队的军政素质较之井岳秀其他各部，有了明显提高。

李象九虽仅为连长，但在石谦旅各部中威望日见显赫。对于李象九其人，

李瑞阳在解放后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说：

……所有的连长都受过李象九的好处，如送给他们手枪、子弹。石团长的干儿子王有才连长最信任李象九。李象九又确能为石团长办事。因此，李象九在全团威信很高。尽管他是第三连连长，人数不过六七十人，但全团十二个连中，他能指挥动的就有八个连。在三个营长中，两个营长是空名，长期住在延安高双成旅部，第三营营长是收来的。因此，李象九实际上的权力及影响，超过了几个营长。他的建议，都被石益斋（石谦字）采纳；决定一切机密大事，也必有李象九参加。

当时在李象九连当兵、入党，建国后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的阎红彦这样描述李象九：

……连里还订了《中国青年》、《向导》等杂志。共产党员李子洲、魏野畴、杨明轩等同志也经常来讲演，宣传革命。我们的连长李象九从来不穿军衣，爱穿一身朴素便衣。他常给我们讲《水浒》，灌输打富济贫的思想。他讲课有声有色，听得你眉飞色舞。在共产党宣传的影响下，石谦也表示赞助革命。我记得他讲过“谁不革命，就不是娘子养的”。一九二七年春天，陕西地区大革命进入高潮，井岳秀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联军第九路，石谦团改为步兵第六旅，深得众望的李象九升任第二营营长。此时，石部中党团组织已有了更大发展，特别是李象九营，大多数连建立了党支部，有些连里的班、排长全部由共产党员担任，战士中也有相当数量的党、团员……李象九是接到石谦派人送来的快信后，马不停蹄地由清涧驻地赶来的。一进屋，来不及寒暄，石谦就把井岳秀的信递给了他。

李象九看完信，眉毛蹙了起来。

石谦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又指指另一张椅子，让李象九坐。

李象九没有坐下，还愣站着。

“没想到老井会来这一手。”石谦说。

“我们几个想到了，唐东园（唐澍字）上月底一来，就告诉过，井岳秀对共产党下手，是早晚的事。”李象九从愣怔中醒了过来，恢复了常态，说，“连冯玉祥革命态度那样坚决的人都在‘清党’，何况咱这个陕北的土皇帝。”

“你看咋办？”石谦问。

“你说呢？”李象九问。

“我没有办法了才请你来，咱现在在老井手下吃粮，上峰的命令一点不理睬也不是个办法。”忠厚的石谦一脸愁容。

李象九说：“在西安、开封，冯玉祥把共产党员集中到一起，来了个‘礼送出境’，如果共产党员落到井岳秀手里，大概就没有那么便宜了。中山大学校长刘含初从西安逃脱了，回到中部老家，却没有逃过井岳秀的手，派人把他杀了。”

石谦说：“我想也是，现在从南到北，都在‘清党’反共，井岳秀善观风向，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听任共产党在他的地盘上活动的，何况，他对共产党历来就怀恶感，魏野畴、李子洲在榆林中学教书，不都是让他逼走的！”石谦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一筹莫展。

“要不然我们几个先离开姐夫的队伍？”李象九试探说着。

“你说哪里去了！”石谦勃然变色道，“部队能弄成眼前这个样子，还

不是仰仗着你们，我石谦是个人，不能出卖良心。我让你来给我出主意，不是让给我来撂担子！上头来了命令，总不能不理它吧！”

“姐夫你误会了，”李象九说，又看了一眼桌上的那张纸，分析道，“对于老井的命令，现在摆在姐夫面前的办法有三条，一是放我们走，二是把共产党员都抓起来，你既不愿意让我们走，更不会把我们抓起来送给井岳秀，这第三个办法，就是姐夫刚才说的，不理它！”

“不理它？”

“对，不理它！”李象九说，“咱陕北山大沟深，队伍分散，你现在又是一旅之长，只要我们谨慎从事，他一时还奈何不了我们。”

“有道理。”石谦长出一口气，继而又问，“要是老井再问起来，咋个回答？”

“只有搪塞了，就说没有共产党，管他信不信。只要他不敢派兵讨伐，我们就好办。”

石谦点点头，说：“嗯，也只好这样了。你还得给子长、有才他们都打个招呼，让都有点防备。”

李象九说：“知道了。”

说罢，打马告辞。

石谦送走李象九后，站在院子里，望着满天繁星，轻叹了一口气。

他感到了一丝寒意。

秋凉了。

镇北台望秋，井岳秀编织着阴谋

一九二七年八月的陕北，秋天过早地来了。

小河断流，土地干裂，秋风扬着黄沙，摇着白草，重复着一年一度的风景。

这是一个晴好的秋日，身着长袍马褂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九军军长井岳秀（国民军联军时为第九路总司令）坐进一辆破旧的吉普车，驶出了榆林城，径直向北开去。

穿过一片荒凉，二十分钟后，吉普车停在了明长城上著名的烽火台——镇北台下。

井岳秀跳下车一抬头就看见了镇北台北额题刻的“向明”二字，那是明万历年间巡抚涂宗濬的手迹，布局严谨，笔力遒劲。眼前这个虽然颓败却依然雄伟的镇北台他太熟悉了，自从入主陕北以来，这里他不知来过多少次。有客人来榆林，他必定要陪着来。没有客人，他自己也总来，高兴时来，烦恼时也来，镇北台成了这位“陕北王”遣兴消愁的最好去处。

心绪好的时候，他站在镇北台上，环顾四方，胸中常能泛起一种雄霸一方的豪气。那时，他的耳边总会响起从古至今各种兵器的砍杀声、爆裂声。当那些历史的声音退去以后，在寂静中或隐隐的驼铃声中，他往往会感到方圆几十里、几百里只剩下了自己。这是他最好的感觉。

是的，这镇北台是他的，榆林城是他的，榆林、延安两府所辖的二十三个县是他的。他从四面八方走来又向四面八方走去的骆驼队、骡马队、操着各种口音的商人那里，看到的是白花花的银子和沉甸甸的“袁大头”。

今天，井岳秀看上去心情不太好。他顺着侧面的台阶，向上走的时候脸色阴沉，一句话也没有。很明显，他今天是来消愁的。上到台顶，他这边看看，那边看看，满眼满目，都是让人心烦的黄色。那星星点点的田垄、房舍、树木，都被这无边无涯的黄色吃掉了，唯有南边十五里外的榆林城显赫地堆砌出另一种风景。闭上眼睛，他也能看见那条砖铺的南北大道，还有虽不宏大却也不失灵巧的钟楼、鼓楼。但是今天，这些都没能冲去他心中的阴影。

在镇北台，他没有找回那种“四野空茫，唯我独在”的最好感觉。

他的心中塞着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共产党。

这几天，他一连封闭了共产党活动猖獗的绥德四中、延安中学和榆林中学。但一个走路有点瘸的军人的影子总在他的眼前晃动。

那是石谦——他的一个旅长。

他至今也弄不清石谦旅怎么混进了那么多共产党。

他井岳秀有恩于这个曾啸聚梢林当草头王的“石瘸子”。当石谦领着几杆破枪在梢林里钻来钻去闯荡的时候，他不记恨石谦曾打死过他的一个团长，收编了他，还一步步把他提上来，最后当了旅长。应该说，自己是了解他的。但偏偏他的队伍里出现了共产党。

前几天，他刚刚派人给石谦送去了一封密信，要他清除掉部队里的共产党员，但那边迟迟没有回音。

在他的地盘里，他不能允许有人违抗自己。何况，发出的命令是针对共产党的。他清楚，石谦既然敢于违命，就一定有对付自己的办法。这时候，他的眼前出现的还是那几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他们是站在石谦背后的人。

以前，他也许低估了石瘸子（石谦走路腿有点瘸，人称石瘸子），这个

黄龙山里的土匪头子。他看到的只是石瘸子的勇武和侠义，石谦斗大的字认不下半升，办事情只知道直来直去，这样的人，带兵是一把好手。他井岳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平心而论，石谦自接受收编以来，为他出力不少，但自从接纳了共产党，脖子一天比一天挺得硬了。眼下，连“清党”这样的大事都理也不理了。

井岳秀不能容忍。

这两天，他在编织一个计划。

构思阴谋的过程伴随着焦灼和烦躁。

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今天来镇北台究竟是为了什么。

他在镇北台上踱了一阵，站住了，向南，越过榆林城向南望去，在那看不到尽头的地方，是与榆林相隔几百里的蒲城。

那是他的老家。

在这一刻，他不由想起了另外两个蒲城人，一个是在榨油坊当学徒的杨虎城，一个是自己的胞弟、总是行色匆匆的井勿幕。

杨虎城此时不知挥涟何处。而勿幕弟却已作古九年。

秋风中，井岳秀不禁凄然，心中涌出勿幕遗诗《秋感》一首：

叶落鸿归露满林，河山四战气严森。
白旗冉冉摩天汉，玄鸟飞飞恋岁阴。
因果能收瓜李种，恩仇不解虎狼心。
征夫设问寒衣就，断肠西风野戍砧。

如果弟弟勿幕尚在，他能否除去自己眼下的烦恼。

多么想再有一次兄弟俩的竟夜长谈。

往昔，历历在目。

井岳秀刚刚懂事，就从父辈那里知道了井家的发家史。

渭北蒲城第一大户井家祖籍陕西扶风，先祖夫妻二人在未考年代逃荒来到蒲城，在后来称之为井家源的地方给一户姓丁的地主拉长工。妻死，丁地主给井伙计（长工）一块坡地，使其葬埋。挖墓坑时，掘出一个古代武将的墓穴，其中金银器物等殉葬品不计其数，井家因以致富。后来在井家塬附近植槐树百株，出售树苗，人称“井百槐”。之后，又与人合股在四川自流井开盐井，每年所得红利，全部运到江西，铸成每个纹银五十两的元宝，运回蒲城，更成巨富。清道光年间，井岳秀的祖父在县城大什字巷新建住宅，举家遂由井家源迁居县城。

父亲井永汲是幼年井岳秀最崇拜的人物。这种崇拜始于父亲的一次非同凡响的壮举。

清光绪三年，西北各省因荒大饥，父亲井永汲向官府倡议放赈。蒲城县令因不能包办侵吞，质问井永汲：“你有多少钱，敢在蒲城县放赈？”井永汲答：“我没有百万之富，就不敢干这事！”“井百万”之名便不胫而走。井永汲为赌一口气，独出白银数十万，在蒲城设粥场几处，放赈三年。度过荒年之后，井家家道由此渐微。

井岳秀十四岁时，父亲去世，弟弟勿幕才四岁。勿幕天资聪慧，岳秀爱之若父。其时清廷腐败已极，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逃到西安，“辛丑条约”，“庚子赔款”，引起国人众怒。井岳秀经常和弟弟议

论时政，勿幕虽在幼年，却常有惊人之语，岳秀自愧不如。如此，井岳秀更加着力培养，想井家再兴，当在勿幕身上。及至勿幕稍长，貌秀心雄，豪侠尚武。在学习之余，随哥哥岳秀拜三原名师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金仲为师，练习拳脚击技。

一九二二年，年仅十四岁的勿幕因破产（与其兄分家后，分得蒲城县内义源永杂货铺），前往四川投靠曾受他父亲周济过的川东道台张铎。在重庆读书一年多，闻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反清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不顾张铎的再三劝阻，与四川赴日学生一起东渡日本。在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成为陕西最早的留日学生。

此时的井岳秀，仍在家中经营产业。

一九二五年八月，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创建同盟会，井勿幕是最早加入的陕西人。他一面学习制造炸弹，一面进行文字宣传。年底，他向孙中山要求回陕西组织同盟会支部。中山先生问：“你这个十七岁的小孩，能办成这样大的事情吗？”勿幕慷慨陈词：“我虽年少，但我哥井岳秀在陕熟人很多，可以通过我哥联络各界人士。”孙中山当时正想打开陕西革命局面，遂委派勿幕为同盟会陕西支部长，带着中山先生给井岳秀的亲笔信，于一九二六年初，秘密回到陕西。

在井岳秀的记忆中，勿幕回来的那段时间，是他最忙的一段日子。他带着勿幕，秘密奔走在渭北各地，数月间就发展了同盟会会员三十多人，创建了同盟会陕西支部，奠定了辛亥革命在陕西的组织基础。这年夏天，勿幕又二次赴日本，年底，又受命回国，往来奔走于山西、甘肃、河南、四川各地，联络各地同志，推钱定三、胡景翼为运动新军的中坚干部。

以后，勿幕频频出入于日本，与孙中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兄弟时聚时散，井岳秀在弟弟的影响下，也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和革命工作。

一九二一年春，井勿幕奉同盟会总部令，回陕组织起义。七月九日，他召集同盟会和会党负责人张伯英、钱定三、胡景翼、李仲三、邹子良、张云山等三十多人，号三十六弟兄，在大雁塔“歃血结盟”，共图大举。秋天，他和吴玉章、熊克武等由上海赴香港，策划广州起义。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他在五月间返回陕西，与哥老会党人张云山、万炳南密议，准备大举。并将家中珍藏的名人字画挑选两箱子交付张奚若带往日本，变卖后购买军火。

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各地纷纷响应，在井勿幕的领导下，十月二十二日，新军首先在西安起义，与清军激战三昼夜，于二十四日光复西安。十月三十一日，井勿幕被陕西军政府任命为北路宣慰安抚招讨使，井岳秀、胡景翼、曹世英、郑库等日后各路诸侯其时都在井勿幕麾下任标统。

井岳秀随勿幕北上，是他经营陕北的开始。

而井勿幕的心无时不在大局上。蔡锷在云南反袁护国，井勿幕立即南下，陕西驱陈（陈树藩），他又紧急北上。在那个动乱的年头，勿幕行色匆匆。

而井岳秀此时却在陕北越坐越大。在他的眼里，陕北闭塞有闭塞的好处，经管好了，外人进不来。榆林靠近口外，商贾往来，终年不绝，是个能赚钱的好地方。

一九二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等率三百多人在三原起义，胡景翼由蒲城、曹世英由耀县驰赴三原，举起陕西靖国军旗帜。到

十月，陕西靖国军已有六路，于右任为总司令。十一月，井勿幕由西安到三原，被公推为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就任后，即率岳维峻、董振五、邓宝珊部赴凤翔慰劳靖国军第一路部队。一天，在第一路司令郭坚的宴席上，井勿幕指责郭坚部军纪不好，要求整顿。谁知胸襟坦荡的井勿幕因此遭到心胸狭窄的郭坚的忌恨。在归途，两次受到郭部截击，幸未受损。

井勿幕回到三原不久，就收到郭坚送来的公函，约井勿幕等于十一月二十一日齐集南仁堡开会，商讨攻打西安计划。岳维峻、董振五等都劝井勿幕不必前往，但井勿幕却无戒备之心，认为自己是靖国军总指挥，与郭坚、李栋才又都是蒲城同乡，不会把他怎么样。并且还可借开会之机，再说服他们整治军纪。开会那天，他只带了四个护兵，自己坐轿车前往南仁堡。远在榆林城的井岳秀不会想到，死神正在向弟弟井勿幕走来。

关于井勿幕之死，我们还是将现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原井勿幕麾下胡景翼将军胞弟胡景通、严佐民的回忆笔录如下：

 勿幕到了堡外，问门卫：“郭司令来了吗？”答：“没有。”李栋才即迎勿幕进堡。约上午十时，郭坚的差弁李新生、任申娃、张昉等数十骑自北门进堡。扬言：“郭司令来了。”勿幕出迎，不见郭，即折回。才进营部，李新生突然自背后连发两枪，勿幕倒地殒命，李栋才急割勿幕头，带赴西安。勿幕的尸身，由随来的护兵安彦明用棉被包裹，背回泾阳。井勿幕死后，泾阳驻军团长田玉洁，向陈树藩几经交涉，索回勿幕头颅，和由南仁堡背回的勿幕尸体，临时草葬于老家蒲城……

噩耗传到榆林，井岳秀连骂三声：“卑鄙！”……然而现在，他在用同样的方式编织同样的阴谋。此时的井岳秀没有再想到“卑鄙”这两个字，让他烦恼的和焦灼的是怎样把腹案中的阴谋构思得再周密些。“司令，风大，走不走？”副官凑上前去，轻声问。井岳秀向他挥了挥手，没有说话。

此时，那个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影子正在向他走来。

“石瘸子！”他咬着牙，在心里叫了一声。

石谦遇害，点燃清涧起义导火索

石谦也在焦灼与不安中度过了好几天。

一切似乎都没有发生，井岳秀并没有向他问起那封信的事情。

石谦心绪开朗了些。

此时，他忽然记起了一件事情，井岳秀的五十大寿（此处指虚岁）就要到了。往年井岳秀过寿，都要给各旅、团长下帖子，把大家邀到榆林城去热闹一番，今年不知还会不会给他下帖子。

违令之后，井岳秀既没派人追查，也没解除密令。对于井岳秀的这种态度，可以理解那封在军中清除共产党员的密令只不过是走走过场的官样文章，也可以理解成井岳秀对他心怀不满，已结下疙瘩。因此，今年给他下不下祝寿帖，是揣度井岳秀胸中风云的晴雨表。

帖子终于来了。

一天下午，他正在屋子里练习写字，勤务兵领进来井岳秀派来的一个副官。那副官他很熟悉，这两年都是他来送请帖。副官将一个信封交给石谦，石谦打开一看，果然是一个艳红艳红的请帖。

石谦心中疑团顿失。

他决定如期前往榆林祝寿。

为了安排走后的工作，他向几个信得过的营连干部发出紧急通知，要他们急赴宜川，有军务安排。

第二天下午，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就赶到了，和李象九一起来的，还有住在他那里的唐澍。

石谦说了准备动身前往榆林祝寿的打算后，几乎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特别是十二连连长谢子长。这个安定人操着一口浓重的陕北口音说：“去不得，去不得！井岳秀让你收拾我们你没办，这明明是专为你设下的陷阱嘛，石旅长，你要三思而行。”

唐澍也说：“我同意子长的看法，眼下中国南北，新旧军阀联手，好像是在进行反共大比赛，井岳秀此时邀你去，怕是没安好心。”

石谦不以为然地说：“井岳秀过寿，每年都下帖子，这是惯例。我们也不要过于多疑。”

李象九慢条斯理地说：“姐夫，今非昔比，我们在陕北这么多年，老井是个啥东西，你还没看清？”

石谦不禁一怔，经常穿着长袍马褂、戴副墨镜的井岳秀出现在他的眼前。

对于石谦来说，坐镇陕北一隅的井岳秀到底是个什么面目，在他心里一直模模糊糊。这个耿直的人一向只知道井岳秀有恩于自己，自己应该为他好好效力，仅此而已，石谦的评价标准十分简单。以前李象九、谢子长以及他们请来的那些先生，给他说过一些含义深奥的话，但他从没与自己的顶头上司井岳秀对上过号。此时，李象九一提醒，他才认真地将这些年井岳秀的所作所为粗粗地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井岳秀是什么东西？

榆林城头不断变换着的旗帜大概是井岳秀留给陕北人的最有特色的记忆——他决不像他的那个早殁的弟弟井勿幕，井勿幕认准了革命的道一条路走到黑。井岳秀也许从勿幕之死汲取了人生教训，也许天性使然——善于看风使舵是他最大的特点。袁世凯称帝，他上劝进表；云南蔡锷起义护法，他又

响应；张勋在北京复辟，地处偏远的榆林城头也挂起了龙旗；大革命风暴来了，他又高喊起革命论调。一九二六年五月，他刚就任了吴佩孚封的陕北护军使，九月冯玉祥五原誓师，他又变成了国民军。归顺国民军后，又怕吃不准形势，暗中指示部下，制作两面旗子，刻两颗印，谁来了打谁的旗，说谁的话，两面应酬……

石谦想到这里，头上渗出一层细汗。但他立即又淡淡一笑，说：“井岳秀扮他的鬼，我做我的人，做人凭的是个良心，你们都比我有学问，常言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管咋样说，我是井岳秀成全的，人家五十大寿，我连个面也不露，怕是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谢子长又说：“眼下形势复杂……”

“再复杂，我看他能把我咋样！”石谦打断了谢子长的话，说，“我跟着他东征西战，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就不信他姓井的能当着那么多祝寿的旅长团长的面把我给剁了！”

大家看石谦主意已定，也不好强拗，只是劝他随时随处提防着点，免生意外，石谦一口咬定没事，吩咐完走后的工作，就带了一个姓阎的副官打马动身了。

石谦进了榆林城后，井岳秀亲自给他安排了一处环境秀美的住处，设宴洗尘，对于那封信，只是淡淡提了一下，石谦趁此机会向井岳秀将李象九、谢子长等人好好介绍了一下，井岳秀听罢，轻描淡写地说了句：“知道了，你当心些就是，不敢闹出乱子来。”没有再提那件事。

石谦更加放心了。

寿祝罢了，酒喝过了，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石谦准备返回部队。他不会想到，就在这时，由井岳秀和他的师长高双成导演的一个阴谋已经开始实施。

石谦准备动身的前一天晚上，安定县长张凤梧求见。石谦与张凤梧素来失睦，本不想见他，但考虑到安定县在自己辖区，不好不给面子，遂答应接见。张凤梧知道石谦有吸大烟嗜好，来时带了两杆烟枪，一包上好的云土，说是来为石谦送行。于是二人守着一盏烟灯，吞云吐雾地吸起来。

石谦正吸到魂游虚幻处，一个彪形大汉一脚将门踹开，朝着还没有回过神来来的石谦“叭叭”就是两枪，石谦顷刻倒在血泊中，大汉乘乱夺门而逃，不知去向。

随石谦来榆林的阎副官听到枪声赶来时，石谦早已断了气，张凤梧吓得面如土色，说不出话来。

阎副官赶忙将这一突然变故报告井岳秀，同时，派人飞马向李象九、谢子长汇报。

井岳秀得知石谦死讯后，下令在榆林城连夜张贴告示，言石谦旅长遇刺身亡，全城戒严，要求各区各乡严密搜察，捕获凶手归案。

折腾了半天，连凶手的影子也没抓住。其实，最清楚内里真情的莫过于这位“井大人”。张凤梧是他派来诱惑石谦，使之解除防范的；而那位凶手不是别人，正是井岳秀的心腹警卫营长。

石谦死了。

一根导火索也随即点燃了。

大革命失败后，由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北中国第一次武装起义将在陕北这块贫瘠的土地上爆发。

起义前夜，谢子长率部赶往清涧

李象九、谢子长几乎同时得到了石谦旅长被害的噩耗。很明显，石谦是代他们而死的，井岳秀已经向他们发出了一个危险信号。

不久，井岳秀就任命其亲信康子祥取代石谦，任石旅旅长。并向石旅发出两道命令，一是迎接石谦灵柩回白水，准备厚葬；另一道命令是石旅进行换防，李象九营由清涧换防到南边的宜川，谢子长连则由瓦窑堡调到清涧。与此同时，令骑兵团长钟宝卿在清涧、安定一带“严加防范”。

井岳秀对石谦旅的不信任一目了然，不仅换了旅长，还要以换防为借口，准备对共产党人李象九、谢子长领导的队伍分而吃之。

听任井岳秀摆布，李象九、谢子长肯定不干，石旅长已经以血教训了他们。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一时还下不了决心。特支研究后，决定由唐澍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眼前陕北发生的一切，等候省委指示。对井岳秀的命令还是采取拖的办法，见机行事。

唐澍回到西安时，正赶上李子洲从武汉回来，陕西省委准备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

在一个飘着细雨的下午，唐澍来到了红埠街九号。在一间陈设简陋的房子里，省委组织委员李子洲接见了她。

唐澍详细汇报了陕北当前的政局，侧重汇报了石谦被害后，石谦旅面临的危险。李子洲听完汇报后，说：“我领教过井岳秀，对共产党，他是一直耿耿于怀的，这两年，国共合作，他不好胡来，现在趁着全国反共的大气候，他一定要搞一下的。”说着，他打住了话，问唐澍：“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南昌发动的起义你已经听说了吧？”

唐澍点点头：“听说了，省委寄给我们的报纸我们都看了。李象九、谢子长他们都喊着‘解气’。”

“中央‘八七会议’你们知道吗？”

“还不清楚。”

“八一南昌起义后，为了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今后工作方针，八月七日，党中央在汉口原俄租界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在会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李子洲说。

“根据‘八七会议’精神，我们也可以拿起枪，武装反抗井岳秀？”唐澍问，显得很激动。

“当然可以，”李子洲挥了一下手，坚决地说，接着又问，“你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当过军事教官，想必一定熟悉毛泽东同志吧？”

唐澍点头说：“嗯，见过，毛泽东来讲习所讲过课。”

李子洲又说：“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他说，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群众运动，但蒋介石、唐生智等却是拿枪杆子起家的，而我们独独不管。”李子洲说得兴奋起来，离开了椅子，在地上一边踱着一边说，“瞿秋白同志也在最后代表常委所作的报告中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从土地革命中造成新的力量来，我们的军队则完全是帮助土地革命的，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要点燃这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听着李子洲介绍“八七会议”，唐澍感到浑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了。

李子洲停顿了一下，又看着唐澍说：“眼下，在咱们陕西，党能发挥影响的军队还不多，一支是陕北的石谦旅，另一支是关中的许权中旅。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点宝贝，决不能叫国民党反动派吃掉！这些地方的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的手里。”

唐澍激动地说：“子洲同志，我们知道该怎么办了，瞅准时机，就拿起枪杆暴动！”

李子洲赞同地点了一下头，说：“要紧的是一定要掌握好时机。”

唐澍说：“知道了！”

得到了“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唐澍返程轻松了不少。

天，瓦蓝瓦蓝，云，白格生生。

谢子长骑在一匹大马上，缓缓地走在山间小路上。

他的身后，跟着他的一连人。谢子长连人数不多，看样子也就是七八十人，装备则是井岳秀队伍中最差的。此时走在山岭间的这支队伍排列整齐，行进有序，还不时地唱起一支时兴的歌子，能使人感到这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

谢子长正带着他的连向清涧方向走去。

本来，他和李象九商量，不执行井岳秀换防的命令，拖他一段时间再说。但井岳秀新任命的旅长康子祥却接二连三地派人来催促。谢子长和李象九一研究，决定李象九营托辞不动，谢子长连向清涧靠拢。这样，表面上看是在执行井岳秀的换防命令，实际上在聚拢力量，以便在必要时互相照应。

谢子长回头看了看他的队伍，一个孩子大小的兵扛着一杆和他年龄很不相称的老步枪，呼哧呼哧地爬一个大坡。

他勒住马，向那个兵招招手：“二娃，过来，把枪放马上。”

“没事，不重，一根禾杆杆。”二娃笑着说，还故意摇了摇手中的那支枪。

谢子长也不勉强，下了马，牵着马缰，等那个小兵跟上后，一边走一边和他拉起了家常。

“二娃，你小小年纪，出来扛枪，不苦？”谢子长笑着问，一边从他背上卸枪。二娃挣扎了一下，还是被谢子长卸了下来，放到马背上。

“我爷爷说，跟上‘谢青天’当兵，受苦也是为咱穷人。”二娃红着脸说，二娃是两个月以前才从安定当的兵，当时谢子长没在连里，他和连里一个排长是同村，通过排长收下了。谢子长回连后见到了这个娃娃兵，见到他训练、学习都很刻苦，很喜欢他。

“咱是革命队伍，这个‘青天’那个‘青天’，都是封建社会里的叫法，革命队伍里都是同志，都是战友，可没有什么‘青天’。”谢子长给他讲道理。

二娃脖子一梗，辩解道：“我们安定的婆姨老汉后生娃娃都这样叫。到今天乡亲们还说起你当年在安定县城鞭打西区李恶霸的事情呢。乡亲们说，陕北祖祖辈辈，当官的护的是有钱的，自打你当上了民团团总，安定才有了替老百姓出气的官。”

谢子长笑了笑，抬头看看远处，说：“过去的事了。”

这时，他听到一支野曲不知从哪个山岭上飘了过来。

那调调谢子长十分熟悉：

人家男人闹哟嘴买卖，
我家男人么赶哟嘴生灵；
赶的毛驴钢三块，
一心要走么定边城……

苍凉的信天游，那是他儿时的摇篮曲，懂事后的人生谣。在这偏僻贫瘠的黄土高原上，它唱着祖祖辈辈陕北人的痛苦、欢乐和期望。

也许是二娃的那番话打动了，也许是耳边的信天游感染了他，此时，谢子长连长的心回到了他的以往。

当谢子长能品出信天游中的人生甘苦的时候，他已经是安定县立高小的学生了。当时他已十七岁，但长得又矮又小，看上去像是只有十四五岁的样子。很快，同学和老师就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学生具有一种天生的组织能力，同学们在一起调皮闯了祸，向老师认错把责骂顶起来的总是他。在课堂上，他又肯动脑子，常常能提出一些连老师也感到不好解答的问题。时间一长，学生老师都喜欢上了他。

那时，谢子长家境还好。父亲谢彪鹏虽只上过几年冬学，但乐于交结读书人，加上刻苦好学，在安定县里算得上是一个有学问的文化人，县里但凡谁家要写文约文契过红白喜事，写契写幛写帖的都是他。谢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在兄弟姊妹中，子长最小。子长到县城上学时，谢家还在城里开一个小杂货铺，在小小的安定城里，谢家算是一个殷实户。

然而谢子长从小偏偏爱打抱不平，这种性格部分得益于县城里一个姓石的石匠。石匠手艺很高，雕狮子，凿石碑，谢子长没事的时候，常去看石匠凿石头。石匠虽然没黑没白在干活，但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石匠一边干活，一边给子长讲古代那些杀富济贫的故事，末了，石匠总会扬起那双混浊的眼睛，看着他说：“好好念书，将来当个为民除害的清官。”那眼睛里的渴望，谢子长记了一辈子。可以说，那个子长叫不上名字的石匠是他了解人间疾苦的第一个老师。

就在谢子长安定高小毕业的头一年，一向安安静静的安定县城发生了一件大事情。一天，成百上千的乡下人为了抗羊圈税，从四面八方拥进了县城，冲进了县衙门，把县官从衙门里提溜了出来，一阵审问之后，愤怒的农民一刀把县官的头剁了下来，然后开仓放粮，鞭炮放了一世界。

那一天，谢子长看到了真正的造反，长年唉声叹气的穷汉脸上绽放出的笑容深深地刻在这个矮小的青年人心里。

但那笑容是短暂的，很快，安定县城一切都恢复了老样子：摊捐，派款，拉税，穷的还是穷，富的依然富。

“五四”运动爆发了，当消息传到安定城的时候，除了谢子长跟几个要好的娃娃激动了一阵之外，对于这个荒僻的小城几乎没有任何冲击，徐缓苍凉的日子依旧，犹如那弯弯曲曲的秀延河没有涟漪的河水。

小学毕业的谢子长在家乡待不下去了。

他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这时已经二十二岁的谢子长第一次走出了小城安定，来到西安。他以优异成绩考入颇负盛名的省立第一中学，第二年，又转入榆林中学。在西安、榆林，他明显地感到了新思想的撞击。未及毕业，抱着一腔热血回到家乡，在安定小学当一名教员，想以倡导新文化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一点事情。无

奈安定陈腐势力太强大，谢子长独木难支，于是，又于一九二二年秋天，过黄河到山西报考阎锡山办的太原学兵团。

在太原，谢子长遇到了一点小麻烦。

太原学兵团相当于山西的讲武堂，考试十分严格。目测时，考官见谢子长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认为不是学兵的材料，就没有让他参加考试。第二天一大早，在学兵团大门外和谢子长下榻的客店门口，同时出现了用工整楷书写成的《秦人在晋言志书》。不大一会儿，两处门口都挤满了人，争着看墙上那篇议论豁达，行文潇洒的文章。看到落款处，题名是“谢子长”。

“谢子长是谁？”

“这样有抱负的人日后准成大器……”

一时间，街谈巷议，谢子长成了那个早晨人们议论的话题。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学兵团的考官专门为秦人谢子长一人开科考试。结果各科成绩全部优良，谢子长被破格录取。

一九二三年秋天，是谢子长在寻觅人生中的收获季节。

在那个秋雨绵绵的秋天，他到河南考察后又前往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在举目无亲的北京，他第一个要找的人是绥德人李子洲。虽然在此之前他们没有见过面，但由于陕北能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本来就并不多，再加上李子洲又参加过“五四”运动，因此，李子洲的名字他很熟悉。他找到北京大学，恰逢李子洲刚刚毕业，正在准备离京返陕。李子洲对这位来访的陕北老乡十分热情，带他去看了北大的“共产主义小室”，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党，陈独秀，李大钊……在那间布置庄严的“小室”里，他看到了一片明朗的天空。

李子洲匆匆地走了，但一束圣火在谢子长心中点燃了。

冬天，一场大雪覆盖了古老的北京城。在榆林会馆的一间房子里，谢子长终于站在了由镰刀斧头组成的红旗之下，庄严地举起了拳头。

从此，他有了一个明确的奔头，尽管那条路很遥远。

一九二四年，谢子长回到安定时，正值国共合作，为了对付大小军阀骚扰，陕北各地都在拉民团，唯独安定还没有搞起来。他和当警察局长的李象九商量，决定挑头拉民团。由于老百姓都知道谢子长学过兵，又走过大地方，见过大世面，纷纷报名参加，个把月，一支七十多人的安定民团办起来了，谢子长任团总。这是谢子长掌兵的开始。

一九二五年，石谦团驻瓦窑堡时，已经当上石部第三连连长的原安定县警察局长李象九联络谢子长与石谦团会合，安定民团被石谦编为石部第十二连，谢子长任连长。

谢子长当了官，没有忘记党旗下的誓言，他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利用团总的合法身份组织农民协会，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农民反抗苛捐杂税，反对官员放赌开烟馆。他还仿效南方，在安定县举办了一个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农运干部，吸收积极分子入党。在谢子长连的支持下，安定县农民协会拘禁和审判了恶绅宋运昌、李跃辉、王伯扬等，没收了他们的财产，鼓舞了农民的斗志。一时间，安定县城闹得红红火火，连儿童团都敢把县太爷张凤梧拉出来审问审问，于是，“谢青大”的名字不胫而走。

……那支忽隐忽现的野调调忽然大了起来：

……

饿了吃的冷干哟嘴粮，

渴了喝的么无情哟嘴水；
三口两口做下个病呀，
路吐吐闹么谁侍应呀嘴.....

谢子长心里一阵酸楚，跨上马，挥一鞭子，山路上扬起一股黄尘。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枪声击破了清涧的黎明

雨后的清涧城，空气被过滤得干干净净，大雨冲刷过的石板路蜿蜒进每一条小巷，泛着发腻的青光，折射出小城苍老的往昔。

雨后，走在光溜溜的石板路上，不由你不想起陕北人为榆林府几个有特点的县所编的一句顺口溜：“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清涧以出石板闻名遐迩。

如果连石板也没有，它只会是一座常常被人遗忘的小城。

谢子长一身戎装，走过清涧雨后的石板路。

一个脸上有几粒麻子的士兵牵着两匹马，与谢子长擦身而过。空寂的街道上，留下一串“叭哒叭哒”的马蹄声。

十天前，谢子长连已经移驻到了清涧城外，与李象九营挨得很近。唐澍也在一星期前返回了李象九营，这一段时间，他们几乎天天都在开会。这是一段让人既感到兴奋又夹杂着不安的日子。

时间在这些共产党人眼里，走得太慢了。

谢子长走进李象九的营部时，唐澍、李象九、白乐亭几个人正在低声说着什么。见他进来，他们朝他点点头，没等他坐下，唐澍就递给他两页纸：“你来得正好，省委来函了。”

谢子长接过那两页纸，急忙看起来：

中共陕西省委给陕北函

对军队、农村、学校的同志开展工作的指示

（一九二七年十月）

1. 榆（林）、绥（德）、延（安）三校同志尽可能的一律复校。

2. 被迫而离校的同志，分配在农村、军队两方面

工作。

3. 军队中去的同志，集中李（象九）部，去时更名当兵，不准作无用的书记、司书、司事等闲官。

军队归省委军部管辖，与陕北党亦可发生横的关系。但关军事方面，不必过问。

谢子长从省委公函中已经闻到了火药味。

“省委指示我们，当前，要尽可能多的把学校里、社会上的党员同志都吸收到我们队伍里。”唐澍指着省委公函说。“最近我们营来的不少，前几天清涧第一高小的王怀德、白自强两位共产党员教师也过来了。绥德还不断地有同志来。”李象九说。

“子长，你那边准备得怎么样了？”唐澍问。

“一切都已就绪，就等着动手了。”谢子长说着，拣了一把椅子坐下来，又说，“连里的党、团员和几个班、排长我们都秘密打过招呼了，大家说早就应该闹他一家伙了！”

大家都笑了笑，屋里紧张空气稍微冲淡了些。

唐澍收敛了笑容，说：“周恩来、朱德在南昌举行了八一起义，毛泽东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而我们北方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清涧的这一点部队，力量虽小人数量虽少，但我们要用我们微弱的声音给西北一个震惊，给中国一个震惊！”唐澍激动地说，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被这个河北易县

人热辣辣的话感染了，大家都一脸严肃。

李象九接着说：“省委已经同意我们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举行起义。至于起义之后的行动方向，省委指示，先由清涧退到宜川，再不得已退到关中道合阳等地，最后再谋与许权中部会合。”说着他看了大家一眼，“这个起义计划在举行之前属党内机密，除党内少数人知道以外，不要扩散。”

在座的人都点了点头。

“我们起义要想获得成功，一要靠周密的准备，二要靠掌握好时机。”唐澍继续说，“起义的准备工作，自接到省委指示后，我们一直在进行着。现在，全旅各连政治倾向，已经基本掌握，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这是眼下最重要的。”说着，他看了看李象九。

李象九说：“现在情况很明白，清涧的这些部队都靠得住，延川的王有才连也没问题，王有才是党员，又是石旅长的干儿子，我已经和他联络过了，他说他开个党员骨干会先动员一下，让我们定下日子再派人告诉他一声就行了。至于宜川方面，情况就比较复杂一些了。康子祥营带旅部驻在那里，大家都知道，六、七两个连是听康子祥的，但十连长李瑞成是党员，他连里的党、团员不少，可以从那边接应我们。昨天，我们已经派李维俊、白锡林二位同志去宜川联络李瑞成了，估计明天就能到。”

白乐亭插进来说：“我是本乡本土，地熟人熟，地方上的党、团员由我负责发动。”

谢子长对白乐亭说：“你搞宣传需要人，从我连上拉。”

大家又仔细研究了一阵。

看看天色不早了，唐澎对大家说：“公祭石旅长的日期临近，我们必须利用公祭石旅长的机会，揭露井岳秀的残暴罪行，激起部队和民众的仇恨公愤。利用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加紧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样，我们可以争取更多的部队和群众站到我们这边来。”

散会后走出屋子，谢子长看见西边山岭上飘着一片血红血红的火烧云。

起义的日子一天一天临近：

十月九日，清涧县公祭石谦的仪式在大操场隆重举行，石谦的遗像高挂在会场中央的一块遮天白布上，一联笔力遒劲的挽幛直落三丈，上书：

一身肝胆生无敌
百战灵威殁有神

操场上黑鸦鸦一片人头，却静得如同虚幻。清涧城的老百姓几乎倾城出动，都来和被冤死的石旅长告别；李象九营和谢子长连全体官兵臂缠黑纱，脸色沉重，列队严整，像一组悲壮的群雕。主祭台上站着唐澍、李象九、谢子长和地方上的社会名流。

谢子长宣布公祭仪式开始。由李象九主祭，他富有煽动性的祭词像一点火星溅在于柴上，霎时间，清涧城炸裂了。

“为石旅长报仇！”

“打倒军阀官僚！打倒井岳秀！”……

此起彼伏的口号声连成一片愤怒的海洋。

阴历九月十六日，清涧城里逢集，李象九营和白乐亭组织的地方党团骨干征集了赶集的牲口，用来运输装备、物资；查封了清涧城里几个大商号的

银柜，没收了浮财；并向县长和大绅士“声言借钱，不加伤害”。共筹集辎重二百多驮。

十月十一日，谢子长连配合李象九营封锁了交通要道，割断了与榆林的电话联系。同日，派出联络李瑞成的李维俊、白锡林二人由宜川返回清涧，向唐澍、李象九报告说李瑞成十连已经准备就绪。

是夜，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等起义领导人彻夜未眠。

十月十二日凌晨四时，清涧城还在熟睡，忽然，“砰！砰！砰！”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小城的寂静。

起义的号角终于吹响了。

随着踏踏踏的脚步声，一支支参加起义的队伍迅速集中在了大操场。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乐亭早已全付武装，站在瑟瑟的秋风里的阅兵台上。

东方渐渐出现了一抹鱼肚白。

李象九掏出怀表看了看，与唐澍、谢子长等交换了一下目光，在微茫的晨光里，向着新一天的黎明大声宣布：

“为了替石旅长报仇，从现在起，我们起义了！”

呼应李象九的，是一阵激烈的口号声。

起义的目标很明确：南下，攻打宜川。

起义队伍浩浩荡荡地开出了清涧城。

被号声惊醒的老汉后生婆姨娃娃披着衣服，从破窑里草棚里土屋里走了出来，目送着这支与他们朝夕相处的队伍沿着弯弯曲曲的清涧河走远了，走远了。

懂古经的老汉问一个瞪大了眼睛一直追着看的后生：“你听说过咱米脂的那个李自成么？”

后生说：“不就是李闯王么！”

老汉说：“看来咱穷汉又要闹一回世事了！”

后生穿上披在身上的破衣服，向人群里挥了一下手，说：“走！狗日的成年价不死不活地熬，还不如去闹一回世事！”说着，也不管有没有人响应，径自追队伍去了。没几分钟，又有两个后生跟了上去。

一种新奇的期冀，在清涧后生的脸上绽放出动人的光彩。

谢子长智取延长，起义军会师宜川

注南，往南。

一切都很顺利。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起义部队就在当天下午抵达了延川县城。与延川驻军王有才连会合后，拐向西急进。一路上，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不少战士路过家门而不入。当晚在老庄河宿营。

下一个进占目标是延川以南八十里的延长县。事前估计，南下宜川一路，此处情况最麻烦，驻守延长的是井岳秀信任的齐梅卿二营，没有党的力量。对如何取得延长，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决定由谢子长连担任先锋，争取智取。

十三日天没明，起义部队就打火做饭，之后沿着杨家沟以急行军速度向八十里外的延长前进。

智取延长，曾在谢子长连担任班长的刘光汉有过详细的记述：

清涧起义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二日凌晨从清涧动身。当天到延川和王有才连会合，晚上在老庄河宿营。第二天翻山走出一条川到了延长，行至沟岔时已能看见延川县城。谢子长命令部队停止前进，派班长周增玉带四个人带了“公事”进城联系。谢子长召集部队讲了话，他讲：“进城门前四路纵队，要快；进城后二路纵队，拉开一臂短距。”讲话后，谢子长带了部队四路纵队快步进城。

当周增玉五人和敌营部联系时，敌营长只知道有五个人，便通知哨兵准许进城，然而四路纵队全部进城，敌营长要阻拦已来不及了。进城后十二连驻商务会，其他连驻店和机关，自己做饭，对群众热情，派哨兵站岗不准上铺台，秋毫无犯，群众惊讶。

我们进城后，驻延长的二营长带一副官、两个护兵来到谢子长住处。护兵大背红缨盒子枪，穿灰军衣，外穿黑大褂站在商务会大门外。齐梅卿一见谢子长说：“子长，先到营部（在山根下）吃饭。”企图把谢子长骗进营部。谢子长识破诡计，婉言谢绝说：“我们先在这里休息。”并暗示我们大排长（一排长）贾信之通知班长集合。我们几个班长集合后，谢子长暗下命令缴敌营长护兵的械。我们立即下了两个护兵的枪。这时谢子长又派李玉技排占领寨山。当李玉技带人上到寨山时，敌人已经占领了寨山，只准派一个代表上山。李玉技遂带领全排下山了。

缴齐梅卿护兵的械以后，已控制了齐梅卿和副官，谢子长让齐下令缴械。齐提出因距离远喊话听不清楚，放回去一个人传达缴枪命令。谢子长放回敌副官，

传达了齐梅卿缴枪命令。不多时间，城里的敌人全部缴了枪，寨山上敌人全跑了。

驻洛川的敌人杨寰旅的一个排长带人在延长提款，谢子长派人提了这笔款子。第二天早饭后部队要往宜川进发。我们部队正在集合，李象九在一个土台上站着。这时齐梅卿被绑着，由我连班长周增玉押着从东门往出走。经过这土台时齐梅卿对李象九说：“象九，咋价（陕西土话，干什么？——笔者注）？”李象九说：“你前边走。”

当我随部队出东门后，看见齐梅卿面朝下爬在石

台上，被枪毙了。

十四日早饭后，起义部队继续向宜川进发。

十五日午，起义部队来到宜川城下。由于城内情况不明，暂驻白家原。其实，就在清涧起义的当天晚上，共产党员李瑞成即已率部在宜川城里起事。

宜川守军有刚被井岳秀任命不久的旅长康子祥的旅部及其控制的五、六两个连，李瑞成任连长的十连，还有九连和骑兵连。清涧起义的同天晚上，李瑞成将十连分成三路，下了死命令，一个班对付康子祥一个连，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当晚十点，李瑞成下令行动。三路人马按照事先分配的任务，悄悄摸到了敌人住的营房。先打死哨兵，随后进入院子，攻到敌人住的窑前，推开窗子，就往里面扔手榴弹，当时敌人刚刚躺下，土炕上的被子霎时染成了血蛋蛋。战斗进行了一夜，第二天，十连控制了半个县城及西门、北门，与敌人分城而占。因事先已有通信，为了等待李象九部队，白天未再主动发起进攻，与敌处于相持状态。

此时，来到宜川城下的清涧起义部队通过与城里的起义部队互相对号，了解到宜川城里敌我双方各部的的位置。接着城里城外，几十把冲锋号同时响起，李象九、谢子长部与城内起义部队相配合，向敌人发起进攻。康子祥见势不妙，带十九人仓皇向延安方向逃去，其余敌军全部投降，清涧南下部队与宜川城内的十连、九连、骑兵连胜利会师。

风尘仆仆的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等起义领导人出现在欢呼的人潮里。谢子长走到一个臂缠绷带的战士面前，轻轻扶了扶他的肩膀，问：“挂彩了，疼不疼？”

战士使劲摇着头：“不疼！心里痛快！”

唐澍说：“好后生！你今天干的事情，全中国都会知道的，你是英雄，你知道吗？”

战士羞红了脸，低下了头。

李象九站在一个高台上，向黑压压的部队说：“弟兄们，我们起义胜利了！”

一阵热烈的欢呼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西安。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三日——也就是清涧起义打响的第二天。陕西省委组织部长兼管军事的李子洲（当时尚无军事部长，军事由李子洲代替）正伏案疾书，就清涧起义一事，代拟中共陕西省委军委给中央的报告：

……陕北井部石旅之一营又二连，约共五百人，枪支足数，同志约四、五十人，营连长全为同志。派唐澍同志（黄埔学生，党的观念好），在那边做指导工作。最近，石旅长被井暗杀，并对我们那几部分已处心积虑。首谋解决。现在我们也给以积极的策略使之抗井，先由陕北清涧退至宜川，再不得已，即退至关中道之合阳等地，投降高凤五（高与营长同志李象九及石旅长有同乡关系），再谋与许权中同志联合……

鸡已报晓，李子洲抬起头来看看窗外，东边已经出现了一丝淡淡的晨光，他揉了揉眼睛，又埋头疾书起来。

西安。

十月十四日。

高双成师长收到了井岳秀派快马送来的一封手令（榆林、延安本来有电话线，清涧起义爆发前，被李象九营剪断了）：

高师长双成：

顷闻李营带一连已于十二日在清涧起事，向南窜至宜川方向。为防赤祸借势蔓延，

黎民涂炭，兹令你师速往延川至宜川一线剿歼。

井岳秀

高双成咬了咬牙，吩咐副官：“通知各旅团长，到师部开会！”副官离开以后，高双成抽出挂在墙上的指挥刀，用手捋了捋锋利的刀刃……

在宜川，起义领袖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宜川城里，得到暂时休整的战士们一边擦着枪，一边唱起了套着老调调信口唱出的信天游：

十月的清涧城造了井大人的反，
一路南下呼啦啦就到了宜川；
井大人在榆林城哟嘴气傻了眼，
抱上个大烟枪么嘛难解心烦……

战士的歌声传到了一间讲究的大窑洞里，正在开会的谢子长微微笑了笑。

在座的其他人似乎都没有听到战士的歌子，唐澍、李象九、白乐亭等都一脸严肃，劣质旱烟叶子的烟味充满了整个窑洞。这是会议进行中的短暂的沉默。

很显然，之前他们刚刚进行过一场激烈的争论。

历史上的遗憾很多。后来人经常用“当初如果不怎么怎么”来替当年惋惜，但历史就是历史。

清涧起义顺利地实现了预期的第一步计划。

然而就在此时，不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

占领宜川后，起义队伍怎样整编？打什么旗号？向哪里发展和转移？用哪些人……起义领导人面临着一系列急需解决的问题。

分歧出现了。

争论主要在唐澍和李象九之间展开。

唐澍、李象九在三个重要问题上均有分歧：

一、起义后的旗号问题。在是否打红旗的问题上，唐、李争论得最激烈。唐澍和谢子氏主张亮出共产党的牌子，立即打起革命的红旗；李象九则主张仍用旧的名义，理由是容易保存力量，争取在陕北与高双成部队共处，必要时可以接受改编。

二、关于军事行动方向问题。唐澍主张主动出击，进攻延安，以求发展；李象九则不主张出击，而倾向暂时驻守宜川，他的理由是部队初到，家属、行李、辎重很多，未得整顿，暂时不宜远走。还提出根据陕西旧日地方武装割据状况，在宜川一带有利生存。

三、关于干部问题。唐澍主张纯洁干部队伍，把非党的旧干部洗刷出去，由党员干部担任他们的工作；李象九则主张迁就，不同意撤换旧干部。他认为处决了齐梅卿，在黄龙山又枪毙了一个连长，由于都是同部同乡，已经引起了人心浮动，眼下应该稳定。

在以上问题上，谢子长均表示同意唐澍的意见。

在这次会议前，他们已经争论过两次，唐澍、李象九各持己见，互不相让。

今天的会是第三次。

已经争论了大半天，意见依然不能趋于一致。

此时，他们正为起义后的参谋长人选争论得不可开交。

李象九欲任命原旅参谋孟激斋为参谋长，遭到了唐澍、谢子长的激烈反对。

孟澂斋不懂军事，会写八股文，因原旅长石谦不识字，把他从司务长提为参谋，笔墨上全靠他，在石部有些影响。加上平素与李象九交情不错，因此提起参谋长人选，李象九便想到了他。

在黄埔生唐澂眼里，军队里的参谋长非同一般，此职任命一定要慎重，他坚持说：“参谋长要带兵打仗，要的是赵子龙，不是马谡！”

李象九说：“孟澂斋在石旅多年，关系熟，很受人尊重，许多连长与他私交都不错，他干参谋长，可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谢子长说：“我同意唐澂同志的意见。以我看，参谋长一职，由唐澂同志担任最合适，他上过黄埔军校，懂军事……”

“子长同志，唐澂同志是省委特派员，党内工作唐澂已经很繁重了。”李象九客气地打断了谢子长的话，“再说，我认为，指挥打仗有我们几个就满行了，任命孟澂斋主要是为了稳定军心。”

会议无结果而散。

会后，唐澂随谢子长一道来到谢营营部（起义部队整编后，谢子长担任了营长），他当着谢子长、白乐亭、呼延震西激动地说：“我不是为了要官来这里，要做官，在冯玉祥部队有的是官做！与他说不清，我找省委去。”说罢，告别了谢子长等，带了一驮准备接济省委做经费的银元，连夜走了西安。

对于唐澂出走，李象九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的意见正确，有利于稳定官兵情绪。既然起义喊的是“为石旅长报仇”的口号，就应该先把旧旗号打下去。因此，唐澂走后，他还是打出了旧旗号。谢子长碍于大局，也没再坚持打红旗。在干部的任用上，李象九还是部分地接受了唐澂、谢子长的意见，补充了几个进步的领导。

此时集中在宜川的起义部队共有一千六百多人，枪一千多支。编为一个旅，李象九为旅长，孟澂斋为参谋长。下辖三个营，营长分别由谢子长、韩起胜、李瑞成担任。

下一步部队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省委指示，拿下宜川后，谋求与许权中部会合。但是许权中部的具体位置在何处，是起义部队向许旅靠拢，还是许旅向起义部队靠拢，省委都没有交待。因此，在唐澂走后，李象九也派人去西安请示。

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李象九决定暂时驻守宜川，一方面整编，一方面等待省委指示。

当起义部队在宜川进行整编的时候，高双成师奉井岳秀之命，正率部向宜川急进。同时，井岳秀也派兵从榆林南下，企图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对起义部队围而歼之。

高双成行动迅速，率轻便先头部队仅用两天时间就进至宜川城下。那时高双成的大部队尚在通往宜川的途中。为了麻痹李象九，高双成一到宜川城下，就给李象九写了一封信，联络往日感情，并说自己只不过是奉命行事，仅带了几个兵来给老井做做样子，决不会攻城云云。

之后的一两天，高双成的队伍源源不断向宜川拥来，很快将宜川城团团围住。这时的高双成立即变了嘴脸，派人给起义部队各连干部写信，煽动他们投降叛变，叫嚷“归顺者不究，顽抗者杀头”“活捉李象九、谢子长者赏洋一百”，企图瓦解起义军。

李象九仔细检查了城中的起义人员、武器和可供补给的粮食等物资，决

定死守宜川——当然，这并不是他下死守决心的全部理由。更有利的因素是起义部队占据着宜川城的制高点——东城外的凤翅山，占据了凤翅山，就可以控制宜川全城。驻守凤翅山的是配有重火器的雷进才连。李象九认为，有雷进才连防守凤翅山，宜川城可保万无一失。

后来的一切说明，李象九犯了一个错误。

高双成写的那些劝降信，被大多数起义官兵骂着撕成了碎片，却恰恰在凤翅山这个要害部位产生了作用。

雷进才叛变了。

他联络了几个变节的班、排长，与高双成相勾结，暗中在战士中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他们进步，他们革命，城让他们来守”（指共产党员领导的连队）等等，来瓦解士气。

高双成看到攻城时机已到，便发起总攻令。在敌人的枪炮声中，雷进才连一枪不发，乘乱中撤下了凤翅山。丢失了制高点，敌人从四面八方方向城内拥来。起义军的阵地相继失守。一些班、排长在敌人逼近时，带领士兵向敌人投降，就连共产党员领导的王有才连的一排长，在虎头山阵地也率一排人全投降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敌情越来越严重。

凤翅山、虎头山两个制高点因守军变节而失守之后，再死守宜川城已十分困难，旅长李象九决定起义部队突围。

突围是在夜间进行的，由谢子长营首先冲锋。谢子长率部打退南门的敌人，为起义部队打开一条通道。谁知谢营后面却紧跟着二百多匹驮着大烟土、大洋的骡马。这些骡马一听枪声，四散惊逃，冲散了后续跟进的队伍。他们不知前锋情况，只得匆匆折回，再由西门突围。不料敌人的重机枪全在西门，起义部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除谢子长营和韩起胜营部分冲出包围外，其他人员被冲散，辎重全部丢失。

突出宜川后，李象九、谢子长指挥起义部队向韩城方向退却（在宜川时，杨虎城驻韩城指挥部曾派人联络过收编事）。到韩城西庄镇时，只剩下了二百多人。

浑身裹着烟尘的李象九沉重地走在七零八落的队伍中间，一脸哀戚。忽然，他转过脸来，看着矮小的谢子长，问：“你说，我们还能把队伍拉起来吗？”

谢子长眼里露出了坚毅的目光：“能，一准能！”

一向斯文的李象九骂了一句：“狗日的老井，你看着，老子接着来！”说着，大步朝前走去……

起义部队与李象九“分家”

陕西省委并不知道起义部队已经在宜川惨败。当唐澍向省委汇报了他与李象九的分歧后，省委指示：起义部队眼下争取在宜川站住脚，将调许权中部、甄寿珊（陕军将领，反冯倾向明显，与井岳秀关系素恶）部到陕北，以控制陕北全境。为了加紧起义部队的干部培训工作，从三原调回了对党员进行秘密军事训练的阎揆要（阎在石谦给井岳秀祝寿时，即到宜川大南川经营农垦，准备作一革命基地。石谦遇害后，陕西省委将其调往三原），与唐澍、白自强同去宜川，准备在宜川整训部队，阎揆要的任务是举办军事政治学校。

唐澍一行三人在前往宜川途中，走到白水的窑河镇，才得知李象九部守宜川失败，已经退到韩城。于是改路东行，赶往韩城。此时，驻扎在韩城北西庄镇的失败起义部队，为了谋求生存，取得立足之地，李象九已派人与驻在韩城县城的杨虎城留守司令王保民联系，准备暂时接受王保民改编。

由于王保民与井岳秀辖地毗连，互相常有滋扰，芥蒂已深，因而收编事进行得很顺利。当唐澍等人到达韩城不久，王保民就发布了收编命令，李象九部被编为独立旅，李象九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长，谢子长、韩子丰等为营长。

遗憾的是，唐澍、李象九的分歧依然在继续。

以唐澍为首的革命委员会与李象九“分家”已不可避免。

引用两位当事人的回忆文字，或可帮助读者了解当年那件令人扼腕的事件。当时任起义部队五人军委成员、教导队长的阎揆要这样说：

在韩城，打红旗搞游击战争，并与李象九“分家”。当时，李象九的思想动态还和到宜川时一样，以唐澍为首的革命委员会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对李也未进行积极的团结说服工作，认为他私人感情用事，右倾。石谦的旧部对唐也不满（因为他们没权没势了），在李面前嘀嘀咕咕。彼此隔阂，形成与李象九分家的僵局。准备了十几天，成立了军委，由唐澍、谢子长、白乐亭、史唯然和我等参加。决定把队伍拉到陕北清涧、安定一带党和群众工作基础好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制定了行动计划，拟定了口号等。当时省委对军队有这样的指示：必要时打红旗（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搞好游击战争。这一次起义就是根据省委这一指示决定的，但要与李象九“分家”，具体行动计划没有报告省委。起义的准备工作，召开过几次革命委员会会议，均未通知李来参加，也不让他知道；部队夜间出发，李独在一地也未发觉。对李象九的处理，曾有缴枪与否的考虑，后来还是没有缴他的枪。行动前召开干部会议，韩子丰（原为石旅连长，起义部队退到韩城后被李象九任为营长）参加了，与大家一致行动的，但他没有带出队伍……

李象九这样说：

……这时，我任旅长，唐澍任参谋长，阎揆要任教导队长。唐澍同志工作非常积极，努力提高士兵的学习，每日黎明即起，操练士兵，很能吃苦。但要求部下有些过苛。未几，他又提议撤换韩子丰（系党员）。我认为唐澍同志要求太高，在革命初期太激进，犯了急躁病。这不能收到团结效果，还易造成恐怖不安，分散部队的力量。所以非常不同意。但出于尊重党的纪律，未能明言，打算将部队交给唐澍率领，我到外边游历，犯了态度消极的错误，过早地提出不愿继续做下去的意见，引起了唐澍同志的误会，认为李象九既然不愿革命、不愿合作，今后的局面势必无法维持，将要造成分裂。但他既没

征求我的意见，就在次日黎明出操时宣布反攻宜川，并说“李旅长已先行了”。随后策军北开，终在攻打宜川时失败了。

从此，李象九彻底离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舞台。

李象九在部队开走之后，陷入了长久的痛苦之中。此时他已感觉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以唐澍为首的军委的信任，没有再去追赶部队，但仍利用他以前的关系，对起义部队尽力保护。起义失败以后，到处是白色恐怖。省委、地委均转入地下，陕西各地贴满了捉拿“匪首”李象九的告示。李象九只身辗转各地，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象九虽致力于商界，但爱国热情不改，仍积极投身于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一九三六年底，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国共合作殚精竭虑，多方奔走。建国后，担任西安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西北工商界代表，全国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委员等要职，一九五四年病故。

历史已成烟云。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个多事之秋，这年下半年中共党史翻过去的那页，追求，献身，激情，狂热，流血，误解，对于处于幼年期的陕西党来说，在不可避免的幼稚中，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事件明明白白地判定出一个对错是非是相当困难的。

但有一点似乎毋庸置疑，在韩城，清涧起义部队与李象九“分家”，对本来已经大大削弱了的起义力量，是再度的削弱。

在起义军甩掉依附于人的旧旗子，独树一帜的问题上，当时的陕西省委曾有过这样的意见：

……不过我们力量薄弱，不能独树一帜。在积极的政策之下不能不取退却的行动……

可以说，幼稚的陕西省委在这一件事情上是有见地的。

可惜的是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最后一天作出的决议案中的这句话被清涧起义主要领导人忽视了——当然，也不排除这一种可能：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这份文件根本就没有送到起义者手中。

现在推测已无任何意义：与李象九“分家”终成历史。

唐澍、谢子长举兵第二次起义

与李象九“分家”之后，起义部队终于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旗号：“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唐澍任总指挥，谢子长任副总指挥，阎揆要任参谋长，史唯然等任大队长；由唐澍、谢子长、阎揆要、白乐亭、史唯然五人组成军委。

从亮出新旗帜开始，史学家将以后的一段斗争称之为清涧起义中的第二次起义。

陕西省委对清涧起义部队十分关注。当起义部队由宜川退到韩城后，省委即对起义部队的策略、进攻方向给予了指示，根据变化了的敌我态势，修正了原先的计划。省委原打算清涧起义成功后，起义部队南下至宜川，然后再继续南下至关中道和许权中部会合，但起义部队退至韩城后，由于战争失利，人员大大减少，而韩城以南，敌人兵力密集，不论是起义部队南下，还是许权中旅北上，都已十分困难。因此省委指示起义部队“今后的出路北去较妥”。

一九二八年元旦，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第一支队离开韩城北进。

在这支人数不多的队伍里，最惹人注目的是打在队伍前面的三面旗子，一面写着“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队”，一面写着“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另一面写着“劫富济贫”。可惜的是，由于当时起义队伍人少力单，只能拣无人小路行进，加上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在一般老百姓心中，这支起义队伍与土匪强盗无异，未能在沿途起到宣传民众的作用。

这时的起义部队总数仅剩一百多人，分为五个队。预定的行军路线是经临镇、延川和延长之间，到清涧、安定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在北进途中，带领先头部队走在前面的谢子长遇到了两个从宜川城里出来的赶脚汉子，谢子长即向两个脚夫打问了宜川城里敌人的兵力情况。脚夫说高双成进入宜川城后又走了，城里眼下只住着他的一个连。谢子长大喜，决定再打宜川。对于陕北高原上的古城宜川，谢子长怀有感情。它曾是石谦旅的旅部，他和石谦、李象九曾多次在这里密议反井，结下了战斗的情谊，城中的一街一巷，他都了如指掌。两个月前举行清涧起义时，军委就准备将起义大本营扎在宜川，后来只是由于战术上的问题，才未能在宜川站住脚。眼下，又是一次机会。城中只有高双成的一个连。脚夫的话一次又一次在谢子长的眼前绽放出一团希望之火。对于寻找暂时立足点和急于取得武器弹药补充的谢子长来说，这个消息太重要了。

谢子长赶紧赶了回来，将了解到的情况向唐澍等军委同志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攻打宜川。军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采纳谢子长的意见，乘敌人空虚，立即再打宜川——在研究是否攻打宜川的问题上，总指挥唐澍初时执反对态度，可惜他未能坚持到底，在谢子长等人的一再坚持下，他最终也被说服了。等着起义军的悲剧结局便在此时酿就了。

这个决定是在宜川以南一个叫作高家湾的地方作出的。那是韩城到宜川之间的一个十分安静的小镇，不长的街道上散落着二十来户人家。如果不打宜川，可以绕过高家湾后边的西山直接去延安方向。

部队连夜急行军八十里，拂晓到达宜川城下。

此时，城门还紧闭着，只有个把哨兵挎着枪，在城墙上无精打彩地游弋，看样子宜川城还在酣睡。

唐澍、谢子长将部队分成两路，打算从两个方向同时攻城。

两支队伍悄悄摸到城下，架起人梯，准备攻城。

当其中一支队伍冲上城时，被敌人发觉了，枪声、号声顿时响成了一片。

敌人立即集合，与起义部队交上了火。

敌人火力很猛。

战斗进行了好一阵，唐澍、谢子长才从抓获的俘虏口中得知，高双成的师部其实并没有撤出宜川城，城内不仅有他的师部，还住着高双成师的几个直属连，所有兵力加起来，至少有一个营。昨天在路上遇到的那两个脚夫提供的情况并不准确。

袭人城上的一部与敌人打了半天，不见胜负，在越来越多的敌人阻击下，遂弃城而去。

未攻入城的一支队伍被敌人强大火力压在城下，未及还击即被击溃，不少未经很好训练的起义战士趁乱逃跑。

攻城已无任何希望。

唐澍、谢子长等决定立即撤出战斗，向西转移。

西风白草，夕阳西斜。

激战的枪声渐渐远去了。

受到重创的起义部队浴在落日的余辉里，默默地行进在土黄色的山峁间。

瘦小的谢子长双目紧蹙，看着正在西边山峁上慢慢下沉的太阳，那个通红的圆球使他不由想起了从倒在宜川城头起义战士的头部或腹部流出的黏稠的鲜血。他心中隐隐泛起了一股难言的内疚——为刚刚过去的那个恶仗。本来，一切也许都可以避免——如果他没有轻信那两个脚夫的话，如果他不建议再打宜川的话，如果在唐澍提出反对意见时他不再坚持的话，如果，如果……如果有一个如果，一切都有可能改变。但是现在，一切都已经晚了。

宜川一仗，死伤共产党员十五六人，损失枪支二百多条，五人军委中，白乐亭、史唯然两人也先后负了重伤。在部队撤出宜川时，又有一些战士趁机逃跑了。这就是二次攻打宜川城的结果。

望着迢迢在山峁间的起义军余部，谢子长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

忽然，他听到了离自己不远的一副担架上发出了几声痛苦的呻吟声。他朝那声音望去。原来是抬担架的一个战士不小心被脚下的土坎绊了一下，打了几个趔趄，将担架上躺着的大队长史唯然颠疼了。一向温和的谢子长的脸立即阴沉下来，停住脚步，朝两个抬担架的战士大声吼了起来：

“轻点，轻点！你们抬的不是一个羊羔羔，知道不知道！”

抬担架的战士张了张嘴，想分辩。

脸色苍白的史唯然在担架上朝谢子长努力笑一笑，用轻微的声音说：“路不好走，怨不得他们。”

谢子长从鼻子里“嗯”了一声，没有说话，走到担架跟前，用手摸了摸史唯然的额头，蹙眉道：“头有点烧。”又问，“伤口疼得厉害？”

史唯然轻轻摇头说：“不要紧。”

“忍一忍，等赶到休息的地方，好好包扎一下。”谢子长安慰说。

“不要紧。”史唯然依然轻声说，谢子长看见豆粒大的冷汗从他的额头上冒了出来，显然，他很痛苦。

谢子长不再说什么。他抬起头来，看了看走在前面的唐澍，快步赶了上

去，抓住唐澍的胳膊说：“唐澎同志，为我的失误，我请求组织处分！”

唐澍摇了摇头，轻轻扶着他的肩膀，说：“武装起义对于我们来说，都是第一次。再说，攻打宜川城的决定是军委作出的，也有我一份。重要的是汲取经验教训。”说着，指指前边的路，“我们还得打着红旗往前走。”说罢，迈开大步朝前走去。

谢子长咽下涌到喉咙的一股酸水，快步走上前去。

天黑时分，起义部队撤至宜川以西二十里的一个村庄进行休整。

起义幸存者几乎人人裹着一身血水满脸血污，连日行军、征战，使这些从苦难中集合起来的庄稼人疲惫不堪，他们刚一倒头，就裹着已被战火撕成了碎片的棉袄拉起了粗重的鼾声。

经清点人数，此时的起义部队已不足六十人。

军委召集紧急会议，决定部队立即执行原先计划，将部队拉到清涧、安定一带群众基础较好的地区去开展游击战争。

会议开得很短。乘着甩掉了敌人，起义的指挥者们打算好好睡上一觉。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将熟睡中的谢子长喊醒了。

谢子长一个激灵跳下炕，开了门，望着站在黑暗中的哨兵问：“有情况？”

“从宜川方向发现了一个马队。”哨兵报告说。

“多少人？”

“天黑，看不准，总有三四十匹马。”

“离这里有多远？”

“不到十里。”

谢子长掏出怀表，借着星光看了看，差一刻不到五点。

“把人都叫醒，赶紧出发！”谢子长命令说，等哨兵走出后，又加上一句：“不要吹号，不要弄出动静！动作要快！”

“是！”哨兵低声回答，转身隐没在黑暗中。

谢子长摸黑来到唐澍的住处，向他谈了敌情，二人决定，部队立即向延长、延川一带北进。

几乎就在起义部队撤离韩城的当日，坐镇榆林的井岳秀便得知了石谦旅余部北返陕北的消息。当起义部队二次进攻宜川失利后，井岳秀即电令陕北各部，对起义部队严加堵截。

因此，在那个寒冷的凌晨，当唐澍、谢子长等人率领着清涧起义余部向北开进的时候，即处于井岳秀部的重兵追击之中。

接下来的历程十分短暂。

起义部队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一路北上。由于井岳秀的高压政策，沿途群众都躲了起来，不敢接近起义队伍，有时急行军一两天，吃不上一顿饱饭；晚上则是敌人的不断袭扰，往往部队刚一歇下来，就有敌人围了上来。冻馁，困乏，大大影响了这支缺乏经验的起义队伍的士气，逃兵不断，非战斗减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最后经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到达陕甘交界的洛河川时，仅剩下了二十多人。

井岳秀的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地继续向这支部队扑来。

在洛河川，唐澍、谢子长、阎揆要三人在一起，召开了最后一次军委会（另两位军委委员白乐亭、史唯然因负伤，已在北上途中秘密隐蔽了起来）。会议决定，唐澍、谢子长、阎揆要先后离队，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起义始末，其余人员就地分散隐蔽。

他们含着眼泪，将打了不到一个月的“西北工农革命游击第一支队”的红旗卷了起来。

至此，清涧起义宣告失败。

清涧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向国民党反动派发出的第一声武装宣言。与“八一”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相比，它的声音虽然短暂而微弱，但它毕竟是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形式的呐喊。

火燃过了。

血流过了。

火烧过的地方，血流过的地方，迟早会开出瑰丽的花朵。

走过幼稚，便是成熟。

第三章 渭华暴动

努力改变形象的省委书记

清涧起义的枪声，牵动着几百里外西安的陕西省委。

狭长的红埠街上，早上卖豆浆油条的，夜里卖烧鸡馄饨的，常常可以看见一些急匆匆的身影，闪进这条街上九号那座门道里卧着两只小石狮的院子。

穿着一件黑色长袍的省委书记耿炳光走出走进红埠街九号时，常挂着一脸严肃。他的眼睛由于熬夜，布着一圈浓重的黑晕，显得疲惫而焦灼。如果你的目光能在他的隐在黑晕里的眼睛上多停留片刻，你便会感到在那疲惫的目光里，还融着一个职业革命家身上所固有的执着和坚毅。

如果你再细心些，你还会发现，近来，每当他走进红埠街九号时，总会眯着眼睛，看一眼高大的门楣，踌躇一下，然后才慢慢地跨进门坎，走进院子。他的步履多少显得有些沉重和勉强。

在清涧起义的这些日子里，没有谁比他显得更焦的——同样，在起义之初，没有谁比他更兴奋。因为这是他改写大革命失败后陕西省委历史的第一笔。

他希望这一笔写得潇洒。

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在宜川兵败之后，他最初的兴奋消失了，用后来毛泽东在文章里批评有些人的话来说，耿炳光不知道从清涧城里飘出来的红旗还能打多久。

近来，耿炳光心情好的时候不多。

自从九月二十六日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之后，他一直处于被指责的地位。围绕着对冯玉祥的态度、对于右任的态度以及对待农民运动的态度，他受到的指责最多。在党的会议上，机会主义这个刺耳的字眼似乎总在隐隐的指向他。

他曾向省委提出过辞去省委书记的请求，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再适宜待在这个责任重大的位置上，但常委们挽留了他。

不久，省委就接到了八月间中央发出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和策略的决议案》。文件指出党的总方针是准备并组织已成为农民运动中心的各省的武装暴动。这份文件，无异于在他的眼前点亮了一盏明灯。

以后的日子，他在努力改变形象。

遵循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耿炳光为改变陕西省委右倾机会主义作了不少努力。在陕西省委“九二六”之后短短的一个月时间里，耿炳光主持下的陕西省委一共发出了九份通告，先后就倒冯的宣传组织工作、在全省范围内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款、抗税斗争、组织共产党员打入国民党军队开展兵运工作以及党团的组织建设等问题进行了全面部署。十月二十六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共中央要使中国有一个能反抗右派反革命的真正的左派国民党的指示，发出了第九号通告。通告要求各地在国民党员重新登记时，共产党员尽可能去登记，不准自行退出：在国民党的各级大会或代表大会中，组织三至五人的党团委员会，从中灵活地运用党的政策。

陕西的党、团活动在一派白色恐怖中积极开展起来了。十月二十四日，

陕西省委向三原县委发出了指示信，要求受大革命影响最烈的三原县“尽可能用其他比较革命的方式组织农民”，“对农村封建势力必要时须用非常手段对付。”遵照省委指示，十月下旬，中共三原县委派负责军事工作的张汉民到云阳镇，指挥云阳农民收缴了国民党杂牌军队十多支枪，成立了农民自卫团。随后，自卫团夜袭了国民党招兵连。月底，杨虎城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后方三原留守部队补充团和炮兵营建立了中共第四军支，张汉民为书记。第四军支先由中共陕西省委直接领导，后改由三原县委领导。

与此同时，党、团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也开展了起来。十月二十六日，西安省立一中反动学校当局勾结军警，逮捕了六名进步学生，开除三十四名。二十九日，党、团陕西省委联合发出通令，发动全市学生声援一中学生。十一月，省教育厅被迫答应更换校长，释放被捕学生，给被开除学生转学等条件。

陕西地方党组织还效仿大革命时的南方诸省，加强了对农运干部的培训。十月秋，高岗、马明方、曹亚华等共产党员在响水堡、横山旧城举办了“农民运动通俗讲习所”，准备迎接陕西新的革命高潮。

这些日子，有几个数字常常出现在省委书记耿炳光的心头，在那一瞬间，他会产生一种短暂的欣慰。从“九二六”会议之后到十一月，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处于白色恐怖日益加紧的陕西党在农村和军队中的组织都有了一些发展。全省有党组织的县从三十三个增加到四十一个，区委由十六个增加到十八个，支部由一百五十三个增加到一百六十一个。全省党员人数由一千六百八十一人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人，关中和陕北大部分县都有了党的组织。

耿炳光知道这些数字所包含的全部意义。在农民觉悟普遍落后的陕西，这是一束在白色恐怖中逐渐绽放的革命之花。这是省委努力的结果，其中融进了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的他的心血。

耿炳光继续在为改变形象而努力，十一月初，他主持中共陕西省委、共青团陕西省委，拟制了《三个月组织工作计划大纲》，以“田友明”（中共陕西省委代号）、“李竹梅”（共青团陕西省委代号）名义下发全省党、团的各级组织，就发展组织问题作出规定。“大纲”明确提出要求：“现在党员的成分，知识分子均占十分之七，农工仅占百分之三，在此三个月中要改变党的成分，使农工变为十分之七……在十一月内，各须发展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十二月中，各须发展至百分之八十以上，如三个月期满后，各地发展成分有相差过远者，则该地负责同志应受严格处分。”按照“三个月大纲”规定，要使党员总数在目前基础上增加三倍。

在耿炳光看来，在组织发展上实现上述目标并不困难。让他感到头疼的是对于如何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发动全陕西的“总暴动”，他心里没有准谱。在这方面，“八七”会议文件虽有要求，但无具体指示。省委开过几次会议专门研究，几位常委也常常是各执一辞，莫衷一是。十月，李象九、唐澍、谢子长在陕北发动了清涧起义，耿炳光曾为之一振，本来他希望起义部队能与在关中的许权中旅会合，在陕西造成一种较大的气候，不料起义部队在宜川却遭到了重创，又辗转撤至韩城，被杨虎城部之王保民收编。这支部队日后的前景如何，现在还是个未知数……此时此刻，耿炳光深深地感到了作为省委主要负责人肩上担子的沉重。近来他常常失眠，他在不断筹划，同时，他也在不断推测与揣摩，他不知道现在省委所做的一切，距中央的要求还相

差多远。

耿炳光急于知道中央对于陕西工作的态度。十月间，省委地下工作布置就绪后，他曾派刘志丹去中央请示，并领取经费和文件。十一月初，刘志丹赶到上海时，中央正在准备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由于正在准备会议，中央领导同志匆匆听取了刘志丹的汇报后于六日将致陕西省委的第七号公函交给了刘志丹。那是一份措辞严厉的文件。

省委书记耿炳光在昏暗的灯光下，曾反复推敲过那文件中的一字一句：

……农民之要求从地主封建军阀豪绅的铁蹄下解放出来，是无可疑义的。可惜过去因为党的机会主义没有去领导农民斗争，所以过去农村中的阶级冲突尚不十分明显而剧烈，目前你们应马上注意到尽可能的发动农民暴动，从抗捐、抗租、抗粮的口号之下，引导农民群众发展到一个广大的农民暴动，大杀豪绅地主，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交给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一切乡村政权交给农民协会，一直到推翻整个的反动统治拿到政权……

……过去我们的党从中央一直到支部整个的机会主义化，实在不能担负中国目前的重大任务，因此改造各级（即支部也应改组）党部是全国党部的重要工作……对于工作不积极观点不正确的人，要坚决的取消其领导地位，甚至清除出党，提拔在斗争中表现得积极的分子——特别是贫农分子来参加党和群众中的领导工作……

我们坚决的认为：谁能站在土地革命的浪潮中，谁便是革命的同志。陕西省委不但本身，而且要向一般同志纠正对于（右任）的幻想，指出我们的出路不是在于右任身上找，而是在领导工农贫民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中找……

中央特训令陕西省委于接此信后，马上作一各种工作的详细的报告和工作计划交来中央讨论以便指示，如再不交报告，中央则停止发给经费。请勿忽视！

刘志丹带回中央指示，已是十一月中旬。无论是刘志丹还是远在西安等着消息的耿炳光，都不清楚上海中央临时政治局正在发生着的一个大事件——就在刘志丹离开上海的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文件。在这些文件里，强调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和弥漫在党内的悲观情绪，提出了发动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正确主张。但是，会议同时还发展了“八七”会议以来在党内滋长的“左”倾情绪，提出了许多错误的理论观点。比如在革命性质问题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的“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在阶级关系问题上，他们把民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等同起来，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完完全全投降了外国资本”，已经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势力，而认定上层小资产阶级“由动摇犹豫而终归走上反革命，去当豪绅资产阶级的走狗”；在革命形势的判断上，否认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已处于低潮，错误地认为革命“无疑的是在高涨”，“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在斗争策略上，不去组织革命力量实行有秩序的退却，而是一味主张实行盲目的进攻，主张农村暴动，城市暴动，工农联合暴动，“直到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而在组织总暴动问题上，又错误地强调以城市为中心；在组织问题上，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农化，提出要对全党进行“改造”，要“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同时，在组织上还采取了过分追究个人责任的扣击政策，

滥用组织手段，强制推行盲动主义，对“八七”会议前后各地的武装起义所遇到的失败和挫折，不作具体分析，一律归之于“机会主义遗毒”、“犹豫动摇”、“不听中央政策”。在瞿秋白主持下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竟无理指责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并给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处分，领导了秋收起义并开创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也被指责为“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解除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全国总暴动这个“总策略”。自这次会议起，开始了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统治时期，刚刚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阴影下摆脱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尽管中央致陕西省委第七号公函在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但文件中已经稍多稍少地向陕西的党、团透露了中央路线大步向“左”转的信息。

天飘着小雪，耿炳光又一次站在了红埠街九号的大门前，他像以往一样，踌躇一下，走进门廊，在砖地上轻轻踩了踩脚上的雪，步履有些沉重地跨过了门坎。

院子里，薄雪落了一层。李子洲站在窗前，正望着一枝刚刚绽出新蕾的腊梅出神。耿炳光看看他，走了过去。

“子洲，你好兴致。”耿炳光掸掸衣袖上的雪，勉强笑着说。

李子洲从梅枝上抬起头来，朝耿炳光笑一笑，指着梅枝说：

“你看，梅树已经打蕾了，今年的花期看来比往年早。”

“就怕恶风寒潮。”耿炳光说着，轻轻叹了一声。

李子洲微微一怔，他听出耿书记话中有话，便在院中踱了两步，慢慢地扭过头来说：“迎风绽红，斗寒吐香，不然就不是梅花了。炳光，不是么？”

耿炳光也怔了一下，随即点点头。此时，他满脑子都是心烦事，没有精神和李子洲品花，便将话锋一转，切入正题：“李象九部在韩城与王保民会合后，你看前景如何？”

李子洲抬起头看看天上飞舞的雪花，沉思了一下。对于兼负军事责任的李子洲来说，近来他也在常想这个问题。他明白陕北这支起义部队的结局对日后陕西全境的武装斗争意味着什么。但他确实难以预料会是什么前景，他轻轻摇了摇头，说：“说不准。唐澍从宜川来西安汇报情况时，我们没有料到李象九会把队伍拉到韩城去，但眼下从实际情况看来，李象九也只有这样办，原先拟定与许权中会合的计划难以实现，陕北老井压得厉害，关中有冯玉祥的宋哲元，再北返或南下都无出路，只好东走韩城联合王保民了。”说着，停顿了一下，蹙眉道：“现在不清楚唐东园（唐澍字东园）找到李象九他们了没有，据消息来源称，李象九带队伍到韩城时，兵力已经大减，但愿他们几个领头的不敢再你扯东我扯西。眼下，保持团结是最重要的。”

耿炳光点了点头说：“清涧起义是贯彻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发‘九二六’会议的第一个有声有色的行动，它对以后全省的总暴动起着示范作用，但愿能按我们的意愿发展。”

李子洲从鼻子里“嗯”了一声，一丝坚毅从他的目光里透了出来，他用不高的声音说：“失败了也不要紧，权当是我们大西北一次流血的呐喊，民众将在这呐喊声中惊醒。”

在这一瞬间，耿炳光感到一股热辣辣的东西流遍了全身，他不由走上前去，悄悄握住了这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陕北人的手。

近来的一些日子里，耿炳光愈来愈强烈地感到，沉稳、热情、激进的李子洲也许是比自己更合适的省委书记人选。省委“九二六”会议，他曾提出过辞职的请求，当时他准备推荐的接替人选就是李子洲。然而那次会议没有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他的职位保全了，面子保全了，但当每次关于机会主义的指责指向他或指向省委的时候，李子洲的影子都要在他的眼前晃动一下。

他说不清那种特别的感觉，是钦佩？还是妒忌？

十一月三十日——红埠街的不眠之夜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西安。

吃过晚饭，天早早地黑了。西北风打着唿哨，顺着沿街的电杆，把那带着寒意的风声传向远处。街上人迹稀少，国民军的哨兵在这里那里晃动，给这清冷的薄暮搅进了一丝惊恐与不安。

中共陕西省常委李子洲穿着一件黑棉袍，脚步匆匆地走在大街上。走到一根电杆底下时，他在国民党省党部贴的一张告示前站下来，借着暮色中的一线微光，勉强看了一眼，不屑地笑一笑，然后撩起长袍，匆匆拐进了红埠街。

今天，省委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全面检查对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情况，安排今后工作。会前这几天时间，李子洲仔细推敲了准备提交这次省委全会的《中共陕西省常务委员会政治报告》，作为三名省委常委之一的李子洲参与了这份文件的起草和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报告。因此，他预料今天的全会通过它不会遇到更大的麻烦。走在红埠街上，他的步履是轻松的。

卖烧鸡的那个老汉已经出来了，提着烧鸡篮子一路喊着，他的声音被晚风吹得歪歪扭扭。李子洲与他擦肩而过时，买了一包鸡爪子，捧着进了九号院子。

一进门，李子洲就听见从上房传出来耿炳光激动的叫喊声：“依我看，张金印有严重的脱离党的领导的独立倾向！”张金印是省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近来，他经常在省委会议上用傲慢的语言指责省委被夸大的错误，为此，耿炳光和他有过一些会议桌上的短兵相接。

屋里早已点好一盏灯，生好一盆木炭火，李子洲进屋就感到了一股暖意。在他进屋之前，已经有两个人围坐在火盆边了，一个是正在发火的耿炳光，另一个是负责秘书工作的省委委员刘继曾。李子洲把带来的鸡爪子放在靠近火盆的桌子上，自己拿起一个，一边吃着，一边招呼着：“来！先打打牙祭，有话吃饱了再说。”

刘继曾也拿起一个，啃起来。耿炳光向李子洲摇摇手，抱歉似地笑一笑，说：“啃那个太麻烦，你们吃。”

李子洲边吃边问：“今天能来几个人？”

耿炳光说：“咱们正式委员、候补委员一共八个人，张含辉到蓝田去了，联系不上，亢维恪被关在宋哲元的监狱里，今天应该到会六个人。”

说话间，李秉乾、潘自力也陆续走了进来。

预定的开会时间就要到了，但坐在火盆边的还只是五个人。

刘继曾看看表，问耿炳光：“现在到了五个，还等不等？”

耿炳光皱着眉头，强压着火说：“等！”

应该到会的，就剩下团省委书记张金印了。

李子洲提醒说：“团省委这两天也在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张金印能来吗？”

说到张金印，耿炳光脸上阴暗了一下：“团们会议昨天就结束了，通知他今天开会时，他没有请假说不来。这么重要的会议，他应该来。”

李秉乾说：“听说他对常委提出的政治报告有意见。”

耿炳光说：“有意见就更应该来会上说一说。”

秘书刘继曾也说：“前天下午我还专门叮嘱过他，他说他能准时来。”

“那咱就再等等。”李子洲说。

窗外的天空迅速黑下来，夜风吹拂着窗纸，弄出窸窣窸窣的声响。李子洲掏出怀表看了看，已经晚上八点半了，原通知七点半开会，现在离预定开会时间已经过去了快一个小时，但还不见张金印的影子。

耿炳光也在看表。

大家开始不耐烦起来。

“不等了，”耿炳光终于挥了一下手说，扭过头来吩咐秘书主任刘继曾，“继曾，记上，张金印无故缺席。今天到会人数已经超过应到人数的半数，是法定的开会人数，可以开会了。”

大家集中精神，看着耿炳光。

耿炳光首先宣布了会议议题。今天的议题很集中，讨论贯彻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案》，检查对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的执行情况。接着，由他代表省委常委向全会作报告。

提交全会的政治报告十一月十六日就发到了党的各支部讨论，并要求各市县委汇总各地意见，报到省委。在此后的半个月时间里，省委常委综合各方面意见，修改了几次。在座的几位省委委员在会前也都看过政治报告的蓝本，由于报告不仅全面总结了两个月所取得的成绩，也充分地列举了尚未根除的机会主义现象，大家认为这是个基本上实事求是的政治报告，因此讨论通过得比较顺利。

会议的后半部分是讨论《两月来之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

没有出现耿炳光担心的那种疾风暴雨式的批评和批判。

会议对于全国和陕西的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应该说，得出的结论是冷静的。

会议认为，常委报告和决议案中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政治形势及革命前途的分析是正确的。指出两个月来，省委机会主义减少，但因为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对“八七”会议及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没有完全了解和传达到党员群众，使决议未能完全实行。

关于全国形势，会议明确指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但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一点没有变更，仍然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行土地革命，能够完成彻底的中国民权革命。”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无论会议的政治报告还是决议案，都阐述得很清楚。决议案中指出：“所以我们很坚决地认为中国革命的两个前途仍是并存并无任何根本的变化，而且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在这阶段的正确策略斗争中，非资本主义前途要战胜资本主义的前途，现在正是这两个前途斗争的更剧烈更严重的关键！”会议的讨论结论中又说：“不过无产阶级若放弃了斗争，则普鲁士式资本主义前途便要胜利。”

关于陕西的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与策略，会议认为陕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农民也比较落后，党的力量也比较弱小，因此，反对对农民力量作过分的估计。会议结论中说：“中央以为陕西广大农民群众富于斗争的革命情绪，易于组织革命的暴动，即在陕西的同志也常有此种话说。我们经过一年的工作……使我们对民众力量及党的力量便不能不重新估量……”从这种估量出发，会议认为：“我们要积极的领导农民作部分的暴动，准备总暴动。暴动是空口说不得的，也不是一说便可成功的。”

会议决议案最后指出：“一个斗争的共产党，不是由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共产党的正确政策不是由办公室内可以制定的，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决定的。党在陕西还很幼稚，惟其幼稚才要努力于一切斗争，在一切斗争中，增加党的力量尽我们的历史的使命……彻底纠正我们的机会主义，努力履行我们的政治任务。”

在陕西党的历史上，这无疑是一次主调基本正确的会议，它对于全国和陕西政治形势的分析，对于暴动和苏维埃问题的分析，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不仅如此，它还对中央的一些“左”倾指示进行了自觉的抵制，应该说，这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在全国蔓延初期，来自大西北共产党人的一声微弱的警示。

会议一直持续到翌日早晨六点半。

省委书记耿炳光在熹微的晨光里走出红埠街九号的时候，揉了揉布满黑晕的眼睛，不过，他的脚步看去比往日轻松了不少。

总的来说，他对今天的会议十分满意。

不过，耿炳光的好心境并没有持续太久，在陕西省委第一次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常委的政治报告和全会通过的决议案就遭到了十分严厉的批评。

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批评并不是来自中央，而是来自一个自负的年轻人——没有出席会议的团省委书记张金印。

一场党内斗争已不可避免。

陕西党、团不断升温的一系列会议

十一月三十日夜里，当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在红埠街紧张进行的时候，团省委书记张金印也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在自己的住处，他将几份文件同时摊开在桌子上，逐字逐句地对照、研究着。

两天前他就接到了召开省委一次全会的通知，省委一次全会恰好安排在共青团省委第二次会议之后，会期并不矛盾。最初接到通知时，他也准备在二十九日开完团省委第二次会议之后，再参加党的会议。但二十八、二十九日，他主持了两天团省委第二次会议之后，由于团省委与党的省委意见上的严重分歧，使他作出了不再参加省委第一次全会的决定。

两天的团省委全体会议，在对陕西政治形势的分析上（主要表现在对武装暴动的看法上），对陕西农民的基本估价上，以及对敌斗争的策略上，团省委所执观点与党的省委在许多方面都格格不入，认为党的省委依然在机会主义的老路上走。在会议通过的共青团陕西省委《对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决议案》中，对准备提交党的一次全会讨论的省委常委会的政治报告和决议案提出了尖锐批评。

不出席党的三十日全会，是张金印在党的全会召开前两小时才决定的。他属于决定了什么就不计后果的那种人。他既不参加会议，又不请假，故意表现出对党的省委的轻慢和藐视。于是在《中共陕西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及决议案》中，便有了“张雄甫（即张金印——著者注）不知何故未到”这样无可奈何的记录。

也许只有张金印自己心里明白，与党的省委意见上的分歧并不是他不参加会议的全部原因。尽管他常显得自负而自信，但还不是目空一切——在党内，他既没有敢于向省委分庭抗礼的资历，又没有这样的威望。他之所以敢于表现出目空一切，是因为在团省委背后站着的团中央。

十一月，团省委先后收到了团中央《驻汉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案》、《告全国同志书》和《复团陕西省委公函》等文件。团中央《驻汉委员全体会议决议案》主要是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纠正团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复团陕西省委公函》则在对陕西团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严厉批评的同时，提出许多“左”的主张。比如在对形势的分析时认为，“中国革命虽然部分的失败，但是革命依然是高涨的”，“现在的局面是炸药已经埋好，只看点药丝的

人有无决心”，主张“反对一切军阀”，“杀尽一切地主土豪、绅士买办、反革命的大资本家、贪官污吏与一切反革命者，每个已死革命者的性命，要拿十个反革命的性命来偿还”。在批评团陕西省委的机会主义错误时，严厉指出：“天下哪有不争斗的共产青年团，哪有不争斗而能够保有实力的道理，你们还不立刻改正这样错误的观念，那简直团的前途，只有涣散而被群众唾弃，很快地死灭。”

张金印乍看到团中央对团省委的批评时，头上冒了一层冷汗。但他再三揣摩团中央“复函”，终于找到了摆脱“机会主义”的出击点。

他在团中央《复团陕西省委公函》下面这些文字上划满了加重号：

你们现在要破除这个观念，就是说团只管青年，甚至只管学生运动和文化工作，这是根深蒂固的机会主义观念，应当与此观念奋斗。陕西的党与团都很弱，现在目前的工

作，无所谓青年成年，而且团的工作也不要等待。党的不过是一个政策的决定。现在政策已经决定了（如上面所说的引起斗争），团应当自动地奋勇地上前干了。

在张金印看来，这段话中的“青年成年”即指共青团和共产党，其中的暗示不言而喻：必要时，团省委可以抛开党的省委自己干。

很明显，团中央的这段指示，与党的省委对团省委的批评针锋相对，尽管团中央也许并不清楚陕西党的省委对团省委有过“纠正儿童化倾向”和“纠正对党的无意的抗争”的警告。在张金印眼中，那是些不能容忍的字眼。

不参加省委会议，只是张金印向省委粗暴地抛出的一个信号。

实际上，在团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策略决议案》中，已经对党的省委的右倾机会主义进行了火力猛烈的批评。

批评集中在对待农民运动以及由此延伸的对待“总暴动”的态度上，针对党省委政治报告和决议案中关于“陕西农民落后”的观点，团省委认为这种观点是机会主义的。认为陕西的反动统治“崩坏动摇”，革命“更有发展之机”，因此，要求把工作的重点放在组织工人农民暴动上，“乘资产阶级军阀的更大危机，可立即组织大的暴动，仍旧由彻底的民权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在这里，张金印显而易见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仅如此，在团省委的决议案中，还塞进了一些强加于人的“观点”，如党省委的决议案在说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两种可能时，指出“不过无产阶级若放弃了斗争，则普鲁士资本主义前途便要胜利”，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团省委的决议案则断章取义地批评省委，“只说今后有向普鲁士式资本主义前途发展之可能，未及其他”。由此，团省委最后给党省委下的政治结论是，“总之，党省委常委会在目前革命形势下的政治路线，充分的表现动摇、犹豫、矛盾、阶级意识缺乏，机会主义成分保存很多。”

张金印也像党省委书记耿炳光一样，努力于改变团的形象。遗憾的是，他却把矛头指向了“九二六”会议后基本正确的中共陕西省委。

也许事后人们可以看得更清楚些，团省委的决议案，对形势的分析，对党的策略的主张，都和自十一月九日开始的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相一致。虽然这时不论党省委还是团省委都还没有收到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文件，但团中央给团省委的指示却带来了瞿秋白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信息。由此而产生的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决议案”，可以说是第一次“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在陕西贯彻的先声。

在党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增补为省委常委的张金印将团省委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决议案”上报党省委的同时，要求立即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团省委的意见。在张金印的强烈要求下，迫使党省委于十二月四日、六日连续召开了两次常委会议。在这两次常委会议上，张金印陈述了团中央在“复函”等文件中对党省委早在七月十一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报告主要内容是，在未取得中央指示前，对“清党”反共的冯玉祥既不反对也不袒护；对原国民二军取中立政策等）的意见和团省委对省委常委政治报告的意见，认为省委提出的西北农民落后和发动起义要经过一个准备过程是右倾机会主义。省委书记耿炳光与其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在这两次常委会议上，张金印手持团中央的上方宝剑，言词咄咄逼人明显地占了上风。

常委会最后表示接受团省委的意见，同意修改在党的第一次全会上刚刚

通过的政治报告和重新起草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并决定于近期召开第二次全会解决这些问题。

十二月七日下午七时，当薄暮初合时，省委第二次全会在省委秘书处秘密召开，与会同志六人，除了一次全会参加的五人外，增加了张金印。

会议由省委书记耿炳光主持。

耿炳光宣布开会后，张金印第一个要求发言。

他列举了省委机会主义的主要表现之后，矛头立即指向了耿炳光：“我认为作为省委书记，耿同志应对陕西党的机会主义错误负主要责任，由于耿同志头脑里固有的机会主义，才导致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做人还得讲个良心，在党的会议上讲话更应该实事求是！”耿炳光挥一下手打断了他，然后扫视了大家一眼，冲动地说，“我承认，党在陕西机会主义的错误非常严重，我个人是一个十足的机会主义者，我完全承认。但党的机会主义，并不是由我一个人造成的。在陕甘区成立到省委成立这个期间，我们的工作大部分都是按照中央指示进行的，中央及北方区的指示文件至今尚存，历历可考，对冯玉祥对于右任的政策即由此而来，如像张同志给我戴的大帽子，那共产国际顾问乌斯曼诺夫的错误比我们还要大十倍。”

“你不要用中央的问题掩盖自己的错误。”张金印带着一丝冷笑说，“‘八七’会议，已经解决了中央的机会主义，可咱们陕西呢？有多少改进呢？耿同志左一个陕西农民落后，又一个陕西的党落后……”

“这是事实。”耿炳光被张金印嬉弄的神色激得满脸通红，“党在陕西缺乏理论，缺乏训练，缺乏经验，统统是因为没有斗争，没有斗争便是落后，不能讳言。我也说过陕西农民落后

“哼，不是‘也说过’，这是你的口头禅。”张金印插了一句。

李子洲吐出一口烟，看着耿炳光说：“陕西农民有落后的一面，但我们发动得不够，工作做得不够、也是事实。”

耿炳光喝了一口水，对李子洲的批评，他似乎找不出反驳的理由。他停了一会儿说：“我同意李同志的批评，笼统地说农民落后是不恰当的，但若说农民完全不落后也不见得正确。”

张金印说：“陕西党落后，陕西农民落后，这就是耿同志不发动总暴动的理由。”

耿炳光：“我没有说过不暴动，我是指发动总暴动时机还不成熟，现在是准备阶段。”

张金印：“南方早就暴动起来了，你还想准备到啥时候？”

耿炳光：“对南方各地的暴动，只可取法而努力，不可眼热。要知一个暴动不是任何党任何个人能够随时随地创造出来的，必须有可能的条件——环境、时机与准备。即使十月革命暴动，也不是列宁创造出来的。过去省委对暴动的急切的指导，甚至有提出今年正月十五某地举行暴动，都是不正确的，结果一点效果都没有。”

潘自力问：“请问耿炳光同志，你说的‘必须有可能的条件’是指什么时候？”

耿炳光：“我没有时间表，我主张由部分暴动到总暴动，先准备，再慢慢扩大。”

张金印：“这个时间我们总不能看不到头，现在我们一边反着机会主义，一边还在继续机会主义，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将机会主义碎尸万段！”

耿炳光也冷笑一声：“纠正省委书记的错误，不是把他碎尸万段一句恨话可以了事的，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态度。”

潘自力摆开劝架的架势说：“耿同志、张同志说话都有不合适的地方，耿同志以‘陕西农民落后’而把武装暴动推到看不见的将来，依然是机会主义。张同志也有些言词过分的地方。”

耿炳光的嘴动了动，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李子洲也说：“‘八七’会议以来，土地革命、武装暴动是最重要的工作，我们也不能等得时间太长……”

张金印粗暴地打断了李子洲：“是的，应该立即发动总暴动，而不是原先省委政治报告中说的‘准备总暴动’，我们应该以此为出发点，修改省委一次全会的《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这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团省委的意见。”

在那天晚上，耿炳光、张金印吵到半夜。

最后，会议采纳了张金印的意见，修改了《两个月工作回顾及政治问题决议案》，最重要的改动是将文中的“准备总暴动”改成了“组织农民在农民协会旗帜之下发动抗税抗捐抗粮的部分暴动，以至总暴动”。

最后，耿炳光向全会提出，由于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请求辞去省委书记一职。

全会没有讨论他的辞职请求。

省委在第二次全体委员会会议之后，陆续收到了瞿秋白的新中央通过长江局和河南省委转来的许多关于发动农民暴动夺取政权的文件。为了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召开了第三次全体委员会会议，进一步肃清右倾机会主义影响，争论依然在耿炳光、张金印两人之间展开。张金印继续攻击耿炳光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耿炳光则批评张金印把团引向脱离党的领导，犯了“先锋主义”错误。会上耿炳光再次提出撤换他的省委书记职务，被会议所通过。

在这次会议上，对清涧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李象九给予了处分。

翌日，即一月五日，省委又召开第四次全会，主要解决组织问题。经过讨论，推举潘自力、张金印、徐梦周、刘继曾、王松年等五人组成常委，潘自力代理书记。在新省委第一次常委会上，又增选李子洲为省委常委。

在此次全会上，还决定了两个重要人选：杜衡为陕北特委书记（日后担任过省委书记，又于一九三三年叛变）；刚被撤销的省委书记耿炳光为陕南特委书记。

根据中央关于全国工农武装暴动的指示，一月十二日，陕西省委发出第二十六号通告，要求各级党组织努力于鼓动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开发游击战争，准备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总暴动。为此，将全省划为关中、陕南、陕北三个区域，关中又分为省东、渭北、省西、中区、东府五个区，每区设一暴动委员会，指挥各区游击战争。

会后，省委陆续派出一批党员和干部到各地区领导暴动。

在此期间，省委先后接到中央《关于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中央致陕西省委公函第九号》等文件，为了贯彻中央指示精神，省委又于一九二八年二月十三日到十四日在西安召开了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陕西C.P.目前工作方针》决议案，决议认为“陕西客观上亦到直接革命形势之阶段中”，目前陕西各地党的组织工作总方向

是发动群众，认识自己必须武装暴动，使民众自发的暴动尽快开始高涨，一直到建立陕西统一的苏维埃政权。

省委五次会议召开之时，清涧起义已彻底失败。这次全会，对清涧起义的另一位主要领导人唐澍以“十二月中攻取宜川，犯了单纯军事投机”错误，决定给予书面警告的处分。

二月十八日至十九日，省委又召开了第二次扩大会议，审查批准了省委第五次全会通过的决议案。选举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农民）三人为陕西出席将于三月中旬召开的党的全国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

党内认识已经统一：陕西全面暴动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次次不断升温的会议，孕育着三秦大地上即将爆发的惊雷。

关中各地，已经断断续续地传来了一些好消息：

三原党组织派人杀死了三原甲种职业学校反动校长尹聘

华县党组织派人杀掉了国民党特务李纪实……

大革命时期农运、学运高涨的渭南地区，党、团组织以渭南赤水职业学校、渭南中学、渭阳中学、东关小学和华县的咸林中学、谷维小学、高塘小学等处为据点，秘密策划着即将到来的暴动。

在大暴动的前夜，被委派担任陕南特委书记的耿炳光终于离开了西安，脱离了他曾为之奋斗的事业。

他没有前往陕南赴任。

他在解放后写的材料里这样说到了他脱党的原因：

后来我提议去陕南工作，省委同意，送来路费二十元与文件一束。我看了文件，知道已通知各地组织暴动，而且要求在旧历年举行暴动，我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认为这样干要垮台，并表示我不去陕南执行这个政策，把文件与路费退回去，请另派工作，省委未答复。这时我爱人病逝，留下一个四岁的女孩，只好送回老家。回西安后，省委秘书处遭破坏，好几个同志被捕，我想省委一定搬家了，不能去找。那时在西安无眷不能租房，又难与组织取得联系，只好再回老家……

可以看出，对暴动的抵触，他一如当初。

一九二八年十月，耿炳光在北平遇见陕西省委委员肖明，肖明告诉他，陕西省委已经开除了他的党籍，并说可在北平设法恢复党籍，但此后再无下落。后来他得知，是他的老对头、已升任河北省委书记的张慕陶（即张金印）从中阻挠。以后，他再没有想过恢复党籍的事。

他回家了，从此，陕西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舞台上，耿炳光这个名字消失了。

历史依然在艰难地往前走……

宣化事件——渭华起义的火捻儿

宣化观——位于渭南县城西北八里处槐衙村的一座道观。两进院落，几株翠柏，占尽风水。古庙始建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庙产为宣化四社（即宣化观周围的几个村庄）村民所有，已历数代。辛亥革命，兴办新学，宣化四社村民将古庙改为小学，仍惜“宣化”之名，叫做宣化初级小学。附近乡村学龄儿童多在这里上学，在校学生常有四五十人，年龄不等，在七八岁到十五六岁之间。一九一八年，渭南县豪绅景行之、刘铭初、李兰轩等不顾宣化四社农民的反动，以“暂时借用”为借口，将其所办的“乐育高级小学”从县城西关强行迁至宣化观，将原宣化小学逼于观内东南角几间小房内。从此，宣化观门口，挂起了两个学校的牌子。周围群众对劣绅恶行虽怀恨在心，但惧于权势，敢怒而不敢言。于是，宣化观里这种一院两校的对峙局面一直延续了十年之久。

渭南地区是陕西传播马列主义、开展党的活动最早的地区。一九二七年初，西安解围后，中共渭南党组织为了发展壮大党、团力量，驱逐乐育高小反动势力，开辟西北乡的工作，曾派共产党员刘廷献、共青团员刘克俭等到乐育高小任教。刘廷献任校教务主任，刘克俭任教员。当时乐育高小主事的校董有国民党渭南中区长景行之和劣绅刘铭初、李兰轩等，校长是国民党渭南县委委员田宝丰；教员有顽固守旧的薛明璋、王武轩、刘英才等。刘廷献、刘克俭到校后，利用教学活动，向学生和群众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教育，同时还在乐育高小秘密发展进步学生朱汉杰、张炳正、董正志、王应举、许仙志等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刘克俭转为共产党员，同时，又先后发展本校进步教员李彦武、宣化初小进步教员焦悦仁入党。五月，成立宣化小学党支部，刘廷献任支部书记；七月，中共渭南县委成立，八月，刘廷献任中共渭南西北区委书记（区委机关即设于宣化观内）；九月，刘又兼任中共渭南县委候补委员。

此时，党、团组织虽是秘密的，但革命进步活动较为公开，刘廷献等通过学生会把学生组织起来，深入农村，帮助成立平民夜校，组织农民协会，党团员和进步学生经常到夜校去讲演，说故事，为农民演新戏、唱新歌，有声有色。在乐育高小校内，则发动学生向反动的校董会开展斗争，要求撤换毒害学生的反动校长田宝丰、教员刘英才等。

宣化观内，宣化初小与乐育高小的两校之争，实质上已成为渭南西北乡一带革命与反革命两种势力斗争的焦点。

随着冯玉祥叛变革命，陕西当局石敬亭、宋哲元奉命“清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被强迫解散，党团全部转入地下，陕西全境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此期间，乐育高小反动分子勾结地痞流氓，异常活跃起来。一九二七年冬，景行之、刘铭初、李兰轩等为了打击革命力量，巩固宣化观内的反革命阵地，乃用校董会名义，以停办乐育高小为借口，公然解聘共产党员刘廷献、刘克俭、李彦武三人。于是，宣化观内两股势力的矛盾急剧发展。

停办乐育高小是虚，解聘刘廷献等人是实。景行之等的意图很明显，就是要瓦解共产党在宣化一带形成的势力。渭南县委经过研究，决定利用景行之、刘铭初停办乐育高小之机，在原宣化初小的基础上设置高级班，成立宣化高级小学，以坚持阵地，开展斗争。为了取得宣化一带农民同情和支持，县委还决定通知乐育高小归还所占宣化观房舍。县委的这一决定，取得了县

教育局长王悦益（共产党员）的赞同。一九二八年二月，经过一番紧张的工作，宣化高小正式宣布开学，校长为共产党员李维屏，教务主任依然是刘廷献。宣化高小刚开学，报名入校的学生就有八十多名，连原乐育高小的学生也大都转了过来，这与占据着观内东侧房舍的已停办的乐育高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乐育高小校董会见“停办”诡计失败，复于二月九日重新开学，劣绅刘铭初自任校长，企图与宣化高小对抗，但报名学生寥寥无几。乐育小学校长恼羞成怒，采用更卑劣的手段向宣化高小反攻。

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乐育高小谎称当晚为校舍之争要与宣化高小在县政府“过堂”，将宣化高小多数教职员哄骗至县城，校内仅留教员李延寿（共产党员）一人上课。黄昏时，李延寿正在给学生上课，乐育高小校长刘铭初、校董景行之、李兰轩与薛明漳、王武轩、田宝丰等反动分子纠集地痞流氓四五十人闯入宣化高小，辱骂教师，威吓学生一律转回乐育高小上学。师生不服，执理反驳。景行之、刘铭初之流图穷匕现，指挥地痞流氓砸碎校牌，捣毁桌椅门窗，撕碎书籍，强行驱赶师生离校，宣化观中，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急剧白热化。

当晚，李延寿即赶到县城，向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详细汇报了宣化高小事件始末。此时，渭南县委已经收到了省委关于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发动全面暴动的指示。肖明敏感地认识到这是发动群众的一个极好时机，当即指示李延寿：“回去就地发动群众，明晨迎接县里来人。”李延寿走后，肖明连夜召集中共渭南县委、共青团渭南县委在县城东关的县立高级小学召开联席会议。恰逢省委常委、团省委书记张金印参加“六大”路经渭南，也住在东关县立高小。听肖明汇报了宣化事件后，异常兴奋，出席了是晚举行的渭南党团联席会议。会上，张金印代表省委讲了国内的革命形势，进而联系省委刚刚开过的一系列会议，指出在全省发动武装暴动的紧迫性，他认为目前在渭南两华（华阴、华县）地区暴动，主客观条件均已成熟，应当立即举行暴动。在这个发动暴动的大好时机，若不暴动，就是右倾，就会失掉民心。张金印的意见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会议最后决定首先对眼前以乐育高小为代表的反动势力予以坚决反击，并对翌日的斗争作了部署。

半夜，党、团县委联席会议结束后，即派人分头去联络正在熟睡中的党、团员和进步学生骨干，准备行动。

二十九日黎明时分，乐育高小反动校长刘铭初还在睡梦中，以渭南县立高小和县立中学为主的二三百名学生挥舞着木棍、劈柴，已将宣化观团团围住。接着，宣化四社的农民也向宣化观拥来。一刹时，“打倒劣绅！”“还我校舍！”的口号声连成一片，惊天动地。

渭南党组织掌握的三张民团接到起事通知后，也派了十几个人，携带武器，直驱宣化，把守住宣化观周围各主要路口。

刘铭初被学生的口号声惊醒，赶紧起床，一边抓摸他护身用的铁拐杖，一边大声喝叫头天晚上就住在校内的劣绅和流氓恶棍对付学生。他还没走出屋子，就被冲进观里的学生堵在门口。

刘铭初看着面前将他围住的青皮娃娃，又气又恼，指着学生大骂：“驴日的反了，看我上县里告你们去！”

一个宣化高小的学生上前辩理：“你们霸占了我们的学校，到底该告谁，你说！”

“快说！”“快说！”又是一阵喊声。

刘铭初依然骂：“反了，你们这些穷鬼真的反了！”说着，抡起铁拐杖追打着学生往外冲。几个地痞手拿家伙，闻讯赶过来为刘铭初助威。

学生被激怒了。一个学生砍了刘铭初一劈柴，刘向前踉跄了几步，另一个学生顺手举起铁棍向刘头部狠狠砸去，刘铭初当即毙命。

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清党委员薛明璋也被学生杀死在宣化观内。

田宝丰见势不妙，想夺门而逃，被一手持菜刀青年撞上，迎面一刀，顿时鲜血喷面，昏死倒地（后又苏醒，未死）。

王武轩魂飞魄散，越墙而逃，被学生发现，穷迫不舍。王武轩慌乱中跳入农民贾玉良家菜地井中，几个学生赶来，搬起一扇磨子，要往下砸，被贾玉良老婆阻挡。

景行之、李兰轩两个反动校董由于当晚不在学校，免受惩治。

宣化高小的斗争取得了暂时的胜利。

在淡黄的阳光下，宣化高小的学生们排着队，唱着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

儿童儿童要振起，咱们儿童被人欺。

打倒了恶霸，惩治了老皮。

快乐共同合，乐在儿童也……

学生的歌声未歇，景行之、李兰轩就带着驻渭南的国民党军队和警察包围了宣化高小，逮捕了未来得及撤走的学生董正志和炊事员刘保保（共产党员），此二人被毒打后投入监狱多年。接着，又到处搜捕宣化高小校长李维屏和教员刘克俭两位共产党员。抓不到人，多次敲诈李、刘二家，共刮去三千四百多元了事。

二十九日下午，国民党渭南当局在查封了宣化高小后，又命景行之、李兰轩带路，派军队、警察包围了县立中学，逮捕党、团员和进步学生十多人。共产党员、县中校长王文宗到县署找县长论理，以校长身份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十多名学生，县府以“共产党嫌疑”将其逮捕。该校教员、共产党员冀月亭在县城不能立足，随党团机关秘密转移农村，为即将到来的武装暴动作组织发动工作，不幸于三月中旬在侦察敌情时被捕，三月二十八日，被解送至西安国民党军法处羁押。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七日，王文宗、冀月亭等九名参加宣化事件和渭华暴动的共产党人被杀害于西安北门外，是年王文宗二十四岁，冀月亭二十三岁。

三月二日上午，县政府又封闭了参与宣化事件的县立高小。

宣化等三校被查封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命马鸿宾部一个连包围了三张镇。三张民团事先得到消息，虽已有所准备，但团丁韩玉杰仍被抓走，损失部分枪支，民团被迫转入地下……

陕西省委密切关注着宣化事件。

三月十三日，省委常委发出了第三十九号通告。这是省委针对宣化事件，依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新政策”即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向全省发出的要求由宣化事件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的动员令。

省委三十九号通告高度赞扬了宣化高小的斗争：

数百人一霎时打死了四个大恶绅，这当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当然立即会引起全县人民的注意，轰动了全县。一般民众自然是无不称快，只有驻军、官厅以及豪绅们则于惊怖惊慌之下，一定要作最后挣扎，用白色恐怖手段来镇压报复……宣化斗争在陕西的工作上，的确是一新纪元呵！

由宣化斗争，省委兴奋地看到了全陕总暴动的前景：

沉寂无斗争的陕西的党今已开始了正确的群众斗争，我们只有本党的新政策，坚决地勇敢地站在群众的前边，领导民众继续延长扩大宣化斗争，并不断地发动新的群众斗争，在斗争中开发游击战争，猛烈的杀豪绅地主官吏及其走狗，夺取他们的武器，破坏他们的统治，掀起全陕东的大动乱，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的民众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同时各地皆须努力发动群众斗争，引起全陕大骚动，一直形成全陕总暴动，建立全陕苏维埃政权……全陕的总暴动决不是空谈妄想，也不是几年几个月而后才有希望实现的事，而的确是由现在开始一直继续延长扩大而即可以实现的。

在第三十九号通告中，省委还明确指示各级党部：一、立即发动民众斗争；二、领导群众将斗争扩大而一直转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三、建立苏维埃政权；四、在斗争中武装群众，开展群众的游击战争，杀豪绅，杀官吏，杀地主，杀一切反动派，夺取武装；五、抓住眼前青黄不接之机，爆发斗争，否则就是出卖革命；六、将民众的各种斗争汇成民众的大暴动；七、发动产业工人和手工业工人，造成城市大暴动；八、在斗争中发展组织；九、各军队的武装同志应帮助农民斗争，同武装农民共同组织农民革命军，以作农民大暴动的前锋。

号角奏响了。

一场风暴，在惊喜、兴奋、焦急中孕育着……

不平静的起义前夜

一九七二年五月，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潘自力，在大山沟的一孔破窑洞里艰难地打发着他人生的最后日子。

山沟在山西的霍县，潘自力一家住的破窑据说曾是在历次运动中被毁掉的一座古庙。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大使潘自力回国治病，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便被打成“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一九六九年，林彪发布“第一号令”，已患重病的潘自力带着年迈的岳母和十一岁的小儿子，被“下放”到湖北钟祥的“五七干校”劳动；一九七一年五月，又同夫人、儿子、岳母一家四口，被“安置”在山西霍县的这座破窑里。

恶劣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潘自力的病情迅速恶化，从一九七二年春天起，八十多公斤的体重只剩下了五十多公斤，他几乎是终日卧床了。夫人姚淑贤向有关部门提出送丈夫到北京治疗的请求，没有人理会。情急中，夫人给周总理写了一封求援信，潘自力得知后，把信压下了，他对夫人说：“总理也不是那么好过的，不要再给总理找麻烦了。我的病能好就好，我也愿意好，继续为党做点工作。万一好不了，也不要紧，人总有一死的。”

给周总理的信终于没有发出去。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潘自力在霍县的那座破窑洞里含冤去世，终年六十八岁。

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潘自力的夫人姚淑贤都陷在不能自拔的悔恨中，她后悔自己没有把那封给周总理的信发出去。她相信如果周总理看到她的信，一定会把她的丈夫接到北京看病的。

她知道，周总理了解她的丈夫……

一九二八年的三月上旬，在上海中共中央的一个秘密交通站，中央负责同志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等接见了出席党的“六大”的陕西代表潘自力一行。

潘自力与张金印、王松年是三月二日抵沪的。与中央接上关系后，才得知由于上海白色恐怖严重，中央已决定“六大”延期在别处举行（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莫斯科举行，陕西代表只有留在团中央的张金印出席）。在他们返回陕西前的这段时间里，中央听取了他们的口头汇报并作指示。

“去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文件你们已经看到了吧？”周恩来问。

“今年一月份才看到。”潘自力说。

“还有今年一月二日中央给你们关于发动工农暴动的第九号公函，也收到了吧？”李维汉又问。

“上个月才收到。”潘自力说。

周恩来：“中央关于对冯玉祥、对国民二军政策的指示你们有什么意见？”

潘自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机会主义错误确实是严重的，以前确实还抱有幻想。最近，省委开了几次全会，思想已经统一了。”

李维汉：“陕西农民落后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工农暴动的错误认识曾经导致了陕西省委的机会主义，现在应该克服了吧？”

潘自力点点头：“认识也统一了。”

张金印补充说：“近来，农民、学生的革命情绪高涨得很，尤其是关中地区，各县都有杀土豪劣绅的，上月底在渭南发生的宣化事件，更是大长了群众的志气。而陕西的大小军阀则是矛盾重重，可以说，陕西全面暴动的时机已经到来。”

周恩来：“好！我们必须抓住机会，给反动派一个全面的打击！”

邓小平：“在暴动中，一定要注意发挥党、团组织的领导作用，现在陕西党、团组织可有发展？”

潘自力拿出一张表格，看着说：“现在全省共有两个特委，一个市委，十一个县委，党员、团员各约三千人。与头年九月相比，县委增加了四个，党员增加了一千四百人，团员增加了一千一百人。”

周恩来兴奋地拍了一下手：“成绩不小！在冯玉祥、宋哲元眼皮底下，一下子钻出来那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成绩确实不小，这是我们发动革命暴动的政治基础。”

潘自力：“省委经验不足，希望中央经常多给指示。”

周恩来：“你们先不忙回西安，这两天你们坐下来，给中央写个书面汇报，然后咱们再抽个时间，坐到一起，专门研究一下陕西的问题。”

三月十六日，潘自力就陕西党组织问题给中央写了书面汇报。

三月十八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小范围会议，研究陕西问题。在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等陕西代表的参加下，中央作出了《陕西工作决议案》。“决议案”重申：“党的总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的革命高潮。”

四月初，潘自力、王松年返回陕西，张金印则留在团中央工作。潘自力回陕时除带回中央指示外，还带回一封《中央给权中同志信》。中央在给许权中的信中强调：“你们现在寄生在李虎臣之下，绝对不是你们的出路。”指示许旅要发动农民群众，配合农民的武装起义，要脱离军阀军队，独立搞武装。

当潘自力一行在上海就组织陕西全省暴动一事接受周恩来、李维汉、邓小平的指示之时，西安的国民党当局也加紧了反革命部署。

宣化事件不久，在国民党陕西省政府第四十次例会上，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公然宣布“二·二九”宣化群众斗争“实属反革命之行动”，严令“渭南、固市两处发生学潮之学校暂停”，“严办共产分子”。为示强权，省政府还将在宣化事件中镇压不力的渭南县县长袁棚撤职，另委张公辅掌渭。随后，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又于三月二十三日在《革命军人朝报》上发布“整顿学风”的电令，宣布“渭河南北各学校一律停办，切实改组。校长不良者撤换之，教员不良者更易之，自有教育厅长负责，学生不得借故滋闹，心存破坏。不服从师长者，以共产党论罪”。

宋哲元、冯玉祥发令后，渭华地区各县反动当局立即纠集上豪劣绅，查封学校，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一时间，浊浪滚滚，甚嚣尘上。

三月八日黎明，国民党一个营包围了中共华县县委所在地高塘小学，封闭了学校前后大门，抓走了共产党员、校长李维俊，党员教师陈树功、吉维

庚、翟文凤和三名进步学生。李维俊后与王文宗、冀月亭同时被害于西安北门外，牺牲时年仅二十二岁。

在封闭高塘小学的同时，敌人还包围了党组织掌握的高塘民团，因团丁平时食宿在外，未被抓获，仅损失少数武器。

同日上午，共青团华县县委机关所在地谷维小学也被一连敌兵包围，正在上课和工作的党、团负责人及多数同志闻讯机智逃脱，未及撤走的党员教师杜芳亭、马步益、梁俊献、韩育贤、李萌霄五人被捕。

三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华县警察局局长王硕甫带一队警察，将华县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七里寺小学包围，当时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温济厚正在学校楼上主持召开党支部会议，闻讯后即组织在场人员持枪与敌激战，无奈只有四人二支枪，与敌相持一小时多后，终因弹尽无援被蜂拥而上的敌人抓走，同时落人敌手的还有党员教师史卓生、肖成栋，后党员教师申定远也遭逮捕。温济厚在华县狱中备受酷刑，被打得休元完肤，坚不屈服。敌人于是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华县县城西门外城壕边将他杀害。

五一县（渭南渭河以北辖区曾设渭北分县，县治在固市镇，一九二七年五月一日，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改渭北分县为五一县，习惯上也叫固市县，后与渭南合并）是渭华地区革命斗争最活跃地区。位于固市镇的渭阳中学是中共五一县委、共青团五一县委地下机关所在地，敌人觊觎已久，三月二十四日，一营国民党军队突然包围了渭阳中学，将全校师生集合在操场，宣读宋哲元封闭学校的电文。这时，尾随而来的县府警察、衙役拿着一个六十多人的名单到校点名捕人。五一县委虽在前一天获得捕人消息，已有所防范，但仍有武维化、刘仲哲和王希晏、武定一等党、团员师生被捕。武维化后来在华县监狱中被敌人折磨而死。

宣化事件后，渭华地区同时期被查封的还有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华县咸林中学、县立高小、郑村小学。五一县的下吉高小、隆兴小学、上太平小学等十多所学校。共有四十多名党团员和进步学生被逮捕。

萧瑟的春风中，弥漫着淡淡的血腥味……

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并没有扑灭渭华地区革命群众的斗争烈火。为适应斗争需要，“宣化事件”后，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均及时地由县城转移到乡下，广大党、团员走出机关、学校和农民结合，加紧对农民暴动的组织指导工作。

中共渭南县委在“二·二九”事件后，积极筹划全县的暴动。为了打击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群众，在三月十日前处决了两名民愤最大的劣绅，抄没了五家豪绅的财产。三月十八日、二十九日，县委两次发出通告，限期捣毁国民党县党部，举行全县的武装暴动。

中共华县县委和共青团华县县委也于三月十六日联合发出通告，要求加紧与扩大游击工作。在县委具体组织下，团的县委书记王之鼎和共产党员王泰吉带领武装人员，在高塘到县城的途中，截杀了鱼肉乡里的华县县政府收粮委员姬捷三，夺得巨额经费。

中共五一县由县委书记苏士杰任总指挥，组织了一百多名党、团员，于三月六日晚袭击了巴邑镇民团，抄了大土豪贾雨天的家，焚烧文约地契账簿，在农民一片欢呼声中开仓放粮……

渭华大地，酝酿着一场摧枯拉朽的风暴。

三月二十二日凌晨四时，李子洲又点燃了一支烟。

他刚刚送走了省委常委、秘书长刘继曾。

李子洲叼着烟，在屋子里慢慢踱了几圈，然后推开门，来到了院子里。月亮很好，在墙上地上铺了一层银白，带着寒意的夜风轻拂着，将天井里的腊梅摇出窸窣窸窣的响声，一只夜游的乌鸦从深蓝色的天际划过，嘶哑的叫声在寂静的夜里搅动起几分惊恐。

李子洲在慢慢地踱着，他的心里，激流翻滚。

省委书记潘自力还在上海，在这段时间里，由他代理省委书记。几乎与潘自力前往上海同时，发生了“二·二九”宣化事件。之后的一些日子，他几乎每天都能感受到来自渭华大地的震颤。

不能再等待了。

实现全陕总暴动，他已经找到了突破口。他把目光投向了以渭华为中心的陕东地区。

二十二日，李子洲连夜召集在西安的省委常委开会，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组织暴动。为了加强对陕东暴动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以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即李昌英）为特委宣传委员。

常委会议结束以后，李子洲和刘继曾谈了很久。

送走了刘继曾，李子洲还久久地沉浸在亢奋中。一九二三年夏天，从北京回到陕西后，他一直在为拯救桑梓东奔西走。冯玉祥挥师入陕，誓师北伐，他眼前曾闪亮过一线希望。可随着冯玉祥急剧右转，那线希望也彻底破灭了。从此，他不再对军阀寄任何希望。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是救民众出水火的唯一法宝。

现在，是时机了。

黑暗中，三十六岁的李子洲仿佛听到了来自渭华大地的隐隐的枪声……

潘自力、刘继曾匆匆的脚步

三月二十四日，肩负着领导渭华暴动大任的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由西安来到了渭南。之后不几天，李大章也赶到了。四月一日，陕东特委召开第一次会议，由刘继曾、肖明、李大章组成的陕东特委正式开始工作。

四月二日，特委发布第一、第二号通告。第一号通告明确指出：“特委直辖于省委，专指导陕东各地斗争与暴动，各县委、区委在斗争方面，无论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均应受特委之指导。至其经常党务，则仍归省委直接指导。”第二号通告则要求各地对陕西省政府关于“停办”渭南、五一、华县各地各级学校的反动训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立即成立小学教师联合会，并以联合会名义发表宣言；动员农村支部及各小学积极宣传，煽动联络，尽量把事情闹大；如遇反动军警出动武力，即以武力对付。

四月六日，特委召开由全体特委成员、渭南、华县的党、团委书记、华县县委的特科主任，及许权中旅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渭南、华县的工作汇报，讨论了陕东区目前工作计划、许权中旅的行动问题，通过了《中共陕东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这是特委成立后，在全面分析了陕东斗争形势后，制定的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纲领性文件，“大纲”的第一部分，即用十分庄严的文字开宗明义：

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特制定工作计划大纲；但应注意四点。

(1) 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计划；

(2) 这个计划是要在最短时间完全实现的；

(3) 这个计划是要按照陕东客观情形决定的；

(4) 这个计划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许权中旅——著者注）出山，帮助农民暴动，但不是等待主义。

特委指示在四月底之前完全实现特委工作计划大纲的要求。

为了保证“大纲”的顺利实现，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渭南、华县、固市三县党、团联席会议决定了临时纪律十一条，即：叛党者枪决；不遵守纪律者开除，重则枪决；临阵逃脱者开除，重则枪决；畏缩不前者开除；不参加斗争者开除；不努力工作重则开除；虚张敌人声势、不信任群众力量者开除；不接受命令者开除；不服从决议者开除；行动自由者开除；冒充上级发布命令者开除。

从三县联合决定的临时十一条纪律中，不难看出，在渭华起义前夕，党、团组织已经意识到了未来斗争的严酷。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革命队伍内部，必须采用非常手段。

武装暴动在紧张的准备中。

在一个太阳很暖的中午，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的医生骑着毛驴走进了洛南县城。

医生在一家药铺门前下了驴，立即被药铺掌柜迎进了屋子。

“路上咋样？”药铺掌柜问。

“还算妥当。”医生在一张藤编的靠背椅上坐下来，笑了笑说，“过了两岔河不久，遇上过一次盘查的，那个官儿难缠，问来问去的，我怕时间长

了露馅儿，给他塞了一瓶藻露堂的虎骨酒。”

“没事儿了？”

“没事儿了！”

医生和药铺掌柜相对大笑了起来。

这个“医生”就是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这家药铺是党在洛南的秘密联络站。刘继曾此次南行，是为了到洛南三要司和许权中取得联系，传达省委、特委关于在陕东组织武装暴动的决定。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时，许权中派军党委书记杨晓初参加了会议。那次会议后，特委从华县、渭南选调了四十七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运动积极分子，由中共陕西省委常委、华县县委书记王松年、薛自爽等带队到洛南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刘继曾此次到来之前，许旅党组织已派旅党委委员、共产党员张汉俊，率领在许旅学习的渭南地区军事人员返回渭南，并带回几十支枪支和一批手榴弹，这些军事人员回到渭南后，已经开始以“踏团”名义进行武装活动，成为陕东暴动前夕对土豪劣绅的一支威慑力量。刘继曾这次以特委书记身份前往三要司，则是根据暴动总要求，与许权中研究军队与农民相互配合的细节问题。

“此时，住在商县城里的李虎臣大概也想不到，一个共产党头头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钻到他的眼皮子底下了！”药铺掌柜边倒着茶边说。

刘继曾淡淡一笑，把话转入正题：“许旅还在三要司？”“李虎臣嚷嚷着要往潼关开，眼下还没有动静。”药铺掌柜说。

“李虎臣对许旅还信得过吧？”刘继曾问。

“原先还好，近来有些麻烦。”药铺掌柜说。

“出事了？”刘继曾问。

药铺掌柜点点头，说：“省委关于组织暴动的两伤文件不知怎么落到李虎臣手里了。”

刘继曾一愣。

药铺掌柜说：“不过李虎臣这个人还讲义气，许权中和他是临潼同乡，现在又在他的部下，没有找太大的麻烦。听说李虎臣截获了那两份电报后，派人把许权中叫去问了一番话，许权中用言语搪塞，说冯玉祥在陕西清党之后，共产党的陕西省委早已瘫痪，哪来的力量组织暴动。”

“李虎臣相信吗？”

“将信将疑。”药铺掌柜说，“不过李虎臣还是有了防备，派出了嫡系部队的一个连到三要司，观察许权中的动向。”

刘继曾听罢，心里不由蒙上了一层阴云。清涧起义失败之后，党在陕西掌握的武装只剩下了许权中的这一支部队，陕东起义发动在即，省委、特委对许旅寄托着很大希望，如果这支队伍被敌人掌握或被敌人瓦解，暴动前景将会十分渺茫。

“药铺掌柜”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第二天，天还没亮，刘继曾就起了床，依然是一付医生打扮，骑着驴，往三要司方向而去。

下午，刘继曾来到了三要司许权中旅的驻地。不巧，许权中旅长昨天刚刚被李虎臣叫到商县第八方面军司令部开会，与夜宿于小药铺的刘继曾失之交臂。恰巧此时，许旅又接到了省委秘密交通送来的急件，告知省委书记潘自力近日已由沪返陕，着刘继曾接信后，立即返回特委。刘继曾连夜召集了许旅党的会议，讲了国内形势和陕西两个月来的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全陕“总暴动”的决定，代表省委要求许旅进一步扩大武装，准备参加即将

到来的陕东起义。之后，便匆匆赶回了渭南。

刘继曾回到特委的第二天，省委书记潘自力在向省委汇报了上海之行的情况后，便由西安秘密来到了处于斗争风暴前哨的渭南。在一所乡间小学的教室里，潘自力向特委传达了中央关于立即进行武装暴动的精神。一段火辣辣的文字在陕西年轻的造反者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图画：

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城市和矿山发动工人经济斗争，建立群众的赤色工会，发展到政治斗争，造成农村暴动的中心领导者；在农村领导自发的斗争转变到杀豪绅地主没收土地建立乡村苏维埃，造成乡村的割据……

他们决心与以往的机会主义决裂，决不辜负中央。

这是陕东暴动前的最后准备阶段。

二十四岁的省委书记潘自力马不停蹄地奔走在临潼、渭南、华县、固市、蒲城一带的山间小路上。暴动前夜，他的胸中常常充溢着一股澎湃的激流，仿佛他在二十四年间聚集的力量，要在眼前这一刻爆发出来。

他要在故乡的土地上，唱一支理想之歌。

在四月最后一天的晚上，他来到了他的故乡——华县高塘原，夜风把四月的麦花香轻轻送了过来，他大口大口地吸着，微醉了。这里的一切，他都太熟悉了，这溶进了麦香的四月的夜风，这开着紫色马莲花的田埂，这歪长在地头的老槐树，还有远处隐在月辉下的庄稼人的草屋……当然，还不止这些，还有在那些青黄不接的日子里（眼下正是这样的时候），从终年趴在黄土地里的男人女人人口中发出的呻吟以及横陈在苍白的天际下的饿殍；那些挂在财东家墙上的鞭子和摆在场院里的大斗——那是后来成为陕西省委书记的潘自力最早认识的“阶级”两个字；岁月如河，在后来的省委书记眼前掠过的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敞胸露怀的“硬肚”走了，打家劫舍的“红枪会”来了（硬肚、红枪会均为陕西关中一带的土匪帮会），这个旗号的司令换成了那个旗号的司令，然而世间不平依旧，百姓苦难依旧。于是华县高塘镇上土染作坊老板的儿子，将迷惘的目光投向了高塘原以外的另一个世界。

一九二二年夏天，十六岁的潘自力考入了陕西著名的华县咸林中学。在这里，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回陕的魏野畴成了他的第一个人生导师（魏野畴回陕后，即被著名教育家杨松轩聘为咸林中学教务长，并兼任英文和历史）。之后，著名共产党人王复生、王懋廷也先后来到咸林中学，还有魏野畴的好友、渭南赤水职业学校校长——瘦小的王尚德，也成了咸中讲台上的常客。这些陕西最早的无产阶级职业革命家让年轻的潘自力结识了《向导》、《先驱》、《新青年》，一个伟大的理想在他心中萌芽了，他成了学生读书会、自治会、讲演会、新剧团、青年励志社、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社团的积极参与者和组织者。他经历了顽固势力在咸林中学的复辟，含着依依不舍的目光送走了魏野畴，当王复生被迫离校时，潘自力毅然辞学跟着他来到了北京，一九二二年，十八岁的潘自力由王复生、刘天章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四年，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国民军控制的区域里出现了国共合作推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局面，潘自力根据中共党组织的决定参加了国民党，并以国民党员的身份参加了北京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一九二五年七月，他奉中共中央之命由北京来到开封（此时，王若飞正在开封衔命组建豫陕区委），旋即又受王若飞之命，回陕了解建立共青团和国民党组织

的情况。潘自力回陕后，往返于西安、三原等地，会见了著名共产党人魏野畴、杨明轩、刘含初、张含辉、高克林、张秉仁、李子健等人。八月回开封向王若飞复命。这年十一月五日，潘自力、罗世文等四十二名经过斗争考验的共青团员奉命出国赴莫斯科学习，翌年一月，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转为中共党员。一九二七年五月初，在大革命高潮中，潘自力奉命回国，他沿着几个月前邓小平走过的路，经乌兰巴托、宁夏到达西安。谁知回到西安不久，冯玉祥就背叛了革命，陕西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被一片白色恐怖所代替，共产党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

而此时，潘自力的名字频繁地出现在党的秘密文件上：共青团陕甘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中共陕西省委东路特派员兼中共渭南县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西安市委书记；省委代理书记——在同党内机会主义的斗争中，他一步步走到了前台……

潘自力久久地站在高塘原上。

一片浓云不知不觉地遮住了月亮，四野黑得更加沉重，远处传来了隐隐的雷声，潘自力侧起耳朵，他的眼前绽出了一片炸雷时的绚丽。

此时，二十四岁的省委书记的血已经热到了沸点，他的心里只装着两个字：暴动！暴动！暴动！

五月——暴动的渭华

五月一日，渭南崇凝镇逢集。

天还没有大亮，通往崇凝的大路小路上就涌满了源源不断的人流。路边的人家惊异地望着向崇凝镇匆匆涌去的人流，崇凝七天一次集日，在他们的记忆里，自家门前的土路上从来没有走过这么多的人。他们扒着门框，望着匆匆而过的赶集人，终于感到了今天与以往集日的不同，在这股赶集的人群里，显眼地走着一队又一队举着小彩旗喊着口号的学生娃。那些平日里挑着菜提着鸡零零星星前来赶集的庄稼人今天例外地扛上了镐锹犁铧，排着不算整齐的队伍走在灰蒙蒙的晨光里，粗糙的脸上写着庄严。

肯定发生了什么事。路边的人家这么想着，也回头问上门，加入了匆匆的行列。

太阳从东边源上慢慢爬了出来。崇凝镇东南角老爷庙的戏楼前的空场子上，彩旗飞舞，人山人海。被红红绿绿的旗子围着的戏台子正中央挂着一幅列宁的画像，四周的墙上，几幅墨迹未干的标语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情大家办！”

“有土皆豪，无绅不劣！”

“打倒国民党军阀，打倒土豪劣绅！”

“建立苏维埃，实行耕者有其田！”……

上午十一点多，在一片愤怒的声浪中，县府的两个恶差王永泉、张丑娃被五花大绑着，由五六个身背大刀 of 农民押着穿过聚集在戏台前的群众，走上戏台，被结结实实地绑在戏台上两旁的柱子上。

渭华起义的序幕正在拉开。

十二点整，中共陕东特委委员、渭南县委书记肖明在群众的欢呼声中走到了台上，他看着台下一片热切的目光，大声宣布：

“乡亲们，今天是一九二八年的五月一日。五月一日，是个不寻常的日子，四十二年前的今天，美国芝加哥的二十万工人为了阶级的利益，用血写下了无产阶级斗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今天，在这个伟大的纪念日子里，我们渭南县将要诞生第一个农民自己的政权。现在，我正式宣布，渭南县崇凝区农民暴动大会开始！”

霎时，“苏维埃万岁！”“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声淹没了整个会场。

接着，东南区委书记金鼎五发言，他的烈火一样的语言把在场群众的心点燃了：

“乡亲们，我们祖祖辈辈在这里受苦，背负日头脸朝天，粮我们种，布我们织，可是大家说说，我们过了一天好日子没有？”

“没有！”“没有！”……回应他的，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吼声。

金鼎五等会场安静下来后，继续说：“谁不让我们过好日子的？是那些财东，是那些劣绅，是那些催粮派款的军阀，是国民党，是蒋介石，是冯玉祥。过去我们对冯玉祥还抱过幻想，指望他维护工农利益，我们错了，犯了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我们明白了，拯救工人农民的，还是工人农民自己，除此，谁也靠不住。因此，我们要建立自己的政权，用咱们农民的话说，就是要成立咱自己的官府自己的衙门，这样的政权十多年以前在苏联早已实现了，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也已经实现了，今天，在咱们崇凝，也要实现，这就

是苏维埃……”

“拥护苏维埃！”“苏维埃万岁！”……又一阵声浪盖住了金鼎五的讲话声。

金鼎五讲完话，区委组织委员闵希孝及郑德龙相继发言。

讲话毕，金鼎五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金鼎五任苏维埃政府主席，闵希孝、何思杰、李治、王景文、冯养浩、李凌支为委员。区苏维埃政府下设四个委员会，即人民委员会、土地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

最后，肖明代表陕东特委和渭南县委热烈祝贺陕东地区第一个苏维埃政府成立，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指着绑在台柱子上的两个恶差问大家：“大家说，把这两个咋办呀？”

“杀了！”“杀了！”台下来一片愤怒的喊声。

喊声未罢，站在台前的农协会会员李耸霄便伸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杀猪挽钩，把恶差从台上拉了下来，群众一拥而上，你一锹，我一耙，霎时间，两名恶差被群众打成了肉泥。会后，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走到崇凝街上，抄了恶霸、原东南区区长李玉林的“天庆昌”商号，烧了账簿分了浮财。队伍游行至西城门口时，突然遇见了国民党催粮委员孙太。农民孙敬堂眼疾手快，赶上前去，一锹砍下，结果了这个鱼肉乡里的恶吏。

世世代代任人宰割的“泥脚子”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崇凝率先起义后，农民暴动的烈火很快在渭华地区蔓延开来。

五月二日，渭南县委在赤水召开了群众大会，由于赤水地处敌人控制严密地域，会开得很短，团省委委员、渭南县委县委书记张宗适抱着屠弱的病体主持了会议。会后，群众冲到东赤水，踏了商团，杀死商团会长赵绍普，缴了几支枪。接着，又抄了劣绅吴彦福的家，打死敌探廉老八。走到长寿原，暴动农民碰见国民党师长魏忠臣的马弁押着十三驮子银元和烟土向南行进，立即将他们截住，押到黑张口小学门口，让车夫、脚夫站出来。一马弁见状，慌忙掏出魏忠臣的信和证件，两个农民上前夺过信和证件，撕个粉碎，审问了一番后，暴动农民将八名马弁全部杀死。

五月三日，南阳郭镇举行暴动大会，群众查抄分配了大地主牛星照的粮食和家产。正当暴动群众欢天喜地庆胜利的时候，一支悠悠的歌声由远处飘了过来：

妹妹呀，知道吧，我今参加军队呀。

放锄把，抓刀把，决心要把老财杀。

妹妹呀，等着吧，回来咱再结婚呀……

大家循声望去，见一支三四十人的队伍正朝镇上走来。歌声就是从那队伍里传出来的。

原来，陕东特委派往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的渭、华两县农民革命武装骨干赶来了。他们每人扛了一杆长枪，背着三排子弹，别了四颗麻辫手榴弹，穿着新军装，在许旅党委委员张汉俊（出山后化名李大德）和华县农运骨干薛自爽的率领下，威风凛凛地来到了渭华原。

暴动群众立刻认出了他们，跑过去，拉着他们的手，兴奋地说：“好好！这下可好了，有了咱们的队伍，还怕啥，干！”

这支农民自己的武装在渭华五月的风暴中屡建功勋。

五月四日，李大德率领这支农民武装出席了三张镇群众暴动大会，踏了三张警察局，收缴了枪支，然后又砸了厘金分局，逮捕了厘金分局局长，押到大会上，当众处决。会后，他们又配合西原群众杀劣绅，斗土豪，攻击大小地主武装，消灭了郭照乾民团，处死团总郭照乾。之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正在举行暴动大会的华县高塘镇。在一万多群众“打倒冯玉祥，祖祖辈辈不纳粮！”“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口号声中，捣毁了大恶霸薛良臣的放账窝子“同盛公”，烧了账簿，分了财物。同时，还捣毁了潘炳万（潘自力的父亲）的染坊。

五月六日，以这支农民武装为基础的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授旗仪式在沈河川望冈岭娘娘庙前举行，附近五六百群众参加了大会。会上，渭南县委组织部长何寓础代表中共陕东特委向赤卫队授旗，宣布李大德为陕东赤卫队大队长，薛自爽为副大队长，冯养浩为党支部书记。下辖三个中队和一个由少年组成的大刀队，大刀队队长由省委书记潘自力的小弟潘树藩担任。此时，赤卫队已由刚出山时的三十多人发展到五六十人（最多时到百余人）。

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便遵照特委指示，移驻高塘镇西南的塔山，修筑工事，设立枪械修理所，储备粮食——很显然，这里将迎接一场更加猛烈的斗争风雨。

一个牧童骑着一头老黄牛，在五月的的高塘原上慢慢走着，伸直了嗓子唱着一支从民国初年就传唱在这一带的歌谣：

一天做到晚，一年做到头；
筋骨快挣断，汗水顺腿流。
饿了没饭吃，冷了没衣穿；
没有房子住，尽叫丘八占；
粮草天天要，差务不能断；
军警拿鞭打，差人用绳拴；
里绅迫烟款，值年迫杂捐；
穷人没法过，何时见晴天。

来到高塘组织渭华起义的李子洲听见歌声，走向牧童，问：“歌子是跟谁学的？”

“没跟谁，这里的人都会。”牧童说。

李子洲沉吟一会儿，又问：“放的是自家的牛吗？”“不，我家没牛。薛财东的。”牧童说。

“是薛良臣吗？”李子洲问。

牧童点一点头，好奇地望着这个穿长袍的外乡人。

“薛良臣近来在庄子里吗？”李子洲问。

牧童摇摇头：“不在，一暴动，他就跑了，听说是跑西安了。”李子洲摸着牧童的手，又问：“你们家里有几个参加暴动的？”

“没有，一个也没有。”

“你大呢？”李子洲问。

“死了。”牧童说。

“你妈呢？”

“死了。”

“你有哥哥姐姐吗？”

“有一个哥，也死了。”牧童声音越来越小。

李子洲感到一股寒气正在向自己全身袭来。他没有问他们是怎么死的，他觉得那样问是多余的。

他沉默了一会，然后，看着牧童的眼睛，用低沉的声音说：“你刚才在歌子的最后一句问：何时见晴天。让我告诉你，快了，快了！”说罢，离开那孩子，迈开脚步，向源上走去。

李子洲回到高塘小学自己的临时住处，在桌子上铺开一张纸，舔好笔，写下十六个大字：

今日举旗闹暴动，云开日出霞满天

写罢，他慢慢踱到门口，牧童的歌声又隐隐约约传了过来：

……

里绅迫烟款，值年迫杂捐；

穷人没法活，何时见晴天

……

苏维埃——农民心头之火

蓝天白云，红日艳丽。

鱼池村府君庙前的场子上，在无数面飞舞的红旗中，醒目地夹杂着一杆牙边杏黄旗，旗上高挑着一个斗大的“苏”字，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的上方，“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十四

个大字赫然在目。

鱼池十六村在高塘镇丰原里。晚清民初之际，渭华地区吏治混乱，匪患频繁，这一带群众在抗暴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两个中心，一个以柿村为中心的十八个村子，俗称丰原里十八村或柿村十八村；一个以鱼池村为中心的十六个村子，惯称鱼池十六村。在历次武装抗暴中两个村落集团时有联合，协同对敌。

从大清早起，鱼池十六村的数千名群众、苏维埃成员、赤卫队员脖子上佩戴着象征起义的红布带，扛着土枪、大刀、长矛、铁叉等武器陆陆续续来到了会场，太阳刚出来一竿子高，府君庙前已是人头攒动，熙熙攘攘了，还有三十多名老爷庙会会员各执黑红棍赶来助兴。

大会开始了。陕西省常委王松年及华县县委负责人工之鼎、霍世杰及高塘民团总教练王拯民走上了主席台。

王松年走到台前，看了一眼台下的人群，代表省委、县委大声宣布：“从现在起，丰原里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了！”

“苏维埃万岁！”王松年的声音立刻被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淹没了。

接着，宣布了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主席赵德壁，委员吉星昭、赵振华。他们都是丰原里最早的共产党员，大革命时期，由他们建立了高塘原上第一个党支部，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鱼池十六村，村村都成立了农民协会，领导农民情算劣绅账目，形成了一个坚强的核心。一九二八年春，为了组织武装暴动，陕东特委派往许权中旅接受军事训练的四十七个人里面，就有他们三人。李大德、谢自爽率领学军人员出山时，正值渭华起义前夕。他们随着陕东赤卫队在渭南东、西原活动了几天后，被党组织派回鱼池，组织武装起义。他们分头到各村联络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农民群众，宣传苏维埃，首先帮助姚河和上墉两个村子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之后，鱼池十六村其他村子的苏维埃

政府也陆续建立起来了。

今天，统一的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后，又组织了统一的农民赤卫队。

鞭炮爆响了，唢呐吹响了，三十名老爷庙会会员舞起了黑红棍，耍得眼花缭乱。娃娃们兴高采烈，三五成群地结成伙，在大人们的队伍里窜来窜去。

会后，群众打着“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的旗子，冲到大恶霸孔宪文和乡团长薛中和的家里，命他们拿出历年摊派的粮款烟款账本，推举出几名办事公道的苏维埃成员，面对面查对。查出许多漏洞，恶绅多收的款项至少在四成以上。“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孔宪文！”“清算薛中和！”愤怒的口号声如雷声滚滚。铁证如山，孔宪文、薛中和吓得流出了一头冷汗，连连躬首作揖，答应限期交出赃款。谁知事后，二人裹了细软，双双躲逃在

外，好久不归。

受了愚弄的鱼池十六村革命群众总结了首次斗争的教训，在第二次斗争恶霸赵楚珍时便有了经验。首先派农民赤卫队捕捉赵楚珍。不料赵的叔父赵玉锡得知了赤卫队行动的消息，偷偷传递给赵楚珍，致使这个恶霸事先逃跑。农民赤卫队和群众闯进赵家后，没有抓到恶霸，就查抄了银元、粮食等浮财。赵玉锡气势汹汹地出面阻拦，死死趴在粮袋子上，破口大骂“土匪”，并扬言要和苏维埃干到底。群众大怒，一拥而上，将赵玉锡按到地上，痛打了一顿，然后，将他捆作一团，在群众的怒吼声中，押送到高塘小学，交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审判后，唐澍总司令下令将其处决。

工农革命军撑腰处死恶霸赵玉锡后，群众精神大振。苏维埃主席赵德壁率领群众赶到方寨村，逮捕并处死了重利盘剥穷苦老百姓的放高利贷者高孝贤，焚烧了里峪口村豪绅王兴致的房屋；随后，又赶到东原，烧毁了孔宪文的竹园和麦垛子。

六月十日前后，在宋哲元部田金凯师进攻高塘原的同时，逃亡在外的大恶霸孔宪文、民团头子薛中和终于闻到血腥回来了。他们带着地主武装突袭了甘河子等村，抓住村苏维埃主席高利娃，乱刀砍死。孔、薛二霸仍不死心，带着人又向其他村子扑来，企图对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员进行更残酷的报复。鱼池十六村苏维埃闻讯，立即率领千余名群众和农民赤卫队截击孔、薛地主武装。敌人闻风逃窜。

十六村苏维埃决心铲除孔宪文、薛中和这两大恶霸。他们联合了丰原里柿树十八村苏维埃，在工农革命军支持下，在李家洼村戏台前集合了三千之众，准备袭击孔、薛二霸。恰在这时，薛中和带着一股武装恶奴从戏台前路过。看见集会群众，即命手下向人群开枪射击。苏维埃成员与工农革命军领导紧急商议后，决定由鱼池十六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赵德壁和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郭济众分别率领群众，兵分两路，一路追击薛中和，一路直插孔宪文庄园。一路赶到孔宪文庄园后，发现孔宪文没在家，抓住其三弟孔石娃，当场杀死，然后一把火烧了孔家。另一路群众与薛中和边打边走，薛中和吓得魂飞魄散，混乱中带着地主民团逃往金堆峪，群众和工农革命军武装包围了薛中和的家。薛中和的父亲薛金娃是个冥顽不化的家伙，见群众包抄过来，便紧锁大门，依靠高墙大院和众多家丁进行反抗。薛金娃率领家丁爬上房顶，用一把盒子枪向群众射击。他早先练过枪法，打得很准，群众一时很难接近。为了防止不必要的牺牲，决定正面由工农革命军与之对付，吸引薛的注意力；同时派赤卫队员抱麦草从侧面靠近房子，放火烧屋。这一着果然奏效，火光闪时，房屋内外浓烟大起，薛金娃惊慌地从房上滚落下来，拔腿就跑，群众穷追不舍。眼看就要追上了，薛金娃连甩几下盒子枪，都没有响——子弹打完了。一名冲在最前面的赤卫队员举着铁叉准准地捅在他的腰眼里，薛金娃惨叫一声，栽倒在地。这时后面的人群已经赶到，刀枪齐下，结果了他。杀死薛金娃后，鱼池十六村和丰原里十八村为争夺薛金娃的那把盒子枪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工农革命军的一个排长出面做工作，才解决了纠纷。

此后，在苏维埃的发动下，十六村村村开展了大张旗鼓的斗恶霸、杀土豪斗争，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首恶分子，群众在斗争中看到了希望和光明，越来越多的人参加了武装斗争。

柿树十八村几乎与鱼池十六村同时成立了统一的苏维埃政府。在十八村

苏维埃成立之前，一些村子已有了村苏维埃，如建国后曾任北京体育学院院长的钟师统就曾担任过吉家河村苏维埃主席兼农民赤卫队队长。十八村苏维埃是在腰村共产党员郭济众、赵彦明发动下成立的。大革命时期，他们就在华县党的负责人霍世杰、张克敏等人的帮助下，率先在等城子、腰村组织了农民协会。之后，南堡、东窑子、吉家河、牛窑、柿村等地也纷纷组织起农协。在村农协的基础上，成立了十八村分区农协。一九二八年四月，酝酿武装起义，党组织派往许权中旅学习军事的四十七人中，有十八村的王松年、赵彦明等人。从许旅返回渭华后，赵彦明即被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派回柿村，与郭济众等人一起，开展苏维埃活动。

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是在柿村老爷庙召开的。用传统的“分豆”形式进行了选举，郭济众当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联合鱼池十六村，在联合反霸、配合工农革命军抗击宋哲元进攻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六月二十日，郭济众、赵彦明率领农民赤卫队摆脱敌人后，随工农革命军撤退到秦岭，后又随军赶到两岔河，分别被任命为军需主任和供给处长。

苏维埃是什么？

大革命时期曾往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的“高塘三杰”之一的华县县委书记陈述善（另外“二杰”为后任陕西省常委的王林及留上海大学工作的赵锡琰）在高塘军民联欢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是通往共产主义的一座桥梁。什么是共产主义呢？共产主义就是彻底铲除了地主恶霸，官僚豪绅，世上再没有贫人富人之分，工人农民自己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现在的苏联那样。因此，只有建立苏维埃，在苏维埃的领导下，穷苦百姓才能彻底摆脱压迫和剥削。”

农民们瞪大了眼睛，听着关于苏维埃的解释，他们的心被这个新奇的词暖热了。苏维埃是燃烧在他们心里的一簇希望之火。

在短短的半个月时间里，仅在高塘一个地区的三百多个自然村中，就有一百一十七个村子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勿庸讳言，在短时期内雨后春笋般诞生的苏维埃政府，就其整体素质来说，并非很高。有些村苏维埃成立时既不发动群众，也不开会，几个平时相好的朋友夜里一合计，第二天就打出了苏维埃的牌子，开始捕人杀人。渭华一带，红枪会势力很大，红枪会成员多数也是穷人，为了防身护家保村，结成帮会，刀矛拳脚，样样精通。因为都是穷人，各村成立苏维埃后，许多红枪会员都成了赤卫队员。因此苏维埃运动开展起来后，维护苏维埃自身形象，取信于民就成了各村苏维埃政府面临的最重要问题。

李木村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后，群众群情激奋，强烈要求村苏维埃带领大家打击土豪劣绅。但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韩金锋大耍两面手法，企图抵制群众斗争。他的父亲韩继冬拥有土地五十多亩，是本地一个劣迹昭彰的土豪，常放高利贷给农民。尤为可恨的是农民徐登荣病故后，韩继冬诡称徐登荣欠其债务，强迫徐妻偿还，徐妻索要债房文约，韩继冬不但不给，反而霸占徐妻，夺去徐家十五亩地，惹起众怒。苏维埃成立后，群众强烈要求清算韩继冬。韩金锋不但不理睬群众的要求，反而以党支部书记身份威胁群众，企图报复。

苏维埃政府为了给韩金锋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焚烧自己家里的文约和地契。韩金锋不但不执行，还蛮横地扬言说：

“谁敢在我头上动手，就走着瞧吧！”同时，他勾结参加过红枪会的村赤卫队长韩建义，与苏维埃作对。韩建义公然向国民党军队营长刘居彦暗送情报，将县委、团县委以及各村苏维埃、农民赤卫队的情况一一不漏地报告给敌军。党组织和群众发觉后，决定除掉这个恶棍。五月的一天中午，中共华县县委和第四区委在堡子底三教堂前召开群众大会，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区委书记李成栋忽然大喊了一声：“韩建义来了没有？”韩建义站起来说：“来了！”他的话音没落，早有两个人事先布置在他旁边的赤卫队员将他结结实实地绑了。接着，李成栋大声宣布了韩建义的罪行，在群众一片喊杀声中，东王村农民赤卫队队长王春龙一刀劈了韩建义。会后，何家村一个绰号叫疯子喜的农民发觉韩建义还未死去，又补了几刀。

处死韩建义，韩金铎依然我行我素，执迷不悟。六月十日，敌骑兵师田金凯来犯，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为救魏家原之危，赶回堡子村，敲响大钟，命令各村赤卫队和群众迅速赶到魏家原增援部队，韩金铎竟然拒不执行。后来，县委又要求他跟随陕东赤卫队行动。韩金铎继续拖延，抗命不遵。六月十二日，中共华县县委在堡子底三教堂召开东阳一带群众大会，将韩金铎逮捕，当场处死。

革命队伍里的坏分子韩建义、韩金铎被处决后，深深教育了广大群众，在之后短短几天时间里，出现了一个积极报名参加苏维埃、参加赤卫队的高潮。李木村土豪李兆贤看见连不守法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和赤卫队长都被砍了头，又惊又怕，立即拿出一大碗大烟土，到苏维埃政府伏地请罪，苏维埃与群众商量后，认为李兆贤恶迹不多，民愤不大，且有悔罪表现，决定免于抄家……

陕东大地，成千上万脖子上挂着红带子的农民集合在苏维埃的旗帜下，他们似乎已经感到，祖祖辈辈延续下来的那个遥远的梦正在自己眼前实现。苏维埃——农民终于有了自己的政府。这就是希望。

杨窑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姚郭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王稔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三张村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桥南镇苏维埃政府成立了……

渭华原上，岩浆在奔突……

暴动！暴动！三秦响彻惊雷

一九二八年五月前后，为了配合渭华起义，在陕西省委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在陕西境内组织了旬邑、礼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县的农民武装起义。

其实就在省委决定渭华起义的前夕，麟游县已经发生过一次短暂的武装起义了。起义的领导人就是后来在渭华起义中担任工农革命军参谋长的王泰吉，当时王泰吉在原国民二军甄寿珊部教导团一营当营长。大革命失败后，冯玉祥“清党”，党组织将从武汉回到西安的一些共产党员也转入尚未清党的甄部，不久教导团成立了党的支部，王泰吉任书记，共产党员刘清和、魏书林、赵希和分别任一营一、二、三中队队长。一九二八年三月，甄寿珊率部去陇县围剿吴山的王友邦股匪，将教导团迁驻他的家乡麟游县城。恰在这时，王泰吉接到省委关于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立即召集全营八名党员开会传达，决定连夜发动教导团一营一中队举行起义。当时，教导团一营一中队只有五十多人，其他中队都是空架子。为了保证起义顺利进行，王泰吉命人把思想保守的第三分队队长叫到营部捆绑起来，嘴里塞块手帕，留在原地；又将思想反动的二分队分队长李柏荣叫到营部，由王泰吉和他谈话。王泰吉对他说：“我们准备起义，你准备咋办？”李柏荣说：“我们就这么点人，成不了事。”王泰吉说：“不在人多人少，关键在决心大不大。”李柏荣说：“不能干。”王泰吉问：“要干呢？”李柏荣说：“你们要干你们干，我不干。”说着就往外走。王泰吉向屋里的几个兵摆了一下手，李柏荣的一只脚刚跨出门坎，就被那几个战士从后面勒死了。

起义于当晚举行。刘和清集合起一中队共五六十人，王泰吉宣布了起义命令，就率领队伍离开了麟游县城，向礼泉县南坊镇方向急进。

起义队伍急行百余里，在礼泉南坊镇一个庙里休息时，被地方民团围攻，有的被迫缴械，有的跑散，起义遂告失败。王泰吉只身回到西安后，被省委派往陕东，准备组织渭华暴动。

这是陕西党领导的武装的微弱一搏。

四月下旬，省委确定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为陕东暴动区的同时，指示关中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以配合渭华暴动。中共三原县委根据省委指示精神和三原县群众斗争的实际情况决定，以武字区为中心，发动农民举行“交农”（关中农民的传统斗争方式，即将农具耕牛交给官府，意为不再种田务农，称为“交农”——笔者注）围城斗争，并派农民游击队指挥黄子文等到武字区具体组织和领导。

四月二十四日黎明，一阵排山倒海的口号声响彻在武字区的上空：

天不下雨，天逼民反；
苛捐杂税，官逼民反；
百姓不反，离死不远；
倘若造反，或者可免；
各地联合，一律造反，
铲除豪绅，实行共产……

成千上万的“交农”群众在陵后庙集中后，扛着杈把、扫帚、梭镖，一路上反复高喊着口号向县城进发。走到楼底村后又与心字区、军字区、力字

区以及富平石桥等地的“交农”大军会合，浩浩荡荡涌向县城。中午时分，两三万“交农”群众将县城团团围定。心字区、武字区及军字区的群众围攻北门和西门；同字区、力字区及富平石桥的群众围攻东门和南门。各城门附近人山人海。“打倒贪官污吏！”“免除苛捐杂税！”的口号震耳欲聋。县城附近的百姓给围城“交农”群众送水送馍，支援围城斗争。县长马润昌惊恐万分，紧闭城门，增派军队严加把守。翌日，围城群众增加到三万多人，他们将带来的权把、扫帚等农具放到城门洞里焚烧示威。与此同时，围城群众派出代表与县府进行谈判。四月二十六

日，县长马润昌被迫答应当年全年粮款全免。为了不受欺骗，围城斗争继续到二十七日县府贴出免除粮款的告示后才停止。

渭华起义爆发后，根据省委指示，中共三原县委决定武装围攻三原县城，配合渭华暴动。为此，成立了以黄子文为总指挥的武装围城指挥部，联络地方武装胡景铨、马仙舟一起行动，共同商定了围城方案。五月三日，正式武装围城。胡景铨部党谢芳团长率四个连的兵力从富平出发，经石桥到武字区的大寨堡，与黄子文接头后，星夜南下，到达三原南城东梢门外；此时，杨致中率领的游击大队和武字区农民武装也赶到三原西城门外。黄子文的指挥部设在城西申家堡。天亮后，攻城开始。由于三原驻军马鸿宾部已有防备，攻城未克。在准备进一步攻城时，不料马仙舟叛变，缴了武字区游击大队的枪支，扣押了黄子文、雷展如等，武装围城遂告失败。

四月二十六日，中共泾阳县委发动“交农”围城起义。这天天刚亮，各乡起义农民约万人，在“交农”起义总指挥张焕文、副总指挥雷志学率领下，手持权把、扫帚、大刀、长矛，由四面八方方向泾阳县城进发。沿途农民纷纷加入，队伍越走越长。西北乡农民途经石桥时，放火烧了烟膏局的账簿，赶走了教堂的神父。下午三时左右，起义大军汇集汉堤洞。总指挥张焕文在围城农民大会上讲了话，号召各地农民团结起来，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宣布了攻县城行动计划和进城后的纪律。会后，“交农”大军由雷志学率领出发，高呼着口号，直逼县城。

傍晚，起义军包围了县城。是夜，泾阳县长杨增润带几个绅士登上城墙，向起义群众喊话，拖延时间。起义农民主力从西南角发起攻城，但由于指挥不当，加之原先联络的马仙舟叛变，终未破城。

二十七日黎明，陕西省府急调三原驻军马鸿宾部骑兵连赶来镇压，农民起义指挥部下令撤退，围城斗争失败。

由此，泾阳党团区委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批党、团员被迫转移到外地工作。五月三日，礼泉县数千农民在共产党员秋步月领导下，以“交农”方式包围了县城，高呼“免粮免款度荒年”等口号，连续围城两天。

五月九日，淳化县数百群众在共产党员田望秀领导下，攻占了淳化县城，并在田望秀主持下成立了淳化县苏维埃政府，推举赵新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

起义农民坚持守城一个多月。

六月三十日拂晓，田金凯部骑兵团长过梦成纠集淳化县长石翊、保安队长张含宪及起义队伍中内奸杜思聪等七八百人，包围了淳化县城。守城军民在田望秀、赵新三指挥下，英勇抗击，终因兵力悬殊而不敌，田望秀在突围时壮烈牺牲；赵新三被敌人逮捕后锁入木笼，七月六日被杀害于淳化县城。

五月六日，爆发了大革命失败后，被称为陕西三大起义之一的旬邑起义

(另外两个是清涧起义和渭华起义)。

年初，旬邑党组织即根据陕西省委发出的“开展游击战争，由部分暴动过渡到全陕西的总暴动”的通告，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五月六日，共产党员许才升来到群众基础较好的郝村，用“鸡毛传帖”的方式，召集了清水源各村群众一百四十多人，以抗粮“交农”为口号，发动了起义。当日晚就地处决了恶绅程茂育和省催粮委员，然后手持各种农具和大刀长矛，连夜向旬邑县城进发。沿途，起义队伍增至四百多人，由于旬邑城防空虚，五月七日拂晓，起义农民顺利攻入县城。起义农民进城后，攻占了县政府，杀死县长李克选及其他几个民愤大的职员和官差，打开监狱，救出关押的共产党员，开仓放粮，集会演说。一向冷冷清清的旬邑县城霎时间闹得红红火火。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起义队伍在县城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旬邑县临时苏维埃政府，把参加起义的群众改编为三个连，称苏维埃红军渭北支队。推举许才升为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程永盛任红军总指挥，吕佑乾任中心支部书记。在陕西的革命斗争历史上，这是第一支以“红军”命名的武装。

县苏维埃成立以后，为了扩大起义成果，许才升等带领武装人员分散在县城周围和村镇，进行打土豪斗争，贫苦农民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土豪劣绅纷纷闻风逃窜。起义烈火很快就由南原燃遍全县，并波及到邻县的彬县、永寿以至甘肃的宁县、灵台等地。

国民党反动派对旬邑县“赤祸”非常惊慌，敌彬乾区行政长官刘必达一方面指使逃到彬县的劣绅暗中收买起义队伍中的败类，一方面派李焕章代理旬邑县长，率领民团围攻县城。五月三十日拂晓，被敌人收买的内奸刘兴汉、程振西、郭金科、连怀印等人在县城发动叛乱，逮捕了起义领导人吕佑乾、吕凤岐等人，接着，刘兴汉等人又到张家村，将许才升逮捕。五月三十一日，敌人将吕佑乾、许才升、吕凤岐、程永盛、王浪波、程国柱、王廷碧等七位领导人押到张洪镇杀害。

旬邑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起义军余部却在共产党员程百印的率领下，成立了旬邑游击队，钻进了山区，开始了更加艰苦的斗争。

在暴动的一九二八年五月，三秦大地上，还有以下值得纪念的日子：

十六日，李艮等人在咸阳马家寨举行暴动，杀死豪绅地主，烧了契约账簿。

十八日，在党的武装暴动政策影响下，永寿县农民自发地组织了有五千人参加的抗粮“交农”围城斗争。

二十六日，在东府特委领导下，爆发了以澄城为主、并有大荔、朝邑、蒲城等县农民参加的澄城起义。起义农民联合当地红枪会，共有五六千之众，坚持斗争四十多天，驱逐了反动地主武装赵桂堂……

胜利虽然短暂，但黯淡的岁月里毕竟辉煌过一次了。

流血，断头，寻常得如同赶集。

西安。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凌晨。

一夜大雨之后，天气凉爽了下来。

时候还早，路上没有行人。东羊市一家杂货铺的门开启了，从里面陆续走出了一些看去有些文雅的“先生”，他们表情似乎一样的严峻。“先生们”走下台阶，踩着或深或浅的积水，走出东羊市，然后，消失在一条条街道里。

路口的警察懒洋洋地打量一下他们，然后，无聊地掏出枪来，退出一粒

子弹，拿在手里，漫不经心地头发上摩擦着。

警察当然不会得知，刚刚与他擦肩而过的那个人正是他要抓的共产党的“大头头”，他或者是潘自力，或者是李子洲，或者是蒲克敏，或者是杜衡。

他同样不会得知，这些共产党人刚刚举行完陕西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还会不断给他们制造麻烦的《全陕总暴动决议案》。

在那些带有书生气的共产党人的眼中，陕西眼下正处在一个火山口上。虽然三原失败了，泾阳失败了，礼泉失败了，淳化失败了……但是，渭华地区已经烧成了燎原大火。

旬邑的斗争也还在继续……

东边不亮西边亮，全陕总暴动并没有失去机会……

只要有胜利的可能，就要暴动。

第四章 壮哉许旅

三要司——秦岭腹地的一块热土

三要司——一个群山环抱中的小山镇，东临豫西山区，北靠秦岭，闭塞的交通留住了这个洛南小镇的恬静与秀美，同时，也将一份贫穷毫不吝啬地付于了它。

土匪和官差并没有遗忘这块美丽而贫穷的土地，你走了，他来了，把地里的出产拿走了，把艰难的日子留下了。

三要司一代一代的百姓们到南河边的小庙里去请签，虔诚而执着，这是他们漫长苦难岁月里的唯一慰藉。他们的香火有时会换来一线遥远的安慰：忍辱今生，修造来世。在摸到上上签的那天夜里，他们会安稳地睡上一觉，来日，又像以往的日子一样，木然地走向贫瘠的大山，种瓜点豆，犁耙耕耨，收获微茫的希望。

山里人的生活，像没有涟漪的死水。

三要司也有令人振奋的时候。据说李闯王当年败退商洛山时，曾向三要司发过一支队伍，领头的是员女将，义军杀了三要街上的两个恶霸，开了仓，放了粮。时至今日，李闯王的传说成了挂在老爷爷白胡子上的故事。在不能上山下地的雨天，李闯王的故事像醇美的配茶，暖和着山里人的心，搅动着血管里的血。短暂的激动过后，一切又都是老样子。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要司又红火了一阵。

阴历腊月二十四，从西边开过来一支穿着灰衣服的队伍，在三要司驻下了。看穿戴，和冯玉祥、冯子明的队伍没有两样，听三要街上的先生们说，这支队伍叫“许旅”。“许旅”一来，老百姓就感觉出他们和以往来的队伍不一样，没有随便卸门板的，没有抓鸡娃子的，夜里过队伍连脚步声也听不见。“许旅”的司令部安在“广阔祥”药铺里，许旅长在郭以训的厦房住下以后，就骑着一匹黑马来到了街上，碰到几个晒太阳的老汉，许旅长翻身下马，走过去，先叫了声老人家，然后掏出一包纸烟，一个人一个人地散。发完了烟，就地坐下来，说：“我想向老人们打听个事，你们要照直说。”

老汉们点点头。

许旅长又问：“我们队伍来到三要司后，有没有在老百姓跟前乱拉乱抢耍威风的？”

“没有。”一个老汉说。

“一个也没有？”许旅长又问。

“没有。”另一个老汉说，“听说住在南街上的两个兵不小心把梁瘸子家的瓦缸打了，还赔了一个新的，乡亲们夸嘿！”

许旅长说：“我们是穷人自己的队伍，穷人的队伍哪能祸害老百姓。遇到祸害老百姓的事情我们决不手软。”说着，他给自己点上一支烟，问，“前天，恋庄街上的事情你们听说了没有？”

“听说了，”一个老汉抢着说道，“你们部队在恋庄街一次就枪毙了五个违犯纪律的，听说里头不光是兵，还有当官的哪。”

“这两天镇上都传遍了。”老汉们七嘴八舌地说起来，“天下真有这样的队伍，李闯王的队伍只听说过，没见过，今天我们亲眼看见了仁义之师。”

“许旅长，除了整治纪律，鱼肉乡里的恶霸你们治不治？”一个胆子大

的老汉插进来问。

许旅长笑笑，说：“当然治。”又严肃起来问，“你们说，三要司的首恶是哪个？”

几个老汉面面相觑，支吾起来。

许旅长又笑笑，说：“我知道你们害怕不敢说，那就我来说，你们看对不对。”许旅长稍一思忖，说，“何连玉的儿子何豹子？”

老汉们一怔，眼睛里露出惊异的目光。

许旅长：“还有个民愤很大的绅士罗云秀，对不对？”

老汉们不再害怕了，抓住许旅长的手说：“长官，你啥都知道了！”

许旅长从地上站起来，对老汉们说：“有祸害老百姓的，不管是队伍里的，还是地方上的，你们只管来找我，我叫许权中。”说罢，上了马，只身单骑，向镇外的村子走去。

许旅来到三要司的第三大，就在南河滩上杀了恶霸何豹子，分了他家的财物和粮食，接着又处决了绅士罗云秀和土匪丁克盛。之后，派了许多穿便衣的兵士分别到高耀、兰草河、鸡头关等地，了解民情，一户一户地联络，发动群众，不久，农民运动在三要司周围一带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许多村子成立了农民协会，杀土豪，斗恶霸，山里人第一次在蓝天下直起了腰板。

许旅是这些扬眉吐气的庄稼人身后的靠山。

但是最近几天，传说许旅就要开拔了。当兵的把借用的水缸、背篓、驴车纷纷归还给老百姓。部队要开到哪里去，没有人知道。

人们打听看。

一天下午吃饭的时候，十一岁的董悦贤用瓦罐提了一只炖好的老母鸡，来到了街上郭以训的院子。山里天短，屋里都点上了灯，他看见厦屋的窗纸上，映着一个不住地走来走去的人影。门口的哨兵告诉他，那就是许旅长。哨兵敲敲门，先走了进去，然后转身出来，把孩子领进了屋子。

其实，董悦贤认识许旅长。队伍刚住进三要司后，董悦贤他妈做了双鞋，叫他拿到街上卖，一个战士过来要买，他不肯卖，吓得就跑，让许旅长看到了，拦住他问，你这鞋既是要卖，为啥人家买时你又跑。董悦贤支吾半天说，他妈说不让卖给当兵的。许旅长哈哈笑了起来，说也难怪，你妈叫当兵的坑怕了，我们跟别的当兵的不一样。董悦贤看着这个当官的，将信将疑。这时候许旅长拍拍他的头，指着那个要买鞋的兵说，我劝你还是把鞋卖给他。说罢朝他笑笑，带着卫兵走了。董悦贤问当兵的刚才那人是谁。当兵的说是许旅长。又问旅长是多大的官。回答说三要司所有的人马都归他管。董悦贤伸舌头说，看不出来，以前来个小班长三要司也要鸡叫狗跳地折腾半天。战士笑了笑，指着他手里的鞋问他多少钱，他说三十个大板，战士把他领到驻地，让他吃了饭，又给了他三十个大板买了鞋。董悦贤一回来就说他见过许旅的大官了，并把卖鞋的经过说了一遍，“许旅有个好旅长”一下子在三要司传开了。

许旅长也觉得进来的孩子眼熟，迎上去，很和气地问：“小鬼，有事吗？”

董悦贤说：“我妈让我给许旅长送鸡。”说着把罐子放到了桌子上。

许旅长走过去揭开罐盖，把鼻子凑上去闻了闻，说：“好香呀，还放了香菇哪！”

孩子很高兴，说：“我妈说，你常熬夜，山里天寒，让你补一补。”

许旅长摇摇头，说：“可是这鸡我不能吃。”

孩子急了：“为啥？”

许旅长：“我们有纪律，当兵的违犯了纪律要受处分，我这个当官的咋能带头破坏纪律呢。”

“这是我们自愿送的，又不是你摊派的。乡亲们都说，世上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专跟财东作对，专为穷人撑腰。可是几个月里，许旅长在三要司没有吃过我们一顿饭，喝过一口水，我妈说，你们就要走了，今天这鸡送不到我妈不让我回去。”孩子涨红着脸说。

许旅长笑笑，摸摸董悦贤的头，说：“好，这鸡我收下。代我谢谢你妈妈。”又回头唤出勤务兵，让拿出五十个大板给了董悦贤。

董悦贤捧着五十个大板，看着许旅长，不知说什么好。半天，他才挤出一句：“许旅长，街上都在传说，你们要走了，我大我妈让我问问你，是不是真的？”

许旅长一怔，神情随即严肃起来，说：“当兵打仗，没有钉在一个地方的。”说着，将目光落在了桌上的地图上。

“你们往哪去？走得远不远？”孩子小声问。

许旅长的双眉皱了起来，看看窗子外面已经黑严了的天，拍拍董悦贤的头，避开孩子的话题，说：“天黑严了，快回家吧，看大人着急。”

勤务兵刚送走董悦贤，副官主任就拿着一封快信进了屋子。

许权中从副官主任手中接过快信，匆匆看了一眼，双眉立即蹙了起来：

许旅长权中兄见字如面：

前次快信想已早到帐下，至今未见复函，不知何故。樊钟秀在豫境已与冯交火，宋哲元被冯调往洛阳击樊未归，西安眼下空虚，此时图陕机会甚好，望兄如期开赴潼关，共图大计，恳望勿延。切切。

李虎臣

许权中看罢，把信团了，扔在地上，站在窗前，望着屋外的黑暗出神。

“旅长，送信的说，李司令要他把你的回信带回去。”副官主任提醒说。

许权中一怔，想了想，对副官主任说：“让送信的先住下，回信明天再说。”

“是！”

“你等一下。”副官主任报告完正要往外走的时候，许权中叫住了他，指着桌上的罐子对他说：“麻烦你把这罐子鸡汤给刘景桂送去，他最近一直闹病。”

副官主任提着罐子走出去以后，许权中关了灯，坐在竹椅子上，点上一支烟，狠狠吸了一口，这时，另一个声音立刻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耳边：

权中同志并转旅委及全体同志：

陕西省委负责同志来，得知你们的近况，中央对于你们今后的工作有下列指示：

（一）关于党的一般军运的原则与策略，现在节录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央致朱德同志信的几段，你们详细阅读，即可明了。

（二）根据这些原则与策略及你们的特殊情形，你们现在应注意与执行者有下列几点：

1. 你们现在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的不是你们

的出路，现在是革命与反革命争斗到了生死关头的时期，陕西的军队无论他是冯玉祥、岳维峻或李虎臣以及一切一切的杂色军队，都是反革命的……从今日起，必须下决心的脱离，若是犹豫妥协，终会要彼他们解决的。

2. 目前要做的工作，第一，肃清内部，一要军官尽量换成我们的同志，有反动倾向的，应不姑息地解决之。第二，发展组织……第三，扩充军队，你们现有一千八百支枪，至少可扩充到二千五百多人……

3. 你们脱离李虎臣之后的出路，现驻地三要司农民运动及党的力量都没有基础，又在敌人四方包围之中，恐不能久驻。据我们现在想到的，你们的出路：第一，开赴陕中农运与党比较有基础的地方，去帮助农民并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可以形成一割据的局面。第二，开赴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第三，开赴鄂北，预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哪条路，要看动作时的实际环境来决定——由陕西省委决定……

中央

这封信是省委书记潘自力从上海返回时，中央托他带来的。在近来十几天的时间里，这封信许权中已不知看过多少遍，他一闭上眼睛，那些指示明确的文字便带着一种不可违抗的权威力量出现在他的眼前。

中央的指示很明确：立即脱离李虎臣。至于脱离李虎臣之后的三种出路，中央也明确指示：或陕中，或豫西，或鄂北，由省委决定。

省委的指示也十分明确。继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赴三要司，传达省委、特委“配合渭华暴动”的指示之后，离沪返陕的潘自力在向许旅传达中央指示的同时，也亲笔致函许权中，要求许旅开往渭华地区，配合农民起义。

本来，执行省委指示，应该十分顺利。

然而就在此时，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件。一是李虎臣截获了陕西省委指示许旅配合渭华起义的信件，尽管其信疑参半，但还是靠近许旅移驻了嫡系部队，加紧了对许旅的防范。二是此时反冯战争已经爆发，继河南地方军阀樊钟秀、陈文举举兵反冯之后，陕西军阀也加紧了反冯。李虎臣乘冯部主力宋哲元部到洛阳打樊钟秀未回，陕西后方空虚之际，扯旗公开反冯。其具体部署是：驻户县的何经纬旅围攻西安，李虎臣亲率四个旅赴沛关截击冯玉祥回陕主力。许权中旅就是这四个旅中的一个。

李虎臣几番来信催促许旅开拔，在这个时候，特别是在李虎臣对许权中已有所警惕的情况下，行动上稍有不慎，都可能葬送党在陕西好不容易保存下来的这支军队。

到潼关，还是到渭华？一个是许权中所依附的“上司”的命令，一个是党的省委的指示。

李虎臣军令急迫，渭华原上形势急迫，两方面都不允许他有更多的犹豫。许权中陷入了两难境地，他举棋不定。

不是为自己，是为了这支军队。许旅走到今天，经历了多少坎坷。从中央来信中，他可以感到中央对这支党掌握的部队所寄予的希望。清涧起义，陕北的李象九旅打完了，如今，党在陕西只剩下这唯一的一个旅了。

许旅决不能蹈李旅覆辙！

许权中又续上一支烟，黑暗中，灯火明灭，照着他的显得沉重的脸。

许权中透过茫茫夜幕，仿佛看见了从血雨腥风中走到今天的自己的弟兄

们.....

许权中旅三次“找主求生”

许权中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二七年七月底那个风雨肆虐的黑夜。

在临潼交口镇山东庄的一座农舍里，许权中望着屋外被闪电不断照出的惨白，陷入了深深的愧悔之中。他不知道在这风雨交加的夜晚里，史可轩带着朝夕相处的弟兄们栖身何处。

这种愧悔之情在他离开部队回到家里的那天起，就像一根绳子一样，死死缠住了他。他不该在部队面临着艰难抉择的时候离开他。当然，他曾与史可轩在部队去向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史可轩主张到美原镇国民二军田生春部暂时落脚，许权中则主张坚持去陕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但这能成为自己离开部队的理由吗？回家的这些日子，这位昔日战场上的骁将常陷于不能自拔的自问自审中。

也许，应该再回到自己的部队去，和史可轩一起，把这支处于危境中的队伍带到一个便于发展的地方。许权中曾经动过这样的念头，但他没有能迈出那一步，他善于自审自责，却怯于人前低头。于是，他在交口老家的日子度日如年。

在那个风雨大作的夜里，许权中拿出一本当年在韶关云南讲武堂用过的《孙子兵法》，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

不知什么时候，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他放下书，走过去开了门，一个浑身湿得精透的军人站在他的面前。

“高文敏！”许权中高兴地喊着，紧紧抓住了军人的手。

高文敏（即高克林）是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组织科长。几天不见，消瘦了许多，加上满身泥水，更显得狼狈不堪。许权中赶忙给他倒上一杯热水，又拿出一身干净衣服让他换。可是高文敏只是呆坐着，不动弹不吭声。

许权中急于知道自己离开后部队的情况，便问高文敏：“现在部队到了什么地方了？”

高文敏有些沮丧地说：“从美原镇又撤回到了栎阳镇，现正在向临潼方向返回。”

许权中一愣：“怎么？史可轩同志没有去找田生春？”

高文敏垂着头说：“史校长在美原镇被田生春杀害了。”

“你说啥？”许权中顿时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惊呆了，他抓着高文敏的胳膊，连连追问道，“你说啥？你说史校长怎么了？”

高文敏说：“他牺牲了，唉，他太相信他那个老朋友田生春了，他太大意了。”接着，他向许权中详细介绍了史可轩在美原镇被害的经过。

许权中听着，流下两行情泪，热血在胸中不住地翻滚着。他没有想到陕中一代名将竟是如此结局。

“下一步部队打算怎么办？”听罢高文敏讲述，许权中间。

高文敏说：“可轩死后，队伍一下子没了主心骨，不知道咋办，我们几个党员干部开会商量，要我来找你，想请你回去，领着弟兄们干。”

许权中擦了擦眼睛，把桌子一拍：“走！”

在家住了不到一个礼拜的许权中又回到了部队，他被推举为总指挥，负起了指挥这支军队的重任。

部队往哪里去？仍是摆在许权中面前的首要问题。

陕甘区委曾经指示这支部队“找主求生，保存革命的有生力量”。眼下，

部队处于冯玉祥、冯子明、岳西峰、甄寿山等大小军阀的重重包围之中，谁都想吃掉这块“肥肉”，到底依赖哪个才能有利于部队“求生”呢？许权中经过冷静分析，认为陕西地方军阀、

国民二军冯子明部与冯玉祥素有矛盾，决定利用这一矛盾，接受冯子明部的改编。冯子明也想趁机扩大势力，改编事宜一谈即成，许权中部被编为暂编第三旅，驻临潼关山镇。

不久，冯玉祥为了巩固他在西北的大后方，清除异己，再次强令陕西各路小军阀由岳西峰、李虎臣统率，到南阳（襄阳、樊城）一带整训。旅党委决定，趁军阀调动之机，将部队带到陕北建立革命根据地，彻底脱离冯子明。恰在此时，省委接到中央指示，要许旅将计就计，随岳西峰、冯子明、李虎臣等陕西国民第二军乘机开赴鄂、豫、川、陕结合部，配合地方党发动群众，举行起义，建立边区苏维埃政权。旅党委服从中央命令，随冯子明部南渡渭河到蓝田。

不料此时，冯子明却奉冯玉祥、石敬亭之命，欲以“共产党”罪“收拾”许旅，并派赵杰三旅和他的行营主任包园才监视许旅行动。因赵杰三与许权中有换帖之交，遂将此情况秘告了许权

中，引起了许权中的警惕。旧历十月初，冯子明终于向许旅动手

了。他指使蒋介石的密探、许旅参谋主任惠介如勾结参谋长韩威西、史宪章（史可轩的胞弟）等反动势力，策动许部的两个连长徐裴威和杨锡民举行暴乱，妄图杀害许权中等共产党员，破坏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孰不知杨锡民是许旅党组织派去专门监视惠

介如的，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许权中。许权中感到事情严

重，赶忙召开了旅党委会。当晚，以开会名义，把全旅连以上军官

召到了旅长办会室，当众下了惠介如的手枪，把他拖出房子枪毙

了。念及韩威西、史宪章与老领导史可轩的关系，将此二人缴械

后驱逐出部队。

这次事件后，许权中宣布脱离冯子明，率领部队向东移至商县黑龙口和渭南的厚子头一带。正在这时，又接到省委指示，说中央取消了在鄂、豫、川、陕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仍要许旅“找主求生”，设法保存实力，就地整训，听候党的新指示。

许旅此时靠近李虎臣，李虎臣与冯子明关系素恶，许权中便向李虎臣提出收编。李虎臣和许权中是临潼乡党，早年一起参加过于右任的靖国军，以后又同属国民二军，虽无深交，也有薄谊，便将许旅收编，番号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许权中被委以旅长。不久，许旅开到洛南三要司驻防。

先是田生春，继而冯子明，现在李虎臣。三次“找主求生”，哪一次没有危机？哪一次不是死里逃生？

眼下，又遇到了那个让人莫衷一是的老问题：部队往哪里去？

服从李虎臣，开到潼关去打冯玉祥？显然违背省委意图。

按照省委指示，立即赶到渭华地区？从三要司到渭华，非一半日之程，大部队稍一行动，立即会引起李虎臣的怀疑——其实，李虎臣早已有所怀疑。如果此时前往渭华，无异于授李以讨伐之名。

许权中举棋不定。

他不担心自己。他担心的是这支好不容易走到今天的军队。

许权中久久地坐在黑暗中。

鸡叫了。

他走出屋子，来到院子里，伸了伸腰，看看东边微白的天空。一夜的苦思，对于下一步部队行动的方向，他已有了腹案，天亮以后，他就召集旅党委会，讨论自己的意见。

许权中清楚自己的意见并不是一个完美的意见，非但不完美，还要冒着顶上“机会主义”帽子的危险。

但这是出于无奈。

他不知道自己的意见会不会被通过。想到这里，两个熟悉的面孔在他的眼前闪现了一下：粗壮的参谋长唐澍和清瘦的参谋主任刘志丹。他希望他们能在会上支持自己……

唐澍、刘志丹与许权中产生了分歧

刘志丹、唐澍都是在许权中最困难的时候来到三要司的。衔命来到三要司的不仅有刘志丹和唐澍，省委在着手准备全陕总暴动时，便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了许权中旅，陆续派来的党员干部还有谢子长、廉益民、吴浩然、王泰吉等人。

先到的是刘志丹。

刘志丹和许权中是老相识。他们都参加了一九二六年九月十七日的五原誓师。不过誓师当天才从广州辗转赶到五原的刘志丹那天无缘结识这位已战功赫赫的国民军联军将领。五原誓师后，刘志丹随联军总政治部南下，年长刘志丹九岁的许权中则以援陕军第三路司令员职挥师急赴西安，解嵩匪之围。西安解围之后，刘志丹才有缘与许权中见面。其时刘志丹担任了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组织科长，兼任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军事教官；许权中则是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卫队师代师长，同时也兼任了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在那些沸沸扬扬的日子里，他们在学校北面的红城广场上，曾有过令人难忘的竟夜长谈。许权中的侠义直率，刘志丹的机敏稳健，加上他们对革命的忠诚，使这两位年龄相差九岁的军人由彼此敬慕最终发展到友谊。冯玉祥“清党”后，刘志丹被集中到开封“受训”，而此时的许权中则同中山军事学校校长史可轩一道，率部开始了艰难的“找主求生”之路。二人从此断了联系。刘志丹在被冯玉祥“礼送出境”途中逃跑，在上海找到党中央之后，便成了中央和成立不久的陕西省委之间的联系人。第一个初中央九月七日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在全国各地普遍发动起义”精神带到陕西的人便是刘志丹。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底省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为了加强对许权中旅的领导，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陕大暴动，省委派刘志丹来到三要司。刘志丹一到部队就向许权中和旅党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抓紧兵运工作，通过党的领导，实行武装起义，配合农民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

对于刘志丹的到来，最高兴的莫过于旅长许权中。部队经过“三易其主”，思想有些混乱，更有些动机不纯的分子混杂其中，

常常制造事端。许权中虽早有觉察，无奈于寄人篱下，常有走钢丝之感，为了应付不测，他将主要精力用于军事训练上，无暇顾及及其他。刘志丹来到三要司后，即被许权中任命为旅参谋主任，并参加了旅党委的领导工作。

刘志丹走马上任，协助许权中整顿军队，首先肃清了部队内部的坏分子，撤换了几个不称职的指挥员，把最优秀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提拔为基层领导，经过彻底整顿，全旅面貌焕然一新。

之后，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准备在洛南及相邻的豫西卢氏县一带建立农村根据地。刘志丹又遵照旅党委的决定，带了十几个干部，分别化装成补锅的、磨刀磨剪子的、收买废铜烂铁的，到洛南、卢氏农村走家串户，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很快，在刘志丹走过的地方，村乡的农民协会的分会、总会成立起来了。在刘志丹等同志的发动下，农民协会在鸡头关处决了恶霸吕能俭、反动民团团长吕贤选，在马家坪处决了劣绅陈东昌、陈荣昌、陈衡胜，将

没收来的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千百年死寂如水的山村响起了欢庆的锣

鼓声。刘志丹也受到了洛南、卢氏一带老百姓的爱戴，“老刘”的名字不胫而走。直到前不久特委书记刘继曾到三要司来部署渭华暴动，刘志丹才被调回旅司令部。

今年二月底，清涧起义的两位主要领导人唐澍、谢子长奉省委之命，结伴来到了许权中旅。

那天下午，许权中正在司令部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指挥着战士们盖马厩，远远地看见从进山的路上来了两个人，一个骑驴，一个步行，骑驴的身量矮小，穿戴讲究，像个先生；步行的粗壮结实，像是脚夫。二人边走边问路，径朝司令部走来。

二人走近了，许权中听见骑驴的用一口浓重的陕北话向路边的一个战士打问：“乡党，司令部在哪达？”

战士警惕地看看骑驴的，又看看赶脚的，问：“你到司令部找哪个？”

“我找旅长。”骑驴的说。

战士又问：“旅长姓啥？”

“许，言午许。”骑驴的说。

“你……认识他？”战士往许权中这边看了一眼，又问。

“认识，我们是老朋友。”骑驴的笑着说。

许权中一怔，他在一旁仔细打量了一下骑驴的，觉着眼生，就走了过来。骑驴的并不知道走来的就是许旅长，还在接受战士的盘问，等许旅长走到跟前时，那个赶脚的却迎了上来：“权中，你躲到这世外桃源，让我好找！”

许权中朝那声音看去，顿时眼睛亮了起来：“原来是东园兄！没想到是你来了！”——唐澍也是老相识，他曾在国民军联军军事学校任主任教官，与许权中多有交往。

唐澍笑道：“你的眼睛只注意骑驴的，没看见赶脚的。”然后指着已经翻身下驴的“先生”向许权中介绍说，“你们大概还没见过面，这位是谢子长同志。”

许权中握住了谢子长的手，高兴地说：“欢迎欢迎！路上辛苦。”

唐澍说：“辛苦倒不算啥，麻烦的是一路上的那些卡子，多亏了我们这套行头。”他指指自己，又指指谢子长，说，“你看，我们这一主一仆还行吧？”

许权中点头笑道：“嗯，满像的。”

谢子长一旁笑道：“这一路我骑驴，他当差，委屈他了。”

唐澍摇着头说：“没有办法，子长长得精干，穿件大褂像个先生，我五大三粗的，只好扮个下苦力的脚夫。装成脚夫还不成，还得是个哑巴，我一口外省话，一张嘴就露馅，走不出西安，就会被宋哲元抓了去。从西安到三要司，一路上最难受的是不能说话，憋死人了！”

他们边说边笑，来到了司令部。碰巧刘志丹临时从农村回来，几个人在三要司相会，异常欣喜。唐澍、谢子长都是刘志丹的熟人。刘志丹和谢子长是榆林中学校友（不是一期），早就认识。一九二四年刘志丹在黄埔四期学习时，与刘志丹同岁的唐澍刚刚结束了在黄埔第一期步兵科的学业，留校工作，他们被编在了同一个党支部。黄埔岛上，共同的革命理想把两颗年轻的心紧紧地联在了一起……

到三要司后，唐澍的公开身份是旅参谋长，谢子长为二营副营长，二人均为旅党委委员。

至此，党在陕西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员都集中在了秦岭腹地三要司狭小的山谷里。

他们为一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集合在了一起。

当许权中踟躇于那个让人心烦的长夜的时候，刘志丹也是一夜未眠。

睡觉前喝了几口许权中送来的鸡汤，觉得身上好过了些。可临睡的时候又发起烧来。接着是一阵发热，一阵发冷，折腾了一夜，使十分虚弱的刘志丹看上去又明显地消瘦了一圈儿。

早晨一起床，他就接到通知，吃罢饭后，要开旅党委会议。昨天李虎臣派人送来的信，许权中让他看过，他知道今天的会议一定还是研究部队撤出三要司的问题。

就在他要出门的时候，唐澍走了进来。

“景桂，夜里又犯病了？看你脸黄的。”唐澍打量着刘志丹，关切地问。

“不要紧，好了些。”说着，刘志丹戴好了帽子，和唐澍一起，走出了屋子，向设在“广阔祥”药铺的司令部走去。

“你看今天能定下走的时间吗？”唐澍边走边问。

“看来不定也得定了，李虎臣一个劲地催着向潼关开拔，昨天派的人到现在还没走呢，今天总得拿出个说法来。”刘志丹说，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苦笑一下：“‘找主求生多，日子不好过。’”

“依我说，遵照省委的指示，立即开到渭华原上去。”唐澍说，他一直这样主张。

“看会上怎么定。”刘志丹说，从心里讲，他是赞成唐澍意见的。但在常委没有决定之前，他不愿多说什么。

像以往一样，许权中第一个来到了会议室。唐澍、刘志丹进屋的时候，他正趴在地图上看地图，他们进屋以后，他才从地图上抬起了头。

“景桂，病还不好？看你的脸已经瘦成瓦刀了！”许权中也注意到刘志丹的脸色不好，尽量轻松地说。

“没事，本来就瘦。”刘志丹笑着打哈哈。

说话间，另外几名旅党委委员杨晓初、谢子长、高文敏、廉益民、吴浩然等也陆续到齐了。

等大家落座以后，许权中开宗明义，对大家说：“今天开个临时旅党委会议，专门研究一下部队下一步的行动计划。”他停顿了一下，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在座的党委委员，又说，“现在我们再不能不动了，这两天，连老百姓都在议论我们开拔的事，我听到好多说法，有的说我们要开到河南卢氏去，有的说我们要开到潼关去，有的说我们要开到渭南去，有的还说我们要开到西安去

会场上发出了轻微的笑声和窃窃的议论声。

等安静下来以后，许权中又打趣说：“在这个沸沸扬扬的时候，我们已经不得不走了。”许权中的话又引来一阵笑声，他接着又说，“至于我们走到哪里去，则是我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请大家发表意见。”

会场立即安静下来，大家互相看看，坐得近的，就近小声交换着意见。

“听说李虎臣又在催我们去潼关？请旅长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形势先向同志们通报一下。”旅教导营教官、党委宣传委员吴浩然建议道。

“好！浩然同志提的建议很好，我先把眼下我们所处的局面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许权中说着，目光在摊放在地图上面的几份文件上瞄了一眼，

看着大家说，“现在我们处于两难境地，中央、省委、特委对我们有指示，我们名义上的顶头上司李虎臣对我们有命令。中央指示我们应脱离李虎臣，谋求独立发展，配合农民起义，具体行动由陕西省委决定；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的指示则十分明确，要求我们开赴渭华地区，配合那里的农民武装斗争，造成整个陕东地区武装起义的大局面。而李虎臣却命令我们开到潼关去打冯玉祥。”许权中用十分简练的语言将中央、省委、李虎臣对许旅的态度介绍得一清二楚。

“因此，现在我们面临着三种选择。”许权中最后说，“一、就地在三要司举行起义，省委曾指示过，必要时可先在三要司打出起义旗号，然后再向渭华方向会合；二、服从李虎臣，将部队开往潼关前线去打冯玉祥；三、立即开赴渭华地区，参加渭华起义。究竟到哪里去，现在提交党委会讨论，请同志们发表自己的意见。”

许权中讲完后，点上一支烟，狠狠吸进一口，等着大家发言。

“我认为，在三要司就地起义之案可以否定。”过了一会儿，刘志丹首先发言，“三要司地处秦岭之中，四面环山，周围又有李虎臣部队监视，就地起义，地利、人和皆不在我方，很可能有被消灭的危险。”

“我同意景桂同志的意见，秦岭是我们无法飞越的障碍，就地起义如果一旦被围，后果将不堪设想。”唐澍说。

“我也这样想。”许权中表示赞同的点头说。

党委很快排除了就地起义的可能。

“我认为，现在我们应该立即赶往渭华地区，参加起义。”在继续研究下步计划时，唐澍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因为，一、省委已有明确指示；二、宣化‘二·二九’事件之后，渭华地区已出现革命高潮，形成了陕东暴动区，已经普遍发动起来的渭华群众急需一支和他们并肩战斗的革命军队。”

“我同意唐澍同志的意见。”谢子长说，“我们也可以在走出秦岭后立即举行起义，再打着我们的旗号去与渭华暴动农民会合。”

“同意唐澍同志意见！”大家纷纷表示说。

许权中没有说话。

显然，他对唐澍的意见有保留。

会场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素有“易水壮士”之称的唐澍（唐澍是河北易县人，与古代易水豪歌壮别的刺客荆轲同籍）似乎也意识到了将会出现的分歧，他想在许权中发言之前对他施加影响，于是，他打破沉默说：“渭华地区的群众正在与土豪劣绅勇猛奋战，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和他们在一起。”说到这里，他显得有些激动，“去年我们发动清涧起义，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没有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省委批评我们是单纯军事主义，大家也知道，为此，我受到了省委的处分。清涧起义的教训我们应该记取。”说罢，他看了一眼一言不发的许权中。

刘志丹、高克林表示同意唐澍的意见。

杨晓初、廉益民、吴浩然也表示同意。

“权中同志的意见呢？”刘志丹问。

许权中没有想到常委会议会是这样的结果——也许他应该想到，省委将眼前在座的这些同志陆续送到三要司来，不就是为了组织暴动吗？而自己却

要把他们带到军阀混战的战场上去。但许权中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自己的想法可能更切合实际。他有些后悔，未能一开始就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此时，会上意见已经趋于一致，他要做的，是尽力扭转局面，他心里清楚，逆水行舟十分困难。

他准备尽可能准确地阐述自己的意见。

他看了看几乎已经统一了意见的旅党委委员们，平静地说：“我和同志们的看法大概有些距离。”

屋里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他的身上。

许权中掐掉了烟，缓缓地说：“我的意见是，暂时执行李虎臣的命令，把部队先开到潼关去。”

许权中这句话，又引起一阵议论声。

唐澍忍不住问道：“我想问权中同志一句，我们这支部队到底是党的还是李虎臣的？”

许权中怔了一下，但马上又平静下来。几个月的朝夕相处，他已摸透了这个容易冲动的河北易县人的脾气，因此对他的诘问，他并不介意。他故意避开了唐澍的问题，依然用不高的声音说：“我的意思是，面对我们周围的冯玉祥、冯子明、宋哲元、李虎臣这些大大小小的军阀，我们这一旅人马依然显得弱小。如果在眼下立即脱离李虎臣，宣布起义，将面临着极大的危险……”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直性子的唐澍打断了许权中的话说，“认为自己弱小，认为起义时机不成熟，这还是省委的老观点，是中央早就批评过的机会主义，其实现在整个陕西都已经处在火山口上了，就缺一个点火的了……”

许权中看着唐澍，嘴张了张，似乎想辩解什么。

唐澍停顿了一下，又补充上一句：“这话是中央的。”

“我也不太赞成权中同志的意见。”刘志丹说，他的声音很小，透着虚弱。他使劲啐了一下烟锅，慢慢吐出一股烟雾，说，“不能只是看到自己弱小，这种观点，实际上还是老省委‘我们羽毛尚未丰满，反冯尚非时机’的延续，这种观点在三月十八日中央的《陕西工作决议案》中已经进行了批评。”

“渭华地区的群众几乎在手无寸铁的情况下，不是一样闹起来了嘛！后来我们才派张汉俊同志带去了四十多支枪。”谢子长看着许权中说，“何况，我们旅现在已有两千多支枪呢。”

大家纷纷发言，都倾向立即开赴渭华，参加起义。

许权中认真地听着，一直没有说话。从唐澍、刘志丹发言开始，他已经预料到了眼前的局面。等大家几乎都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以后，他站了起来，诚恳地说：“中央的指示很正确，大家的意见也都没有错。”他稍稍停顿一下，像在斟酌字句，与往日相比，他显得有些拘谨，“但是我认为，办一切事情，我们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我并不是不主张赶到渭华去参加起义，大家知道，在李虎臣举兵反冯之前，我们一直在做配合渭华起义的准备。可是后来由于发生了反冯战争，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们不能……”一位同志要插话，被坐在旁边的刘志丹按住了。

许权中看了那个同志一眼，继续说：“当然，我不是说由于形势发生了变化就可以不执行省委决定。恰恰我认为，由于发生了反冯战争，为我们发动陕东起义乃至陕西全境的‘总暴动’提供了一个好机会。问题是看我们如

何抓住这个机会。”许权中恢复了往日固有的自信，分析道，“现在李虎臣联络原国民二军的陕西地方军阀，与冯玉祥刚刚打开了个头，如果我们现在就举旗造反，很可能他又和冯玉祥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我们，那将于我们十分不利。”

唐澍和刘志丹交换了一下目光，说：“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就将起义无限期地推迟。况且，渭华地区的群众已经起来了，现在每天都可能在流血。”

又是一阵议论。

许权中等屋里安静下来后说：“我理解东园同志的心情，我何尝不愿意早日投入起义。”他的声音忽然间大了起来，“但是，请注意，我们虽不能保证每一次起义都胜利，但胜利毕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如果说一开始就看不到胜利的可能，我们为什么要去追寻失败呢？别忘了，清涧起义失败后，党在陕西只剩下我们这一个旅了。”说到最后，他的声音又低沉下来。

屋里又出现了短暂的沉默。

许权中稳定一下情绪，在一片静默中准备结束自己的发言：“我的意见是，不如利用李虎臣调我们出山之机，先攻占潼关，将反冯战争挑起波澜，极力造成军阀混战、无暇顾我之局面，然后我们再寻机撤出潼关，回到渭华参加暴动。”

“我认为，权中同志的意见可以考虑。”许权中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旅党团委员会书记杨晓初说。

刘志丹用手捂着太阳穴，皱着眉头说：“权中的意见好是好，恐怕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万一军阀间大打不起来呢？万一我们部队上去了下不来咋办？”

“完全有这种可能。”唐澍支持说，“敌人不会完全听我们的。因此，我不主张开赴潼关，而是立即到渭华参加起义。”

“我也是这个意见。”刘志丹附和说。

“我也是。”唐澍的意见占了上风。

“我依然保留自己的意见。”许权中说，用不高但却不容更改的口气说，“我要为这支好不容易才保存下来的部队负责。同时，我希望同志们尊重作为一旅之长的指挥权。”

很明显，部队何去何从，许权中已经作出了决定。

“那省委的指示呢？”有人问。

“我这样做，同样是在对省委负责，胜利之后，我可以向省委作出解释。”许权中平静地说，“当然，如果因此而犯了错误，我愿意接受省委的处分。”

唐澍想了一下，说：“既然如此，我提个建议，我们一面向潼关缓行，一面再次请示省委，并将我们的分歧一并向省委报告。听候省委决定。”

大家表示同意。

“我也同意。”许权中说。

当天下午，许权中给李虎臣写了一封短信：

李司令勋鉴：

顷接手示。前番忙于肃整内部，至滞留于今。现已肃整完毕，无如绊腿意外，阖旅当于一两日内开往指示地点。特函奉闻，敬希明教。

许权中上

于五月四日午后

三要司——潼关——高塘，许权中步履艰难

关于许权中旅离开三要司的时间，一直众说纷坛。一九八三年春天，洛南县文化馆干部卫迪誉经过四次采访依照户日本，访遍了三要司周围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前推到一九二八年，六旬老人当初也仅有五六岁，才刚刚记事。卫迪誉用心良苦——笔者注），才查出了许旅离开三要司的准确时间。现将这位文化馆干部的调查报告摘录如下：

……结果在三要司街北小学附近一家姓李的老婆口中得到了一些证据。老婆说：“许旅是民国十七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晚月亮初升时离开三要司的。”我问：“你为啥记得那样清？”老人说：“娘家我父亲十九日过三周年，因我坐月子不得去，将献食蒸好，准备十八日下午叫我男人去。收拾好后还未走出门，发现军队来往忙碌，捆绑牲口驮子，送还借用的东西。我一想，军队要走，一定要拉夫，这一下不得出门了。我把我男人藏在楼上黑角里，用围一扣他睡在里面。当月亮刚升起能看见路的时候，就听不见来往军队走动的脚步声（原文如此，此处似应去掉“不”字——笔者注），宁悄夜静（原文如此——笔者注）。第二天清早一看，院子扫得干干净净，缸里水担得满满的，借用的东西放在原地，损失了的还给点钱。娘儿们互相诉说，从街上一打听，连一个差也没拉，还不知道军队朝哪个方向走了。人都说，从来没见过这样好、这样“礼行”的军队。不是我父亲三年，不是我坐月子，这件事我也记不清。”

一九二八年农历三月十八日即阳历五月七日。

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七日那个“月亮初升”的晚上，当许权中、唐澍、刘志丹等人率领着队伍，顺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出三要司的时候，几百里外的西安正在举行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研究许旅党委关于行动方案给省委的报告。会议由潘自力主持。李子洲首先发言，谈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被与会同志一致接受，在没有任何分歧意见的情况下，省委很快作出决定：许旅不参加攻打潼关的战争，应迅速起义，赴渭华地区配合当地农民武装斗争。

许权中旅行至靠近潼关的巡检司时，接到了省委的这一指示。

许权中、唐澍、刘志丹、杨晓初等紧急开会研究省委指示，意见趋于统一，认为应该执行省委指示。许权中又提出，眼下离潼关已近，李虎臣部队又近在左右，为了不暴露起义意图，应仍向潼关方向前进，然后再伺机脱离战场。为了表明对省委指示的态度，可先派营长雷天祥带领一个营前往渭华。

当晚，许旅就在巡检司兵分两路，主力由许权中、唐澍等率领，连夜赶往潼关，一个营在雷天祥带领下与主力分路，往渭华而去。

许旅赶到潼关前线时，被李虎臣置于潼关正南的十二连城（地名），担任正面主攻任务；两边侧翼，分别是王少猷旅和范子石旅，均为李虎臣嫡系；李虎臣在蒿岔峪口设下司令部督战。

从阵地配置不难看出，李虎臣对许旅有所防范。

其时，冯玉祥驻守潼关的军队是宁夏马鸿宾部。李虎臣兵临城下，大战迫在眉睫。两军交过几次火后，各有伤亡。由于许权中旅摆在正面战场，较之侧翼两旅，伤亡损失更大。而孤军驻守潼关的马鸿宾更感兵力不支，为了拖延时间，等候援兵，马鸿宾致信李虎臣，请求投降。李虎臣信以为真，命所部暂停攻打潼关，静候马鸿宾投降。

在此期间，唐澍曾向许权中提出，与其待在潼关为军阀混战充当炮灰，不如早日执行省委指示，赶赴渭华参加起义。许权中依然坚持暂时留在潼关前线的意见。

分歧依旧。唐澍、刘志丹心急加焚。

一天下午，许权中带着杨晓初到潼关城附近去侦察地形，唐澍望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一个计划在他心中产生了。

唐澍马上找来参谋主任刘志丹、旅军委书记高文敏，商量决定，趁许权中、杨晓初外出侦察地形之机，甩掉许、杨，立即组织部队哗变，奔赴渭华。

由于时间紧急来不及召开党委会议，只能紧急动员，分头行动。

关于许旅撤出潼关的具体情况，当年的过来人有过大同小异的记述。

原许旅军委书记、八十年代初任中顾委委员的高克林（即高文敏——著者注）这样回忆说：

……天还没黑，部队已开始向渭华方向移动。我和高致凯负责带教导营，当高致凯发现我们要甩掉许权中同志，直奔渭华，他就发生了动摇，脱离部队，带两个护兵去找许权中了。据说，他没找到许，就叛变投靠国民党军队去了。其他各营凡接到命令的都按照计划行动。行军两天，我们把分头带出来的队伍全部集中到华县瓜坡镇一带……

原许旅营特派员、解放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的周益三这样说：

……在与马鸿宾部的战斗中，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我方伤亡增多，我连也有一些战士受伤，前线战况出现了不利于我军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刘景桂通知我连晚上十二点撤出战斗，以后又接到推迟撤退的通知，当时我在党内担任着营特派员，还领导刘中向连。第二天晚上我们一道随刘景桂从前线拉了下来。经一夜急行军到达华县的瓜坡镇，群众已经在村外摆设了供桌，抬水让我们喝……当时部队从潼关向下撤退时动作不够一致，黑夜行军也有些混乱，因此直到瓜坡还有些同志陆续归队……

到达瓜坡镇那天是五月十日，许权中旅于是日正式宣布起义，参加农民暴动。

那天晚上真正感到危机的是旅长许权中。

他和杨晓初侦察地形回到驻地后，才发现人都走光了。他看了唐澍放在桌上的一张便条后，得知他们已经带着部队奔向渭华了。

望着空落落的军营，许权中痛苦万分。

他已经预料到了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当初，到潼关来，他有他的计划，他有他的打算，他在尽自己的努力实现那个计划。他寄希望于成功。成功是他最好的解释。

然而此时，已经没有那种可能了。

他失去了证明自己的条件。

但自己还是党的人。陷入痛苦中的许权中没有任何犹豫，跨镫上马，狠抽几鞭，带着杨晓初和仅剩的十几名马弃，朝渭华方向急驰追去。

追了一夜，他们终于在太阳出山的时候赶到瓜坡镇，与自己的部队会合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十六日的华县瓜坡镇，红旗飞舞，锣鼓震天。

在陕西革命斗争历史上，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站在一个高台上的刘志丹向挤得黑鸦鸦的军民大声宣布：“从现在起，我们陕西第一支正规的革命军队工农革命军诞生了！”

会场上顿时响起了如浪如潮的口号声：“打倒国民党！”“打倒土豪劣绅！”“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

口号声中，全旅官兵摘掉了国民党帽徽，脖子上戴上了标志起义的红带子……

在宣告许旅起义的同时，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的最高权力机构军事委员会。刘志丹被任命为军委主席，委员有刘志丹、唐澍、吴浩然、廉益民、谢子长、王泰吉、许权中、杨晓初、高文敏等。总司令唐澍，参谋长王泰吉，参谋主任高文敏，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工农革命军下辖四个大队，一个赤卫队（负责警卫工作），一个骑兵小队。一大队队长赵雅生，二大队队长谢子长，三大队队长武丕谟（虚设），四大队队长雷天祥，赤卫队长张汉泉。

许权中、杨晓初受到了严肃批评。

犯了错误的许权中任工农革命军总顾问兼骑兵小队（由他带来的十几个马弁组成）队长，杨晓初任财经委员。

新的军党委会中，没有原许旅党委成员许权中、杨晓初和高文敏。

之后，工农革命军在华县高塘镇高塘小学设立了司令部。

五月中旬的一天，中共陕东特委、华县县委在高塘镇召开一万多人参加的军民联欢大会，庆祝军民联合暴动，当场枪毙了三个劣绅。

那枪声，是向旧秩序宣战的檄文……

会后，在高塘小学大门外的墙上，醒目地出现了一幅白纸黑字的文告：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剥削穷人真是凶
加一放账驴打滚卖儿卖女还不清
如今穷人要翻身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齐干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部打倒我们要做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过上好光景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 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 唐澍

政治委员 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

许权中之谜

在工农革命军第二次党委会议上，通过了对许权中的处分决定：永远开除党籍。

已经不是党委委员的许权中没有参加那次会议。会后，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将处分决定告诉了他，许权中怔了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但他随即又坐了下去，没有说什么。

“当然，这个处分决定还要上报省委。”吴浩然告诉他。

他点点头，还是没有说什么。

吴浩然走了以后，许权中下意识地从小腹中抽出了枪，拿在手里轻轻摩挲了一会儿，又把枪塞进了枪套。走出了屋子。

那是一个沉闷的午后，浓云从上午就布满了天空，但一直没有下雨。许权中默默地站在司令部的院子里。地上一条醒目的大标语吸引着他，他出神地看着它，久久没有离去。那是用洁白的鹅卵石在院子中央嵌成的十五个大字：“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最后是三个有力的惊叹号，标语长约二十多米，透着一股气壮山河的气势。工农革命军司令部进驻高塘小学以后，这条标语就像一簇不熄的圣火，燃烧在许权中和他的战友们的心头。高塘小学自一九二七年七月起就是中共华县县委机关所在地，省委“九二六会议”之后，这里便成为华县群众革命斗争的前哨阵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共产党员、高塘小学校长李维俊和党员教师陈述善组织高塘、谷维两所小学的师生在高塘镇召开了悼念李大钊的大会，揭露反动派血腥镇压革命运动、迫害共产党人的罪行。会后，李维俊、陈述善率领两校师生到附近的涧峪河捡来洁白的鹅卵石，搬来青砖，在学校会议室前的院中央嵌下了这条悲壮的巨幅标语。此时许权中仁立于此，心潮滚滚……

他想到了李大钊。

几天前，当他带着杨晓初从潼关城下回到兵去营空的十二连城时，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在党内将要面临的处境，他知道自己将会受到处分，但他没料到会这样严重。

永远开除党籍——意味着什么？

理想已经成了永远不可及的高峰。

追求已经成了只能留在梦中的憧憬。

无法再归雁阵的孤鸿。

失去目标的盲箭。

在许权中看来，今后的一切，对于他来说已经失去了意义。

从吴浩然将党委决定告诉他的那一刻起，他就觉得过去的那个许权中正死在死去……

那个许权中从辛亥革命的烈火中走来，陕西靖国军的花名册上，有这个年轻的临潼人的名字，班长、中队长、副官、参谋、绘图科科长，那是他戎马生涯中最初的脚步。为了拼一腔热血，与腐败的旧中国厮杀，他告别了关中故乡，到韶关人云南讲武堂炮科学习。在此期间，他加入了共产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发动“北京政变”后，国民军胡景翼第二军被段祺瑞政府调往河南，倾向共产党的胡景翼将军通过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和刚刚成立的豫陕区党委王若飞，要求向该部输送干部，从一九二五年二月起，受李大钊、王若飞派遣，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源源不断地来到国民二军和河南省

——那是一个十分显赫的阵容：刘天章、张昆弟、李震瀛、李求实、李瑞香、邹钧、马文彦、杨晓初、侯友可、高克林、潘自力、史可轩等等，许权中便是这个长长的名单上的一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陕西日后的革命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仅在参加渭华暴动的许权中旅担任重要职务的就有许权中、杨晓初、高克林及在美原镇被田生春杀害的史可轩等）。许权中在国民二军先后担任过副营长、团长、旅长；西安解围后为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的史可轩则是郑州警备司令。国民二军在河南失败后，许权中率部驻防北京以南的涿州。在那个阴沉死气的初夏，刚过而立之年的许权中的生命曾有过辉煌的一闪。

也是暴动。

那是他指挥的第一次暴动。

那天晚上，许权中正坐在涿州官邪的灯下研读《孙子兵法》，卫兵进来说有人求见。许权中放下书，请客人进来。客人进屋后，许权中一眼认出是中共北方区委曾派往郑州京汉铁路工会工作的马文彦，立即迎了上去，高兴地问：“原来是你，从哪里来？”

“北京。”

“你咋到了北京？”

“河南兵败之后，在那边待不住，就来到了北京，住在咱陕西的朝邑会馆。”马文彦告诉他。

“你此次来涿州，是路过，还是公干？”许权中问。

“领一个大人物之命，专程来找你。”马文彦笑着说。

许权中的心跳了上下，问：“领谁之命？”

“李大钊先生。”

“哦，果然！”许权中轻轻叫了一声，有些激动。几天前，他曾派任警斋到北京向李大钊报告，说他有一个加大营要在吴佩孚北上途经涿州时举行起义，届时他准备带部队在火车站举行盛大欢迎会，趁机将吴打死。为防不测，请李大钊先生同驻张家口的国民军联系，请起义时予以策应。现在马文彦肯定为此事而来。

果然，马文彦说：“大钊先生让我告诉你，北方区委同意你们的意见，也已做好了国民军的工作。我来时大制先生再三嘱咐，此举关系重大，一要果断，二要缜密，要知道，党在此时能掌握一支部队不容易。”

“知道了。”许权中紧紧地握住马文彦的手说：“加大营已经做好起义准备，请你到保定，设法通过你在铁路上的关系，弄清吴佩孚北上确切日期，我们好行动。”

马文彦连夜赶往保定，通过京汉铁路工会关系，打听到吴佩孚已在保定下车，暂不北上，许权中的击吴计划落空。但在此时，起义计划已经暴露，危急中，许权中又策动了田维勤部马克斋两个团起义，把田维勤的部队拉走了一大半。田维勤恼羞成怒，会同奉军截击，由于李大钊早已通知国民一军策应，许权中部和两个团起义成功了。

涿州起义之后，许权中把队伍拉到了绥远一带。一九二六年冯玉祥从苏联回国，许权中率部参加了五原誓师，任援陕军第三路司令员，一九二七年一月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部委员兼卫队师旅长、代师长，后又兼任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总队长……

落雨了。

许权中依然站在那条标语前。他不知道失去了党籍之后的自己将如何走今后的路。

撤职他可以接受，批评他“军阀作风”、“机会主义”、“对抗省委指示”他都可以接受，甚至党内的其他处分他都可以接受。唯独这“永远开除党籍”，他接受不了。

永远，那是看不到尽头的路。

他将得不到证明自己的机会。

从三要司往潼关开拔的时候，许权中并不轻松，特别是在巡检司接到省委紧急指示以后，他的心头无时不在压着一块石头——很明显，他是拗上级指示而动的，他想到了纪律，但他同时也想到了行动的后果。在他心里，检验军事行动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结局：胜利或者失败。而检验军事胜负的标准则是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的程度。当他挥兵前往潼关的时候，他悬着一颗心，寄希望于结局。

现在，他不仅失去了指挥军队的权力，又永远失去了共产党员的称号。失去军队指挥权就失去了证明自己正确的机会，失去党员称号就失去了证明自己忠诚的机会。

人生之旅，许权中第一次感到了迷惘。

一只手扶到了他的肩上，他扭过了头，是刘志丹。

“进屋去吧，下雨了。”刘志丹关切地说。

“不，我再在这里待一待。”许权中说。

“小心着凉。”

“不，我心里正在着火。”许权中说，他看着地上的那副标语，喃喃着，“大钊同志走了一年多了，如果他在这里，多好。”

刘志丹默默地站了一会儿，说：“也许，对你的处分过分了一些，希望你能正确对待，当然，你也有权利向省委申诉。”

“不，我接受组织处分，我不申诉。”许权中说。

“当初，你太固执了，到了巡检司，你不应该再坚持自己的错误意见。”刘志丹诚恳地说。

“不……”许权中小声说了句什么，但他又立即打住了，他看看被雨水打湿了衣服的刘志丹，说“志丹同志，你身体还不好，快进屋去吧，小心淋着。”

“你呢？”

“我没事。”许权中脸上浮现出一种固有的坚毅，“我不会出事的，我会永远觉着自己在党里头！”

细雨沙沙，打在被“永远开除党籍”的许权中脸上……

许权中毕竟是个在革命斗争风浪中摔打出的汉子，他将痛苦嚼碎咽下之后，带着由十几个人十几匹马组成的骑兵小队，在渭华大地上书写从头开始的历史。

他没有向中共陕西省委申诉。

作为没有实权的工农革命军总顾问，他关注着渭华起义后战事的发展。他为这支诞生于渭华起义洪流里的西北第一支工农革命武装的命运担忧。

他希望它在斗争的风雨中一步步走向辉煌。

然而，他确实为它捏着一把汗。

生于斯长于斯的许权中也许比外乡人唐澍和陕北人刘志丹更了解将部队

置于靠近西（安）、潼（关）公路的高塘一带将意味着什么。作为从靖国军开始就一直在战场上厮杀的许权中以战略家的目光审视过，省委将武装起义的中心确定在南靠秦岭，北临渭河的狭小区域将会是什么后果。

也许，这正是许权中不愿将部队开赴高塘的真正原因。

但在中央已经批评了陕西党的机会主义，省委已经确定陕东作为中心暴动区以后，这显然是个无法言明的理由。因此，许权中便只能以“先开潼关，待挑起大规模军阀混战后再开渭华”为由（当然，也不排除这一因素——笔者注），在接到省委紧急通知后，不顾旅党委唐澍、刘志丹等人的反对，仍将部队开到潼关。

在对许权中的所有批评中，最有“分量”的莫过于由于许权中与李虎臣同属国民二军旧将，因此指责许将部队带到潼关是为了助李攻冯，为反动军阀充当炮灰；更有甚者，则说许权中将部队拉到潼关打冯玉祥只是为了自己能在李虎臣麾下当师长（因李虎臣曾以第九师师长职许许权中）。

其实，“身在曹营心在汉”的许权中此时正为部队的出路绞尽脑汁。为保存这支军队，在潼关前线的许权中曾有过一次十分隐秘的行动。这一行动无论在当时的许旅内部还是陕西省委，都鲜为人知。

参与过这次行动的碰巧仍是两年前奉李大钊之命到涿州去找许权中的马文彦。

建国后曾任西安市政协副主席的马文彦在一九八三年详细地回忆了他曾奉许权中旅长之命执行这一秘密使命的经过，现摘录如下：

一九二八夏，我在靠近临潼的炭渣小学教书，负责富平县党的工作。五月初，李虎臣联合了各路陕军，同时向西安和潼关发动进攻，欲断冯玉祥的退路。当时，由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也随李虎臣部一道攻潼关。正在这时，许旅有一个姓赵的排长到炭渣小学找我，说他是渭北人……许旅长托他给我捎话，如果潼关战况不好，就准备把部队带到渭北一带举行武装起义，叫我赶快调查和联络渭北一带的地方武装，准备迎接许旅开往渭北。

当时，富平和蒲城交界的东四联有一支民间武装，富平北边的文字七团也有不少枪，我们均进行了调查，并做了一些工作。然后，我迅速去三原武字区找黄子祥，他是黄子文的哥哥，也是我的同学，掌握着一部分武装……这天晚上，我将许旅准备开往渭北举行起义的事对他说了一遍，叫他提前做好迎接许旅的准备工作。

从当事人的这段回忆中，不难得知，许权中率部到潼关后，既没有打算长期投入军阀混战，也没有打算将部队开往以高塘为中心的渭华起义地区，而是准备将部队开往远离东西大道的渭北一带，并且已经派人作了先期准备。

如果单是站在战略角度考虑，许权中也许更正确一些。就连没有指挥过打仗的马文彦对许旅撤往高塘也表示出惊奇与难以理解。他在同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谈到了自己当时的心情：

潼关战争失利，我又听说部队被拉到高塘参加了渭华起义，心里感到很奇怪。转念又想，高塘一带南靠秦岭，北临渭河，离西安和东西大道很近，局面大小，攻守不利，部队无法展开。因而便约了同学员铭新（渭南人）一起从三原出发，第二天赶到渭南员家村住在员铭新家。在这里，我看到宋哲元的部队陆续进关，向西安和渭华一带集结，

心里越发着急，于次日早又上了路……一直走到离高塘不远的地方，看到一座小庙，门前还拴着马，一位哨兵挡住盘问我干什么的，我说我是收大烟的商人。走近小庙时，我看见许权中、杨晓初在庙里用茶缸烧水，不由得喜出望外，上去和他们互道问候。之后我问许权中：“高塘靠近东西大道，地势狭小，攻守不利，而渭北地带开阔，械源充足，能攻能守，为什么不到渭北去呢？”当时许、杨二人没有吭气，我便去总部询问唐澍、刘景桂。临行时许权中说：“这里是战场，你赤手空拳怎么能行。”将一支手枪交给了我……许权中派人把我送去总司令部，首先见到参谋长王泰吉，他与我过从甚密，一见面我便焦急地问他：“这里离东西大道很近，连渭河都看得很清楚，地形于我不利，为什么不把部队拉到渭北起义。那里条件好，局面大，枪械子弹来源又容易。”泰吉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连我家里的枪械子弹都不少。”并告诉我，许权中、杨晓初和我意见一样，还想影响李虎臣一些部队一起开往渭北举行起义。但上级要求在渭华立即行动，许坚持自己的意见受了处分……

从马文彦的这篇回忆文章中，我们不难解开许权中之谜。无奈的是，面对当时的形势，许权中无法理直气壮地申明自己的意见，并无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申辩。

历史常常会为某些事件写下无可奈何的一笔。

其实，就在渭华起义的前一天——九二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央临时政治局即召开了会议，传达学习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开始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发布第四十四号通告，号召各级党组织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案”，纠正“左”倾盲动主义。遗憾的是，陕西省委直到这年年底才收到中央通告。陕西省委没有批准工农革命军党委将许权中“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决定。省委书记潘自力在渭华起义爆发后第二次来到了陕东，他在军党委会上对此处分决定提出意见，“认为太重了”。但省委仍将工农革命军党委的处分意见报告了中央，中央没有同意对许的处分决定。

在以后的一些日子里，当总结渭华起义失败原因时，不论当时对许权中持何态度，几乎所有当年那场伟大斗争的参与者都会这样说：起义中心选在敌人必夺的靠近西安的西潼公路要道上，是渭华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那场武装起义的革命风暴中，许权中旅长是清醒的。

第五章 悲歌血路

宋哲元、李虎臣联手扑向渭华

“革命起义了！”这声音像春雷，像疾风，在渭华大地上滚动着，翻卷着。

沸腾的人群冲向了地主豪绅的庄院，向世代压榨他们的财东举起了黑黝黝的拳头，破坏着千百年来已经使人们习惯了、麻木了的秩序。那些平日里作威作福惯了的地主豪绅纷纷逃进了县城，势大的住进了西安，来不及逃走的老财让他们的儿女们拿着农民的借据文契（往往他们自己不敢来），跑到借债的农民家里，低声下气地说：“大叔，我把地契文约拿来了，当着你的面烧了吧，账上的钱、粮都不用还了。”

那些只会用叹息和眼泪打发日子的渭华农民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们在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改变着“世道”。

驻扎于沈河两岸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队长赵雅生）和驻扎在箭峪口的第四大队（队长雷天祥），配合由李大德、薛自爽率领的陕东赤卫队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浮财，并着手准备将地主豪绅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未能实现——著者注），在高塘镇、崇凝镇、赤水镇一带的村庄普遍组建了苏维埃政府，并积极筹划成立统一的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谢子长带领第二大队驻扎在高塘镇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经常向华县县城和赤水镇一带主动出击。许权中带领十九个人的骑兵小队曾奇袭到渭南县城附近，袭击敌人从西安到潼关的交通运输线和敌人的驻军据点，打得敌人提心吊胆。

“世道”变了！在陕东大地上，终于出现了以华县高塘、渭南塔山为中心，东至少华山，西到临潼，北接渭河，南连秦岭约二百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一时间，渭、华两县出现了许多提着鸡蛋白馍到处打听“苏主席”的老百姓。

乡村和城镇，大人娃娃传唱着一支用旧曲谱填写的歌子：

农民苦，农民难，一年四季不得闲；农民苦，农民难，打的粮食叫地主都收完。共产党，领导咱，打土豪，杀劣绅，为咱农民来伸冤……

贫贱者肆虐的笑声回荡在天地间。

就在渭华群众刚刚挺起身板，迎接新生活的时候，许权中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国民党开始向渭华地区反扑。

在河南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最先感到了来自渭华的威胁。他虽然率大军驻在开封，并以国民党开封分会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身份统领河南党政军大权，但陕西、甘肃在他的军事棋盘上却举足轻重，他一向视其为自己的可靠后方，豫、陕二省唇齿相依。渭华起义中心区域正处于豫、陕交通要道，若被切断，对冯玉祥来说，后果将不堪设想。作为北方最具实力的军事统帅，他不能容忍这种威胁存在。六月初，他命宋哲元为总指挥，率部直趋渭华。

在潼关与宋哲元打得不可开交的陕军李虎臣此时感到最不能容忍的则是许权中旅的反叛。于是，与宋哲元暂时偃旗息鼓，反戈扑向渭华，与宋哲元形成南北夹攻之势。

六月初的一天拂晓，敌人对渭南暴动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进攻。宋哲元以魏凤楼部一个旅的兵力作为主攻部队，在渭南县城保安团的配合下，从渭南县城倾巢出动，向东南方向的塔山一带进攻，妄图经龙尾坡围歼驻在塔山的陕东赤卫队。发现敌情后，赤卫队队长李大德、副队长谢自爽立即率领三个中队下山迎击敌人，在土桥与敌遭遇，展开激战。敌人仗人多枪多，疯狂发起进攻。赤卫队武器低劣，人数只有敌人十九分之一，面对优势之敌李大德临危不惧，沉着指挥，中队长张绪昌、徐汉儒带头冲锋陷阵，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猖狂进攻。但终因力量悬殊，赤卫队渐不能支，敌人则顺着瓦塔到龙尾坡间的土坎，慢慢向前逼近，进至龙尾坡的南端时，工农革命军许权中率领的骑兵小队和雷大祥率领的第四大队赶来增援，配合陕东赤卫队向敌发起反击。这时正在田里劳动的农民就近赶回家拿起了火枪、长柄斧等家伙，高呼着“保卫农民协会”、“跟狗日的国民党拼了”等口号，纷纷跑来助战，敌人见状不妙，丢下几十具尸体，仓皇逃回了渭南城。

敌人缩回渭南县城之后，并不死心，不断派出小分队到靠近塔山一带侦察，妄图首先拔掉陕东赤卫队这个眼中钉。六月七日下午，兼任着韩段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赤卫队二中队队长张绪昌在从渭南东原返回塔山的路上，突然发现了一二十个颈上系红布条的赤卫队员，心中一阵高兴，加紧脚步赶了过去。等到接近那些“自己人”时，方知上当，原来那是些经过化装的县保安团团丁。张绪昌拔出枪来准备与敌战斗时，被拥上来的假赤卫队员拦腰抱住，夺走了他的枪，另一个团丁抡起枪托，凶狠地砸在他的头上，他两眼一黑，踉跄了几步，被敌人俘虏。凶残的敌人用刺刀挑开他的皮肉，用铁丝穿过他的锁骨，拴在马尾巴上拖走。张绪昌被带到县政府，当天晚上连夜审讯。

“你们在渭南有多少人？”敌人问。

张绪昌哈哈大笑，说：“十万人，八万枪。”

敌人一惊，又问：“分布在哪里？”

张绪昌又笑：“哪里都有，城里城外都是的。”

敌人方知受了作弄。“打，打！打断他的骨头！”“老实说，你们有多少人，多少枪！”……一阵阵鬼哭狼嚎声从县衙门里传了出来。

第二天一早，遍体鳞伤的张绪昌被敌人押出了县政府，走向刑场。面对荷枪实弹的刽子手，平时爱唱秦腔的张绪昌毫无惧色地走着台步，用嘶哑的声音拼力唱着秦腔名段《斩单童》：

恶气一口冲斗牛，
叫骂声敬德儿黑屠头。
儿当年本是铁匠手，
与人家打铁造斧头……

“不准唱！不准吼！”一杆枪柄在他的腰上戳了戳。他回过头去朝那个兵瞪了一眼，继续唱道：

三王子见儿相貌丑，
重打了四十不收留。
儿含羞带怨山外走，
不得志去投刘武周。

刘武周见儿武艺有，
封儿为扫唐大都督

.....

一声枪响，戏文戛然而止，陕东赤卫队中队长张绪昌倒在了血泊中。
是日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

六月十日，宋哲元又以田金凯一个骑兵师为主力，出华县，东自崔家村、西到段家村的龙王庙，成扇形向魏家原压来，妄图一举攻占工农革命军高塘司令部。敌人每到一村子先放火，大王庄、贺王庄.....一村子一个村子烧过来，高塘镇以北，成了一片火海。

敌人在发动这次进攻之前，驻守高塘镇的谢子长第二大队已被派出袭击华县县城。敌人攻打高塘镇时，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只有一个连和一个负责警卫的赤卫队，情况十分危急。从早晨八点起，敌人以两团兵力向高塘镇压来。在高塘小学工农革命军司令部，用望远镜已可以看清魏家原上越来越近的敌军。总司令唐谢冒着敌人的炮火，亲临阵地指挥。守卫司令部的一个连和张汉泉所带领的赤卫队在高塘靠近魏家原的前沿阵地凭借工事拼死抵抗，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但在敌人强大火力进攻下，起义军伤亡渐渐增多，赤卫队长张汉泉也身负重伤。唐澍即命工农革命军参谋长王泰吉代为指挥，并派军委秘书长许维善火速去箭峪口及塔山送信，急令许权中、李大德、雷天祥迅速率骑兵小队、陕东赤卫队和第四大队火速增援高塘。这时，敌人又派了一支部队，从崔家村东面向起义军正面部队的侧后迂回，企图攻占魏家原后再夺取高塘镇。正在危机之时，恰逢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到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汇报工作。薛自爽见状，立即跑回自己的家乡三教堂村，敲起报警的大钟。四乡的农民听到钟声，纷纷扛着锄头、铁锹、土枪、大刀聚集起来，足有四五百人。薛自爽把农民分成小队，临时指派了负责人，振臂一呼：“跟我走啊！”武装农民潮水般地拥出了村子，向田金凯骑兵围去。此时，谢子长率第二大队也赶了回来，从东西两面对敌人形成夹攻之势。田金凯误以为中了埋伏，不敢恋战，率部仓皇逃走。唐澍、刘志丹、王泰吉指挥司令部、赤卫队和薛自爽带来的增援群众追击敌人，缴获炮弹多箱，工农革命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攻胜利。

宋哲元不甘心前两次围剿的失败，又在调兵遣将，准备对渭华起义进行新的讨伐。

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谢匆匆地奔走在各个阵地上，他的脸上透着少有的威严与冷峻。此时，他已经预感到，一场恶战近在眼前。

宋哲元向冯大帅立下了军令状

冯玉祥终于向他的爱将宋哲元发火了。

他听完宋哲元关于围攻渭华起义的汇报，对着电话筒，向远在西安的那个山东乐陵籍部下刚说了声“咋整的”，电话便突然在一片嘶嘶拉拉的杂音中中断了。

他阴着脸，拿起另一部电话机，强压着恼怒，说：“接西安宋司令，快一点。再告诉通讯科长，以后我打电话不许半途中断，军情如火，连总司令的电话都不能保准不出事，我就得给他重新找个差事了。”不等对方回话，他就“啪”地一声挂断了电话。

冯玉祥近来心情一直不好。

造成他坏心绪的主要原因来自三个方面：盟弟蒋介石的暗中制约、陕军李虎臣的反叛以及渭华地区的共产党造反。

当然，让冯大帅最感恼怒的是蒋介石。

他已经有所觉察，在蒋、冯、阎、桂联手将宿敌张作霖逐出北京后，他与刚刚结成金兰之交的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变得微妙起来。

回顾使冯玉祥不快。

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之后，国民党新军阀蒋、冯、阎、桂四大派系实现了军事编制的统一。继蒋、冯分任第一、二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之后，阎锡山、李宗仁先后被任命为第三、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依照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决定，统一后的国民革命军将采取联合行动，继续进行“北伐”。“北伐”旗帜依旧，对象依然是以盘踞北京的张作霖“安国军政府”为代表的北洋军阀势力，但已完全失去了大革命时期的进步意义，演化成一场新旧军阀争夺地盘与势力的争斗。

此时，国民革命军投入“北伐”全部兵力约七十万，“安国军”及依附于张作霖的直鲁军阀总兵力四十万。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亲赴徐州部署；四月十日，蒋介石发布全线总攻击令，拉开了蒋、冯、阎、桂联合“北伐”张作霖“安国军政府”的序幕。

这是蒋冯换帖后的第一次军事合作。

冯玉祥第二集团军主力在京汉路以东、津浦路以西地区，自新乡向彰德、大名、顺德一带北上，右与蒋介石，左与阎锡山、李宗仁相顾，会攻京津。

在向北京的征伐之旅中，兵多将广的冯玉祥有许多足以自诩的建树。蒋介石被“治军有方”的孙传芳围困徐州，冯玉祥派出勇将石友三率一万五千人火速增援，以凌厉攻势逼孙后撤，解了徐州之围；由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在西线与奉军主力连日激战，顶住北上主要压力，才使蒋介石于五月一日顺利进至济南，为此，他付出了惨重代价，仅在彰德前线，韩复榘部就三个师长、两个旅长受伤，韩本人也受了伤；为了遏制“北伐”，五月三日，日军第六师团在济南杀害中国军民三千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身在济南的蒋介石屈辱退让，不仅下令取消一切反日活动，禁贴一切反日标语，还于五月五日仓皇逃出了济南城，慌乱中连外衣也未来得及穿，匆匆避到了党家庄。冯玉祥对蒋介石虽满胸怨气，还是应召来到党家庄参加盟兄召集的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慑于日军武力，主张停止“北伐”，与张作霖“划江而治，分南北朝”。在与会者多数同意这一妥协方案的情况下，冯

玉祥力排众议，激烈反对放弃“北伐”，主张把日军消灭在济南。最后，蒋冯相互作了让步，会议决定绕开济南日军，继续“北伐”。此时，得了“恐日症”的蒋介石已无心再在前线指挥，遂告“病假”回到徐州，将“北伐”全线责任交付冯玉祥。冯玉祥从蒋介石手中接过“北伐”接力棒后，踌躇满志，五月二十一日，与蒋介石、白崇禧在郑州会商了一次军事问题，然后按原部署挥旗北上，直逼幽燕。六月六日，冯玉祥麾下另一员猛将韩复榘进抵南苑，率先攻占北京。六月二日，当韩复榘逼近北京时，奉张见大势已去，发表出关通电，三日晚，张作霖悄然离开北京，逃往关外。四日，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至此，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统治宣告结束。

冯玉祥自视完成了自民国建元以来的一项伟业。

冯玉祥没有料到，就在他倾其全力“北伐”之时，蒋介石却与阎锡山进行了一次秘密交易。

蒋、阎的交易是在石家庄进行的。两人见面只交谈了几分钟，蒋介石就急不可耐地把话题引到了日渐壮大的冯玉祥身上，阎锡山也已感到了冯玉祥的威胁，乘势问蒋：“请你翻开历史看看，哪个人没吃过他的亏？（指冯玉祥的倒戈史）”蒋、阎一拍即合，随即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把直隶和京津大权交给阎锡山，阎锡山则支持蒋介石的统一领导。

为“北伐”立下大功的冯玉祥仍被赶回了河南，总也走不出贫瘠的西北。

冯玉祥没有料到，“北伐”一成功，蒋介石立即对自己换了一付面孔……他无可奈何地对西北军提出“地盘要小，军队要小，工作要好”的口号。

如果说冯玉祥对蒋介石丝毫没有设防的话，那么，对李虎臣的反叛，他则多少有些防备。当然，不只是对李虎臣，还有陕系其他将领杨虎城、甄寿山、邓宝珊、田玉洁……甚至还有那个美髯公于右任，这种担心，自西安解围之日起，常常成为他熟睡中的梦魇。为消心头之患，他曾想过一些办法，逼走于右任，调走杨虎城、搬来马鸿宾、马鸿逵，让宋哲元坐镇西安……但李虎臣还是

乘主力“北伐”之机，联络了薛宝权、胡景通、耿庄、段燮功等将领公开反叛。好在马鸿宾、孙连仲、张维玺协力作战，加之李虎臣部何经伟、赤亚武二师反水投冯，李虎臣之乱终于平息，李虎臣率部重返商县……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有许权中旅参加的渭华起义。

宋哲元虽已派兵围攻了两次，均无功而归。冯玉祥搞不清楚，许权中就那么两支半枪，怎么就闹出了那么大的气候。从许权中，他又想到了在美原镇被田生春杀死的史可轩，想到了曾在清涧起事的唐澍，还有那个高鼻梁的刘景桂……五原誓师，他们纷纷集中到自己麾下，如今……冯玉祥不愿再想下去。

他的心头，忽然涌上一丝凄凉之感。

他缓步走向地图，目光投向了渭河南岸。高塘、塔山……他都用黑铅笔画上了大大的圆圈，一条标示道路的黑线被这些黑圆圈割断了。

冯玉祥冷笑了一声。

共产党武装起义若继续闹大，直接后果就是豫陕交通被切断，那么，他将失去一个可靠的后方。

他的决心已经下定，不能让渭华之火继续蔓延。

电话铃响了。

冯玉祥拿起了电话机。他听出是宋哲元，这回电话也清晰多了。

“刚才我说的你听清了吗？”冯玉祥问，声音很大。

“听清了。”对方说。

“我们能一路打到北京去，我们能对付得了孙传芳、张宗昌、张作霖，就没有办法对付几个共产党吗！”冯玉祥用尽量客气的语气说，“一个师不行，上两个师，两个师不行，上三个师，他们充其量不就是许权中一个旅吗！”

“总司令，我知道了！”

“我希望下次你打来电话说的是好消息。”冯玉祥说着，停顿了一下，压着恼怒说，“我不能让蒋介石、阎锡山看我冯玉祥的笑话。”

“是，我知道了！”对方这几个字是咬碎了传过来的。

血路——从高塘原到牛峪口

四十三岁的宋哲元坐进一辆敞篷汽车，出了省政府，一路响着喇叭，穿过长长的向东开拔的队伍，驶出东门，往渭华方向驰去。

汽车行到灞桥，一直没有说话的宋哲元忽然扭过头来，向随行副官问了一句：“你说，李虎臣难对付，还是渭华的那些共产党难对付？”

年轻的副官不知宋哲元忽然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嘴动了动，没有马上回答。

宋哲元朝副官意味深长地笑了一下，抽出一支纸烟，用打火机点上，将目光投向了眼前的原野。

麦子黄了。

迎面走过来几个扛着扇镰的农民。

宋哲元又回过头来，指着那几个农民，问副官：“你说，他们里头有共产党吗？”

“这……”副官支吾着，说，“不会有吧……”

宋哲元摇了摇头，又冷冷地一笑：“这就是我们的思维，因此，共产党会在任何地方冒出来。”说罢，徐徐吐出一口烟，闭上了眼睛。

六月十九日，宋哲元向渭华起义中心区发动第三次围攻（也有说是六月二十日）。

国民军以孙连仲、魏凤楼、田金凯三个师的兵力为主攻部队，分东、西、中三路向起义军的两个主要据点高塘（工农革命军司令部驻地）和塔山（陕西赤卫队驻扎地）进攻，陕西省政府主席兼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宋哲元亲自督战。

敌人的具体部署是：

东路一个师由孙连仲指挥，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向高塘镇以南地区进攻；西路一个师由魏凤楼指挥，从渭南出发，经崇凝镇向塔山进攻；宋哲元亲领中路，以一师兵力，从赤水出发，再兵分两路，从赤水东川、赤水西川同时攻打高塘镇。东、西、中三路皆由地主民团武装为前锋，先导开路。

破晓时分，三路敌军从集结地向预定目标蜂拥而来。

宋哲元骑着一匹栗色马，走上一处高坡，举起望远镜，看了看曙色中静悄悄的渭华原，又看了一眼走在自己身边黑鸦鸦的队伍，嘴角轻轻抽动了一下。

他的这个细微的表情被紧挨着他的骑兵师长田金凯看见了，便凑上去揣摩着说：“宋主席，此番由你亲自督战，定能扑灭赤焰。”

宋哲元把脸转向田金凯，嘴角又抽动了一下，说：“我宋哲元自光绪三十四年入北洋左路补备军从军开始，迄今已在枪炮丛中走过了整整二十个年头，还从来没有和比我弱小的对手交过火。”

“啊……是……”田金凯唯唯连声。

“一九一七年与我交手的是辫子皇帝张勋；一九二一年，与我交手的是督陕的陈树藩和河南的赵倜；一九二四年北京政变，我打的是曹锟吴佩孚；一九二六年五原誓师后参加北伐，对手又是北京的张作霖。”宋哲元勒着马缰，侃侃而谈。突然话锋一转，看定田金凯，问，“如今我们以三师之众去对付那些用大刀斧头武装起来的农民，不知田师长作何感想？”

田金凯满脸羞红，嗫嚅道：“这……不光是农民，还有许权中的一个

旅……”

“据我所知，许旅从潼关撤至渭华的部队充其量也不过一千多人，且无弹药补充。原先我总以为，以一师骑兵击之，足以取胜，可谁料到……”宋哲元摇摇头，咽下了后面的话。

田金凯有些恼怒，宋哲元这是在明显的责怪自己，但由于是上司，不好发作，便用话软软地顶了回去，“常言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粮秣对于骑兵来说，尤为重要，人不吃饭尚可硬撑着打仗，马若无食，非但不能上阵，拖着拉着还是累赘。”

果然，田金凯此话一说，宋哲元只是蹙眉看了他一阵，没有再说话——他心里清楚，由于陕西财政困难，已经欠了田金凯师两个月粮饷了。

打马下坡的时候，田金凯还是讨好地说：“此次总司令亲自督战，定会奏捷而归。”

宋哲元黑着脸，冷冷地说：“拳头砸圪蚤，砸死了也不值得夸耀。”说着，又举起望远镜向高塘原看去，一边自语着，“看样子他们还没有发觉我们。”说罢，扬起鞭子，狠狠打了一下马屁股，朝前跑去。

就在宋哲元向渭华起义中心区域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围攻的前夜，工农革命军军委在高塘小学的司令部刚刚举行了一个重要的会议。

会议是军委主席刘志丹提议召开的，主要研究渭华起义后工农革命军的行动方向问题。

进入六月以来，宋哲元明显加紧了对渭华起义区的围攻。工农革命军虽然取得了前两次反围攻的胜利，但起义区已经明显暴露出了地利上的劣势。在六月十日击败田金凯部之后，已排除出领导中心的许权中由驻地专门赶到高塘小学，找到军委主席刘志丹进行了一次长谈，提出了自己在潼关时产生过的想法：把队伍拉到渭北及陕北去打游击，谋求发展。刘志丹冷静考虑了许权中的意见，认为很有道理，便给总司令唐澍做了几次工作，最后唐澍同意召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许权中的意见。会议是在六月十八日晚上十点多开始的，一直进行到十九日凌晨三点多，经过反复权衡，大多数同志认为，渭华地区地域狭小，处于平原，确实不易于部队机动回旋；无弹药补充来源，在敌人不间断的围攻中难以长期坚守；地处豫陕交通要道，敌人必欲尽全力夺之。因此，不宜久驻，应该谋求向渭北或陕北发展。会议决定派许维善和中共陕东特委宣传部长李大章北渡渭河，利用渭北关系，为部队筹集弹药，勘察路线；同时决定驻守在渭华交界一带的雷天祥第四大队，骑兵小队和陕东赤卫队，由许权中统一指挥。

很遗憾，这个计划未能付诸实施。

这次会议后仅仅几小时，宋哲元的三个师就压了上来。

这是一场力量十分悬殊的战斗。战前，宋哲元把它称之为“拳头砸圪蚤”，战后，又将它比喻成“老鹰抓小鸡”，若单从兵力对比而言，不失准确。

当宋哲元率部进入高塘以西的魏家原时，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便得到了警戒哨的报告，当即与刘志丹指挥部队进入阵地，迎击敌人。敌人以重炮猛轰工农革命军阵地，凭借火力优势不间断地发起冲锋。唐澍亲自指挥工农革命军一部和陕东赤卫队，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许权中带领着骑兵小队，不断穿插于敌我阵地之间，突袭敌人。但是，敌人在大炮的掩护下，蜂拥而上。工农革命军由于寡不敌众，弹药得不到补充，火力渐渐不支，几处防线被敌突破。战斗正酣之机，曾被起义军民抄了家的高塘恶绅薛良臣、民

团团史明鉴带着一股敌人从侧翼攻击到沿山一带，企图封锁工农革命军退路。唐澍、刘志丹识破敌人意图，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向秦岭山区撤退。

当日晚，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被迫撤退到秦岭北麓沿山的牛峪口、箭峪口、涧峪口一线。

此时，唐澍接一地方送来的情报，说魏家原一带已没有敌军了，敌人在高塘小学设了司令部，眼下驻兵不多，建议今晚夜袭敌司令部，地方组织农民群众配合。唐澍没有多想，即派周益三率第六中队（后来成立的，周益三为队长）夜袭高塘镇敌司令部，并派第五中队从侧翼掩护。谁知五、六中队刚一接近高塘，便与敌人交火。拂晓，才发现敌人主力并未撤走，还在魏家原上，周益三主攻部队不能得手，只好且战且退，复又回到牛峪口，此时，五、六两个中队已经伤亡过半。

六月二十日上午，敌人又以全部兵力袭击起义军阵地，在敌人强大炮火打击下，渭华起义军无法立足，当天晚上，唐澍下令退出渭华暴动的中心地区，转入南山、商洛地区。并命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及军党委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吴浩然率一部官兵在牛峪口一线阻击敌人；命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率赤卫队一部，与许权中、杨晓初带领的工农革命军一部在箭峪口一带阻敌，共同掩护主力撤退。

箭峪口的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敌人以一个旅的兵力，向起义军阵地轮番猛攻。许权中与杨晓初、薛自爽指挥总共不到百人的部队与敌鏖战，接连击退敌人进攻。当敌人逼近离赤卫队阵地不远的候家崖时，薛自爽振臂高呼：“赤卫队跟我上！”带领赤卫队员迅速占领阵地前沿制高点，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十倍之敌展开激战，敌人数十次冲锋，都被打退。薛自爽不幸右臂负伤，他用左手解下一条绑腿带包扎住伤口，又继续指挥战斗。

战斗进行到中午，双方为争夺箭峪口的铁姜岭高地，战斗更为激烈。此时，工农革命军只剩下三十多人，薛自爽赤卫队仅剩十余人，在许权中、杨晓初、薛自爽的指挥下，又坚持击退敌人三四次进攻。这时的薛自爽身上已多处负伤，一身烂成破布片的灰军衣已被鲜血浸透，发着高烧的杨晓初也被饥饿、疾病、战火折磨着，坚持战斗。

下午五时，敌人推进到起义军阵地前二百米左右。薛自爽正要率赤卫队员冲出阵地与敌人拼命，突然一颗子弹从他的左胸穿过，当即倒地。在他旁边指挥作战的杨晓初和一个战士赶忙赶过去救护，他清醒后，艰难地睁开双眼，挣扎着对杨晓初说：“我不行了……但枪不能让敌人……拿去……这里……不好守……赶快撤……”把心爱的驳壳枪交到了杨晓初的手中，吃力地抬起手，指向箭峪深处，示意部队后撤。

“你咋办？”杨晓初关切地问。

“这时候……能活着出去一个……都是……胜利……告诉许权中……快走……”说着，痛苦地闭上眼睛，不耐烦地朝杨晓初摆着手，“快撤……我能爬……出去。”

入夜，敌人撤退了，枪声稀落了。战友们在一条沟渠里找到了薛自爽，他头部中弹，已经壮烈牺牲。

薛自爽，土生土长的华县人，他的履历很简单。如果没有渭华起义，他只是一个爱打抱不平的农民。渭华起义，使华县堡子底村诞生了一个威振渭华的“火神”。

薛自爽走了，石匠刘寅科一边凿着石头，一边唱着自己编的秦腔戏文：

三教堂薛自爽传下将令，
东至算王村举起大兵。
恶绅不该官派五百要一千，
也不该月利大库三。
不料想薛自爽火神出现，
一定要火烧你的家园……

这段戏文刘寅科一直唱了好多年。

薛自爽牺牲的那天晚上，许权中、杨晓初率领余部在秦岭宿营。这时，他们接到上级通知，命东路部队和西路部队一齐向南山转移。第二天中午，许、杨率部进入蓝田县许家庙一带，与蓝田县委掌握的沙王村农民自卫团合编隐蔽。

牛峪口的激战在六月二十二日。

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牛峪口阻击战的一位幸存者在几十年后这样回忆说。他说，那是他在打退了敌人无数次进攻之后偶然注意到的，那时，他的身前身后，到处是自己人的尸首。他说当时他正在难受，廉主任（廉益民）喊了他的名字。叫他看天上的月亮，他说他就抬头看了，月亮很亮很明，但没有圆。因此他记下了那晚的月亮。

那个名叫王丑娃的幸存者说除了那晚的月亮，在牛峪口他记得最清楚的是廉主任的死。他说廉主任是正在唱秦腔的时候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死的（本文多次写到唱秦腔的情节，决非杜撰。秦人性烈，以秦腔励志，以秦腔抒怀，遇难时亦以秦腔壮行色增胆魄。故至晚清以来，秦地绿林好汉，侠客义士，甚至朝廷犯官，高吼秦腔赴死的不乏记载——笔者注）。他说，廉主任是外省人，外省人本来不爱唱秦腔，当时廉主任见阵地上全是自己人的尸首，部队情绪十分低落，等敌人枪声哑下去的空档，他对大家说：我吼两段秦腔，你们看像不像。大家以前没听过廉主任唱秦腔，一时来了精神。他就吼开了。他刚唱了两句，一颗子弹飞来，打到了他的胸口上，立马倒了下去。当时吴浩然副主任命令王丑娃和另外两个战士把他用担架抬到附近老百姓家里，他坚决不肯，说阻击任务艰巨，要坚持到主力部队脱离危险，阵地上不能再减人了。卫生员简单包扎过后，他说服大家把他藏在附近的草丛里，他说天黑后他自己能爬出来。天黑后，枪声稀了下来以后，大家到草丛去找他，他已经冰凉多时了，从腔子里流出来的血在草丛里结成了块块。

王丑娃说，我记得很清楚，廉主任那天唱的是《辕门》。说完，他就低下头去，两滴混浊的泪水从他苍老干涩的眼眶里流了出来。

党史中关于廉益民的介绍是这样的：

廉益民，原名卢绍亭，河北丰润人，生于一九二一年。在天津直隶省立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成为天津五四运动领导者之一，与周恩来、于方舟结成友谊；一九二二年，参加了在李大钊指导下的天津革命组织“新生社”；之后在李大钊直接指导下参加青年团的工作；一九二四年，与于方舟、邓颖超等人同时当选为共青团天津地委执委；一九二六年冬被中共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派往冯玉祥部国民军联军做政治工作。冯玉祥“清党”后，到许权中旅做政治工作。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于牛峪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工农革命军党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也于当日下午阵亡。

吴浩然，安徽人，早年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由李大钊亲自介绍入党，一九二六年，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总政治部工作，冯玉祥叛变革命后，到许权中旅。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二日，牛峪口充满了血腥……

血路——从两岔河到保安镇

六月二十二日，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各路部队约五百人相继集结在洛南县两岔河一带。

在那个夕阳衔山的黄昏，唐澍、刘志丹把几百名起义军召集到一起，他们神色庄严地走过一队队散发着焦糊味的队伍，然后，登上一块石台。唐澍看看一大片满脸血污、衣衫褴褛的部属，用战士们都已熟悉了河北易县家乡话大声说道：“弟兄们！革命并没有完全失败，今天，我们虽然离开了渭华地区，但是我们还有五百多人，还可以战斗！即使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和敌人拼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打倒军阀！”“誓死保卫苏维埃！”……激昂的口号声飞出了死寂的两岔河。

唐澍与刘志丹等工农革命军领导人研究着新的部署。

在此紧急关头，他们作出了一个分兵的方案。

连日与优势敌军苦战，各部队减员都十分严重，弹药所剩无多，退至两岔河时，已疲惫不堪。此时，本应抓紧时间进行必要休整，但总司令唐澍却命令工农革命军主力赵雅生第一大队和谢子长第二大队继续向南，进驻洛南保安镇。唐澍、刘志丹带司令部及其余部队仍暂驻两岔河。

不能完全责怪唐澍。他有他的考虑。两岔河山大沟深，人烟稀少，供给困难。保安虽属秦岭腹地，但较两岔河条件要好。又远离渭华平原和豫陕东西大道，退到此地，不再成为宋哲元的心头之患，想其必不会穷追，即使再战，也好利用山地与敌周旋，必要时还可退至许权中旅影响所及的丹凤县和洛南三要司一带。而在商州经营的李虎臣新近兵败潼关，元气未复，加之与冯玉祥旧隙未合，估计无意卷进这场战争。

当唐澍并非轻率地走出此步棋时，却犯了“新败之师，不宜分兵”的兵家大忌。

更使唐澍始料不及的是，赵雅生、谢子长率部进入保安立足未稳，李虎臣即派方少海率五旅之众（均为残旅），包围了保安镇。渭华原激战后还未喘一口气的工农革命军又投入了另一场恶战。

六月底，驻在两岔河的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因侦察有误，将驻保安敌军七八百名错报为百余名，军委据此决定唐澍亲率一百多人前往保安增援。

七月一日，乘夜幕掩护，唐澍和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率领增援部队由两岔河出发，一夜急行军，至天明赶到保安。第一大队队长赵雅生在保安北街口迎上唐澍，报告说保安已处于五旅敌军重围之中，伤亡已经过半，眼下情况十分危机。赵雅生话音未落，四面枪声大起，敌人成散兵形满山遍野向工农革命军阵地扑来。唐澍、李大德立即指挥部队散开，在镇外环山一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吃早饭时分，因双方兵力悬殊，唐澍增援部队兵力不支，被敌人冲散。这时，增援部队与赵雅生大队也失去了联系，只能各自为战，分途突围。打到太阳照顶时候，唐澍带来的增援部队已所剩寥寥。与唐澍失去联系的李大德躲在一堵断墙后面与敌孤军奋战，打死十几个敌人后，终因弹尽而被俘。最后，唐澍带着仅剩的四名战士，夺路冲到镇外不远的碾石沟，不料，又遇到了当地民团堵击，三名战士在与敌激战中又饮弹牺牲。这时，后面的追兵也一步步逼了上来。处于重围之中的唐澍面无惧色，镇定自若，带着仅剩的一名战士许天洁（唐澍的警卫员），冲到

一个涝池边，利用涝池边上的土坎，两个人从前后两个方向举枪向敌人射击。扑上来的敌人不断倒在了他们的枪口下。警卫员许天洁忽然听到背后发出了“哎哟”一声，急忙转身，见唐澍中弹倒地，急忙上去将他扶起来，只见他口吐白沫，已经没有知觉了。

这时，敌人已经拥上来了，许天洁放下唐澍的尸体，掏出手枪与敌对射，被敌人打伤右手，敌人趁势上前，将增援保安的最后一名工农革命军战士俘获。

许天洁被俘后被押到洛南县城，与被俘的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等人关在一院厦房里，李大德当天下午被敌人杀害，许天洁趁敌人杀人、抓人的忙乱之机逃跑。

幸免于难的许天洁成了唐澍之死的唯一知情人。

唐澍牺牲后，敌人将他的尸体大卸八块，掷于荒野，将他的头割下来，悬挂于洛南县西门，曝晒十日示众。

燕赵壮士，从易水走来。一九二四入黄埔一期学军，一九二五年初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军事教官，九月参加省港大罢工，任工人纠察队总教练兼模范大队大队长，同年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作战。一九二六年秋奉命到冯玉祥部西北军官学校，任主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陕西最大的两次革命起义——清涧起义和渭华暴动。牺牲时年仅二十五岁。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唐澍的名字与三秦大地的日月山河同在。

唐澍牺牲当日，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在队长赵雅生带领下，在保安镇与敌激战。在打退敌人十几次进攻后，弹药已近殆尽，部队减员严重，仅剩三成。赵雅生果断下令突围，撤退至碾子沟时，又遭敌人包围，赵雅生率部与敌激战一晚，同全队战友一起壮烈牺牲。

“那天枪声响了整整一夜，五更时候，消停了。第二天一大早出屋一看，镇里的大街小巷，到处躺的都是死人，好惨哩，都是年轻轻的，好多人的脖子上都挂着红带子，说是从渭华原上一路打过来的。那一仗后，空气里总有一股血腥气，直到冬里，也没有散尽。”几十年后，一位满脸皱纹的老婆婆不住地跟每一位来到保安的外地人絮絮叨叨地诉说着。

“那晚没有月亮，没有星星，像要下雨的样子，却总也没下……”老婆婆也总忘不了说那晚的天气……

起义军余部再次“找主求生”

刘志丹穿过两岔河的镇街，来到一座临时安顿着伤病员的院子里。

见到刘志丹，能够挪动的伤病员一齐围了上来。

“刘主席，总司令（指唐澍）牺牲了是真的吗？”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四五岁的战士问，他的胳膊上缠着绷带。

“是的，他在保安牺牲了。”刘志丹点点头，沉痛地说。

“总司令带去的人都牺牲了吗？”胳膊上缠绷带的战士又问。

刘志丹又点了点头。

小战士默默地走了。

刘志丹看见那个小伤兵找了个避太阳的屋角坐下，轻轻抽泣起来。

刘志丹走过去，在他身边蹲下，问：“哪里人？”

“高塘东原上的。”

“多大了？”

“十四五了。”

“这么小离开家来打仗，爹妈能放心？”刘志丹问。

“爹妈都死了。”小伤兵说，“前年夏天死的，得上了一种怪病，前后不到一个月，都走了。”

“再没有亲人了？”

“还有一个哥。”伤兵说着，抬起泪汪汪的眼睛，看着刘志丹，“在李大德的赤卫队里，跟着总司令去保安了……”说着，两行眼泪又从那双清澈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刘志丹全明白了，把小伤兵紧紧地搂在了怀里，咬着牙说：“你哥不会白死，你的血不会白流，记着，富人不会总富，咱穷人也不会总穷，今天失败了咱等着明天，明天失败了，还有后天，只要咱不放下枪杆子，咱穷人就一定能够坐江山。”

刘志丹的一番话立即把院子里的沉闷打破了。

“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声响彻了天空。

等口号声静下去后，他指着和自己一起来的总部经理主任王庆兰对医生张归仁说：“现在一共有多少伤病员，都有什么病，哪个部位负的伤。行动时需要多少担架多少滑竿，都要统计清楚，向经理主任报告。”

刘志丹的话刚一落地，就引来了一阵议论声：“要转移了？”“往哪里去？”

刘志丹没有回答，吩咐经理主任分给重伤员每人十元钱轻伤员每人五元，然后转过身，走出了院子。

是的，转移，往哪里去呢？

刘志丹满腹惆怅。

就在这天晚上，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来到了两岔河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他是在田金凯骑兵向渭华起义中心区发动第二次围攻后，从高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在他向省委汇报工作期间，宋哲元对渭华地区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进攻。他从西安返回临潼后，带了一个交通，化装进入两岔河。

刘继曾不期而至，使刘志丹喜出望外，两人促膝长谈了一夜。

刘继曾从西安出来时，省委还不知渭华兵败的消息，他还被省委任命为工农革命军党代表。来到两岔河后，才知近期发生的一切，带来的指示都已

不再适用。刘继曾、刘志丹商量后，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保留起义剩下的力量。经过一夜研究，决定工农革命军应立即离开两岔河，设法向已在蓝田的许权中靠拢。

翌日晨，刘继曾、刘志丹率领仅剩的二三百人，顺着秦岭里的山路，进入蓝田，准备与许权中部队会合。行至坝龙庙时，被蓝渭八保总团长、土匪头子李林荣挡住了去路，不许通过。李林荣当地人称土皇上，手下有二三百人的武装，个个善骑善射，此外，还拥有一两千人的红枪会势力，是秦岭山中闻名遐迩的一股恶势力。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刘志丹给驻在许家庙的自卫分团团团长尹耕莘写信（许权中旅曾于一九二七年底到一九二八年初驻扎于许家庙，刘志丹经常到农村发动群众，成立了许多农民自卫团，于此时结识了共产党员、自卫分团团团长尹耕莘，许旅走时，还留给尹耕莘五六支好枪——笔者注），要求尹耕莘说服李林荣让路。尹耕莘接到信后，立即给李写了封信，派护兵穆占胜骑快马送去，才将刘志丹、刘继曾一行接了过来。

许权中、杨晓初与刘志丹、刘继曾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七月五日会师于蓝田县张家坪，此时，全军不足五百人。

当天，刘继曾、刘志丹、许权中、杨晓初等人召开了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会上，作出以下决定：

一、取消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及军事委员会，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隐蔽起来。

二、不再开展苏维埃活动。

三、通过许权中的私人关系搞统一战线，争取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

会后，刘继曾以军党代表身份，召集了活动分子大会，宣布了上述决定。

打了两个月的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旗子，被两名衣衫褴褛的战士含着眼泪卷了起来。

渭华重演了清涧起义的结局。

从此时起，渭华起义正式宣告失败（关于渭华起义失败的日期，史家执论不一。有人认为，七月一日——也就是保安战斗失利、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牺牲之日，已标志着渭华起义最后失败——笔者注）。

许权中部再次“找主求生”。

这次准备依附的是李虎臣部第三师师长刘文伯。

刘文伯为人豪爽，和许权中同属原国民二军旧将，与冯玉祥不睦。刘文伯虽然号称一个师，但当时只有两个旅，驻在洛南一带。许权中驻三要司时，与之交往更多。决定暂归刘文伯后，许权中即给刘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将部队编为刘部下的一个旅。刘文伯知道许权中会带兵，当即复信表示同意，并给许权中拨了一个团的军队，约四五百人，连同许权中带来的几百人，编为刘部第九旅，任许权中为旅长。刘继曾以党代表身份随军行动。此时，起义军另一位领导人杨晓初病重，自卫分团团团长尹耕莘派人秘密将其送到渭南县长杨寨家中养病。

依然还在病中的刘志丹在一个炎热的午后离开了部队，穿着一件白布衫，徒步回西安向省委汇报。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来到许权中的住处，两人守着一盏煤油灯，相对无言，默坐了一夜。

分手时，刘志丹对许权中说，他到西安后不想多待，向省委汇报后，准备回到陕北老家去。他说他还要弄枪杆子。他说以后再搞武装可能会好些。许权中说陕北山大沟深梢林多，又远离交通要道，在那里搞武装一定能成功。

最后，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许权中无可奈何地输给了蒙昧

许权中部被刘文伯收编后，即移驻洛南，积极进行整训，准备在时机成熟时再打起红旗。

党代表刘继曾在新成分中秘密地物色着党、团发展对象，刚从失败中走来的部队又渐渐有了活力……

作为新组建的九旅，许权中准备采取的第一个军事行动是打荆紫关的土匪，一来为民除害，二来锻炼部队。向刘文伯报告后，刘也同意。正当积极备战的时候，冯玉祥又与刘文伯打了起来。刘力量太小，支持不住，打算撤退到南阳一带投靠岳维峻。于是许权中部离开洛南，随刘文伯东移，经龙驹寨、老河口、商南，进入河南境内，八月二十三日来到邓县。

地处豫西南的邓县以“客军”来往繁多出名。“客军”中尤以陕军居多。为了应付频若织梭的各色军队，民团、商团遍地丛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七日第二集团军南路军总指挥岳维峻率军由陕西进驻邓县，九月十三日又匆匆东去，留国民二军奠基人胡景翼的三弟胡景铨旅长期驻守。号称三多军队的胡景铨旅（即：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所需粮、饷、枪械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全由邓县人民负担，仅粮食一项，每天就达一万多斤。加之军纪败坏，抢掠讹诈、强奸妇女，民众十分愤恨，将其连同岳系其他部队称之为“土匪军队”。一九二八年夏，正当群众生活极度困难之时，反冯失败的李虎臣部三个旅共四千人，也从陕西拉到邓县归胡景铨指挥。邓县官、绅、商、农各个阶层对岳维峻南路军憎恨更加一层，加之乡村土匪蜂起，兵匪为患，民众不得安宁。为了生存和自卫，民间帮会组织红枪会在农村普遍兴起。

许权中率部来到邓县东门城下时，胡景铨旅已于上月离邓。因许部打的是岳维峻南路军第三师的旗号，冯玉祥所委派的邓县县长束清泗以为又是岳军重返，便联合邓县豪绅商贾一致反对许旅进城。在紧闭城门拒许进城的同时，紧急通知城西的民团和邓东的红枪会，立即集中到县城，消灭“土匪军队”。酷暑骄阳之下，被拒在城下的许权中旅经过艰苦交涉，始被放入城内，但地方官绅却避而不见。部队官兵忍受着酷暑和饥饿，蹲在丁字口两侧的屋檐下，等待地方上来人安排食宿。却不知官绅们正在暗中调动民团和红枪会，企图聚歼这支部队。

正当许旅官兵饥渴难当之时，一声锣响，红枪会从四面八方窜出。他们凭着“硬肚”功夫，敞胸露怀，呐喊着，挺着刀矛，双目紧闭，口念咒语，直冲部队砍杀而来。

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硬肚”功夫，据说水火不进，刀枪不入，红枪会信徒极相信这一点。他们既不理睬部队官兵的劝说，也不理睬鸣枪警告，端着大刀长矛，径直往前冲。眼看就要冲到旅部了，官兵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开枪打死了三名冲在最前面的红枪会信徒，其余见势不妙，纷纷逃跑。

与此同时，邓县总团部里的民团也不断向许部开枪射击，在县府后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许旅为迫使地方派代表出面接洽，将民团总部团团围住，并派人爬上房顶向院内投弹射击，又提来煤油，佯装要焚烧总团部。地方官绅迫于无奈，派出县政府承审翟鹏举、红十字会邓县分会理事戴新善及公差支应局局长陈述之等三名官员出面与部队接头谈判。经双方代表商定，一、立即撤退红枪会对部队的围攻；二、马上给部队安排食宿；三、由地方选派

代表护送部队及早离开县城，确保部队在离境途中安全。

邓东红枪会首领雷云亭接到进城打“土匪”的通知后，即用“鸡毛传帖”的方式联络红枪会成员紧急集合，直趋县城。进入邓县城里后，雷云亭首先作法，然后四散进入各条街道，企图消灭许权中旅。

雷云亭红枪会虽然人数不少，但装备极差，仅有从土匪手中夺来的三支老旧步枪，视为珍宝，其余仍是沿用大刀长矛，打仗全凭“硬肚”功夫。下午与许旅稍一交火，就吃了亏。但雷云亭并不死心，在南去襄樊的必由之路南关大街摆下了一字长蛇阵（许权中旅摆出南下襄樊的架势）。夜里两点，雷云亭将全部红枪会人员埋伏在二里多长的南关街的两侧，并要求邻街各店一律敞门，不许点灯，人人手持刀矛，严阵以待，专等许旅全部进入阵地时，将其聚歼。

许权中对红枪会早有警惕，决定避开南街红枪会，出东门转移。

翌日清晨，许权中率领部队，在三名地方代表“护送”下，出了东门，向正东方向急进。县政府怕部队重返县城，等许旅一出东门，立即锁上了城门，并用土石堵死。正在南关的雷云亭听说部队已出东门，即率领红枪会从小东门拥出追击。眼见追上，红枪会为了虚张声势，连放数枪，呐喊声大起。许旅新来乍到，不知邓县民风民情和军事虚实，误以为后面有追兵千万，部队有些慌乱，一些缺乏经验的新兵跑出队列，窜向道旁麦田。红枪会高喊着：“抓土匪！抓土匪！”向前拥来。周围群众不明真相，认为是匪兵败退，纷纷拿着家伙赶来为红枪会助阵，部队陷入了红枪会和群众的重围之中，出城才十九里，已有不少战士被群众和红枪会打死。

“旅长，下命令开火吧！”情势危机，一个营长向许权中请示说。

“开火？当然，凭着我们的装备和战斗力，收拾眼前这些抡大刀舞长矛的人并不困难。”许权中说着沉重地摇摇头，看着那个营长说：“但是革命军人，怎么能向老百姓开枪？他们都是受蒙蔽的群众。”

“那我们咋办？”

“尽量做说服他们的工作。”许权中愁眉紧锁，连他也不敢相信自己说的话能不能起作用。

这时，最痛苦的莫过于许权中了，眼看着红枪会和受蒙蔽群众越聚越多，眼看着战士不断被打死，枪支和物资不断被夺走，部队却有枪不能打，有炮不敢放。

但是没有办法，他们是老百姓。

共产党员许权中此时的目光已经超越了眼前这个让他奈何不得的屠杀场。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在邓县东门外的大路上，上演着一场老百姓杀革命军队的悲剧。

许权中迁怒于县府派来的三个代表，他们问他们：“你们既然保证我们安全出境，为什么对我军还如此的围攻和袭击呢？”

公差支应局局长陈述之（外号陈三炮，是邓县人人皆知的角色）说：“不要紧，这一带都是我的佃户，只用我一句话，他们都退回去了，你们借给我一匹马，我去制止他们。”

许权中命令给他一匹马。

陈述之骑上马，喊了一声：“不要打了，这是军队。”就策马向西跑去，等脱离许旅射程，便直插正北，翻过一道河堤，逃之夭夭。

部队继续在红枪会和群众舞动的长矛大刀丛中艰难地东行。

为了避免全军覆灭的命运，许权中下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有节制的还击。

部队勉强进到辛集东边，许权中下令利用附近一道高堤进行伏击，继续向红枪会和受蒙蔽群众喊话，并在高堤后面紧急召开了全体人员会议，指明部队眼下所面临的处境，研究下一步出路。会议还没有结束，红枪会借着堤边的芭茅棵的掩护，窜上河堤，包围了会场，于是短兵相接，进行了一阵激烈的拼搏和厮杀。

在混乱中、邓县政府“护送”部队的另二位代表翟鹏举、戴新善也被杀死在河湾里。

许旅溃不成军，散兵且战且退，继续东行。

下午，渡过杨城、孙庄一带，群众越聚越多，包围圈越缩越小，在这众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包围之中，疲兵再战，于事无补，就此许旅全部被解除武装。

许权中从洛南带过来的两千多支枪全部落在红枪会和群众手里。两千多名官兵中的一半以上惨死在邓县城东的大路上，被刀矛捅的血肉模糊的许旅官兵的尸体，迤迤迤地摆了四十里。

在河南邓县，共产党人许权中无可奈何地输给了蒙昧。

许旅余部的一部分化整为零回了陕西，一部分去了确山。至此，陕西由共产党人掌握的最后一支军队消失了。

许权中从红枪会的刀矛丛中突出后，带着满身刀伤，经确山到上海寻找中央，又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

一九二八年秋天，许权中受中央派遣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红军大学学习。一九三一年夏天回国，到中央北方局工作。不久在天津被捕，一九三二年夏被保释出狱。一九三三年夏赴张家口，任民众抗日同盟军副军长兼第十八师师长，率部在张北、沽源等地抗击日本。一九三六年转回陕西从事统战工作，任杨虎城部警备第二旅副旅长。西安事变后，任独立旅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挺进河北作战，任国民党军第一一七师参谋长。一九三九年以养病为名从事兵运工作。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九日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陕西眉县槐芽镇洪水沟。

拨开扑朔迷离的历史之雾，可以公正地说，在震撼了整个西北乃至整个中国的渭华起义中，最清醒的大概要数许权中了。

许权中生命无憾。

农奴戟 英雄血（之一）

失败者的命运是相似的——红旗卷起来了，袖章收起来了，红缨枪藏起来了……

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华县的高塘镇和渭南县的崇凝镇分设县佐，专事镇压参加过起义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学生农民。凡是起义波及到的地方，地方当局都成立了“清乡团”，实行“连坐法”。土豪劣绅、警察差役、地痞流氓，对参加起义的群众进行反攻倒算，疯狂报复，恣意杀人放火。在不长的时间里，即有三百多人惨遭杀害，剜眼、掏心、断肢、枭首、腰斩、分尸……父子同时遇难，兄弟同日被戮，夫妻同囚，满门抄斩……

二百公里的渭华暴动区笼罩在腥风血雨中……

一九二八年七月二日，太阳黯淡。

一个瘦小的老汉身背褡裢，走在通往高塘镇的土路上。

老汉家里断盐断醋已经好几天了——渭华起义失败后，清乡团四处抓人，很少有人赶集买东西。今天高塘镇又逢集，他打算去称二斤盐，买上一罐醋。出村时，乡亲们说眼下多事，劝他不要去了，老人坦坦荡荡地说：“我都快八十的人了，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不怕！”

“可你也闹过苏维埃，闹苏维埃也在他们要抓的单单上。”乡亲们担心地说。

“他要抓我，我就问他：你们财东老爷世代代作威作福，我们下苦的闹一回世事也不行？”老人说罢，拄了根竹竿，上路了。

老汉叫李万年，七十五岁，家住高塘镇大王村。因处事公道，为人正派，享誉乡里。一九二七年初，被大王附近十一个村庄的农民公推为首领，清算恶绅王文凤、杜玉曙等摊派粮税烟款账项。李万年开始以年大体弱坚辞不就。众人央求道：“大王十一个村子，谁不知你老人家耿直公道，这是大家的事情，你不干谁干得了！”李万年推辞不掉，便挺身而出。不干则已，干就要干个明明白白。他带着几个年轻人，住在大王村的老君庵里，整整一个多月，终于算出豪绅们向农民多派的几千两烟土。

几千两烟土，大王十一村农民的多少汗水！

七旬老翁拍案而起。

李万年带领本村村民李正申、权正义等人，代表大王十一个村的百姓，把恶绅王文凤、杜玉曙、罗成彦、张绍谦告到县府。证据在案，县府只好判处豪绅向农民退回多收的烟款。

豪绅并不甘心，依仗高塘民团团团长史明鉴买通县府，不肯退出赃款。

李万年一不做二不休，再次背上褡裢，带上干粮，步行五六十里，住到县上和恶绅打官司，王文凤等才勉强将赃款退出。

李万年越发受人敬重。

渭华起义爆发后，大王十一个村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反霸斗争掀起高潮，起义群众抄了罪大恶极的民团团团长史明鉴的家。李万年不顾风烛残年，和儿子李学道、孙子李玉珍、李玉忠一道参加了抄家行动，后来孙子李玉珍还加入了共产党，当了赤卫队长，小孙子李玉忠也参加了儿童团，高塘原上这个普通的农民家庭成了引人注目的革命家庭。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李万年的儿孙们远走他乡，倔强的老人留了下来。他没有想到，就在他到高塘镇赶集的路上，恶魔正在等着他。

李万年路过杜家村时，被摇身一变成高塘清乡团团长的原民团团长沙明鉴抓住，将他带到团部。

“你还认得我不？”史明鉴狞笑着问。

“史明鉴，我认得你。”李万年冷笑着说。

“抄我家有你没有？”

“你知道，有我。”

“今天你说咋办？”

“想咋办就咋办。”

“你们就折腾了那么几天，值得不？”

“值得，我活了七十多岁，当了几天人。”

史明鉴气急败坏，令团丁严刑拷打，杠子压，烙铁烧，老人骂不绝口。最后，民团让李万年家人拿四百块银元赎人。当李万年随着团丁回家取钱时，史明鉴赶来，恶狠狠地说：“这老东西不能放！”接着，“啪！啪！”两枪，将老人杀害。

史明鉴杀了李万年，立即令上一年被李万年在县府告倒的恶绅王文凤带民团抄了李万年的家，掘地三尺，掠劫一空，连老人的寿木也被抬走，家里人只好用芦席裹尸将老人埋葬。

史明鉴抄家后，李万年的老伴在村外老爷庙（关公庙）悬梁自尽；五十多岁的儿子李明道被团丁踢死；年仅四岁的曾孙李夏娃被王文凤活活踩死；孙子李玉珍、李玉忠流落他乡，李玉珍后来返回华县，被国民党县政府杀害于华县城西关外。

一门忠烈，四代英豪。

渭水为之泣，华岳为之号。

渭华起义资料卷宗里，珍藏着一张黑白照片，已经发黄变脆的相纸标志着这张照片年代的久远。

照片上，一位身材高大的汉子表情木然地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他的身旁，依偎着一位抱着孩子的少妇，脸色忧郁。他们的身后，站着—个青年男子，压低草帽，—脸悲愤。

坐在椅子上的汉子叫温济厚，照这张照片时，他已经死了一天多，抱孩子的少妇是他的妻子……

这张照片浓缩着—段浸泡在血水里的柔精密意……

—九二六年冬天，温济厚受党组织派遣，回到故乡华县开展农民运动，对外职业是七里寺小学校长。—九二七年—月，温济厚协助共产党员杜松寿等人筹备华县国民大会，成立了华县农民运动委员会，温济厚被选为委员，组织起七里寺区农民协会。之后，发动农民轰走贪赃枉法的华县县长叶振本，使其成为华县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县长（前后只干了四十二天）。五月下旬叶振本复出任县长，温济厚闻讯十分震惊，连夜联络城内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奔赴各地，动员民众二次逐叶。第二天，五六千民众赶到县城，召开群众大会斗争叶振本，将其再次赶出华县。

—九二八年，中共华县县委指示城关区委组织武装，处死了华县反共急先锋、国民党县党部主任委员李纪实，敌人惊恐万状，放出密探，搜集中共华县地方党组织的情报。七里寺—带的恶绅史丙耀等乘机向国民党政府状告温济厚等人。五月五日晚，温济厚正在七里寺小学召开党支部会议，—群军警突然扑往学校，堵住大门，温济厚拔出手枪与敌人对射，终因弹尽被捕。

温济厚被关进了华县看守所。县长段紫光和警察局长王硕甫亲自提审温济厚，施以酷刑，吊打，火烧，温济厚紧咬牙关，闭口不言。

五月二十九日上午，温济厚被押向刑场。他神态自若，一路高喊口号，沿途群众无不掉泪。

七里寺小学管理员温志德目睹了温济厚被害的惨烈情景，赶回村子告诉了温的妻子温曹氏。

一声霹雷将温曹氏震呆了。

秦人性烈。

温曹氏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以后，顾不上嚎陶大哭，顾不上回忆夫妻恩爱，而是央求温志德帮她把丈夫的尸首搬回来。

温济厚的遗体搬回来后，她轻轻擦干了亲人身上脸上的血迹，整了容，刮了脸，换上一身新衣服，然后与温志德一起将丈夫扶到村里的大庙前，让他端端正正地“坐”在一把椅子上，请温志德在椅后扶着丈夫，她抱起六岁的孩子，紧紧地依偎在丈夫身旁，留下了这张带血的“全家福”。

为了让儿子继承丈夫的遗志，她给儿子取名为“念赤”。

这年冬天，温曹氏因悲愤过度离开人间……

报复还在继续。

敌人在报复中收获快感。

在这里，没有亲情，只有阶级。

六月二十日，当工农革命军在宋哲元三队大军围攻下，被迫撤离渭华地区后，敌中路军大批人马立即包围了与高塘紧挨的魏家原。

下面是与电影镜头类似却又无比真实的场面：

敌人将全村人集中在村外的打麦场上。

在被集中起来的人中间，有曾担任过华县里寺村党支部书记和何家村苏维埃主席的宁景俞。他是头一天来魏家原村苏维埃部署工作的，开会开到半夜，没有走得了，今天敌人就包围了村子。

敌人强令交出赤卫队员和共产党员。群众置之不理。已经换了衣服的宁景俞和赤卫队员王克润却被敌人从人群里拉了出来。

“你是共产党员？”敌人问宁景俞。

“不是，我是教书先生，路过这里。”宁景俞镇静地说。

“干什么去？”

“会朋友。”

“真的？”敌人将信将疑。

“这是友人给我的信。”宁景俞拿出一封信，伸到一个当官的鼻子底下。当官的拿过信看了一眼，把信还给了宁景俞。

敌军官“嗯”了一声，打算放了他。

这时，突然一个老汉大喊着冲了过来：“不能放！他不能放！”

人们转脸看去，都惊呆了，原来冲过来的老汉是宁景俞的岳父周百寿。

宁景俞先也是一惊，但他的眼睛里立刻浮上了一丝鄙夷的神情。他明白了，岳父开始报复了。

岳父周百寿是周家村的土豪。周家村武装起义后，与附近两个小村联合，成立了一个苏维埃，首先向周百寿发动斗争，查抄了周家的浮财，拉走了一头骡子。宁景俞回家后，岳父叫他出面把浮财和骡子要回来。宁景俞坚决不肯，还开导他要低头认罪，争取群众谅解。周百寿气得火冒三丈，愤愤咒骂：

“等着看，有你娃倒霉的时候哩！”……

果然，周百寿从怀里掏出一卷纸，向国民党官兵喊着：“他叫宁景俞，就是共产党！你们看，这些都他搞的！”

宁景俞又一惊。周百寿手里拿着的，正是他收藏的文件，顿时气炸了。他对周百寿厉声说：“我就是共产党，要杀要剐，随便！”

敌人一拥而上，脱去宁景俞的衣服，游街示众。宁景俞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边走边骂，高呼口号。敌人残忍地挖去宁景俞的双眼，又割掉他的舌头，最后剖腹，掏出他的心脏，挑在刺刀尖上，狂叫：“这就是当共产党的下场！”最后，敌人把宁景俞的尸体放到柿子树下，曝尸荒野。

宁景俞被害后，敌人还不死心，抄了他的家，抓走他的父亲宁双福，关进清乡团牢房，严刑拷打，几经致死。宁景俞弟弟宁栓娃被敌人缉捕，外逃失踪。其祖父、母亲也被迫背井离乡……

宁景俞被害的那天下午，他岳父周百寿的饭桌上多了两碟菜，一壶酒。

农奴戟 英雄血（之二）

当危险来临的时候，王授金无比清醒。

此时，他正沉静地坐在南山脚下的一间土屋里。

也许，这位儒雅的老人与这间简陋的土屋看上去多少有点不协调——灰布长袍，大背头，犀利的目光，使人大概可以推断出他的不同寻常的身份。

这间土屋是他的临时隐蔽处。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在敌人疯狂的大搜捕中，他被华县县委安排在位于华山脚下的共产党员刘勋先的家里。这是一个十分偏僻的地方，除了有数的几个党团员在天黑以后轮换着来看看老人外，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隐藏点。

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老人才踱出土屋，在屋前的空地上走上几圈，举头望着微茫的河汉，吟几句稼轩词。

半聋的更夫走过，用诧异的目光打量一眼这位五十多岁的老人，打着更点走过去，更夫不会知道，这位看着眼生的外乡人，就是五四运动以来，在三秦大地上叱咤风云的王授金先生。

一九二一年的孔子诞辰日（八月二十七日），王授金在西安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天，陕西省教育厅长郭希仁命令各校师生，一律到文庙朝拜孔子。时任西安女子师范教育主任的王授金，不但拒绝参加，还召集全校学生，对孔子作了评论，在会上喊出“打倒孔老二，学习新文化”的口号，并将自己的讲演内容在报纸上公开发表。郭希仁大怒，以“违犯定章，有添厥职”的罪名，将王授金免职。王授金不惧，奋起与郭希仁在报上展开笔战，给陈腐的陕西教育界带来一股强劲的冲击力。陕西学界为了支持王授金，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派代表请愿，要求撤郭希仁教育厅长的职。旅外陕籍学生也以书信、报纸刊文谴责郭希仁，支持王授金，形成闻名全国的西安评孔风潮事件。一九二一年五月，郭希仁终于被赶下了台。

王授金的名字不胫而走。

此后，王授金的身影经常出现在陕西的政治舞台上。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五日，西安举行有五六万人参加的孙中山先生追悼会，大会公推王授金为主席，魏野畴为司仪。王授金发表了慷慨激昂的即席讲话，号召人民为实现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斗争。

为了促成国民会议，产生真正的人民政府，十二月十二日，王授金在西安体育场主持反奉讲演大会，刘含初等人作了报告。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党陕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西安召开。王授金与于右任、史可轩、魏野畴、李子洲、刘含初、杨明轩先后任大会主席，大会选举李子洲、魏野畴、刘含初、王授金等十三人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正式执行委员。

六月十日，王授金与邓宝珊、石敬亭、井岳秀等十三人当选为由国民党左派于右任为主席的陕西省政府委员……

大革命失败以后，王授金列入了石敬亭的秘密逮捕名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秘密来到了渭华地区的革命中心高塘镇。他多次与华县党的领导人赵锡琰、陈述善、霍世杰、王拯民交谈，研究高塘地区的革命发展问题，指导农民协会运动。当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传达到华县后，王授金、霍世杰等人多次深入乡村，与农民促膝交谈，宣传武装斗

争，使高塘的革命斗争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开展得轰轰烈烈，遂有了陕西的“小莫斯科”之称。

后来，王授金被派往许权中旅工作。

渭华起义爆发，他跟随许旅撤离潼关战场，奔赴高塘，参加起义，被分配到工农革命军政治部宣传部工作。

王授金的身影又出现在渭华大地上。

苏维埃到底是什么？

它的任务是什么？

苏维埃和农民协会是不是一回事……

王授金用老百姓的语言向老百姓一遍遍地解释着，农民们的心里亮堂了。

六月，王授金正在积极协助筹划成立统一的渭华地区苏维埃的时候，敌人向起义军民反扑过来。为防不测，王授金被安置在这山脚下的土屋里。

敌人搜捕越来越疯狂，有些农民只因为藏过赤卫队员和共产党员就被清乡团抄了家，砍了头。这样的消息一多，王授金住不住了。

他不愿因为自己连累别人。

一天上午，屋主人刘勋先来送饭时，看见王授金换上了一件干净的蓝大褂，炕上放着一个包袱。正在惊疑，王授金对他说：“吃了你这顿饭，我就走呀。”

“为啥？”刘勋先一惊。

“闲得难受。”王授金故意轻松地说，“这些年，我还没有这样闲过呢。”

“外头紧得很，清乡团天天都在路上盘查，你不能走。”刘勋先着急地劝告说。

“不要紧。像这样总藏着，骨头也会散了架。”王授金笑着说，表情也随即严肃起来，“你们也要小心点，敌人疯了，乱咬人哩。我走了，有许多事情要找省委……”说着，背上包袱，告别了刘勋先，出了屋门，向山外走去。

走到龙王庙时，王授金即被王佐的清乡团挡住去路。

“你是干什么的？”敌人问。

“行医的。”

这时，庙内的敌人闻声赶了出来。一个外号叫“一枝花”的恶丁高辛生觉得眼熟，上下打量了王授金一阵，突然奸笑道：“哈哈，你不是王先生吗？听说你和王团总是同窗，怎么能不辞而别呢？请，到团总那里一叙吧！”

王授金知道自己无法逃脱了，坦然地说：“走！我也正想看看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当晚，王授金被拉到高塘镇，关押在王佐的清乡团。不间断的“过堂”开始了。

在关押着王授金的那间屋子里，常常传出王授金用刑时的叫骂声和几乎千篇一律的审问声。

“你藏在谁家？谁和你联系？”

“不知道！”

“在没有走的这些人里，还有哪些是你的同伙？”“不知道！”

“打！”

惨叫，怒骂。

“你是产产客（渭华一带反动派对共产党的蔑称）吗？”

“我是共产党员。”

“还有谁是？”

“不知道！”

“老汉，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想死还是想活？”

“进了你们这道门，我就没有想过活着走出去。”

“想死？美的你。来！灌辣子面！”

又是惨叫，怒骂。

敌人不耐烦了。

八月的一天下午，已经被折磨得体无完肤的王授金被敌人拉到山神庙里杀害了。清乡团也知道王授金来头大，怕日后担责任，把尸体抛进了河水里……

解放后，屠杀王授金的大刽子手王佐被处以极刑，未能逃脱人民的惩罚。

血，还在淌，还在流。

黄土地由此变红了。

这是五个刚刚和他们的父兄长齐了的年轻人，其中有的才刚刚睁开懵懂的眼睛。

他们的名字分别是程养谦、王羊娃、程狼娃、王德成和王心有，质朴如泥土的名字是他们祖辈贫贱的符号。他们中，年龄最大的是王心有，不足二十一岁，其余分别是：程养谦十八岁，王羊娃十九岁，程狼娃十七岁，王德成最小仅十五岁。

当渭华起义的烈火熊熊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和他们的父兄一起激动过，惊喜过，奋斗过。他们拿着木棍大刀，参加了赤水区委统一领导的打土豪斗争，焚烧了赤水商会姚俊贤的房子，打死了新往村的劣绅王恩俊。五月，他们跑到华县三张村、程高村，参加了农民捉拿土豪刘孔华、劣绅王佐的行动……渭华原上，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渭华起义失败后，敌人兵分两路，包围了新庄村和正在地里干活的群众，挨家挨户地搜查。程养谦、王羊娃、程狼娃、王心有、王德成等被敌人逮捕了。

等着他们的是兽性的折磨。

敌人把他们带到新庄村一座古庙的大榆树下进行审讯。曾担任过新庄村党支部书记的程养谦是敌人第一个折磨的对象。他们用牛皮弓弦勒住程养谦的两个大拇指，吊在大榆树上，先使劲用树藤抽打，然后脱掉他的上衣，用锋利的刺刀尖在他的身上刻下几个“十”字，在刀伤处又灌进辣子盐醋水。接下来是当过农协主席的王心有，敌人把他拉到庙门前，先用刺刀割掉他的一只耳朵，再把他吊到庙门上，乱棍抽打。就这样，敌人还嫌不过瘾，又把王心有的母亲拉来吊到树上，用香火烧她的两个乳房。折磨一番之后，敌人又把他们转押到渭南县城。敌人肆虐用刑，终不能征服几条年轻汉子。一九二八年七月十日，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程狼娃和王德成五人被敌人杀害在渭南县城西沈河滩。

“老子今年十八岁，是共产党员，再过十八年，还是共产党员！”沈河滩上，留下了程养谦最后的声音。

“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五位烈士的声音回荡在茫茫天地间。沈河滩上，没有枪声。

敌人用的是最原始的处死法，枭首。

五位烈士被害后，一辆马车拉回了五具无头尸体。被害的五人中，有四人从此绝了门。

让我们记住这些如土地般质朴的名字吧：

杨久娃，华县东阳乡江村人，一九一一年生，起义失败后，一九二八年七月被敌人杀害于华县圣山乡移山庙。

赵继娃，华县高塘镇新城堡人，一九二二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人杀害于华县高塘镇。

保保，华县大明乡方寨村人，一九二二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人杀害于华县金惠乡马峪。

姚友娃，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一九一六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于华县金斗峪。

郭多娃，华县高塘镇吉河村人，一八九二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于华县县城。

贺道娃，渭南桥南镇杨魏村人，一九一一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于渭南老城西门沱河滩。

张蛮娃，渭南桥南镇杨魏村人，一八八四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人杀害于渭南老城西门沱河滩。

郭房娃，渭南桥南镇姚郭村人，一八八五年生，起义失败后，被劣绅郭丙智杀害于本村。

郭牢娃，渭南桥南镇姚郭村人，一九一三年生，起义失败后。被华县民团团团长王邦太杀害。

郭康娃，渭南花园乡三联村人，一九一八年生，起义失败后，被敌军逮捕杀害……

那是一串长得望不到头的名单，那些名字往往是他们一落地就被他们的长辈随口叫出来的。

他们或年长或年幼，到死都没有一个响亮的名字。

但在一九二八年那个如火如荼的年代，这些没有名字的庄稼汉挺直了腰板，扬眉吐气地在人世间走了五十多天。

张蛮娃在临刑前仰天大笑了一阵说：“有这五十多天，我够了！”

血花闪过了，腥风吹过了，沉睡的渭华原苏醒了……

血沃渭华，仇恨发芽

敌人在进行了一番疯狂的滥杀之后，对共产党的活动采取了更严厉的防范措施。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新秦日报》刊出一则《省府布告公布清共清乡办法》，开篇如下：

省政府委员会通过清共及清乡办法业志前报，昨省府始将此项办法布告公布，兹志布告及两办法如下：

一、布告：为布告事，奉总司令冯庚电，内开共党祸

国累图破坏，近虽迭次查获，逆焰少戢，但各机关各团体内恐仍有余孽混迹。查潮。清乡。之十八联结办法，彼此连带，负责应相察监视，并有连坐、诬坐、反坐，诸组织颇为周密，鲁豫陕甘各省似可行，望细心研究实行方法具视，以便审核办理为要等因。奉此当经本政府委员会七十四次会议决，拟定陕西清党办法十一条，清乡办法十条，除电复并通令外及函布告，各界同胞一体知照此布。

在陕西省府公布的“清党”办法中，第一款即对共产党定性：“共产党以杀人放火破坏社会秩序为目的，必须严加防止，以严阴谋而维持治安”。为达到“清党”目的，“办法”规定：各机关、学校及其他团体，凡任用、招生，“不分性别，均须十人具结为保，并须一人以上或确实商号保结，方准收容”；确知某某为“共党”隐而不举发者要“酌量连坐”；规定“各县城市乡村人家，每十家为一排，排十家均须具结应保，如本排内某人有共党嫌疑或隐藏枪支及容留形迹可疑之人，本排排长及结保各家应立即查明呈报，若不呈报……本排结保各家以连坐法治罪，其排长尤当加重惩治”等等。

严律酷刑，为的是彻底折断复仇之箭。

然而，血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省政府的清党清乡告示还只是写在纸上，与起义军民有着血仇的土豪劣绅，其实比宋哲元的省政府性急得多。他们不等省府文告，就已经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撒下了大网。

在渭华起义的资料堆里，有一份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陕西高等法院判决书》，里面记载了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

渭华起义失败后，曾被革命群众抄过家的高塘镇里寺村大恶霸王振乾、史载笔就凶相毕露，首先杀死了本村共产党员王自勤、王家娃，接着，又带领清乡团扑向堡子底、郑村，将薛子正、李百娃、赵德胜等十几名共产党员杀害。郑村苏维埃委员王振亭躲避在外，王、史二恶霸喝令团丁乱刀砍死王振亭的老父亲。赤卫队员姜羊儿之侄姜进生向王振乾要工钱，王将姜进生吊起来活活打死。进生母亲姜杨氏闻讯后，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女找王振乾面理，三口全被王振乾杀害。进生父亲姜六娃眼睁睁看着一家四口人霎时间全部被害，万箭钻心，提起锄头去拼命，被乡亲们劝住。后来逃往外乡，忧愤交加，死于途中。

王振乾在村里狂捕滥杀后，又勾结高塘县佐李凤池、清乡局头子李镇山，将当地共产党员、赤卫队员统统列入黑名单，送往华县政府，妄图斩草除根。

王振乾及高塘恶霸惨绝人寰的暴行，震怒了华县许多正直之士。他们纷纷到县府控告凶手。县长李跃彩迫于各方压力，下令将清乡局头目李金戌撤职查办，押送西安惩处。

大恶霸王振乾并不甘心，一九二八年九月，他串通史载笔，以“反革命嫌疑犯”将王老虎、王锁娃等三十多人告到华县府，并以重金收买县府上下，妄图将王老虎置于死地。

恶吏李镇山、王硕甫被王振乾收买，以“拒捕”为由，枪杀了共产党员雷绪生，对王老虎等人施以酷刑，百般折磨，将王老虎、王福魁毒打致死。李镇山短短几日连伤三命，在华县引起轩然大波。里寺、东王一带穷苦百姓愤怒地向县府提出抗议，要求严惩凶手。在起义中受到冲击的里寺村绅士孙清贵，与清凝里其他开明绅士挺身而出，联名为王老虎出具作保，与王振乾针锋相对。县长恐事情闹大，祸及己身，将王振乾呈报的黑名单暂时搁置一旁。

一九二九年大旱，关中平原千里赤地。九月，高塘民众愤怒地杀死了携带赃款逃窜的高塘县佐李凤池。王振乾在渭华起义前也当过多年“值年”（收税派款的乡绅），巧取豪夺，贪赃枉法，民愤极大。渭华起义时，革命群众本欲干掉这个鱼肉乡里的恶绅，但他一直躲在西安和华县县城的商号上，无法下手。此时，李凤池因赃被诛，王振乾也胆颤心惊，为了不留后患，他携重金在西安上下打点，买通了陕西高等法院检察官纪镜滋。纪镜滋下令将王振乾密告的王锁娃等人押进西安，以“反革命嫌疑犯”提起公诉。

王锁娃等被押进西安后，再次受到严刑逼供，刘申娃等被折磨而死。王振乾又怂恿纪镜滋将刘申娃的父亲刘德法以“漏网赤匪”罪逮捕审讯。王锁娃、王蛮娃等一二十人生命危在旦夕。在此紧急关头，乡亲们和他们的亲属与党组织秘密取得联系，党组织决定趁此机会再次揭露土豪劣绅的罪恶。于是派人四处联络，找到了倾向革命的陕西省高等法院刑庭审判长张履谦和律师张维。二张知识渊博，正直不阿，同情共产党，慨然应允秉公断案，伸张正义。

一场白色恐怖笼罩下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开始了。

一九二九年九月三十日，陕西高等法院正式开庭，审理王锁娃等人的“反革命嫌疑”一案。

开庭后，审判长纪镜滋正襟危坐，对被告王锁娃等十几人提出公诉。

一向视衙门如履院庭的大恶霸王振乾、史载笔以原告身份气势汹汹地历数王锁娃等“反革命嫌疑犯”的“罪行”。

被告席位上，十几个庄稼汉怒目圆睁，逼视着两个劣绅。

辩护律师张维广征博引，对公诉及原告所列举的罪状——

驳回。一开庭就出现不利局面，王振乾、史载笔始料未及，听出一头冷汗。

“请问原告，”律师在连珠炮似地向王、史二原告提出一连串质问后，突然说，“你们状告王锁娃等人，该不会没有人证吧？”王振乾一怔，随即信口说：“王老虎、王锁娃等焚烧我家。有本村官人蓝引栓、蓝喜春眼见可证。”

审判长纪镜滋传唤：“请证人出庭作证！”

蓝引栓、蓝喜春出庭，说：“并未眼见。”

旁听席上，响起一阵开心的笑声。

被告席位上，王锁娃等人和律师张维都喘了口气。

王振乾又说：“还有证人。”

“谁？”审判长问。

王振乾：“我侄子王益娃的舅父刘金盛亲眼看见。”“传刘金盛！”

刘金盛不愿出庭作证。

连举两证，皆无效。王振乾急得抓耳挠腮，豆大的汗珠从头上不住地流下来，他想了半天，又说：“我侄子王益娃也亲眼看见。”

“传王益娃！”审判长喝叫。

王振乾涨红了脸说：“王益娃在春上已经死了。”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律师张维乘机反攻：“如果王老虎等焚烧王振乾属实，王振乾村子里百十户人家，岂能无人看见？原告所举证人，一人否认看见，一个不肯出庭，另有一人是死人，根本就无法出庭……”律师的辩辞被一阵笑声打断了。

等法庭安静下来后，律师严正地说：“原告出证不能服人，因此，被告罪行不能成立。”

王振乾哑口无言。

张维律师又根据王锁娃等提供的情况，当众揭露王振乾草菅人命，杀人放火，蹂躏百姓，鱼肉乡里的种种恶迹。

局势急转直下，王锁娃等被告你一言我一语，矛头齐指王振乾，庭审顿时变成了控诉，王振乾反被推上了被告席。

审判长张履谦当堂大声宣布：被告王锁娃、王蛮娃等无罪释放。

正义战胜了邪恶。

里寺村的老百姓胜利了。

尽管胜利是有限的——罪恶昭著的王振乾并未受到应有的惩处，法庭判决也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但它毕竟是在渭华起义失败之后，面对强大的镇压机器，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对维护自身利益的一次大胆的尝试。

五十多天的苏维埃教会了他们这样做。

这就是希望……

起义失败后，敌人扑进华县高塘算王村，逮捕了王来栓等七人，拉到北堡老爷庙前，强令跪在大路上。东唐村劣绅杨建善带着人给敌人送饭，敌人问他：“这些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杨建善抢着说：“算王村都是共匪，全村没有一个人好人。”敌人当场将王来栓等七人杀害。杨建善的儿子杨来升是清乡团副团长，杀人不眨眼，带着团丁，几个村子里来回转，不管在哪里碰上参加起义的群众，都当场杀死。

红血流进了泥土，仇恨种在了心里。

对于屠杀算王村革命群众的罪魁祸首杨氏父子，算王村的群众寻找着清算的机会，哪怕一年两年……

一九二九年，陕西关中遇到百年罕见的大旱和虫灾，世道大乱。高塘恶绅的威风也过去了。当各村的老老少少牵儿带女外出逃荒时，算王村的群众却纷纷从外面返回了家园。

与杨家父子算账的时候到了，他们要用自己的手，了却一桩在茫茫黑暗中无法去申诉的公案。

血债累累的杨来升也闻到了血腥，格外提高了警惕，出出进进都带着一帮爪牙，杨建善也整天呆在家里，从不露面。

算王村的百姓极有耐心地等待着。

一九二九年过去了。

一九三一年过去了。

一九三二年过去了。

一直等到一九三二年初，机会终于来了。

一天，在东唐安村负责盯梢杨家的郭恒彦跑到算王村来报信说：“有机会了，杨来升要去临潼栋阳丈人家，只带着老婆菊花和马夫。”千载良机，不可再失。渭华起义时的赤卫队长王占平和赤卫队员王羊娃、王东海、王宇安、王武生、王振华六人立即带着棍棒和土枪赶到杨来升返回必经之地史家湾坡底，埋伏在路旁静等。

太阳落山时，杨来升夫妻坐着马车回来了。这是一个等待了四年的时刻，大家强捺着一腔激愤，一动不动地伏在马路两边。

马车刚一走近，王占平打了一个呼哨，六个人一跃而出，直扑上去。杨来升大惊失色，赶忙伸手掏枪。王羊娃手疾眼快，一棒将杨来升打下马来，滚到沟下。原赤卫队员撵到沟底，发现杨来升满身是血，仰面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王振华十分好奇，顺势踢了一下。不料，杨来升一跃而起，搂住王振华扭打在一起。杨来升

身高马大，王振华渐渐不支，王占平大喝一声：“快上，把狗日的砸死！已经等了四年了，还等啥！”众人一拥而上，将杨来升按倒在地，棍棒齐下，将杨来升打死。

王占平等一不做，二不休，趁热打铁，几天后闯到杨家找杨建善算账，找遍院里院外，不见人影。抓住杨来升老婆逼问，才知老奸巨猾的杨建善藏在天窑里。王占平等连喊数声，上面无人应声。王东海、王羊娃搬来梯子，准备架梯抓人，不料，瓦片砖块从上面雪片般砸了下来。王羊娃急中生智，抱来一堆麦草，捆扎起来，点燃后用竹竿挑到天窑边，点着天窑。不大一会儿，杨建善从天窑掉了下来，已经余息悠悠，牵着一丝魂魄。革命群众没有管他，立即撤走。第三天，这个恶绅就断了气。

那天下午，算王村头的迎春花开了，金灿灿地捧着无数个小太阳。

水火不相容的两个群体在渭华大地上继续抗衡着。

在起义失败的那些日子里，前文中记述过的那个杀害了李万年老人一家五口的大恶霸史明鉴，在圣山路上摆了两把大铡刀，令搜罗来的地痞流氓杜万祥、张思成等把守着，凡是由高塘来的人，他头一摆，刽子手就按铡铡人。死在史明鉴阎王铡下的不计其数。以史明鉴为首的恶霸仅在大王一村就杀害了十七名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和无辜群众，还拆房十二间，拉走骡子五头，以金“赎罪”三十二户，勒索白银二千多两，大烟土一千四百多碗

血沃赤野，仇恨发芽。

一九三一年，趁华县新县长到任之际，共产党员李振杰、马建华等联名上县状告滥杀无辜的史明鉴，终于告倒了大恶霸史明鉴，罚其拿出三百元给遇害的无辜老人李万年过三年。

过事那日，大王村像过年，不仅请来了吹鼓手，还请来了大戏班子。新搭的戏台子上，一副升天落地大挽联悲愤淋漓：

戊辰年父母胞兄丧非命衣棺未备葬礼不周含怨三载常落泪

辛未岁子弟儿孙遇青天泾渭分明屈仇已雪演戏一台报亲恩

革命群众自然知道，血债要彻底讨还，不能靠“青天”，还要靠自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里，共产党员李振杰、马建华等联络了程进里等六人，闯进史家，枪毙了作恶多端的史明鉴。

滚滚渭水，巍巍华岳，是那个浸泡着仇恨的岁月的见证。

第六章 走出渭华

赤旗飘过之后的思考

渭华起义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北中国向旧秩序发动的最有力的一击以失败而告终。

刘志丹拖着病体，裹着尚未散尽的烟尘，从渭华前线回到了西安。他在刚刚搬到东羊市不久的省委机关找到了自己的教师李子洲。

那时，省委组织的几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作为兼管军事工作的省委常委李子洲的心情十分不好。他向刘志丹详细地询问了渭华起义失败的经过，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清涧起义失败了，渭华起义失败了，旬邑起义失败了……”过了好长时间，李子洲才自言自语着说，然后慢慢抬起头，对眼前的这位陕北青年革命者说，“景桂，我们一切都是按照中央指示进行的，我总寻思着，难道我们什么地方错了吗？”

刘志丹看着李子洲，诚恳地说：“也许，我们不恰当地选择了渭华地区发动暴动。”

李子洲一怔，抬起迷惘的眼睛，看了看昔日榆林中学自己的学生，说：“渭华靠近冯玉祥，中央指示我们，陕西要集中力量打击冯玉祥，我们正是按照中央的这一要求发动渭华起义的。”

刘志丹喝了一口水，看着屋外的槐树，低沉地说：“可是我们忘了，在冯玉祥的后院放火，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何况，他是不会允许我们这个钉子楔在他的兵源、物资补给线上的。”

李子洲点点头：“我们当时决定在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只考虑到如果在此地闹成气候，可以切断冯玉祥的运输线。”他苦笑了一下，摇摇头，又说，“可是我们忘了，我们能想到这一点，冯玉祥、宋哲元不会想不到。看来，我们都缺乏打仗的经验。”

刘志丹依然看着屋外，用不大的声音说：“许权中那时想到了。”说罢，稍微停顿了一下，看着李子洲说，“那时候我们对他缺乏公正，包括我。”

李子洲的嘴动了动，没有说话，闷闷地吸着烟，慢慢踱着。踱到门口，他眯缝起眼睛，看着蓝天上疾走的白云，愁绪绵长地对刘志丹说：“景桂，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作出《全陕总暴动决议案》已经一个多月了，可是如今，除了失败的几次起义，再没有新的行动，你说，实现全陕总暴动得等到什么时候？”

刘志丹一怔——他没有想到，直到眼下，他的这位老师的心还放在武装起义上。

显然，即使在陕西各地武装起义已经失败以后，办事认真的李子洲还没有完全放弃由他起草的这个全陕总暴动计划。

“在陕北，李象九的部队打完了，在渭华，许旅又打光了，眼下，冯玉祥、宋哲元对我们加强了控制，新的武装起义，恐怕一时半时发动不起来。”刘志丹说。

李子洲点了点头，无可奈何地默认了。他又踱回到桌子旁坐下，顺手拿起他看了无数遍的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文件已经划满了圈圈点点，那是省委书记潘自力四月初从上海返回时带来的，这是至今为止，省委收到中

央的最后一份文件。李子洲的目光很快落在那段他划了三四道蓝杠的文字上：

……冯玉祥在陕西的势力实际上只有关中道二十二县，陕北为井岳秀所盘踞，汉中则多半在吴新田手中，冯玉祥税收范围和政治军事的号令都仅及二十二县……陕西的反动统治已经到了这样地步，实在不仅动摇不定，简直已在崩溃的过程中。冯玉祥是否在挽救这个危机呢？没有，绝对没有，他在继续作战，一切都是加紧促进这种危机的发展……中央命令陕西省委反冯，并指示不要幻想二军三军可以反冯而要依靠在群众的基础，发动群众的斗争，形成群众的反冯，可是省委并未真实执行这一命令，仍不信任群众力量……

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没有说错，确实，在潘自力赴上海前，中央已经多次指示要以各种斗争形式反对冯玉祥，其中包括武装起义。省委执行得不好。选在靠近豫陕东西大道举行渭华起义，是执行中央决定的一个实际行动，明确就是针对冯玉祥的。潘自力接替耿炳光担任省委书记后，主持召开的第一次省委会议就是研究武装起义的。在潘自力赴上海的三月，李子洲主持下的陕西省委积极策划暴动，到潘自力回来时，渭华起义的前线指挥机关——以刘继曾为首的陕东特委已经成立，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已经完全就绪。李子洲想以卓越的工作，努力摆脱陕西省委一直无法摆脱的机会主义。

一个雄心勃勃的暴动规划已经成熟了，陕东，西府，渭北……他将党在各地的力量进行了周密的研究，并派出了许多共产党员奔赴各地。等到潘自力从上海回来时，已是渭华起义的前夜。他带回来的中央《陕西工作决议案》更加坚定了陕西省委发动武装暴动的信心。

那是一些令人振奋的日子。潘自力回到西安后，向省委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匆匆赶往渭华，亲自部署渭华起义。在潘自力前往渭华的这段日子，李子洲依然代理省委书记，作为兼管军事的他并不比省委书记轻松，为了配合渭华起义，他在积极组织其他一系列大大小小的起义。当然，他也曾考虑过那些起义的结局，他不知道在那些没有党所掌握的任何正规武装力量配合的地方发动武装起义，有没有成功的希望与可能。然而这个念头在他的脑子里刚一露头，他便会很自觉地将它堵回去。他同样也知道，在一项计划已经确定之后，最重要的是领导者的决心。暴动，是全党压倒一切的工作，作为一个老党员，他没有理由怀疑。

如今渭华暴动失败了，其他起义也失败了，李子洲在迷惘中还夹杂着一丝内疚。他不知道中央此时是否知道渭华起义失败的消息，中央怎么看待这次起义的全过程。唐澍牺牲了，许权中旅打光了，渭华地区乃至整个关中，笼罩在一片腥风血雨中……刘志丹说得对，新的暴动一时半会难以再发动起来。

看来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的《全陕总暴动决议案》，在眼下已经成了一纸无法付诸实现的空文。

想到这里，一丝愁绪又袭上了李子洲的心头。

李子洲和刘志丹都没有说话，屋里的空气沉闷。一架老式挂钟有气无力地打了五下。

“老师。”刘志丹轻轻喊了一声，打破了屋里的沉默，“省委对我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吗？”

李子洲沉吟了一下，说：“关于你的工作问题，省委有两个意见供你考虑，如果你愿意，可以依然做省委与中央间的联络工作。你到许权中旅之前，一直在西安和上海之间跑，有了这方面工作的经验。你可以考虑一下。”说到这里，李子洲停了下来，让他想一想。

刘志丹问：“另一种考虑呢？”

李子洲说：“依然搞武装。”他用热切的目光看着自己昔日的学生，说：“省委清楚，眼下，党所掌握的两支部队都打光了，在这个时候搞武装等于白手起家，很困难。”

刘志丹的目光里露出了倔强的神色：“老师，革命要想取得成功，没有党所掌握的武装不成，如果省委同意，我想回到咱们陕北去。”

李子洲明白了他的意思，微微点了点头，示意他说下去。

刘志丹抓着李子洲的手，急切地说：“渭华起义失败后，找想过好长时间，在靠近大城市搞武装不是个办法。”

李子洲默认地点点头。

刘志丹接着说：“老师，我想回到咱陕北的山旮旯里去，在山沟沟里、梢林子里去拉队伍，搞武装。咱那里山高皇帝远，人熟好办事，扑下身子，干他个三年五年，不愁闹不起一支咱共产党的队伍来。”

李子洲被刘志丹一番热辣辣的话打动了，紧紧握住他的手说：“景桂，你的想法太好了！毛泽东发动了秋收起义之后，就把队伍拉到了井冈山，在那里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看样子，共产党搞武装斗争，就得走毛泽东的路子。省委也有派你回陕北搞武装的打算。”

“省委同意了？”

李子洲更紧地握住了刘志丹的手：“景桂，回陕北去任重道远。”

刘志丹感到了握着自己的那只手的分量，他激动说：“我争取给老师交一份合格的答卷。”

李子洲笑了：“合格？我记得在榆林中学，刘景桂交的答卷可都是优良啊！”

刘志丹也笑了。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刘志丹对李子洲说：“老师，我走了。”

“还来吗？”李子洲问。

“不来了，我准备明后天就动身去陕北。”刘志丹说，“希望能经常得到省委的指示。”

“好，祝你成功！”李子洲又一次握住了刘志丹的手，“省委的指示会通过交通及时地传给你。”

刘志丹忽然注意到李子洲充满血丝的眼睛，关切地说：“老师，这些日子你太劳累了，要多保重。”

李子洲：“你也要多保重。”

“再见！”

“再见！”

刘志丹走了。

李子洲点上一支烟，陷入了少有的孤独中。

他盼着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情况的蒲克敏快点回来，已经三四个月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了。

陕西的革命又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上，他需要中央的指示。

李子洲当然不会得知，就在他因为无法实现全陕总暴动而焦灼的时候，党中央正在纠正自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就已经开始了的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

与中央失去联系的陕西省委，对几个月中央发生的一切都一无所知。不仅不知道共产国际批评中国共产党“左”倾盲动错误的文件《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和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的关于立即停止盲动主义的中央第四十四号通告，也不知道刚刚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对“左”倾盲动主义的批判。

从四月中央政治局发出四十四号通告起，“左”倾盲动主义即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已基本结束，而陕西的渭华起义却正在热火朝天的拉开序幕。

更意味深长的是，六月十三日，也就是“六大”召开的前五天，年轻的陕西省委在第三次扩大会议上还通过了《全陕总暴动决议案》，鼓动几乎没有任何胜利希望的各地新的暴动。

其实，一九二八年陕西境内发动的几次武装起义，恰恰都在中央已经开始清除“左”倾盲动主义的时候。如果能及时得到中央信息，渭华起义的历史完全有可能改写。

然而，历史却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中央正在批判着的东西，陕西省委由于不能及时得到消息而依然在坚持。处于幼年期的陕西省委对于中央是忠诚的——他们相信党的大脑，但是此时的中央同样没有脱离他的幼年期。

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及时地制止了在全国蔓延的“左”倾盲动主义，严肃指出，盲动主义者过高估量反革命营垒崩溃的速度和程度，否认一切武装起义应有的条件，热衷于依靠少数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中》，中央这样形象地描述了盲动主义泛滥时的党的指导思想：

.....以前在机会主义之下，曾经为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动。现在又在盲动主义之下，为反对国民党而命令群众不准不动.....

关于这一切，陕西省委只字未闻。善良而忠实的潘自力、李子洲们依然在为克服中央三月以前对陕西“机会主义”的批评，把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发动武装起义上，致使大革命时期党在陕西积蓄起来的一点革命武装损失殆尽。

中共中央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一日发出的第六十号通告中，承认了对陕西等省几个月来失之指导：

中央三个月来，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事实上断绝了联系外，对各省都不断有各别的指导。

中央

即使到了此时，陕西对中央政策上的急转直下依然一无所知。

十月八日，中共中央给陕西省委发出了指示信，在分析了陕西革命斗争有利与不利因素之后，严厉指出：

.....因为革命主观上的这些弱点所以客观上虽极有利于革命的发展，而广大的群众斗争仍是不能起来。因此陕西目前工作的路线就是要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的革命的情绪，建立群众的组织，健全党的组织来加强革命的主观力量。过去党的暴动政策犯了极深的盲动倾向，必须严厉的纠正。因为不单是不能推动革命的发展，并且可以损害革命的力量.....

中央指示省委要以“六大”决议为准绳，克服只是“幻想暴动，一味盲目”的错误。直到此时，陕西省委才听到中央纠正“左”倾盲动的声音。省委收到中央指示信后即派省委常委蒲克敏去中央汇报工作，领取“六大”文件。

十二月，蒲克敏才带着“六大”文件返回西安。此时，省委书记潘自力已被逮捕，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组织省委常委传达学习了“六大”文件和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之后，他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中。

教训使这位党在陕西的最早活动家重新回顾刚刚结束的流血。

渭华起义的失败，客观上固然由于敌强我弱，敌众我寡，但冷静下来考虑，不难清理出导致失败的头绪：首先，省委乃至中央时陕西形势的估计是主观的，片面的，盲目的，认为“冯玉祥就要垮了”，“潜伏待发的斗争一触即发”，因而采取了一些过“左”的政策；如对土豪劣绅和催粮收款的差人，采取肉体消灭办法，过多杀人烧房子，引起群众反感。在陕军李虎臣反对冯军的战争中，不知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争取同盟军，而是不加区别，一律反对，结果树敌过多，孤立了自己，使起义部队处于北有冯军南有陕军的两面夹击之中。其次，军事指挥上，在优势敌人面前，不懂得进行游击战，而是采取打硬仗、拼消耗的阵地战。加之侦察情报失误，从一开始就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第三，仍然受以城市为中心思想的影响，选择渭华地区发动起义，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当时省委认为渭华地区党团工作有基础，群众条件好，地处豫陕要道，距西安近，在渭华地区实现武装割据后，可进一步威胁西安进而占领西安。事实证明，这只是起义发动者的一厢情愿.....当然，还有，比如，渭华起义中工农革命军对于许权中等人的排斥；再比如，主要军事指挥员的过于自负的独断.....

在一个难以入睡的暗夜里，李子洲披衣下地，踱到窗前，用浓重的陕北方音朗声吟道：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辱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吟罢，李子洲的嘴角浮上一丝笑意。

昨天，过去了。

他期待着明天。

渭华起义使没有摸过枪的李子洲了解了战争——尽管还很肤浅。

他渴望着再组织一次起义.....

被出卖的省委书记

渭华起义失败之后，三秦大地又一次笼罩在白色恐怖中。

西安成了一座阴森森的城市。大街小巷布满了敌人的密探，侦察共产党的机关和陕西省委领导人的住址；捉拿起义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的通缉令贴在几乎每一根电线杆子上；宋哲元亲自签署了戒严令，全城无限期实行宵禁；军警敲着锣，一遍一遍地吆喝着：“街上行人，不准三五成群，不准交头密语，违者以军法论处！”夜深人静时，常有拉着警笛的警车从街上驶过，给寂静的黑夜留下无边的惊悚……

关中道上，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武装疯狂“清乡”，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有的被捕了，有的被杀了，也有的逃跑了。叛变了，革命阵营里，崇高者和卑劣者共同串演着一出交织着崇高与卑劣的活剧。

西风打着呼哨掠过熟睡了的西安古城，昏黄的路灯凝冻在十一月的寒夜里，街上已经绝了行人。间或，有一声两声狗叫猫叫，剩下的动静，就只有军警的皮靴在石子路面上发出的“刷刷”

声。

一位穿着长棉袍的青年穿过鼓楼十字，走到西大街口的时候，掏出怀表就着路灯看了看，差一刻凌晨一点。他四下打量一下，穿过马路，走进广济街，一直朝南走去。

他就是国民党特务千方百计要捕获的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

现在是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凌晨，他要去的地方是太阳庙门街。昨天，长安县委秘密机关突然遭破坏，脱险逃到西安城里的县委领导人定在今天凌晨一时在太阳庙门召开县委紧急会议，讨论应急措施和布置新的斗争。长安县委负责同志向省委报告后，省委书记潘自力决定亲自参加他们的会议。

潘自力匆匆地走着。

穿过大保吉巷，拐了一个弯，就到了太阳庙门。一里多长的太阳庙门街只有一个路灯，他吃力地找着嵌在每一个门洞里的门牌，终于，他找到了县委同志告诉他的三十八号。

门紧闭着，他推了推，没有推动，就抓起大门上的铁环，轻轻敲了三下。大门从里面打开了。

潘自力一只脚刚一跨进门，就被一直藏在门后的三个特务抓住了。

潘自力环顾前后，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院子里，没有长安县委的一个熟人。原来，就在他到来之前，由于叛徒告密，敌人刚刚抓走了长安县委来开会的张新法、李良、亢心裁、杜松涛等人。

“你是潘自力？”一个看上去满脸杀气的特务问。

潘自力稍一怔，但随即又冷静下来，说：“不，我叫田树荣。”

“田树荣？”敌人狐疑地问，“哪里人？”

“蓝田县人。”潘自力坦然地说，“田和村的。”“胡说！”敌人大声吼道，“你明明是共产党！”

潘自力摇摇头，说：“不，我是个商人，贩布的，不信你们到田和村问去。”

敌人将信将疑：“田树荣？兄弟几个？”

“还有个弟弟，叫田振荣。”潘自力说。

“你这啫，还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一直蹲在院子里抽烟的一个特务走了过来——看样子他是个领头的，他用烟头的火星在潘自力脸前晃了晃，突然问，“你到底叫啥？”

“田树荣。”

“哪里人？”

“蓝田县田和村。”

“干啥的？”

“商人。”

“商人？半夜三更到这里干啥？”

“找朋友来要债。”

特务头头指着院子说：“朋友呢？姓啥名谁？你从这个院子里拉出来让我看。”

这时，潘自力已经猜到出了叛徒，供出了自己，他知道敌人不会相信自己的话，但他还是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刚才说过的话。特务头头发了一阵愣，然后对另外两个特务说：“看样子不来点硬的这家伙不会老实，来！把他拴到门框上，给我打！”潘自力被吊到了门框上，满脸杀气的特务上去就是三鞭子，问：“你到底是干啥的？”

“商人。”

又是一鞭子：“还不老实？”

潘自力不说话。

“老实点，陕西共产党的机关在哪里？”特务问。

“我说过了，我是商人。”

又是一阵鞭打。

潘自力始终不改口，一口咬定自己是田和村的田树荣——他曾在田和村住过两晚上，那家的后生确实叫田振荣，潘自力曾对田振荣说过，万一自己被敌人逮捕，就用田树荣这个名字，假如敌人到田和村来问，就说是他哥。所以潘自力一口咬定自己是田和村的田树荣并不心虚。

特务问不出什么，就把潘自力送进了军法处监狱。经过一番审问后，敌人一无所获，便将叛徒找来辨认。碰巧叛徒只知省委书记潘自力的名字，并不认识他。辨认时，潘自力镇定自若，先发制人地问叛徒：“你说我是潘自力？”

在潘自力的逼视下，汗从叛徒的脸上流了下来，嘴蠕动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潘自力继续追问：“仔细看看，是不是？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叛徒终于不知所措地摇了摇头。

两个月的审问过去了，敌人始终没有弄清潘自力的真实身份。就在敌人准备释放“田树荣”的时候，由于叛徒出卖，陕西省委又遭到空前的破坏，有人暗中向省府告密，说“田树荣就是华县高塘的潘自力”。形势急转直下，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和陕西省党部的头子延国符立即赶到监狱。宋哲元当场指明潘自力的真实身份，潘自力淡淡一笑，没有说话。宋哲元又威胁潘自力把共产党组织的情况讲出来，潘自力平静地说：“没有什么可说的。”这些天，经常有人被从监狱里拉出去枪毙。潘自力也早已抱定了赴死的决心，因此，任凭敌人严刑拷打，他对党的机密只字不露。

敌人并没有立即杀死他。他被戴上手铐脚镣，关在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对于中共在陕西的这位重要人物，宋哲元还没有完全失去希望。

就这样，潘自力在监狱里整整呆了两年。

一九三一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已归附蒋介石的陕军杨虎城于十月底率部入陕，盘踞陕西多年的冯系宋哲元、刘郁芬部败退入晋，其军政官吏及爪牙仓皇逃窜。一天早上，监狱没有人来开门放风，也不送饭，潘自力和“政治犯”们在牢房里大声呐喊抗议，后来来了个做饭的，说杨虎城打进城后，军法处的人都跑光了。说着，他把牢门上的钥匙交给了犯人们，说：“我也跑呀，一个皇帝有一个皇帝的犯人，你们想跑就跑吧。”潘自力就这样和政治犯们一起逃出了监狱。

潘自力出狱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一九三一年一月，他由西安到上海，也未找到党的关系。从此，他不但失去了组织关系，还由于两年的铁窗生活，使他受到了无法申辩的误解。

一九三一年四月，受杨虎城资助，潘自力与同时出狱的蒲子政、亢心裁一路出国，蒲、亢二人去了英国，潘自力来到法国。七月底，参加法国反帝大同盟中国分部。一九三二年六月，他由法抵英，在伦敦参加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九月，又回到法国。一九三三年一月，在苏联参观学习。五月，回国抵达上海。八月回到陕西。一九三四年七月中旬，衔中共上海中央局之命去川陕革命根据地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周折，才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到达川陕苏区的苍旺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并不欢迎潘自力的到来，派人秘密监视，限制行动自由。直到三月初才分配到中共川陕省委工作。五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两次爬雪山过草地。一九三六年九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前夕，方面军党务委员会在甘南岷县决定：潘自力重新入党，候补期两年。潘自力当即声明，与中央会合后，如有同志证明他的组织关系，应立即恢复他的党籍。

关于潘自力被捕的这段历史，中共中央组织部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在延安正式作出结论：

一、潘自力一九二八年被捕与一九三一年出狱整个过程中并无任何失节之行为，一九三一年出狱后接受杨虎城帮助到外国留学并无不利于党的情节，过去对潘自力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

二、潘自力回国以后在党不完全信任的情况下，仍始终如一的为党工作，没有怨言，这表明他对党是忠诚的。

三、恢复潘自力的党籍，在政治上应该完全信任他。

此结论经刘少奇、彭真、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胡耀邦等传阅后，由中央组织部于同年八月一日电告潘自力所在的晋察冀分局，并通知了潘自力本人。

一九五二年九月，四十八岁的潘自力再次担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潘自力转入外交工作。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朝鲜、印度、尼泊尔、苏联等国大使。

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和迫害。

一九七二年在山西省霍县含冤逝世。

七年之后，在北京举行了潘自力的追悼会。

李子洲之死

一九二九年一月下旬，陕西富平美原镇。

在镇上的一座民宅里，陕西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已近尾声。

这是负责宣传的省委常委蒲克敏从上海回来后，为贯彻“六大”精神，总结陕西省委“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的会议。

会议开始，由代理省委书记李子洲主持（此时，潘自力已被逮捕），由于在渭华起义的准备阶段，省委书记潘自力在上海，由李子洲代理省委书记，主持省委工作，加之他又是分管军事的省委常委，因此，在清理陕西的“左”倾盲动错误时，他自然成了批评的主要对象。

另一位受到激烈批评的则是负责秘书工作的省委常委、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

会上，李子洲没有为自己辩解。

会议结束时，会议主持人已由李子洲换成了曹趾仁。在这次会议上，曹趾仁当选为省委书记，李子洲仍任组织委员。

年轻的曹趾仁几乎与张金印一样激烈，在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三日举行的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他被选为负责共青团工作的省委常委，在同月召开的团省委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接替张金印成为团省委书记。

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后的第三天，团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在蒲城荆姚小学召开，马云藩接替曹趾仁当选为团省委书记。

新当选的党、团省委书记曹趾仁、马云藩二人不久即相继叛变，导致了陕西党、团组织的一次空前劫难。

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陕西的政治经济形势正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从一九二八年秋天开始，全省大部分地区发生旱灾，陕北、关中已连续五年大旱，以一九二九年为最甚。据陕府救灾委员会一九二九年四月调查报告称，截止一九二九年二月，全省灾民共达六百五十五万多人。到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全省因灾死亡人口二百五十万人，逃至外省度荒的人达四十万，全省人口从九百四十万锐减至六百五十万。关中各县最为严重，如眉县原有九万零七百四十六人，死亡六万九千二百九十三人；泾阳绝户三千四百余家；千阳人口由十五万减少至十万。全省十九个县的弃耕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陇县、蓝田、榆林、紫阳、永寿五县弃耕地百分之百。许多地方十室九空，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农村经济破产，加之渭华起义后国民党陕西当局疯狂“清党”、“清乡”使党在农村中的基层组织、农会组织几近消亡。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被捕被杀。农村和城市，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一些共产党员纷纷躲避、脱党乃至叛变，党员人数急剧减少。渭华起义前的一九二八年春，关中各县党员已发展到二千六百多人，到一九二九年初，仅剩下了二百五十名。

叛变、告密成了陕西党、团组织的主要威胁。

一九二九年一月底二月初，几乎与陕西省委在美原镇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同时，变节分子正在西安上演着一出极其肮脏的丑剧。

丑剧由在妇女协进会工作的团员肖桂藩（女）拉开序幕。一月下旬，肖桂藩在《新秦日报》登报自首，供认自己的团员身份，并出卖团员刘秀英。刘被逮捕后又供出团省委委员程士诚（即程思诚）。这时，参加了党省委第四次扩大会议和团省委第三次扩大会议的党团负责人已陆续返回西安。一天

早晨，程士诚刚从借宿的一个菜铺里醒来，还没穿好衣服，几个汉子就破门而入，把他押上了警车，一直拉到军事裁判处看守所。敌人几乎没有费什么周折，就从程士诚口中得知了团省委成员的住处和红埠街的团省委机关。程士诚的第一位受害者是团省委组织委员李大章（渭华起义时，他被派往陕东特委，任宣传委员，起义失败后秘密返回西安，依然在团省委工作，团省委扩大会议后；改任组织委员）。当时他住在程士诚的家里，程士诚叛变的当天下午，就引敌人将他逮捕。二月一日，团省委机关被查抄，敌人逮捕了团省委书记马云藩及他的老婆高玉兰以及临时住在他家的团省委宣传委员刘映胜。马云藩经不住敌人威吓利诱叛变，招出了省委书记曹趾仁在早慈巷的住址。二日深夜二时左右，马云藩带着敌人闯入早慈巷曹趾仁的家，将他从床上抓起，绑在屋梁上用鞭子狠命抽打。曹趾仁受刑不过，当即叛变，供出了省委机关在鼓楼化觉巷的地址（这一时期，省委机关经常改变办公地址），并答应给敌人带路抓人。曹趾仁、马云藩带着敌人连夜赶到化觉巷，翻墙越入院内，将住在这里的李子洲、刘继曾和一个名叫任青云的女交通逮捕。三日上午，省委常委蒲克敏、徐梦周先后到省委机关接头，又被等候在这里的特务逮捕，同日，到曹趾仁住处接头的团省委委员王友章也落入敌手。至此，陕西党、团的主要负责人全部被捕入狱。

他们几乎都被关进了宋哲元设在西华门的军事裁判处看守所。

陕西省委的工作暂时中止。

一阵尖利的哨声之后，各个牢房的门都被打开了。

随着镣铐在地上拖出的“哗哗”声，被誉为“西北的守常”（李大钊字守常）的李子洲艰难地走出了牢房。

他的脸上，有几道结疤的血痕，灰布棉袍有几处露出了棉花——这都是受刑后的印迹。他走到狭长的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天很阴沉，灰白色的天空毫无生气，两只寒鸦在看得见的那一片天上飞来飞去，“嘎嘎”地叫着，总不远去，给这可憎的高墙内又增添了另一种凄凉。

一阵脚镣声正在接近李子洲。他扭过脸去，向那声音看去，是新任省委书记曹趾仁。

曹趾仁的脸上也是血痕。

李子洲脸上露出了一丝鄙夷的笑容。昨天夜里，敌人到化觉巷来抓他时，他不仅看到了穿着军装、拿着盒子枪混在敌人里的马云藩，被押出大门时，还看见了站在门道外面暗影里的曹趾仁。

曹趾仁正在向自己走来，从他移动时的艰难程度可以推断出他受过不轻的刑罚。

“子洲同志，这是咋弄的？”曹趾仁蹭到李子洲跟前悄悄问。

李子洲从近视眼镜后面笑着看看他，没有说话。

曹趾仁脸红了一下，又说：“马云藩不是个东西，把我出卖了。”

李子洲依然那样笑着，看着他：“你也挨打了？”

曹趾仁：“嗯，他们折腾了少说也有两个钟头，皮带打断了两根。”

李子洲虽然已经得知曹趾仁叛变，还是告诫说：“有时候牙一咬什么都能过去。”

曹趾仁的嘴张了张，没有说出话来。

哨子又吹响了，两个背着枪的看守吆喝着：“进去咧，进去咧！”朝他们走过来。

李子洲看着曹趾仁，一字一板地说：“我送你一句咱们都知道的古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说罢，拖着脚镣向牢房走去。

李子洲入狱的第四天，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来到看守所，亲自提审李子洲。

“我是奉宋主席之命来看你的，希望你能与我们很好合作。”肖振瀛客套两句，然后问：“初次见面，应该先认识一下，鄙人是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

李子洲点点头，没有说话。

“你呢？可以介绍一下吗？”肖振瀛问。

“陕北绥德人，做生意的，现在家住闲。”李子洲随口说道——他并不想指望敌人会相信自己。出了叛徒，自己已经暴露无遗，但他又不想从自己口中向敌人说出自己的名字。

“李子洲。”肖振瀛笑一笑喊出了他的名字。

他微微笑了笑，说：“我想你已经知道了。”

“共产党里的大头头嘛，我哪会不知道。”肖振瀛不无得意地笑着说，“不但知道你的名字，还知道你当过共党的省委组织部长、军委书记，代理过省委书记，前年筹划清涧暴动的是你，去年策动渭华暴动的也是你，对吗？”

李子洲又点点头，故意说：“你没说错，但你却没有说全，我还组织了其他一些暴动，如果你们不抓我，我还准备再组织几次暴动。”

肖振瀛忍住恼怒，说：“可惜你如今办不到了。”

李子洲摊开双手，说：“因此，我很遗憾。”

肖振瀛冷笑了一下，说：“甭跟我演戏了，现在我问你，你们省委还有哪些人在潜逃，各县还有哪些共党组织在活动？”

李子洲摇摇头，冷淡地说：“不知道。”

“不知道？”肖振瀛从鼻子里哼一声说，“谁不清楚你是陕西共党里的‘老头子’，陕西凡是有点名气、有点地位的共产党员，哪个你不认识，不知道……”

李子洲打断了他，说：“也许我知道，但是，你想我能告诉你吗？”

“咋不能？你今天告诉了我，明天我就放你出去。”肖振瀛说。

“你说，若真那样，我还叫人吗？”李子洲问他。

肖振瀛一怔，嘴角露出一丝冷笑，说：“既然如此，我就告别了。”悻悻走了。

当天晚上，从李子洲住的牢房里，传出了阵阵吆喝声、皮鞭声，隐忍的呻吟声……

第二天，李子洲没有出来放风……

一天早晨，院子里吹起了紧急集合号。几十名被押的政治犯都被集合到看守所门口，李子洲也被大家搀了出来。

犯人集合后，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走了进来。他一眼就看出了李子洲，朝他不失礼貌地招了招手。

李子洲看看他，没作任何反应。

他们两人很熟——一九二七年初，国民军联军进入西安后实行国共合作，李子洲被选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部长，后来又担任了中山学院副院长兼总务长，与当时任冯玉祥第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宋哲元多有

接触——宋哲元走到镣铐缠身的李子洲身边，说：“李先生，还记得吧？”

李子洲：“记得，宋将军。”

宋哲元：“我今天特地来看看你和你的这些同事们。”

李子洲：“那我还得感谢你了？”

宋哲元被噎了一下，一时说不出话来，过了一阵才说：“李先生，以你的才学，若致力于教育，定会有大建树，不知为什么偏偏迷上了俄国的列宁？列宁有什么好处？”

李子洲：“这你就知道了，首先，列宁不只是俄国的，他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至于说列宁有什么好处，他主张实行共产主义，人人平等，如果他的主张实现了，这个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剥削与压迫，就再也没有穷人富人之分，你说，他不好吗？”

宋哲元微愠道：“李先生，我不是来听你宣传的。”

李子洲淡淡一笑：“我是在回答你刚才的问题。”

宋哲元：“李先生，本来我想特意关照你一下。”

李子洲：“是吗？我又要感谢你了。”

宋哲元压住恼怒，说：“念及你我往日之交，我想放了你。”

李子洲：“有条件吗？”

宋哲元：“我如果把你放了，你还干共产党吗？”

李子洲一笑：“我知道你不会放我。”

宋哲元走了。

李子洲拖着铁镣又回到了牢房。

不久，他便病倒了。

春天悄悄地来了，又悄悄地走了，监狱的院子里，已经很难看到李子洲的身影了。放风时，难友们只能从号子的小窗口，透过刺鼻的恶臭，看一眼整日躺在一堆破棉絮上的陕西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者。

夏天来了，苍蝇蚊子肆虐起来，虚弱的李子洲又染上了伤寒，身上忽冷忽热，常常处于昏迷状态。刘继曾等狱中战友联名要求保外就医不准，又要求将李子洲送到外面去治疗，依然不准。只准狱外友人请医生到狱中来探诊。医生要求将脚镣去掉，反动当局置之不理。

奄奄一息的李子洲经常双眼紧闭，咬着牙，痛苦地一分一秒地捱着。

李子洲的最后时刻，在医生和难友们的强烈要求下，军事裁判处处长肖振瀛才派人来给他卸脚镣，他却愤怒地摇摇手，说：“不用了。”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八日深夜，三十七岁的李子洲带着脚镣，静静地离开了人间。

共产党人没有忘记这位陕西革命的播火者。一九四四年二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李子洲的出生地绥德西川地区新成立了一个县，以李子洲的名字命名，从此，在中国的版图上，又增加了一个子洲县……

中国的“罗宾汉”与他的战友们

一九三七年十月，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出版的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首次向世界介绍了刘志丹。他是这样开始对刘志丹的描述的：“远在西北的群山里，另一位黄埔军校学员刘志丹为陕甘宁苏区打下了基础。刘志丹是个现代罗宾汉，怀有山里人对富人的仇恨；在穷人中间，他成了救星；而在地主和放债者中间，他又是天上的神鞭……”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谢子长受省委派遣，先后回到陕北。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

他们最初的步履是艰难的。

一九二九年春，刘志丹和陕北特委的杨国栋、白明善、刘澜涛、李力果等先后转移到陕北第一重镇榆林。特委代理书记杨国栋生活浪漫，在米脂时就曾演出过一出“凤仪亭”的丑剧，到榆林后，作风更加腐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政治上，热衷于和井岳秀部上层军官来往，还企图在井部正式挂个军官头衔。在党、团组织和社会上影响很坏。为了整顿陕北特委，于阴历三四月间，在榆林城北的红石峡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十几天，集中批判了杨国栋单纯结交白军军官的所谓“军事工作”观点，讨论了加强武装斗争的问题。会议统一了认识，认为党的军运工作应该分为三部分，即白、灰、红三种形式。白是派党团员到国民党部队中去工作，灰是作土匪工作，红是公开组织革命武装——红军。会议对军事工作的具体部署是：派党员向孝慈、高克林去井岳秀部（高因故未去）；派一部分人到盐池王子元部和后九天杨庚武土匪部队中去开展工作。

会议最后撤销了杨国栋特委代理书记的职务，派他到后九天的土匪部队搞军运工作，但不久他就叛变了。

刘志丹依然担任特委军委书记，他提出回保安搞武装的计划，被会议通过。

会后，刘志丹赶回了自己的家乡保安。

在没有一点基础的情况下抓武装，犹如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路，困难不言而喻。

刘志丹首先打算把保安县民团抓过来。

此时的保安民团团总叫路仰之。路仰之原是“哥老会”里的“大爷”，不识字，却练过武，横行乡里，恶行昭著。他当上团总后，更是有恃无恐地刮地皮，派款派捐，巧立名目，什么弹药费、慰劳费、服装费、鞋袜费、下乡费、抓逃犯费等等，应有尽有。不仅老百姓痛恨，连一些地主老财也怨怒怫然。

刘志丹与共产党员王子宜、曹力如（均为保安人，与刘志丹小学、中学同学）商量后，决定发动群众向县府请愿，改选民团。由曹力如做绅士的工作，争取他们上书县长；王子宜则秘密串联党团员和可靠群众，散布“黄埔军校的刘志丹回来了，能文能武，要当团总”的消息。其他党员分头到保安各区各乡向群众广泛宣传路仰之鱼肉百姓的罪状，发动群众向县长请愿，更换团总

短短几天时间，保安的士绅百姓就被发动起来。几乎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到县政府的院子里请愿，县长的桌子上，告路仰之的状子堆积如山。

竞选团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一天，王子宜带着由各乡父老士绅签名的“条陈”和搜集到路仰之的几十条罪状，来见县长崔焕九。

崔焕九将“条陈”、状纸翻了一阵，问：“将路仰之选掉，谁来当团总呢？”

王子宜乘机说：“人就在眼前摆着哩，刘景桂，既是保安的人才，又是你的学生。”

崔焕九犹豫一阵，说：“好吧，众意难拗，三天后，在你们学校请本县绅士、父老开场选举。”

消息传出，轰动了永宁山。路仰之和刘志丹都加紧了竞选前的准备工作，双方活动都十分紧张。

选举如期进行。

快见分晓时候，从外面忽然走来了二十多个弯腰驼背的老汉，路仰之笑一笑，对县长崔焕九说：“他们都是远乡绅士派来参加选举的代表。”

形势急转直下。

这是路仰之玩的一个花招，双方力量对比顷刻间发生了变化。

刘志丹一怔，但他马上镇定下来，拿起笔，在手心里写了“学生”两个字，伸给王子宜看。

王子宜立即明白了刘志丹的意思，马上走出会场。这时，刘志丹从容不迫地对县长说：“县长，外面有二三十个远乡绅士的儿子，大人不能来，派他们来投票，你看咋办？”

县长想了想说：“既然有派老汉来的，派娃娃来的当然也得算数，就让他们进来吧。”

选举结果出来了，刘志丹当选为保安民团团总，曹力如当选为副团总。

从此刘志丹以民团团总的合法身份，开始了公开的武装斗争活动。

几乎与刘志丹竞选保安民团同时，黄龙山凤凰山的山大王梁占奎正在为刚来乍到的谢子长把盏接风。

大厅里摆了七八张桌子，首席桌子上，梁占奎与谢子长并肩而坐，梁占奎端起酒，拜天拜地之后，斟满一碗酒，高举过头，说：“今天，为了欢迎沙场名将谢子长，弟兄们干了这杯酒！”说着，带头将酒灌了下去。

子长环顾四周，大声说：“子长在宜川学武时，曾得到梁大王与众位兄弟的帮助，前番渭华兵败，今日不得已来投靠梁大王，蒙诸位不嫌，如此款待，子长感激不尽。在这里，我先祝梁大王兵强马壮，前途无量！”

之后，在梁占奎的大厅里出现了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智斗座山雕的戏剧性场面，之后，就在这里“落草”了。

不久，梁占奎联合黄龙山的另一个山大王黑老一，攻打宜川县城冯玉祥部守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在硝烟弥漫的宜川城下，梁占奎与谢子长挥泪而别，各走他方。

为了枪，刘志丹、谢子长和黄土地的山山峁峁间不停地奔走着，奋斗着，他们注定还要经过多次摸索，遭受多次失败。

他们把目光投向了陕甘边界地区。

当时的陕甘边界地区北至定边，南至淳化、耀县的桥山山脉，是个“三不管”地区，军阀统治比较薄弱，不少土匪搞上几条枪就可以割据一座山头，一些因反抗压迫走投无路的农民也常在这里聚义，封建社团如哥老会、青洪帮也在这里占有地盘。刘志丹看清了这个特点，就提出了“占山头闹革命”

的口号，号召党团员都走出城市上山去，他常说，连土匪都可以在这里称“山大王”，弄得军阀无可奈何，难道我们共产党人就不能在山上站住脚？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刘志丹、谢子长利用亲朋旧友各种关系，先后打入陕甘边界一些军阀和民团进行兵运活动。

一九三一年，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的前夕，冯玉祥调兵遣将，把他在甘肃宁夏的部队都调往河南参战。为了控制后方，委任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为宁夏骑兵第四师师长，留守宁夏平罗。苏雨生视兵如命，乘机招兵买马，不管以前是什么旗号，只要投到他的麾下，一律收编。

刘志丹、谢子长看中了这个搞“白色”军运的好机会，先后打入苏雨生部。

先到苏雨生部的是谢子长，他被任命为十一旅旅长。虽然是个“光杆”旅长，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拉人马。他上任不久，就到榆林、绥德一带招了近百名学生兵，这些兵大多是中共党员和积极分子，日后成为十一旅的骨干。

刘志丹紧随其后来苏部，被委任为十六团中校副团长，团长是与刘志丹还沾点亲戚关系的同乡张廷芝。

在刘志丹、谢子长的建议下，陕北特委派张秀山、贺晋年、张东蛟、高鹏飞等一大批党团员相继进入苏雨生部工作，并在苏部秘密建立了党的军委（书记张东蛟），使党的工作在苏雨生部秘密开展起来了。

正当苏雨生招兵买马、扩充实力的时候，冯玉祥却调他驻守陇东。而西北“五马”（即马鸿宾、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青宛）也恐苏雨生在陕甘边坐大，危及回马势力，准备在苏雨生东调之时，将其消灭。

刘志丹、谢子长研究决定，苏马一旦开战，党在苏雨生中控制的各部立即返回陕北、陇东庆阳五属区（即庆阳、环县、宁县、合水、正宁五县），借扩兵之名，独立发展。

不久，“五马”果然向苏雨生部开战，在能征惯战的马家军面前，苏雨生不堪一击，退至下马关一带，乞得杨虎城保护，所部被编为一个骑兵旅，驻在陕西彬县城内。

乘着苏马开战，刘志丹、谢子长带着部队撤向吴旗洛河川、三道川一带，保住了部队。

部队来到吴旗三道川后，陇东庆阳五属清乡司令谭世林为了壮大地方势力，主动提出收编。刘志丹、谢子长考虑到兵力单薄，军饷无着，独立发展尚有困难，答应收编。为了加重收编的筹码，谢子长二次赶到宜川后九天，拉出了土匪武装周维琪营二百人。此时，刘、谢所部共有四百多人，被谭世林改编为直辖第三团，谢子长任团长，刘志丹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周维琪任一营营长。

谁知刘志丹离开苏雨生部十六团后，团长张廷芝也跟着投到谭世林门下，也被谭任了一名团长。眼看共产党员谢子长、刘志丹在三道川一天天壮大，张廷芝又恨又怕，决定趁其羽毛未丰，先下手为强，将其消灭。他将突破口放在了土匪出身的周维琪身上，先将形容出众的胞妹张够够许配给周维琪，又使计解除了周营的武装。然后率领二百多名骨干直奔三团团部驻地水砭台，迅速包围了村子，将团长谢子长住的窑洞围了个密密匝匝。张廷芝朝窑里大喊了几声，没有动静。一脚将门端开，用手电一照，炕上空空荡荡，一摸被子还有热气。张廷芝估计谢子长在几分钟前得到了消息，肯定现在跑到刘志丹营的驻地张沟门村去了。张沟门村离水砭台只五里路，张廷芝很快

就赶到了，待哨兵发现时，已经晚了，只好放枪报警，然而此时敌人已经冲进了院子，从熟睡中惊醒的战士大部分被缴了械，只有少数几个人突了出来……

刘志丹和谢子长历经艰辛搞起来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尚未正式打出红旗，又损失殆尽。

长路漫漫。

刘志丹横下一条心，一定要搞起一支共产党人独立领导的部队。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议上请求免去自己的特委军委书记一职，要求重返陕甘边搞兵运。在之后的短时间内，志丹独自一人，在甘肃合水县太白镇收编了四股土匪武装，约二百多人。

此时的谢子长由省委派往上海，到中央受训。

一九三一年春，刘志丹奉省委之命，再次与苏雨生合作，准备联合发动起义。苏雨生委刘志丹以团长，驻旬邑职田镇。不慎暴露了起义意图，被当地豪绅告发，刘志丹被捕，囚于彬县。刘志丹被捕的消息传到西安后，省委立即组织营救，在陕西省政府任秘书长的共产党员南汉宸和省府高级参议杜斌丞最终说服了已是陕西省主席的杨虎城，令苏雨生释放了刘志丹。

刘志丹虽然出了狱，但刚刚拉起来的一点武装又被敌人缴械改编了。

他准备从头再开始。

非凡的刘志丹一出狱，就打入平凉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璋部，在桥山南端的宁县成立了一个旅，号称十一旅，自任旅长，没有两个月，已有三百人马。这期间，新的“左”倾错误已经开始，省委曾有一个策动甘军五个旅兵变，建立桥山根据地的计划，并派高岗到平凉找刘志丹联系。但是这些起义多是单纯的兵暴，没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且在路线上都带有某种盲目性，因而都没有成功。刘志丹的十一旅也因与陈璋发生火并而被打败。

刘志丹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连夜出走，只身回到南梁，以百折不挠的精神，集合失散战士，沿着桥山山脉，奇迹般地又聚集起一支二三百人的队伍。

在一个火烧云红遍了半边天的傍晚，走在桥山上的刘志丹沉重地问自己：渭华起义失败以来，你依附过多少军阀？打过多少种旗号？失败了多少次？能永远这样下去吗——辛辛苦苦地把队伍拉起来，再叫人家打下去，在你手里的，永远就是那么几个人几杆枪？

“不行，准备好了条件，我们就得单出去搞！”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陕北的“罗宾汉”脸上浮现出一种少见的冷峻。

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又蹈当年失败覆辙

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延安地区插队青年工作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当周恩来总理走进来的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长时间的掌声。

周恩来朝胸佩毛主席像章的插队知青招了招手，会场安静下来。他看上去有些消瘦，脸色带着倦意。

他在讲述了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之后，谈到了陕北，谈到了刘志丹。这时，他的眼睛亮了起来，声音里充满了感情：

刘志丹像赣东北的方志敏、海陆丰的彭湃、广西的韦拔群一样，是值得纪念的。一九三五年，在陕北贯彻“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搞肃反，提出的材料都是莫须有的。他们决定逮捕刘志丹，信却落在刘志丹的手里。刘志丹看了信后，泰然自若，对送信的通信员说：“你快把信送到军团部去，说我自己去瓦窑堡了。”如果他回来商量一下，局势会有变化。但是，他单身匹马到了瓦窑堡，表现了对党的忠贞不二。

在黄埔的时候，刘志丹是黄埔军校四期的学员，我教过他，但学生多，我不认识他。

我们到了瓦窑堡，给他平了反。我跟他谈话时，他表现很谦虚。后来，毛主席带部队东征时，刘志丹率领二十八军，我是和他一起去东征的。刘志丹在陕北人民中很得人心，确实是人民群众的领袖。我和他东征到清涧时，群众听说刘志丹来了，都来看望他。其中，有两个瞎子看不见，跑到窑洞里，摸他的手。这一点，我现在印象还很深刻。刘志丹后来在攻打三交时牺牲了。

我从一九三五年冬到一九三六年春，和他一起打过仗，时间很短，接触却很多。他很谦虚，是一个非常守纪律的党员。他和方志敏、彭湃、韦拔群一样，都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出身虽不能选择，但革命的道路可以选择。他是投降了无产阶级来搞农民运动的啊！

在延安值得我们纪念的人不知有多少，我只举刘志丹这一个例子……

周恩来讲完之后，会议厅里是一片出奇的安静——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这样冷静沉思的时候是不多的。显然，共和国总理的一番话将革命小将们带到了—一个十分陌生的年代——那同样是一个燃烧着激情的年代。刘志丹裹着白羊肚毛巾，匆匆穿行在南梁的梢林间。

他走上一座高高的山梁，俯视着身前身后的千山万壑，任山风吹拂着火辣辣的胸膛。

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在陕甘边界搞兵运，出生入死奋斗了三年，寻找了三年，如今，他终于找到了一块理想的根据地——南梁。

南梁位于桥山山脉的中段，是一条梢林茂密的大山梁。清朝末年，附近的几个大户征夫派款，在山梁上筑起了高大气派的堡子。由于堡子建在南边的山梁上，人们都叫它为“南梁堡”，后来，南梁就成为方圆几百里梢山林地的统称了。位于陕甘交界处的南梁东距延安、西距庆阳、北距保安均远，山大沟深林密，敌人统治十分薄弱，南边又是照金根据地，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地区。

数百年前，南梁还是一个人口稠密、经济活跃的地区。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灭回，挑动汉、回民族互相仇杀，使南梁地区的劳动人民惨遭杀戮，十不存一，成为一片赤野荒山。民国初年，陕北榆林、横山大旱，大批逃难

农民跑到这里落了户，使沉寂的南梁渐渐又有了生机。与此同时，庆阳城里的地主豪绅也把魔爪伸进了南梁，将南梁最好的几道川地霸占，许多逃难农民又成为这些地主恶霸的牛马。之后，失意军阀、民团、土匪、帮会纷纷看中了这里，你来他往，抓兵拉夫，劫掠奸淫，熙熙攘攘。一些老百姓被逼得活不下去时，唱着“司令多如狗，狗腿满院走，你去他又来，灾祸没尽头……”的顺口溜，也拉起了造反的大旗。

刘志丹经过详细考察，认为：南梁地区天高皇帝远，反动力量统治薄弱，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土地兼并严重，贫苦人民有强烈革命要求，具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地广人稀，自然资源丰富，有利于屯兵养兵，积蓄革命力量；山大沟深，森林绵延数百里，有险可依，回旋余地很大，便于机动作战，开展游击战争。因此，南梁无论从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来说，都具备了与井冈山相类似的发展武装割据的条件，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理想之地。

刘志丹决心在南梁干一番世事。

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在南梁一带活动的杨丕胜、赵二娃、贾生财的三支武装在稻水湾会合，进行整编，建立了陕甘边界第一支不依附于任何人的独立革命武装，当时这支部队尚无正式名称，因活动在南梁地区，老百姓习惯上称之为南梁游击队。共约五百人，刘志丹任总指挥。

一九三一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号召组织群众性的反帝运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全国出现了新的革命形势。

十月底，南梁游击队与杨重远、白锡林、阎红彦领导的晋西游击队以及由师祝杰、杨琪等领导的商贩保运队（反抗官府的商贩武装）在甘肃合水县灵锦庙会合后，在南梁地区休整。

十月三十日，谢子长与担任省委交通的高岗由西安经平凉来到灵锦庙。传达了省委指示。

根据省委指示，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在合水县柴桥子，将部队正式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下辖两个支队，晋西游击队及商贩保运队编为一支队，南梁游击队编为二支队。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二支队队长，第一支队队长师祝杰。

二月初，反帝同盟军移驻甘肃正宁县三家源。二月十二日，省委代表李杰夫（后叛变）赶到三家源，代表省委宣布将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

陕甘高原上，第一次打出了镰刀斧头的红旗。

与此同时，刘志丹回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

刘志丹走后，李杰夫遵照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陕西省委的指示，为陕甘游击队制定了“进军渭北各县，建立城市苏区，坚决反对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方针，指示部队南下渭北。在“左”倾路线的影响干预下，刘志丹、谢子长轮流被戴上“逃跑主义”、“梢林主义”、“上山路线”的帽子，不断变换着领导角色。

五月十日，省委改任刘志丹为总指挥。

这时，敌人部署重兵数旅“进剿”陕甘游击队，省委指示游击队立即北上。五月十五日，刘志丹指挥游击队奔袭旬邑马栏镇，一举歼灭敌——五团两个连。之后，游击队又在焦家坪、五里镇一带发动群众，扩大红军，队伍

发展至一千五百多人。二十日，继续向敌进攻，歼灭白水县及中部县（黄陵县）民团百余人。随后，部队在宜川英旺镇歼敌八十六师一个营，缴枪三百余支，弹药两万万余发。在半个月内，陕甘游击队挺进数百里，经过五个县，大小九战，八次获胜，共歼敌一千四百多人，缴枪一千二百多支。六月，刘志丹率游击队自富县东移，在集义镇消灭民团一部，进至韩城上官庄，发动群众，帮县地方党组织建立了五十余人的赤卫队。原计划在此开辟游击根据地，但因遭强敌袭击，伤亡较大，被迫退至甘肃正宁麻掌子。

短时期里扩充起来的游击队，没有经过严格训练，思想上产生了混乱，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南下三原和北上桥山的争执，相持不下。最后决定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阎红彦取代刘志丹当了游击队总指挥。这时，执行王明“左”倾错误的陕西省委却指示游击队“开展演习阵地战和平原战”，反对游击战，同时又派来李艮（即与潘自力同时被捕的华县县委书记——笔者注）担任游击队政委，进一步推行“左”倾错误。阎红彦、杨重远也被戴上了“逃跑主义”、“上山路线”的帽子。八月，当部队打下五顷原后，又错误地提出死守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五顷原，消灭附近敌人的坚固据点，二十天分完土地等一套过“左”的计划。刘志丹坚决同这种“左”倾错误进行了斗争，并耐心说服，但李艮根本不听，仍令部队进攻敌人坚固的城防，结果连打败仗，使游击队遭受极大挫折，仅剩一百多人的队伍被迫退至马栏附近。

省委于八月底又换马易将，复派谢子长为总指挥，刘志丹为副总指挥。在谢、刘指挥下，游击队在照金诱敌深入，对进剿之敌杀了个“回马枪”，取得了歼敌四百余人的重大胜利。后又在强敌压力下被迫北上保安。

九月，游击队进攻保安失利；十月，再战又失利。撤至合水县梢林地区的平正川时，部队情绪十分低落。谢子长、刘志丹召开队委会，决定分散活动，筹集粮食，解决冬衣问题，发展部队。

十二月上旬，分散各路游击队在合水县黑幕原地区会合，已有五百余人。这时，根据中央北方会议的决定，省委指示游击队开往宜君转角镇整编，准备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

游击队来到转角镇的第三天，一个穿长衫的青年人就出现在狭窄的镇街上，他在游击队战士住的房子里出出进进，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谈话，显得十分活跃。

他就是陕西省委书记杜衡，他此时是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来到部队的。他的到来，给这支脆弱的红军游击队酿成了一场灾难。

八月南方的宁都会议告诉这位陕西的领导人，现在应该做什么。

十二月二十二日，杜衡在宜君杨家店召开党员大会，对游击队一年来的工作横加指责，说刘志丹、谢子长、阎红彦、杨重远等“有反革命阴谋”，攻击他们的正确主张是“游击主义”、“梢山主义”、“土匪路线”“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当场宣布撤销了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等的领导职务。强令谢子长、阎红彦去上海临时中央“受训”。

二十四日，杜衡在转角镇召开军人大会，宣布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当时只有这一个团），杜衡自任军、团两级政委，团长由战士选出的王世泰担任。

红二十六军成立后，谢子长、阎红彦即赴上海“受训”。一九三三年夏，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被重新分配工作，受中共中央北方代表派遣，去察哈尔吉鸿昌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中工作。谢子长恰好分在了许权中师，两位

渭华起义的领导人又相会在长城外的抗日前线……

杜衡知道自己不懂军事，王世泰又太年轻，把刘志丹留下了，但不分配重要工作。刘志丹不计个人得失，仍积极协助王世泰工作。由于军事决定权掌握在一意孤行、一味蛮干的杜衡手中，红二十六军成立仅半年时间几乎就被搞垮了。

历史竟是如此巧合，渭华起义失败五年之后，杜衡又将目光投向了渭华。

本来红二十六军成立之后，就决定建立以照金为中心的根据地。照金是陕甘与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群众基础好，当地虽有几个民团，但人数不多，居住分散，其中一些民团还与红军订有友好协定；加之习仲勋、李妙斋率领的游击队一直在此活动，红二十六军成立不久，又正式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只要路线政策正确，在这里是可以坚持的。但杜衡坚持推行“左”倾错误，只知斗争，不搞联合，当时白军不少军官倾向革命，有些本身就是共产党员或进步分子，和红军联系密切，送枪支弹药给红军，杜衡就骂红军干部是军阀。甚至要进攻与红军有友好协定的民团，使周围民团联合起来反对红军。后来烧了香火很旺的香山寺，惹得几百个和尚也成了红军的对头。敌人越打越多，根据地越打越小，只剩下照金中心的薛家寨，孤零零地处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闹得伤员无处安置，粮食无人供应，情况十分困难。

一九三三年五月下旬，杜衡召开党政军干部联席会议，提出放弃照金，南下渭华重建根据地的主张，极力鼓吹渭华地势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距西安又近，可直接威胁敌人反动统治中心，并宣称这是“百分之百的正确方向”。

对于渭华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刘志丹来说，这是一个似曾相识的腔调。渭华起义的血还没有凝固，他明白此时南下意味着什么。

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坚决反对南下渭华。

然而他没有决定权。

几乎在当年渭华起义的季节，红二十六军主力二团被迫南下。

结果与五年前的渭华起义一样悲壮。过渭河后，杜衡即被强大敌人吓倒，中途借口向省委汇报，私自离开部队逃回西安。不久省委机关被破坏，杜衡被捕叛变。刘志丹、汪锋等率部在终南山与优势敌人苦战两月，终因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团覆没。

刘志丹带十余人冲出重围，又被围困在深山老林里，靠野菜野果充饥。后来在突围时，大部分同志都牺牲了，他只身死里逃生，雨中滑下一道悬崖，摔成重伤，幸被一名战士救起。

西北“罗宾汉”扮成一个跛脚的货郎，摇着拨浪鼓，一拐一瘸地向北走去……

风景这边独好

历史的巧合太多。

渭华起义五年之后，天各一方的谢子长与许权中在张家口相会。三个月后，渭华起义时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参谋长王泰吉又与工农革命军军委主席刘志丹在照金拥抱。

一九二八年六月下旬，渭华起义失败后，王泰吉退入秦岭，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他只身东行，在河南南召县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押送南京。在南京关押近一年，始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后经杨虎城将军具保出狱。出狱后，深得杨虎城赏识，先被委以参谋，后又被任命为补充旅副旅长兼参谋长。

一九三一年，王泰吉随杨虎城由豫入陕，在西安，为解散由土匪改编的马文德旅建立奇功，更得已任陕西省府主席兼潼关行营主任的杨虎城的信任，先后调任他为西安城防司令和新兵训练处长，后来十七路军组建骑兵团，王泰吉又被任命为骑兵团长。

当渭华起义时和王泰吉并肩战斗的许权中、谢子长在察绥前线与日寇苦战之时，王泰吉的骑兵团却被从西安调往三原防共，后又调往耀县，执行“防共剿共”任务。

对于共产党人王泰吉来说，这是脱离杨虎城将军的一个最恰当的时机——在杨虎城遵蒋介石之命“反共剿共”之时，他不难做出自己的选择。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王泰吉率骑兵二千人，在耀县城通电起义，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受挫后，与新成立的耀县游击队等部，先后转入刘志丹、谢子长创建的照金根据地。此时，由于陕西省委被破坏，陕甘边摆脱了“左”倾错误的直接统治，照金根据地发展形势很好。八月十四日，陕甘边特委在陈家坡举行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统一指挥革命武装力量，任命王泰吉为总指挥，高岗为政委。十月四日，刘志丹只身回到照金，即被任命为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十一月月上旬，陕甘边特委和红军总指挥部在合水包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根据刘志丹建议，决定撤销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先成立主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高岗任政委，下辖第三团和骑兵团，全师人枪五百余，并决定建立师党委会。同时，会议鉴于红军暂时撤离照金根据地，部队在无后方的情况下作战十分不利，为坚持和发展革命武装，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这是萦绕于刘志丹心里的一个梦。为了这个梦，早在两年前，他已经在那里拉起了一支南梁游击队。

会后，刘志丹和王泰吉完成了建立南梁中心根据地的计划。三团和骑兵团分兵扫清了反动民团，于十一月下旬，首先在合水小合沟四合台成立了陕甘边临时革命委员会。不久，南梁附近的农村都成立了农会组织，并建立了一千多人的赤卫军。此时，陕甘边根据地的范围，以南梁为中心，北至黑水坡，西至老爷岭，东至平正川，幅员达百余里，从此，以桥山中段为依托的红军游击战争，如燎原烈火发展起来了。

一九三四年一月，王泰吉请求到豫陕边做兵运工作，师党委决定刘志丹任师长，杨森任政委。

在一九三二年冬到一九三四年夏，在陕甘边特委的正确领导下，刘志丹等率领红二十六军主力和游击队配合作战，从南到北，大小战斗三十余次，

歼敌三千多人，解放了陕甘地区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掉了敌人成百据点，建立了大片地区的工农兵政权和十四个游击支队。同年秋，在梨园堡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任苏维埃政府主席。

与此同时，陕北地区的游击战争也发展起来了。一九三三年夏，以崔田夫、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决定划陕北为四个游击区，开展游击战争。一九三四年一月，谢子长回到陕北，由中共中央北方代表孔原任命为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同年七月二十八日，谢子长带领陕北游击队来到陕甘根据地，参加陕甘边特委在阎家洼子召开的红二十六军和陕北游击队干部扩大会议，推谢子长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会后，谢子长率红二十六军三团返回陕北，先后在安定、绥德、清涧、横山等地连打胜仗，粉碎了井岳秀对陕北根据地的“围剿”。

八月二十六日，谢子长在清涧河口战役中负重伤。

十二月，遵照北方代表指示，陕北各路游击队正式改编为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后改为八十一师，师长先后为杨琪、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在此期间，刘志丹多次探望辗转养伤的谢子长，两人就陕甘和陕北两地区统一领导、两支红军统一指挥共同作战等问题交换意见。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砭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军事委员会以及西北军委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谢子长当选为西北工委委员，分任军委主席、副主席（另有说谢子长为主席，刘志丹为副主席——笔者注）。第二次反“围剿”开始后，刘志丹又兼任了前敌总指挥。

二月二十一日，参与领导了清涧、渭华两次起义的谢子长因久病不愈与世长辞，年仅三十七岁。

同年，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决定将谢子长的家乡安定县改为子长县。

一九四六年，在谢子长陵园落成典礼上，中共中央西北局送的挽联引人注目：

一生为人民创造红地
百姓到如今叫你青天

刘志丹怀着失去战友的痛苦，又指挥着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投入新的反“围剿”斗争。

蒋介石对西北革命发展形势极度恐慌，于一九三五年二月，调驻河南的高桂滋部八十四师及陕甘宁青四省军阀军队，共四万多人，对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此时，根据地虽有迅速发展，但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两军主力不过四千人左右，游击队也只有三千多人。面对强敌，刘志丹采用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声东击西，始终占据着战场主动权，结果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此次反“围剿”中，缴获长枪三千支，轻重机枪二百多挺，俘敌约二千人，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保安、靖边六座县城，使陕北、陕甘两个根据地完全联成一片，在二十多个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游击区扩大到三十多个县，根据地范围扩大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临黄河的广大地区，主力红军发展到五千多人，游击队发展到四千多人。

风景这边独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存下来的革命根据地。

西北工农红军第二次反“围剿”胜利之际，正是中央红军长征快要到达陕北之时。蒋介石为了使中央红军无立足之地，于八月间，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为了表示与刘志丹决一死战的决心，他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以张学

良为副总司令，除调集陕、甘、宁、晋、绥五省军阀军队外，还调集了驻陕西的东北军主力和国民党中央军一部分，共十万人，超过西北红军十多倍。刘志丹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制定了集中主力红军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趁敌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先发制人，首先打垮了刚渡过黄河的阎锡山部两个旅，迫使阎军退回山西。接着又集中兵力进攻北线敌人。恰在这时，徐海东、程子华等率领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西征到达陕北。九月中旬，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在延川永坪镇胜利会师。会师后，三个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徐海东、刘志丹率部南下。十月二日，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全歼敌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属队，击毙师长何立中，使敌人受到极大震动。

正当反“围剿”斗争胜利进行的紧要关头，王明“左”倾错误却在陕北恶性发展。“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决定“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和“肃反运动”。他们先是利用永坪联席会议决定的组织上的变动，不公正地将刘志丹排斥在新的省委和军委领导之外，接着即以“肃反”为名到处捕人。凡是原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和西北军委机关、陕甘边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部被捕，严刑逼供，指名要招出刘志丹是“右派反革命的首领”。

在这种背景下，发生了本节开头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告诉革命小将的那一幕。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旗镇。当他听到根据地正在肃反，刘志丹等人已被关押时，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马上派出王首道、刘向三、贾拓夫等代表党中央，奔赴瓦窑堡接管“左”倾错误控制的保卫局，为刘志丹等红二十六军干部平反。

兹引用当时参加过为刘志丹平反的会议的杨和亭的一篇回忆录，作为对周恩来总理前面那番讲话的补充：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博古、董必武、邓发、李维汉、张浩、贾拓夫、王首道、朱理治、郭洪涛、王达成、聂洪钧、刘志丹、高岗、杨琪、杨森、戴季英等参加了会议，我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张闻天说，中央召开这次活动分子会议，主要是解决西北错误肃反问题，对刘志丹等同志的处理是一个冤案，应该纠正，现在请王首道同志将情况向大家讲一讲。

接着王首道讲了错误肃反的经过和处理意见。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又让戴季英讲话。戴的态度很不好，不承认错误，大家都很气愤。杨琪、杨森等同志边说边哭，大家都流了眼泪。

戴季英执行“左”倾路线，残酷迫害革命同志，用法西斯的手段，体罚、拷打、杀害、鼻子灌辣子面、坐老虎凳，还在下湾寺活埋了不少好同志。到会的很多同志都很气

愤，几乎使会议开不下去。

这时刘志丹站起来发言，他的思想境界很高，讲话的内容大约有三点：一、同志们受了委屈，现在党中央到了陕北，正确地处理了这些事情，弄清了问题，大家应该高兴；二、中央领导全国，大家都要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要拥护党中央的决定；三、有些同志现在身体不好，要休息，要很好地学习马列主义。

刘志丹讲完后，会场上气氛好多了，哭声也停后来，张闻天又让戴季英继续发言，如果讲得不好，只能讲三分钟。戴季英的态度仍然不好。这时，董必武、邓发、李维汉等同志高声说道，停止你的发言，让别的同志讲。接着朱理治、郭洪涛等同志继续发言，会议宣布了冤案的处理决定。

刘志丹平反后，党中央将陕甘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编成红二十八军，刘志丹先后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办事处副主任（周恩来兼主任）、红二十八军军长、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等要职。

一九三六年二月上旬，中共中央为适应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迫切要求，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命令刘志丹和宋任穷（红二十八军政委）率红二十八军担任侧翼，从佳县以北渡黄河，插入晋西北地区，配合中央红军迅速打通走向抗日前线的道路。

四月十四日，刘志丹遵照中央军委和彭德怀司令员、毛泽东政委的命令，亲临前线指挥部队攻占山西省中阳县三交镇时，不幸左胸中弹牺牲，年仅三十四岁。

四月二十四日，瓦窑堡市各机关、团体在城内戏台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会后，周恩来亲自扶灵，将刘志丹安葬在瓦窑堡市南门外二三里处的山坡上。

五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蓝天白云下，荒山野岭间，一支歌子刚刚唱开了头：

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真勇敢，

他带上队伍上横山，

一心要共产……

中国革命将从这里继续前行……

后 记

追寻历史，费时费事。尽管二十年代发生在陕西的清涧、渭华两次起义在悠悠的历史长河里还只能划到现代，但毕竟距今已有七十年，当年的婴儿，如今也已古稀。透过历史烟云，打捞逝去岁月里的细枝末节，漫无目标，两眼茫茫。兰州军区司令部编研室的刘思雨同志和兰州军区政治部编研室的袁俊宏同志热心地提供了采访线索和他们手边的资料。之后，在采访和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又得到了陕西省社科院、陕西省委党史征集办公室、陕西省政协文史研究室以及渭南市党史办公室等单位的大力协助和支持。在此，谨对上述单位和同志表示真诚的感谢。

主要参考书目有：《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上海人民出版社）、《陕西党史资料丛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冯玉祥在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刘志丹》（陕西人民出版社）、《刘伯坚将军传》（陈永久著解放军出版社）、《谢子长将军传》（银笙著解放军出版社）、《潘自力》（陕西人民出版社）、《蒋介石与冯玉祥》（周玉和著吉林文史出版社）、《回忆杨虎城将军》（陕西人民出版社）、《陕西民国人物》（陕西人民出版社）等以及有关报刊。对上述出版社及作者，笔者也在此表示感谢。

李镜

一九九七年一月二十五日

